



ISSN 1882-6571

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 II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2016 年 3 月

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編集委員会 ICCS-JMCS editorial board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

〒453-8777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平池町四丁目 60 番 6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ichi University
4-60-6, Hiraike-cho, Nakamura-ku, NAGOYA, Aichi 453-8777 JAPAN



ICCS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Ⅱ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Ⅱ

◆第2巻第1号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宋以敏	1
中国の大国化と国家イメージの改善のジレンマ 高井潔司	8
〈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と東アジア —覇権交代の過渡期分析への一視点— 鈴木規夫	19
中国模式的政治形态：原理及其由来 臧志军	27
中国的価値観の拡散と国際社会 遊川和郎	34
中国国際影响力的增强与国内媒体产业-以新闻出版业做大做强战略为例 西茹	42
北京奥运开幕式与“印象中国” 周星	50
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需要の拡大 渡邊浩平	53
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変貌する中洋国際政治 イタマール・リー	62
中国の対外教育—孔子学院を中心に 馬場毅	72
現代中国の儒教運動—蒋慶の政治儒学に見る文化主権の諸問題— 緒形康	81
中国における差異の政治と民主主義 —新疆「民族問題」の経験が示唆するもの— 小嶋祐輔	89
中国环境问题的国际化与日本的学术贡献 一之瀬俊明	99
中国の乾燥地域における日本人による緑化活動について 藤田佳久	107
日本風水史 渡邊欣雄	113

人水和谐理想之地-东北三江平原自然环境与水资源开发思考 宋献方 张兵 张应华 韩冬梅	122
図們江流域開発の兆し 大澤正治	135
国連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の中国による受容と政策展開 加治宏基	142
国際社会に向かい合う中国の民間組織の可能性 高明潔	150
由“归侨之家”活动看“侨”网络的形成 奈倉京子	160
「省管県」制度の一考察—浙江省の例を通して— 兪嶸	176
中国からの不法移民—香港への密航を中心に— 愛みち子	183
(公募論文)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Utilization in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A Tale of Two Cities Jia LI Tomohiro AKIYAMA	190
交通变革与近代郑州地域构造的变容 刘晖	203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程序化”“执政” —简析中国三十年来执政哲学的程序理性转向，兼谈作为社会行为(制度) 正当性依据的科学的意象的变迁 涂明君	211
当代藏汉的佛教交流:色达的民族志对话 李晋	237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宋以敏¹

非常感谢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再一次来到这里，和各位学者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世界影响问题交换意见。记得2007年初，我在这里的学术讨论会上，曾就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交的关系作过一次发言，其中谈到中国学术界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今天就想围绕本届会议的主题，再着重谈一下中国和平发展路线的确立和对时代判断的关系。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会分成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三十年？头三十年经济没有发展，对世界所作贡献甚微；后三十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以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时代的判断不同和据此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因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下面就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三十年及其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分三部分谈一些纯属个人的看法，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评指正。

I 前三十年我们对时代作了错误的判断

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化传承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大国，曾对人类作出过不少杰出贡献，还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实体的地位。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和其他重要社会指标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进入近代，更迅速衰落，终于沦为“东亚病夫”，受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摘掉了“东亚病

夫”的帽子，并且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摆脱了农业国的地位，还自主研发出能够说明已具备成为大国条件的“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地球卫星）。但就经济发展而言，却并未根本改变长期停滞的趋势，这使我们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² 其实，在1958年前的八年，推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些政治运动，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头几年经济增长较快，是由于带有恢复性质和土地改革对农民的解放，以及在苏联援助下开始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建设。但是三大改造，特别是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却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从总体上看，建国后头三十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

共产党的宗旨不是要解放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吗？为什么会事与愿违呢？简单说来，就是由于我们对时代判断错了。以错误判断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方针和选择走的道路，自然不会对头，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时代的判断对党和国家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什么是时代呢？我们这里所说的时代，就是指整个国际形势在一个相当时期发展的总趋势，主要涉及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对时代特征，也叫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历来都把时代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因为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还是知识的更新积累，二十世纪下半期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大发展的时代。

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正确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各共产党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其他重要政党和国家，在制定纲领和政策时，首先考虑的也必然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只是可能不用时代和时代特征这些名词就是了。我们国家头三十年丧失一次特别好的发展机遇，吃了大亏的原因正是由于，明明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我们却坚持认为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

世界局势发展表明，二十世纪可分为大体上各为一半的两个时代。前半世纪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后半世纪为和平与发展时代。这里讲的战争是指世界大战，不算局部战争和一些国家的内战。因为只有世界大战才能影响到整个世界（特别是所有大国）和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³ 这里讲的革命，也是指世界大战引起的世界性革命运动，而不是指个别国家的革命。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情况正好就是这样：两次世界大战（加上战前备战和战后恢复），大战引起两次世界性革命浪潮。战争与革命及其对全球的影响，确实贯穿了整个上半个世纪。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期，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战争与革命时代由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人们看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不但世界大战早已停止，而且战争的创伤也得到基本平复，各国的主要任务都已放到本国的社会发展上面。与此同时，二战引起席卷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许多国家也先后取得胜利，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在发达国家中，战败的法西斯国家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造，其他国家也都进行了一定的民主改革，建立和改进了社会福利制度。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下半期，虽然还有美苏之间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以及各种恐怖活动，但是就总体来说，世界还是赢得了持久和平，人类过上了长期的和平生活。而且正是在和平的条件下，世界上掀起了两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把人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全新阶段。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进步，

问题就是这么明显：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世界就已走出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是中国却仍然认为时代没有变化，并且坚持了三十年。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认为有外来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从外来因素讲，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世界革命。而且根据列宁主义，二十世纪初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也就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不但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坚持对时代的这种判断。这也是它们后来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国际因素外，中国还有自己本身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个实行高度集中制的党。党章规定全党服从中央，在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后就是全党服从毛泽东。而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所有领导成员又都是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观察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方式总会受到战争年代经历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就只讲不断革命，而不知发展经济。邓小平在1985年改变对时代的看法后，也批评毛泽东说，“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⁴

前面说过，对于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基础和前提。正是由于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错误判断，所以据此制定的方针路线自然会犯错误。这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并执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且随着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估计愈来愈“左”，制定和执行的政策也越来越偏激。例如由于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一开始经济建设就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地区发展布局上不去发挥沿海和大城市的优势，而把重点放在条件并不方便的内地。后来更发展为搞“山，散，洞”的“三线”（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建设，就是把新建的工业项目以及从沿海搬迁出来的一些重要企业，分散到西

部山区的洞穴里。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战争的威胁估计得更加严重，甚至认为迫在眉睫，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中国准备打仗的言行，曾经一再震惊世界。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曾声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⁵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随着自己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激化，中国的对外战备也更为加紧了。毛泽东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全国响起了“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口号，使国家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到处挖战壕，防空洞，地下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顾上经济建设？最后更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

这还只是谈的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对策，至于国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影响就更大更深远了。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严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再加上对外闭关自守，就把国家经济给弄得很死了。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人民遭受到巨大苦难和牺牲，也摧残了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无可挽回地伤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元气，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II 在时代判断上的拨乱反正及其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的世界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不管人们在理论上是否承认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代替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只要实际上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一定快，否则就必然落后。1980年代以前的日本和中国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东京等城市几成废墟，人民缺衣少穿，饥寒交迫，一直过着苦日子。后来由于进行

了民主改造，执行了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从实现全面恢复的1955年到1970年，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创造出“奇迹”，成了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处在和日本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经济总量还大大超过日本。但由于对时代判断错误，竟与世界潮流反其道而行。人家着眼于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我们却重视对内搞“阶级斗争”，对外花大力气支援世界革命，还因此引起了不少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不满。二战后一个特别重要的世界潮流是国际化的快速发展；我们却实行闭关自守，防止“和平演变”和反对“西化”。总之，人家在迅速发展，我们却落后倒退，很快就拉大了差距。例如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4.7%，1980年下降到2.5%。而日本却从1955年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2.4%（约为中国的一半）上升到1980年的9.5%（已为中国的四倍）。另据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提供的数据，1948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的第四十位；到了1978年，反而排到了倒数第二，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二，而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看，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都排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70位以外。⁶

在十年浩劫后，中国人从上到下都认识到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瞎折腾了，必须拨乱反正，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针新路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实行这一转变是比较容易的，但开始时却没有解决对时代特征的判断问题，因此也就不能放下心来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因为在决定改变发展路线前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有好些年还坚持认为，战争只能推迟，不可避免。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战争究竟能推迟几年，要不要为打仗作积极准备，现在搞的建设一旦打起仗来不就又破坏了，等等。总之，不改变帝国主义必然产生战争的过时观念和对时代的陈旧判断，就不可能彻底走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好些年的拨乱反正大讨论中，也包括对时代特征的重新认识。例如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支

援世界革命（实为输出革命）是否对头，以及对美国，苏联和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仅学术界，而且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此同时，中国的党和政府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大量派人出国访问，了解国外情况和学习外国经验。经过讨论和观察，意见渐趋一致。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改变了对时代的认识和判断。

从1984年起，邓小平就多次向外宾谈到，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改变。比较完整的说法是两次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一次是1984年11月1日，他说战争危险我们讲了好多年了，现在应该作出新的判断，这样才能够安心地搞建设。否则，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搞建设，更不能搞全面改革。⁷另一次是1985年5月4日的讲话，正式宣布了中国对战争看法的转变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的转变。⁸在同年3月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⁹随后中共中央又明确界定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不但将其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定为国家长远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学界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界，长期热烈讨论世界是否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起因。所幸最后在大多数人中达成了共识，持不同看法的已经很少了。

1980年代解决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特征的判断问题，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建设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标尺。从此，中国在经济上摆脱了两千年来长期停滞的局面，走上了空前的快速发展道路，并放手解决了与此有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市场化。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国家要得到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市场化和技术革新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落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实行对内对外的市场化。正好，从1970年代后，世界兴起市场化潮流，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参与市场化的人口数量一下子由六亿上升为六十亿。中国虽然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但还是赶上和进入了市场化潮流。另

一个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在这之前，由于国际交往中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所以被称为国际化）。全球化固然是全面的，包括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首先还是经济全球化。中国在解决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后，就更加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实行市场化和参与全球化以后，中国经济更是如虎添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例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其速度之快，大概就破了世界纪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得上。不少大中城市，真像当年邓小平对上海所要求的那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美。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但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甚为突出。三十年的发展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三百年，甚至三千年。现在十多天的产出就相当于1978年全年。中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一个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也已接近日本。当然，按人均产值和技术水平等重要指标看，中国跟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即使好好干，发展顺利，恐怕三五十年也不一定能赶上它们。

不仅如此，还应清醒地看到，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神速，但也存在着不少比较严重的问题，绝对不能忽视。由于我们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认识和把握还不够全面，拨乱反正做得很不彻底，因此就没能完全跟上世界潮流。前面说过，二战后有两大世界潮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我国的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化也不够成熟。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知道，我国经济发展快，首先是由于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是在低人权，低人力成本和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的条件下取得的，基本上还是粗放型的发展。其次，是由于二战后有技术革命中的大量成熟技术，可以被我们引进；有现成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地让我们参与。更由于我们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和碰上并利用了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机会，发展了他们开始转移但仍属必须的产业如家电，服装以至钢铁等。这就使我们经过一段

时间后已越来越紧迫地遇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大问题。认识很早，但却转得很慢。按人均计算，中国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长期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实行粗放经营，不但在寅吃卯粮，而且也难以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大问题。

带来的问题当然不止这些，还要更多。例如我们十多二十年贫富差距的拉大就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几百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比日本高得多。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都很显著。到一些大城市看，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但是到内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看，却相当贫苦和落后。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社会还不是个成熟的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很大距离。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滋长了不少社会矛盾。

以上情况说明，经过三十多年前对时代判断的拨乱反正，中国很快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国人民也感到自豪。但不容忽视的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偏见和误解。在国内，部分人中产生了一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的倾向，助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外，一些人产生了对中国的疑虑，嫉妒甚至畏惧，鼓吹“中国威胁论”，把中国的和平发展说得很是可怕。还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中国说成已经是或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甚至提出美中联合领导世界的所谓“G-2”。上文提到我们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要说明，无论是头脑发热的中国人还是怀有疑虑的外国人，都是只看到中国的经济成就，甚至有很大夸张，而忽视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中国不但没有资格和美国相提并论，而且邓小平老早就宣布：“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III 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的第一人口大国。但是我们感到惭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不但对世界贡献甚微，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在某些问题上成了世界的拖累和给一些国家添了麻烦。例如由于“大跃

进”和反“右倾”，人为地制造了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就曾牵动美苏等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它们都曾提出要提供援助。我们当时也确实花钱进口了大批粮食。至于添麻烦，这里主要指那个时候的支援世界革命。为了尽国际主义义务，搞世界革命，我们确曾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团体提供过人力，物力，财力的援助，做了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接受中国影响的还不在于其内。例如一些发达国家中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产生的极左思潮，好像至今还没有绝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毛派游击队之类，也还在继续活动。当然这决不是说，新中国头三十年对世界只有负面影响，没有正面贡献。其实，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存在本身，就是促使殖民主义体系崩溃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更不用说实际活动了。所以，否认新中国头三十年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后三十年，正像前面讲过的，由于端正了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改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中国经济就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国力的日益加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这里只大略列举以下几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试想，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处于动乱和贫困的状态中，那将是对世界多么大的威胁。单是一个难民潮就会使世界不胜负担；如果再继续支援世界革命，那又会使许多国家不得安宁。而中国的发展本身，起码也意味着五分之一人类的进步。这个道理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一个大国的兴起，大多要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这次中国的兴起却并没有走这条路，而且在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也不容许任何新兴国家走这条路。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成长，加速了世界战略格局的多极化，抑制了霸权主义，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保证。

第三，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世界市场化

和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巨大推动力量。中国的兴起和世界统一市场的最后形成几乎同步，这决不是偶然的。而市场化就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世界面貌和人类历史，这是人们都已看到的。

第四，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大批廉价商品，特别是广大中下层群众日用的必需品。这就是为什么近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只涉及轮胎，钢管等产品，而不敢触及服装等日用品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建国后头三十年，中国的外交主要谈政治，后三十年已经越来越以经济为重点了。许多国家要和中国搞好关系，主要的就是看好中国这个市场。

第五，经过三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国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曾经起过救火队的作用。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起的这次金融危机，人们又把眼光转向了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GDP虽然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和欧盟的四分之一，但从2007年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居世界第一位。

第六，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和规章制度的修订，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秩序的不断合理化，也捍卫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前，解决世界经济有关问题，好像只是由几个大国说了算。开个G-7首脑会议甚至财长会议，由它们制定的章法和采取的措施，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大约就只能跟着走。现在不行了，发挥作用的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G-20会议。而且重大问题总还要先同中国商量。如果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同意，发达国家涉及国际经济问题的意见也就很难行得通。

第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国际事务，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是有力的推动。头三十年，中国国力弱，国际影响小，大国间讨论和决定问题，经常是对中国置之不理，中国只能靠发表声明和开群众大会发表意见和表示抗议。现在已大为不同，正如最近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要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已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本身的态度也

有很大变化。例如中国以前不参加联合国的维和，现在就积极参加了。其他如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处理地球温室效应，反对军备竞赛进入宇宙空间，等等，中国都不但积极参与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和措施，并且以身作则，自觉遵守。

第八，中国积极参加和推动地区合作。我们认为，地区合作和走向一体化，是世界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和步骤，因此这有利于全球化发展，也合乎全球化的总趋势。在这方面，中国实行和平发展路线以后，已做了大量工作，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发展合作，组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非论坛，同一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等，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参与方可以立即从中得益，而且宏观地和从长远看，这本身就是在为世界和平与合作，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做着重要的奠基工作。

第九，中国的和平发展使中国的实力有所增强，可以对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做出一些贡献，进行一些援助。头三十年我们也进行对外援助，但那是在自己勒紧裤腰带蒙受牺牲的情况下进行的，数量自然有限，而且多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或出于领导人的好面子，效果不大也并不都好。现在的援助，不但数量较大，而且完全是为了相互合作和促进对方的经济发展。例如为应付金融危机向上海合作组织中的中亚成员提供的百亿美元的现汇基金，三年来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优惠贷款，减免债务等，都收到很好效果，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十，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促使国力逐渐强大，中国对世界所负的责任也不断增加。头三十年，中国顶多被视为地区大国，所负责任自然有限；现在被视为世界大国，当然就要对全球事务负责。中国也确实称得上负责任的大国。不但对世界经济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如这次对待世界金融危机；而且对涉及全球和人类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持积极和负责的态度，如对这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就自主提出得到各方称许的减排任务。其他如地球生态的保护，传染病的防治，不参加军备竞赛等等，就不用多说了。

上面列举的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的贡献，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些至少说明，比起前三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了。能做到这点，正是由于我们改变了对时代的误判，执行了和平发展路线的结果。世界上有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也公开声明，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和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个好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和挑战。

当然，中国在过去一直到现在的发展中，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互相学习。至于说到有一个“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中国的主流舆论已经表示否认，而且在中国的经验中本来就有一条重要原则：各国的事情只能按照各国自己的情况办理，照搬照抄外国的一定失败。

也许人们会问，过去的和平发展使中国变得日益强大，那么强大以后还会不会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我看来，答复是肯定的。因为首先，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上面已经列举一些急需克服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解决起来就得很长的时间，更不用说工业化，城市化，变成文明国家，实现公民社会了。就算我们的经济总量（GDP约四万亿美元）赶上以至超过了日本，那与另外两个经济实体美国（约14.4万亿美元）和欧盟（约18万亿美元）还有极大差距，而两者的人口不过三亿和五亿左右。日本的人口更是我们的十分之一。中国要在人均这个硬指标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恐怕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办不到。其次，从世界形势和人类社会两者的发展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保持下去。人的聪明智慧的快速提高，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利益交错和文化融合的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以及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等，都制约着世界大战的发生，世界革命似乎也看不到前景，而需要人类加强合作共同对付的，却是来自自然界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主要国家也不敢冒人类毁灭的风险对别的大国发动战

争。当然，局部战争，各种冲突和暴力事件，今后还会不断发生，频率甚至还会提高，但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大约不致再有了。世界将长期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

中国早已把走和平与发展道路定为长久的基本国策。对这一点产生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²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⁵ 《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

⁶ 《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

⁷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2页。

⁸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8页。

⁹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9页。



中国の大国化と国家イメージの改善のジレンマ

高井 潔司¹

I 問題の所在——大国化と「中国イメージ」のギャップ

中華人民共和国は2009年10月、建国から60周年を迎え、盛大に祝賀会を開催した。祝賀会の席で、温家宝首相は、「60年来、中国共産党の指導の下、全国の各民族、人民は、団結奮闘し、刻苦創業の精神で努力し、中華の大地に巨大な変化をもたらし、国家の経済実力、総合国力は大幅に増強し、人民の生活には顕著な改善が図られ、社会文明の程度は大幅に上昇し、国際的な地位は空前の高まりを見せている」と、60年の成果を内外に誇示した。

中国が経済規模において1、2年以内に、日本を追い越し、アメリカに次ぐGDP大国になることは確実と言われる。2008年秋以来の世界的な金融危機の中でも、相変わらず高い経済成長を記録し、世界的な景気回復の牽引役さえ期待される。温首相が「国際的な地位は空前の高まり」と語るのは自然の流れでもある。それをもたらしたのは、後半30年の「改革・開放」路線であると指摘した点も注目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

しかし、その一方で、手放しの礼賛ではすまない問題も指摘されている。国慶節の直前、開催された第17期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第4回総会で採択された決議では、温首相の国慶節祝賀会演説と同様に、「総合国力が大幅に躍進し、人民の生活も明らかに改善し、国際的地位も顕著に高まった」としつつも、「世界は多極化し、経済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深く進展し、科学技術の進歩も日進月歩であるが、国際金融危機の影響も深まり、世界経済の枠組みにも新しい変化が発生している。国際的な影響力競争において、新たな状況が出現し、グローバルな思想、文化交流において、融合と角逐という新たな特徴を呈している一方、先進国の経済、科学技術面での優勢が依然として続い

ている。総合国力競争と各種の影響力争いという面では、さらに競争の激烈化の傾向を帯び、不安定、不確定の要素も増大し、わが国の発展に新たなチャンスと挑戦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との厳しい現状認識を示している。建国60周年というお祝いの席の演説とは違って、国家を指導する共産党の方針を決定する党中央委員会の決議にこそ、中国の本音が表れていることはいまでもない。

とくに中国の大国化の成果を祝うべく計画された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年である2008年はチベット騒乱に始まり、各地での聖火リレー妨害事件、中国の食品の安全を疑わせる事件が頻発し、さらに2009年7月の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の暴動事件に見られるように、中国の国際的なイメージは、大国化とは反比例するように低下しつつあるとも言える。それは、中国当局にとって、中国の体制転換を求める圧力と映るとともに、中国の国民の大きな不満²を呼び覚ました。時には大衆がデモ行進など直接行動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もあり、中国の前途を脅かす不安定、不確定要因となっている。

「改革開放以来、わが国の経済は発展し、社会は進歩し、民族は団結し、政治は安定した。対外的にはたゆまず平和発展の道を歩んできた。しかし、遺憾なことは、中国の日増しの発展、進歩、文明、開放の実際のイメージと相反し、わが国の国際的イメージは西側メディアの筆の下で、再三歪曲され、誤読され、甚だしい場合は醜悪化されている」と、国営新華社通信の周錫生・副社長は慨嘆する。³周論文は、西側メディアがさまざまな問題を取り上げ、「中国崩壊論」、「中国脅威論」さらには「中国責任論」まで振り撒いていると、国際社会における西側主要メディアの情報発信の独占がその原因となっていると批判する。

一連の事件を通して顕在化した、中国当局及び国民の大国化に対する自信の高まりと国際社会における中国イメージ低下との間の根深いギャップは、08年の五輪聖火リレー妨害事件の際、中国国内で発生した反フランスデモなどに見られるように、政府レベル、国民レベルにおいて、国際社会との対立や摩擦さえ生じている。

そうした中国の大国化をめぐるイメージギャップ拡大に、内外のメディアによる情報発信とそれ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国際世論の問題が深くかかわっていると言うまでもない。本稿では、大国化にふさわしい中国イメージの改善を求める中国の指導者の発言と、その指示を受けて展開される中国国内のイメージ改善論議を紹介しながら、その問題点や今後予想される展開を明らかにしたい。

II 政治課題となったイメージギャップの是正

国慶節の祝賀行事の後、中国イメージをめぐる内外のギャップを踏まえた興味深い会議が北京の人民大会堂で開催された。10月9日から10日にかけて、世界の新聞、テレビ、通信社など多国籍メディア、メディア Congrès マリットの首脳を集め開催された「世界メディアサミット」である。会議には胡錦濤国家主席(党総書記)自ら出席し、「それぞれのメディアは人類の平和と発展という崇高な事業に力を尽くし、世界各国の政治上の相互尊重、平等な協調・対話、経済上の相互協力・相互補完、文化上の相互参照、小異を残して大同に着く精神、安全保障上の相互信頼、協力強化、環境保護上の相互扶助、協力の推進、人類のより美しい未来の共同創造の促進に努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述べた。主催者側の挨拶として建前を語っているが、それでも演説では、「世界各地のメディアは十分に自身の特徴や優位点を発揮しながら、平等な相互信頼、相互の勝利、共同発展の理念を堅持し、よりよく交流、協力を展開し、心から社会的責任を担い、ニュース情報の真実、正確、全面的、客観的報道を促進しなければなら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ない」と、メディアの国際的な平等、協力を呼び掛けおり、その点に中国での開催の意味が込められている。

そして、その真意は、2008年6月、チベット騒乱事件の後、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前の国際世論と中国世論のギャップが最も甚だしかった時期、党機関紙・人民日報社を視察した際、胡錦濤総書記みずから明らかにしている。

「われわれは前進する道筋において、得難いチャンスとともに、厳しい挑戦にも直面している。チャンスをしっかりつかみ、経済、社会をよりよく、より早く発展させ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が、挑戦に対処するにあたって、「平時において乱を忘れず」の精神で、時々刻々、各方面の困難とリスクに対応する必要がある。特に注意すべきは、当面、世界的規模で、各種の思想・文化交流の融合と角逐という相異なる現象が更に頻繁に起こり、“西側が強くわれわれが弱い(西強我弱)”の国際世論の構造がまだ根本的に変わっていない点だ。ニュース世論領域の闘争は更に激化し、更に次第に複雑になるだろう。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下で、ニュースの宣伝活動の任務のいっそう難しくなり、責任は更に重大だ」

この演説では、大国化という現実の一方で、チベット騒乱事件など重大な事件が相次いだように、今後もまだまだ困難とリスクが予想され、その際、「西強我弱」という国際世論の構造は変わっておらず、報道部門は「ニュースの宣伝活動」の改善に力を入れ、この状況に対処すべしと指示したのである。そこでは、世界メディアサミットでの穏当な発言とは違って、「世論領域での闘争」という厳しい現状認識が示され、内外の世論の「引導(誘導)能力」の引き上げが強調された。この発言は、チベット暴動以来、国際世論の形成にあたって圧倒的な力を持つ西側メディアによって、中国が受身に立たされ、批判されてきたことに対する苛立ちを読み取ることができる。

視察の3日後、宣伝・報道部門を統括する党中央宣伝部は、報道関係者だけでなくメディア理論研究者、教育者に対しても、

この演説の精神を「真剣に学習し、宣伝を貫徹することを要求する」通知を出し、そのための学習会の開催や新聞、雑誌でのキャンペーンを展開した。⁴この通知を受け、国家イメージに関わる重大事件の報道のあり方、国際報道における主導権獲得について、議論が高まった。⁵そして、世界メディアサミットの席上、胡錦濤総書記自身、各国のメディアの情報発信の平等を訴えたのである。

中国の対外イメージの改善は、この演説によって政治課題のひとつの柱になった。もちろんこの問題の指摘は胡錦濤総書記個人の発想ではない。21世紀に入ったあたりから中国の大国化の流れが決定的となり、その中で大国化をめぐる内外のイメージギャップが徐々に現われ、それが内外の政治、社会情勢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したがって、中国のイメージアップ戦略はすでに21世紀に入ってすでに着手されてきた。例えば、国務院国家ラジオ・映画・テレビ総局は2001年、「ラジオ、映画、テレビの“走出去工程（海外進出プロジェクト）”実施細則」を公布し、中国文化の海外進出の大キャンペーンを繰り広げ、中国のイメージアップ作戦に乗り出した。実は胡錦濤総書記自身、2008年1月に北京で開かれた「全国宣伝思想工作會議」の代表との座談会の席上、「しっかりと宣伝思想工作の指導権、主導権を握り、偉大な旗印を高く掲げ、民族精神を奮い立たせ、人民大衆に奉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さらに深刻な認識とさらに開かれた思考、より効果的な政策と措置によって、社会主義の中核となる価値体系の建設と壮大な主流思想を導く世論の確立、改革・創造の推進、社会主義文化の大発展・大繁栄の推進、国家の文化のソフトパワーの引き上げに力を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の指示を与えている。

にもかかわらず、胡錦濤総書記の人民日報視察時の演説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オリンピックイヤー”という、中国にとってソフトパワーの高まりを世界に示す絶好のチャンスさえ逃しかねない状況に陥っていた。胡錦濤総書記の一連の演説はそうした中国の

III イメージアップ作戦の3つの流れ⁶

中国の国家イメージ改善に関する論議や具体的な対応には、三つの大きな流れがある。議論の分かれ目は、イメージギャップの原因をどこに求めるのかとの点から生まれている。

一つの流れは、国外のメディアの報道にその原因を求める議論である。すでに胡錦濤演説でも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西強我弱」という国際的な情報発信力の格差の下で、新華社の周副社長が批判したように、西側メディアの報道によって中国イメージが歪曲されていると主張する流れである。こうした流れは、主に報道現場の幹部や記者出身の研究者に多い。2008年チベットで暴動が発生し、独立を叫ぶ多数のチベット人が逮捕され、警察、軍との衝突で死傷者が出たが、中国当局を非難する欧米の報道に対して、中国国内では、当局だけでなく、反発の声が高まり、西側メディアの偏向報道と正すという論壇(例えば反CNN論壇)が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に設置されたり、新聞などでも西側報道を批判したりする論調が目立った。反CNN論壇は事件直後の西側報道を受けて、民間人青年実業家によって立ち上げられ、CNNのニュースで報道された画像が別の場所の映像であるなどの点を指摘して、中国国内で大きな反響を巻き起こした。個人の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はあまりにも専門的な情報が盛り込まれていて、当局は否定しているものの、当局の指示によって組織的に作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いかとの見方が西側メディアで目立った。⁷「人民日報」などの伝統メディアもそれを転送し、ネット世論に追随する形となり、中国におけるインターネット論壇の影響力の大きさを見せつけた。

その反響の大きさを受けて、一部の研究者は、西側の報道を正し、中国のイメージアップを図るに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使った「人民抵抗モデル」を提唱する論文を発表した。⁸同論文を執筆した李希光・清華大

学教授らは、まずハーマン、チョムスキーの『マニファクチャリング・コンセント』⁹を引用しながら、「米国政府と政商集団が、いかにニュースをほしいままに操り、見るもの、聞くもの、読むものに影響を与え、メディア管理の目的を達成しているか」との二人のアメリカ人研究者の研究成果を紹介しながら、アメリカメディアのイラク報道などがいかに偏向に満ちたものだったか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その上で、中国国内のインターネット論壇をはじめとする新興メディア上での情報発信が、チベット暴動、聖火リレー妨害事件などに関する西側メディアの偏向報道を暴露し、それが欧米メディアに対し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り、CNNからも謝罪を勝ち取ったと評価する。「その特徴は新聞などのエリートメディアではなく、大衆の声を反映し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メディア」であり、大衆の声に拠る「人民抵抗モデル」であると主張した。李教授らの論文は「ネット上の議論は玉石混交で、甚だしいものは、悪意に満ちた罵倒もある」としながらも、影響力の大きさを高く評価し、「人民抵抗モデル」を提唱している。

もう一つの流れは、対外宣伝力の向上を提唱する「走出去工程」などの動きである。従来、欧米に独占されてきたメディアの世界へ、衛星放送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という新しいメディアを使って、中国の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の発信力を高め、さらに英語、中国語などマルチの言語を使った出版物を海外で発行する動きを拡大した。また世界各地に中国の言語や文化を広める教育機関として「孔子学院」の建設を推進した。この流れの中には、中国イメージの改善に留まらず、現代における中国の大国化は、「平和的台頭」であって、そのための「最大の武器は、ソフトパワーの拡充であり、文化戦略を重視すべき」¹⁰と、大国化イコール＝文化の発信力であると指摘する研究者もいる。

三つ目の流れは、そうした国際的な情報格差や発信力の弱さ、西側メディアによる歪曲を否定するわけではなく、それを前提としつつも、中国の声が伝わらず、西側の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議論が国際社会において対中世論を左右するのは、中国のメディア環境、とりわけ前近代的な報道管理体制や宣伝重視の対外報道の弊害が大きな要因にな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その改善を求める流れである。対外的な圧力を利用して、中国国内の改革を求める傾向とも言える。こうした流れは、主に西側の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を踏まえた若手のメディア研究者に見られる。

こうした議論に共通するのは、国家イメージが、突発的な、中国にとって危機的な状況をもたらす事件の報道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として、突発事件をめぐる報道のあり方をどう改善するか議論が集中している点だ。一般的に言って、国際社会が「中国」という国家のイメージを形成する上で、大きな影響力を持つのは、新聞やテレビなどが報じる「中国」であり、危機的な突発事件は報道の対象となりやすく、その報道の内容によって、中国イメージが形成されやすい。最近では、日本における中国イメージが大きく低下しているが、それは毒入りギョーザ事件をはじめ中国食品の安全性を疑わせる報道が目立ったからだと言われている。¹¹日本人の中国イメージ形成に直接関与するのは日本のメディアは報道だが、日本メディアの報道には、中国の情報やメディアに対する管理体制が大きく影響している。

三つの流れのうち、中国の現在の情報・メディア管理体制、とりわけ突発事件報道をめぐる報道管理体制について、前二つの流れはほとんど言及しない。海外メディアの突発事件報道に偏見や意図的な誤報があると指摘するか、発信力の弱さを指摘して、その是正、改善を強く求める立場である。

これに対し、最後の流れは中国の報道管理体制に海外の誤った報道を許す問題点があり、国家イメージの改善には国内の報道体制の改革が不可欠と指摘する点が大きな相違点となっている。海外メディアに対して、その報道の是正を求め「抵抗型」とすれば、二つ目は「発信型」、最後は自国の管理体制を見直すという意味では「改革型」と言えよう。対外イメージの改善を求める

中国の指導者は、「抵抗型」と「改革型」の二つの流れを、時々の国際情勢をにらみながら、巧みに使い分けているともいえよう。

IV 「抵抗型」モデルの限界

チベットの暴動からオリンピックの聖火リレーの妨害事件の間は、外部からの中国への圧力も強く、「抵抗型」の反応が強くなった。すでに挙げたように、少数民族への弾圧、圧迫を批判する欧米メディアのチベット報道に対して、その偏見、誤報を糾弾するサイトが有力中国メディアのウェブサイトには設けられた。しかし、四川大地震では、逆に「改革型」が前面に出て、外国メディアの取材を緩和し、内外の支援を集めた。09年ウルムチで発生したウイグル族の暴動では、外国人記者の現地での取材を許可し、中国当局がプレスセンターまで設置した。同じ少数民族をめぐる問題であったが、事件の国際社会に与えたイメージはかなり異なっていた。もちろんその違いは報道対応の問題だけとはいえないが、対応の違いがイメージを変え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

そもそも「抵抗型」モデルはあまりにも直接的な反応であり、常に効果があるとはいえない。かえって中国国内の反応が、国際社会の反発を招き、対立をエスカレートさせることにもつながる。一般的な国際世論において、中国の政治体制は依然として共産党の支配する一党独裁の国であり、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という暴力が激突する社会であり、「抵抗型」の反応は、「強硬」という中国のイメージを髣髴とさせる。「反CNN論壇」のような動きが出てくると、国際社会においては、必ず中国当局がやらせた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見方が広まり、中国イメージは一段と悪化する。

しかも、国内的には、そうした対立姿勢がかえって国内の社会不安を招き、中国当局も最終的には、この愛国的な動きに対し矛を収めさせ、問題を沈静化させることになる。2005年の反日デモもその一例であり、2009年の反フランスデモはその典型である。反フランスデモは、チベット暴動、聖火リレー妨害事件をめぐって、中国に進

出するフランス系スーパーの親会社がドラマ14世に対して、巨額の献金をしているとの偽情報が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流布した結果、デモへと発展した事件だが、この事件に見られるように、ネット上には未確認情報や誤った情報があふれ、それによって感情的な議論が巻き起こり、直接的な行動へと発展するケースがある。

したがって、「抵抗型」モデルは、「反CNN論壇」のように、たとえ西側メディアの謝罪を勝ち取ったとしても、国際社会の対中イメージを改善できるかどうか、大きな疑問が残る。中国の研究者も「もしわれわれが西側世論の全ての問題を、国家利益を拡張するための“メディアと政府の共同謀議”に帰するとしたら、そのような分析は一面的である。国家利益以外に、イデオロギー形態、ニュースの価値観、党派傾向、メディア組織、記者の個人的な差異などの要素も関与している」「中国のメディアが一律に、“他者”の思考という考えで、西側のメディアを見なし、対抗という立場を世論のやりとりの前提とすると、それは認識と行動の二つの面で困難な局面をもたらし、国際世論の中の中国の受け身の立場を解消するという面で利点は何もない」と指摘している¹²。

世界メディアサミットで、胡錦濤総書記は各国メディアの平等を求めた際にも、「中国政府はメディアの発展と非常に重視し、世論監督をスムーズに、人民の知る権利、参与権、表明権、監督権を保障するなど各方面のメディアの重要な役割を支持し奨励している」と述べるとともに、「外国のニュース機構の合法的な権益を保障し、中国における取材報道業務への便宜の供与を行っている」と“改革”姿勢を強調している。

とはいえ、国際情勢は複雑であり、国際世論への中国の対応として、今後も「抵抗型」モデルと「改革型」モデルが交錯して表面に出てくることが想像される。本稿では、この後、もっぱら「発信型」「改革型」の二つのモデル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いと考える。

V 中国の報道管理体制

「発信型」、「改革型」を検討する前提として、中国の報道管理体制とりわけ突発事件をめぐる報道規制について触れておきたい。中国の新聞、テレビ、ラジオ、出版といった伝統的なマスメディアは、長く党や政府の宣伝機関と位置づけられ、国営、国有の体制の下に置かれてきた。1990年代、市場経済の進展とともに、情報に対する社会全般の要求が増大する一方、マスメディアの成立基盤の重要な要素である広告需要も急増した。その結果、伝統メディアの多様化、多元化が進行し、とくに新聞、出版分野では大衆向けの新聞や雑誌が急増した。テレビでも衛星放送、有線放送の普及で、多チャンネル化し、報道、教育、娯楽などのセグメント化が進行している。ラジオも同様の傾向が続いている。メディアの商業化、産業化が進んだ。インターネットも急速に普及し、いまや大衆の意見を表明する場として注目され、伝統メディア以上に政府を監督する力を発揮し、“インターネット監督”“インターネット民主主義”という言葉が語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しかし、出版部門を除いて、基本的に伝統メディアの所有形態は国有であり、報道部門ではとくに党がメディアを管理する「党管媒体」の原則が貫かれている。¹³この原則は中国の最高意思決定機関である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で確認されたものだ。近年、ニュース出版分野で、完全な企業化や株式上場の方針導入が当局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るが、にもかかわらず国家新聞出版総署は「党管媒体」、「党管幹部（メディアの幹部人事は党が管理する）」、「党管導向（メディアの世論誘導の方向性は党が管理する）」、「党管資産（党がメディアの資産を管理する）」の四つの方針は不変とする方針を掲げている。¹⁴したがって、メディアの商業化、産業化の進展にも関わらず、報道の管理体制に変わりのないことが読み取れる。

中国の国際イメージに大きく影響する「突発事件」報道についても、国家の危機にもつながるだけに、中国当局は長年、厳

しい規制を行ってきた。1976年7月、発生した死者24万人を出した唐山大地震の死者数が明らかにされたのは、地震発生から3年後のことだった。80年代以降も「慎重に開放する」という方針が取られている。¹⁵

しかし、経済体制が改革・開放され、国内市場の拡大、外国企業の大量進出を受けて、国際間にまたがる突発事件も数多く発生するようになり、「突発事件」報道の開放を求める需要は内外で高まっ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最近まで、突発報道はマイナス報道であり、社会の安全を脅かしかねないとの考えが当局の側にあり、突発事件報道は、①党と政府の指導を厳格に受ける②報道方針は党と政府に一致させ、場合によって国営新華社が統一報道する③記事は上部機関に送り審査を受ける——などの方針が取られてきた。¹⁶

突発事件報道を見直す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のは、2002年秋から2003年に広東省から世界へと広がった新型肺炎（SARS）事件である。SARSの発生は、広東省当局、衛生省そして北京市当局によって2003年4月下旬まで伏せられ、ようやくWHO（世界保健機構）の警告にしたがって、情報公開に踏み切った。衛生相などの幹部も解任され、中国の対外イメージを大きく損なった。SARS事件は、中国の報道管理体制が対外発信力の向上やイメージ改善の障害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VI 対外発信力の拡充と「発信型」モデルの限界

すでに紹介したように21世紀に入って、中国当局は対外発信力の拡充に努めてきた。それは対外イメージの改善に必要なだけでなく、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で、軍事力だけでなく、文化をはじめとするソフトパワーの拡大こそが大国として相応しいと認識され、また経済力の高まり、新たな情報技術の開発によってその拡充が可能となったからに他ならない。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センターの胡鞍鋼主任らのグループは、早くも2004年、中国はアメリカに次ぐ世界2位のメディア大国に

なったとの研究成果を発表している。¹⁷この研究は、①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基礎（電話、携帯電話、郵便局、インターネットサーバー数）②国内メディア（日刊紙、ラジオ、テレビ、ネットユーザー総数）③国際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図書輸出額、ラジオの放送外国語数、全世界のテレビ受信者数、ウェブサイト数）④メディア経済（広告額、映画観客数）を基にしたもので、国内メディアの力はアメリカの半分程度で遠く及ばないが、日本やヨーロッパの国々を上回る。国際的には日本やイギリスにもかなりの差をつけられているが、メディア産業は、過去20数年間、年率20%以上の成長を示しており、すでに世界第2位のメディア大国だと評価した。

この研究の方法や結論に対して、中国国内でも「一部の専門家から疑問が出た」という。¹⁸そこで、人民大学の喻国明教授のグループは、胡鞍鋼報告の評価について「基本的には科学的であり、実際にも符合している」としながらも、より科学的な指標を用いて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軟実力）の発展状況を調査した。こちらの調査では56の指標によって、新聞からインターネットまで中国のメディアを全面的にカバーしたという。その上で、中国を含む2005年の世界GDP上位国50か国を比較した。その結果、中国のメディア水準は50か国中40位だった。ちなみに1位はノルウェー、続いてアメリカ、スイス、フィンランドの順で、日本は13位となっている。この調査結果は『中国伝媒軟実力発展報告』として出版されたが、同報告は「中国は決して遅れておらず、情報産業領域における発展は急速であり、とりわけインターネットなど新メディアの発展は猛烈で、それは中国メディア全体の實力を押し上げることを大いに期待させる」と評価している。

『文化対外伝播・理論与戦略』（吳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は、中国の代表的なメディアの“走出去（海外進出）”の状況について、詳細に調査するとともに、孔子学院の設立状況についても報告している。

まず国営通信社の新華社は2007年現在世界に102の支局を置き、海外で新華社と契約しユーザーとなっている海外メディアは12,447であり、187の国と地域をカバーしている。24時間発信の言語は中国語、英語など7種で2015年までに150の支局と600人の駐在員を派遣する計画である。テレビの国際放送は、中央テレビ局（CCTV）の4チャンネル（中国語）、9チャンネル（英語）とスペイン・フランス語チャンネルの計チャンネルで放映している。2009年初め段階で、CCTV-4は93の国と地域で1,500万人のユーザー、CCTV-9は7,711万人、フランス語は34か国1,011万人、スペイン語は12か国342万となっている。同書はこのほかに国際ラジオ放送や英字新聞、さらには人民日報社発行の大衆向け国際問題専門紙「環球時報」の海外進出などを紹介している。

いずれも立派な数字が出ているが、この調査はそれぞれのメディア側の資料をそのまま紹介したもので、検証された数字ではない。国有メディアが政府の掛け声の下で、海外進出を進めているわけだから、それぞれのメディア企業が都合のよい数字を発表している可能性が高い。もしデータ通りの進出を果たしているのであれば、内外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ギャップが広がることもないであろうし、指導者が「西強我弱」などと嘆く必要はない。同書も、「わが国のメディアは国際世論の場で、現有体制の“力量を集中する”という優勢をうまく発揮できていない。重大な国際事件が発生した時、迅速に国際世論の機先を制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だ。中国の主流メディアが失語症に陥る一方で、西側メディアが“お節介にも”中国に声を出すよう目覚ましてくれる」と、自嘲気味に指摘している。「発信型」の研究者自身、なぜ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が数字通りの力を発揮できないのか、正面から語るのを回避しつつも、4で紹介した報道の管理体制にその問題点があることを示唆している。

VII 「改革型」モデルの模索

「改革型」モデルを提唱する研究者、実務者は、対外イメージの悪化の原因がメディアの古い管理体制にあると実証的にずばり指摘する。例えば彭偉歩・暨南大学副教授は、『信息時代政府形象伝播』¹⁹で、「CCTV-9の視聴者の89.8%は中国に住む中国人であり、外国人は2.9%に過ぎない」とのデータ結果を示した上で、「多くの英語メディアは受け手の調査をやりたくもないしやる勇気もない。なぜなら調査結果はメディア自身とても受け入れたくない可能性があるからだ」との英字紙『チャイナデーリー』の副編集長自身の説明を紹介している。このデータは2000年段階のもので、その後改善されてはいるのだろうが、6で紹介したソフトパワー報告でも受け手の効果は触れられていない。彭副教授は「受け手効果調査の欠如は、必然的にわが国の対外宣伝の自己中心主義をもたらす」と指摘する。自己中心主義は結局、受け手の興味のない宣伝臭の強い内向きの内容の繰返しを行うことになる。

さらに彭副教授は「中国体制内の官僚主義現象が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発揮を制限する障害となっている。情報の停滞、緩慢な政策決定、意味のない議論の繰返しにその症状が現れる。中国では今後ソフトパワーへの要求は“ハードパワー”のそれを上回るであろう。しかし、ソフトパワーの引き上げは数多くの複雑な問題、例えば体制、観念などの方面の改革に触れ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建設は新たな境界線に分け入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の評論²⁰を紹介する。その意味では、胡鞍鋼報告や喻国明報告はソフトパワーの“ハード”の部分調査に過ぎず、本来のソフトパワー報告でなかったともいえよう。

彭副教授の『信息時代政府形象伝播』はその上で、政府イメージの形成と広報体制、大衆メディアとの関係、対外イメージと大衆メディアの関係、情報化時代における大衆メディアの政府イメージ形成の問題点などを、正面から分析したもので、中国政府の広報体制、メディア管理体制の改革を強

く訴え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とりわけ政府の時代にそぐわない、がんじがらめのメディア管理体制によって中国メディアに対する内外の信頼度、親密度が低下している点を、SARS事件報道などを例に挙げながら批判している。ま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など情報技術の発展に伴って、国民の一層の政治参与、メディア報道の権利が高まる一方、多国籍メディアによる他国の国内政治への批判も増大し、それらに対する対応を政府が誤れば危機を増加させ、イメージの低下をもたらすと警告する。

そして、「人民は国家のために存在するのではなく、国家が人民のために存在するのである。政府は公衆の声に基づいて施政を調整すべきで、政府の行政に適応するよう公衆に要求すべきでない。これは政府イメージ樹立の最も重要な思想である。この種の思想が樹立できなければ、政府イメージの改善は不可能である」とまで述べる。これは政府にとってもかなり耳の痛い批判であろう。もちろん「人民共和國」であり、彭副教授の発言も建前としてはその範囲内にあり、したがってこの本も中国国内の権威ある出版社から出ている。

『突発事件与対外報道』²¹は、同じような観点から、突発事件報道をめぐる国内の管理体制やその報道が国際社会に与える影響などについて考察している。同書は、中国の現在の国際的なニュースをめぐる報道環境とりわけ突発事件を巡っては「国家イメージに重大な損害を与えかねない」状況にあると、SARS事件や黒竜江省で発生した松花江水質汚染事件（2005年）などを例に引いて、警告している。後者の事件では地元当局の発表、市民の反応、ネット上での情報、外国メディアの報道を、時間を追って整理し、当局の情報発信のまずさと、それに伴って出回った流言が政府と大衆の関係を損なった経緯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その上で、タイミングの良い情報が流言の防止に役立つとともに、国際世論の主導権を握る上でも重要だと指摘している。

「努力拡大“二次伝播”，切实增强外宣实效（“二次報道”の拡大に努め、しっかりと

対外宣伝の実効を高めよう)」²² (童猛チャイナデーリー記者執筆) は、国際報道において、海外メディアは当該国のメディアを多く引用する(二次報道)という点に着目し、国内のメディアが、外国メディアにもっと転載され反映されるよう、タイミング良く正確な情報を発信する一方、外国人記者への現地取材の便宜を図るべきとの提案を行っている。

「突発公共事件においてしばしば発表が遅れ、わが国のメディアが失語症に陥る。その結果、外国メディアに事実の歪曲やわが国への攻撃のチャンスを与えてしまう。その局面を転換するには、情報公開の速度を早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いかにも英字紙の記者らしい指摘である。海外の読者の興味やその文化背景などを研究し、海外の読者が興味を持つ、説得力のある記事の発信を工夫すべきとも述べている。「抵抗型」モデルが糾弾する海外の偏向報道が、実は国内の報道管理体制の欠陥がその一因であることは以上の指摘で明らかであろう。

SARS 事件の教訓や以上のような提言を受けて、中国政府も「政府情報(情報)公開条例」(2007年1月全人代常務委採択)、「突発事件対応(対処)法」(同年8月全人代常務委採択)を制定し、情報の公開や突発事件報道の改善に乗り出している。しかし、チベット暴動事件など国家的な危機事件となると、やはり情報の公開も、国内報道も遅れ、童猛記者が指摘するように海外のメディアの偏向報道が独り歩きする隙を与えてしまう。

『突発事件と対外報道』は、政府のインターネットサイトを通して、突発事件への政府の対処のマニュアルを調べ、事件への対処システムが結局、政府内部の早期報告を義務的に設定しただけで、メディアへの情報提供や発信をほとんど意識していない点を暴露している。危機的イベントの報道は、マイナス面を報道することになり、それはマイナス報道だという意識が政府官僚に根強い。政府への責任追及へと転化することを恐れるのである。

童猛記者は「われわれは思想を解放し、实事求是の精神で、マイナス報道は全て国家イメージの形成に不利と考える観念を根本的に改める必要がある。いいことも報道するが、実際から出発して、ホットな問題、困難な問題、注目される問題、敏感な問題も回避せず、覆い隠さず、客観的な報道によって説得力と信頼度を高める必要がある」と述べている。この「思想の解放」「实事求是」という言葉は、故鄧小平氏が、革命路線を経済建設路線へと中国を大転換させた際に使ったもので、現在の「改革・解放路線」の指導思想である。この言葉を使って突発事件報道の改善を求めること自体、問題の深刻さを示し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VIII 結論に代えて

以上のような考察の結果、「抵抗型」と「改革型」の間には、メディアの世論形成についての見方が根本的に異なるという点が明らかになる。「抵抗型」はメディアが、「政府や政商集団」によって一方的に操作される受け身の立場にあると見なしている。この論者はアメリカのマスメディアをそう分析しているのだが、実は中国のマスメディアこそがぴったりそのモデルに当てはまる。一方、「改革型」は、メディアが操作されるだけでなく、「新聞専業主義」(ジャーナリズム、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リズム)を発揮し、民衆の知る権利を代表し、議題設定機能を持つことによって、政府をけん制し、世論をリードする場合もあることを指摘する。メディアにも主体性があり、プレーヤーの一員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この点、中国国内では弱いですが、国際世論はそうにして形成さ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ソフトパワーを強化し、国際世論の場で中国の発言力を高めるためには中国メディアの主体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の改革が必要という議論になる。

彭副教授の『信息時代政府形象傳播』は、ゲーム理論を使って、政府とメディア、公衆の関係を説明する。

「政府はメディアを通して、国政の政策や理念を広める。またメディアに対し政府についてのマイナスの報道が多すぎないよ

う求め、政府イメージを損なわないように求める。したがって、メディアにとって政府は憎しみの存在でもあり、愛する存在でもある。政府の様々な情報がなければ、時事問題の報道は不可能だ。最も重要なニュース性のある、公衆の関心を最もひきつける情報がなければ、メディアは生存していけない。したがって、メディアは必ず政府の情報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が、ニュースの原則は政府やその他外部の干渉を受けず、客観・公正のモラルを堅持して政府の情報に対して報道を行う。その結果、両者の関係は互いに厄介な状態にある」

「報道の自由」がないと、このゲームは政府の一方的な支配に終わり、メディアは生命力を失い、公衆への影響力を失う。

「政府はがんじがらめのメディア政策を調整し、合理的な位置に置かねばならない。そうしてこそメディアの政府活動に対する客観的な報道が可能となり、メディアの無秩序な報道、政府に対するマイナス報道を回避でき、社会の安定をもたらすことができる。こうした政府とメディアの関係は、政府が一方的な自身のイメージ追求を放棄させるだけでなく、メディアの信頼性や親和力を増しメディアの発展や社会の進歩を促すことができる」

「政府イメージは内外の公衆の評価、認知の総合体」とする彭副教授は、国内メディアの改革、国内の公衆の政府イメージの改善が、国際社会での中国イメージの改善の前提となると考えている。『突発事件与对外報道』も同様な視点から報道改革を求める。

「一つの良質な社会の運営メカニズムは根本的に政府と公衆の関係によって決まる。現代社会において、それは基本的にメディアという橋渡しによって、協力と共通の利益を実現できる。政府の行政の公開と透明度は、メディアの責任ある情報の公開とニュース報道に依存する。公民が政治に積極的に参画することは疑いなく社会全体の新鮮な活力とエネルギーをもたらす。一つの協調性のある文明政治もしたがって公衆と政府の努力の下で鍛錬を重ね、昇華するの

本稿を執筆中の11月26日北京では、中国政府新聞弁公室主催の「第1回対外伝播シンポジウム」が開催され、対外宣伝の実務担当者や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ソフトパワーなどの研究者が参加した。シンポジウム開催に合わせて、関係論文を募集し、集まった160篇の論文から17本がシンポジウムで朗読され、12本の優秀論文を表彰したという。この問題に関する政府、研究者の関心の高まりを感じさせる。まだ優秀論文の梗概のみが公表されたただけだが、それを読む限り、依然としてソフトパワー拡大の重要性を訴えるのみで、具体的な効果のある戦略を説いたものはないようだ。今後の展望が楽観的なものか悲観的なものか、明らかではないが、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のゲストスピーカーが「抵抗型」モデルの提唱者である李希光・清華大学教授であるという点に、問題の深刻さが垣間見える。「改革型」モデルを打ち出せない。「改革型」モデルはメディアの管理体制の見直しなど大きな転換を求めることになり、政府主催のシンポジウムでは、そのような議論がなかなか難しいのであろう。ここにも、中国の大国化と国際社会でのイメージギャップ拡大のジレンマが反映されている。

¹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院長・教授

² 2009年初め『中国不高興（中国は面白くない）』（宋曉軍など、江蘇人民出版社）と、中国大衆の一部の不満を反映し、またそれを煽るような著作が中国でベストセラーになった。筆者のグループにはかつて『ノーと言え中国』の著者も含まれ、大国化の中で新たな装いの愛国主義思潮が広がりつつある。

³ 周錫生「突発公共事件、応急報道中的国際話語権問題」（『中国記者』2009年第7期）

⁴ 2008年6月23日新華社配信、『中国記者』2009年第7期転載。

⁵ そのような議論は研究者が著作や学術雑誌で発表するほか、実務関係者などは『新聞戦線』（人民日報社）、『新聞記者』（新華社）など編集者、記者向けの専門雑誌上で発表される。

- ⁶ レジュメでは「2つの流れ」としたが、本稿を執筆中、「発信型」を「改革型」モデルから独立させた方がよりわかりやすいため、「3つの流れ」とした。
- ⁷ 3月27日22時26分Yahoo配信 産経新聞 「北京の「アンチCNN」は半官製メディア？」など。
- ⁸ 李希光、杜濤「国際伝播中的宣伝模式与抵抗模式」(『当代伝播』2009年第4期)
- ⁹ 原作はEdward S.Herman and Noam Chomsky『MANUFACTURING COMSENT』(1988, 2002) 邦訳はトランスビュー2007年
- ¹⁰ 芸衡『文化主権与国家文化軟實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8月)
- ¹¹ 日本の言論NPOと「チャイナデーリー」の共同調査(2009年8月26日発表)では、「中国に対する印象が「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くない」「良くない」と答えた日本人の割合は合わせて73.2%となった。また、印象が悪くない理由としては、81.0%の人が「食品の安全の問題などで見られた中国政府の対応に疑問があるから」と答えた。
- ¹² 呉瑛『文化対外伝播——理論与戦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¹³ この原則は2004年の第16回党中央委員会第4回総会で採択された
- ¹⁴ 四つの不変方針は、2004年8月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るが、その当時の中国青年報の記事が、2009年秋の段階で、再び党傘下の各種団体のホームページに掲載されており、メディアの産業化をめぐる水面下で熾烈な論争があるものと推測される。
- ¹⁵ 汪凱『転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復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 ¹⁶ 西茹『中国の経済体制改革とメディア』(中国書店, 2008年)
- ¹⁷ 胡鞍鋼・張曉群「中国伝媒迅速崛起崛的実証研究」(『戦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
- ¹⁸ 喻国明『中国伝媒軟實力発展報告』(同心出版社, 2009年7月)
- ¹⁹ 『信息時代政府形象伝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 ²⁰ 劉曉林「中国提昇軟實力」(『観察与思考』2004年第7期)
- ²¹ 賀文発著, 中国傳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2月
- ²² 『新聞戦線』2009年9月号



〈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と東アジア —覇権交代の過渡期分析への一視点—

鈴木 規夫

はじめに

現代中国のヘゲモニー形成後の現代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政治状況の趨勢をめぐって主に三つの視点から議論したい。

一つは「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という視点である。実はこれはすでに20世紀末から論じられている。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者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たブッシュ政権の数年間一時的に後景に退けられて、「アメリカ一國覇権主義」が支配的であったが、オバマ政権となって、既定通り進んでいく「アメリカの終わり」をようやく受容する現実的段階に至っており、中国のヘゲモニー形成はその相対的現象でもある。それは世界にどのような変化をもたらすのか、われわれ自身の問題として考え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もう一つは、日本における政権交代の問題である。小泉、安部、福田、麻生と続いた日本における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者政権が、アメリカの政治変動と連動して崩壊し、新政権が誕生した。これは明らかにアメリカの衰退と関係した現象である。その政治現象の意味の連関を考える。

最後に、太平洋を挟んで巨大な米中関係が構築されているプロセスにおいて、マージナルな存在に変化していく日本の生存戦略はいかにあるべき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他の諸国との相対的関係における国際秩序形成の問題を含め、かなり長いレンジの歴史感覚を必要とされるこの問題を、「規範形成論」を軸に議論していきたい。

以上、三つの視点から、21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政治的大状況変化の意味の連関を考えていきたい。

I 〈宗教〉としての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義

まず注意しておくべきことは、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義」が一つの特殊な宗教言説であり、それ自体は未だにアメリカ内部に深く浸透して残存し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である。ブッシュからオバマへの政権交代も、この事実自体を大きく変更させてはいない。ブッシュは「新自由主義」的宗教言説のプロジェクトを失敗（イラクもアフガニスタンも不十分な展開でアメリカ国内世論の不支持も拡大）させたので、オバマに鞍替えるということは「新自由主義」勢力にとって何の矛盾もない選択である。オバマ政権がさまざまなシオニスト団体の強力な支持に依拠して成り立っていることも、彼らの堅い核の部分に存在する〈シオニスト・クリスティアン〉との関係から着目しておいてよいであろう。

あらためて確認するまでもないが、「新自由主義」という宗教言説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次のような「教義体系」によって成り立っている。

① 市場による解決は、国家による規制や介入よりも、常に優先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② 私企業は、効率性・品質・入手しやすさ・価格といった点で、公的部門よりも良好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を示す。

③ 自由貿易は、一部の者には一時的に損失を

もたらすかもしれない。だが結局は、どの国においても、すべての住民に保護貿易主義以上の利益をもたらす。

④ 医療や教育のような活動も営利事業としてやることが正常であり望ましい。

⑤ 低率の税金、とりわけ富裕層のためのそれはより大きな投資を保障し、繁栄を保障する。

⑥ 不平等はどのような社会にも存在する。それはおそらく遺伝的なものであり、場合によっては人種的なものである。

⑦ 貧しい人々がいるとしても、責められるべきは自分自身である。なぜなら、勤勉は常に報われるからである。

⑧ 自由市場が存在しないなら、真に自由な社会は存在しえない。したがって、資本主義とデモクラシーは相互補完的である。

⑨ 大きな国防予算と強力な軍力は国家の安全を保障する。

⑩ アメリカ合衆国は、その歴史、理念、高度なデモクラシー制度の点で秀でている。したがって、その経済的・政治的・軍事的力を用いて他国の内政に介入し、自由市場とデモクラシーを推進すべきである。

⑪ そのようなアメリカ合衆国の他国への介入をその国の人民は歓迎するだろう。なぜなら、それは国際社会から好ましからざる破壊的要求を取り除き、究極的にはすべての人にとって有益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からである。

「教義体系」のこの 11 カ条は、アムステルダムにある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研究所所長スーザン・ジョージが、2008 年に出版した『ハイジャックされたアメリカーアメリカは、キリスト教原理主義・新保守主義に、いかに乗っ取られたのか？—』という本でまとめているものである。

彼女は、「文化を乗っ取るためには、戦略、抜け目のなさ、スタミナが必要である。だが、それらすべての前提になるのが信念である」としながら、かつて、イタリア共産党指導者アントニオ・グラムシが『獄中ノート』で綴った、文化的ヘゲモニーと有機的知識人をめぐる議論における次のようなテーゼを、現代アメリカ政治の分析に応用している。

支配を目ざそうとする集団の最も重要な特徴の一つは、伝統的知識人を「イデオロギー的に」同化し征服しようと闘争することである。しかし、この同化と征服は、当該集団が自分たち自身の有機的知識人をつくり出すことに成功すればするほ

ど、それだけ急速かつ効果的に成し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

つまり、新自由主義の「信念」をもった集団が、巧みに「自分たち自身の有機的知識人をつくり出すことに成功」した結果として、ブッシュ＝チェイニー政権下のアメリカ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たわけであり、ブッシュ＝チェイニー政権は、そうしたヘゲモニーの存在を表象する、あくまで「現象」であって「結果」なのではない。

いったんオバマ政権となっても、この現代アメリカに形成されている「有機的知識人」のすべての有様が、ガラッと跡形もなく変化するわけではない。残存するこの当該集団の「有機的知識人」は次の機会を狙うべくしっかりと形成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り、ブッシュ＝チェイニーという「器」を、オバマという別の「器」に鞍替えしたに過ぎない。

「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を受け容れる」状況が出来上がるためには、新自由主義の「信念」をもった集団が勢力を後退させている必要があるが、この集団を具体的に支えてきたキリスト教原理主義の諸勢力は、アメリカにおいて未だに圧倒的な勢力をもっている。オバマ政権は、この新自由主義の「信念」をもった集団とまったく別に形成された集団によって成り立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反新自由主義的「信念」をもった集団による「有機的知識人」が、よく巧みに再構築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ないからである。

オバマ政権が「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を受け容れる」現実的段階にあるのは、むしろ、アメリカ国内における産業生産構造の衰退や深刻な格差拡大などの矛盾の激化による内的必然性という側面はあるものの、むしろアメリカの外の諸要因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い。金融産業の資本主義的ネットワークを構造上支えている世界の諸勢力、EU、ロシア、中国、インド、ブラジルなどが、新自由主義的アメリカに辟易してきたことによって、アメリカは一時的に変わ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くなっただけに過ぎないのだともい

える。

II 「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とは何か？

そもそもこの「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とはいったい何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か。

アメリカ外交問題評議会上席研究員でジョージタウン大学教授のチャールズ・カプチャン Charles A. Kupchan は、7年ほどまえに、『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2002)という本を出している。そこで彼の主張は、主に次の4点であった。

- ① あと10年〔2002年から〕でアメリカ一國覇権は終わり、世界はEU、東アジアなどの勃興にともなって、多極構造の時代にうつる。
- ② もともとアメリカの「本質」は、孤立主義と単独行動主義である。それは、海外でのモメごとに自国が巻き込まれるというのを恐れ（孤立主義）、それを回避するために自分で行動する（単独行動主義）、といったメダルの表裏のような関係にある。
- ③ 放置しておけば、アメリカは自国に「ひきこもる」（正確には単純なひきこもりではなく、他国のことを考えずに行動する）。アメリカが「大戦略」なしに撤退したあとには、無秩序な衝突、すなわち地政学的断層線が登場する。
- ④ したがって、アメリカが多国間への関与を残しながら、秩序ある撤退をしていくという新たな大戦略を描くべきである。

①の指摘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になっている。オバマ政権は、アメリカ政治指導層に本来あったこ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を外交政策に反映させているに過ぎない。

カプチャンは、さらにこの視点から、F.フクヤマ、ミアシャイマー、P.ケネディ、S.ハンティントン、カプラン、フリードマンなどの戦略論を検討し、当然、全部「正しくない」と批判する。かれらは共通して、アメリカ一國覇権が続くことを前提として議論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ただ、「グローバル化こそが新たな地政学的断層となる（つまりグローバル化の進展がアメリカの覇権を必要とし、グローバル化の波が世界を洗うその突端が「衝突」の現場になる）」という議論、および、「自由

民主主義諸国同士は戦争をしなくなる」という議論については、軽視できない議論だとして特別に章を立てて反論している。

アメリカ外交の「本質」について、ウィルソンとF.ルーズベルトの政策の比較をしつつ、先述の②（つまり、もともとアメリカの「本質」は、孤立主義と単独行動主義である。それは、海外でのモメごとに自国が巻き込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のを恐れ（孤立主義）、それを回避するために自分で行動する（単独行動主義）、といったメダルの表裏のような関係にあること）を論証している。周知のように、国際連盟をつくろうとしたウィルソンは、アメリカの政治文化がもっている「孤立主義と単独行動主義」によって挫折した。他方、F.ルーズベルトは、ウィルソンの失敗から学んで、(ア)国内世論を固め、(イ)現実主義と理想主義をたくみに配合し、実行可能な国際システムにすることをかなり注意深く行いつつ、国内で新しい国際機構について説明するさいにも、あまり目的を率直に言わずに、国内世論で無用な紛争をつくりだすことを避けた。

カプチャンによれば、冷戦期というのは、このF.ルーズベルトの試みが抜群に成功して、さらに「共産主義の脅威」が存在したため多国間主義が有効に作用した、アメリカ政治史のなかでも「例外」期であって、ソ連崩壊後の10年はその「惰性」の時期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中国でも現在、上海の華東師範大学などを中心に中国における冷戦の意味の再検討が行われているが、結局のところ、チャーチルが唆してF.ルーズベルトがつくろうとした「国際システム」形成のためのゲームに、中国も日本も振り回されてきたといっ

てよい。しかし、「共産主義の脅威」の「妄想」が消えた後に、アメリカには多国間主義をとる現実的基盤がなくなっている。すると、アメリカの「本質」から、このまま放置すれば、アメリカはしだいに海外から、それぞれの地域の諸事情などまったく考慮することなく、手前勝手に撤退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いうのがカプチャンの見方であっ

た。

たしかに、勝手におせっかいをやきにきて、地域秩序をガチャガチャにしておいて、また無責任に勝手に帰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は、実に迷惑な話であるが、それが「アメリカの本質」であるとすれば、オバマ政権誕生後のこの一年における世界情勢の展開の性格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いに役立つといえる。

さらに、カプチャンは、多極構造を安定的にまとめあげた歴史上の3つのモデルから、共通する教訓をひきだしている。

第一に、諸州が分立しあったアメリカを連邦制度にまとめあげたモデル、

第二に、ナポレオン後のヨーロッパの勢力均衡を実現した「ヨーロッパ協調」(メッテルニヒ体制)、

第三に、独仏の抗争を軸にしてきた欧州をおさえた EU である。

もちろん、彼の論理的推論にどの程度科学的整合性があるのかについて議論は残るが、何れにせよ、カプチャンがそこから引き出している教訓は3つである。

すなわち、第一は戦略的抑制、第二は拘束力ある制度の構築、第三は社会的統合である。カプチャンは、歴史は生産力の発展段階に相応するものであり、バクス・アメリカナの終焉は産業資本主義時代と民主共和制の終焉に相応するものであって、デジタル時代の到来が多極化に相応すると主張している。その意味では、カプチャンは、市場と民主制との考え方について、新自由主義的思考と一線を画する。だが、われわれには「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の後の世界像についてさらなる想像力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る。

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と日本の生存戦略

アメリカがすぐに撤退をしなくても、東アジアはまちがいなく世界の一つの極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は誰の目にも今日明らかであるが、カプチャンは、東アジアが永続的な安定性を享受する前提として、「中国と日本

が緊密な関係を築く必要がある」という。そして、それがまだ十分成熟していない理由を次のように指摘している。

「ドイツが率直に過去と向き合うことに意欲を示し、ナチスの影響の排除と地域における和解とが並行していることを一因に、ヨーロッパは今や、独立独行の用意が備わっている。一方、アジアでは、中国と朝鮮半島が歴史の暗部に対する日本の不十分かつ不承不承な対応に対し、当然に不満の意を示しており、長年の反感が根強く残っている。一方、ドイツは2001年、ホロコーストとドイツのユダヤ人の運命を記憶する目的で、ベルリンにユダヤ博物館を開館した。対照的に、日本の靖国神社の施設内にある戦争記念博物館〔遊就館〕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大東亜戦争)をたたえるもので、大展示室には、悪名高い人間魚雷と特攻隊が使った戦闘機がおかれている。東アジアでは、まだ過去が清算されていない」。

「東アジアにおいて和解と統合を始動させるには、大胆な指導力のみならず、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の行為に率直に対応するような日本の積極性が必要である。日本では近年、近隣諸国に対する侵略行為を認め、遺憾の意を表明しようとする機運がいくらか高まってはいるが、用心深い謝罪やいい加減な認知は、古い傷口を開くだけでしかない」。

このカプチャンの指摘を敷衍すれば、日本の支配層の一部に残っている「靖国カルト」、すなわち東アジアでの過去の清算をしないで何とか日本の過去を殊更に美化しようとする勢力は、F.ルーズベルトの仕掛けた冷戦構造に未だに縛られている人たちののだ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小泉、安倍政権の周辺にいた彼らの心情には、反米と親米とが混沌としていて、世界情勢を冷静に分析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状態に陥っていた。かつて「反米」によって「大東亜戦争」を行ったのだが、その戦争でアメリカに負けた、アメリカは「アジアの盟主」である「大日本帝国」に戦争で勝利したのであるから世界最強である、以来アメリカ一國覇権が今も将来も続いているから、日本はアメリカについていくしかない……という具合にしか世界を見ていなかったわけである。

そして、その枠組みからの離脱はすなわち「反米」であるという思考パターンが形成された。「親米でなければ反米、反米でな

れば親米」,あるいは「帝国主義でなければ反帝国主義,反帝国主義でなければ帝国主義」というのは,まさに冷戦期の右派左派がとっていた発想そのものである。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にとって重要なのは,こうした思考パターンから解放される状況を早くつくり出すことであろう。

財界をふくめ,日本の支配層のなかには東アジアを経済共同体とし,ゆくゆくは安全保障までふくめた「東アジア共同体」へと発展させていこうという志向がある。鳩山政権もそうした「発想」を鼓舞している。むろん,そうした「発想」の一部には,かつての「大東亜共栄圏」的発想で,「反米英」的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を満足させようといった時代錯誤の議論もあるが,一般的には,たとえば,谷口誠元国連大使の言うように,「二一世紀は,世界経済が新しく三極構造(北米,EU,東アジア)化する中で,日本が,米国,欧州とも協調を保ち,躍進するアジアに軸足を置き,アジアと共に歩むべき世紀である」(『東アジア共同体』岩波新書)といった考え方であろう。

ただ,こうした考え方には,「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が,なぜ起こり,その後どうな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への基本的認識が十分であるとはいえない。アメリカが「大戦略」なしに撤退する可能性についてもよく考えておかないと,東アジア地域に不必要な混乱を招く恐れがある。北朝鮮やミャンマーなどのグローバル化の先端のところで起こっている諸問題を,「アメリカ抜きに」どのように処理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も必要とされている。

さらにいえば,新自由主義による市場原理主義的グローバル化によって,国家間関係の緊張は緩んだとしても,各地域の階級間,階層間格差の拡大に伴う,一種の「新たな階級闘争」状況が作りださ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にも,慎重な対応が必要である。

金融操作により市場をもてあそぶ新自由主義は,一方で一部の新富裕層をつくり出すと同時に,他方で圧倒的多数の新貧困層をつくり出している。もし,東アジア地域

におけるアメリカ軍の存在や各地域の国内暴力装置の存在がなければ,抑止が利かず,格差による矛盾の激化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の「革命」が生じ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ような状況がすぐそこにあるといえる。

日本における先の総選挙の結果も,その一つの兆候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劇的な変化をもたらしたこの力は,もし投票行動という規律管理された仕組みがなければ,暴動騒乱や暴力革命などといったかたちで噴出し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ある。

もともと選挙投票などによる多数決といった民主制の諸制度は,敵の頭をたたき割らずに済ませ,相手の生命を維持してそれを活用するために編みだされた。したがって,投票結果それ自体を甘く見てはいけない。先の日本の総選挙が,「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を象徴する結果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の意味を,ここで考えておくことにしよう。

改めて確認するまでもないが,2009年8月30日に投開票のあった日本における第45回衆院選総選挙の結果,全480議席の内訳は,民主党が小選挙区で2005年の前回選挙の52議席から4倍以上となる221議席,比例も前回の61議席から87議席にそれぞれ伸ばし,単独では戦後最多の308議席を獲得した。岩手,福島,山梨,新潟,長野,愛知,滋賀,長崎の8県では,議席を独占した。自民党は公示前の300議席から小選挙区64,比例55の119議席に激減した。民主党に小選挙区で議席独占を許した8県のほか,秋田,埼玉,静岡,大分,沖縄の5県でも全敗した。公明党は小選挙区に擁立した8候補が全員落選した。比例で21議席を獲得したが,公示前の31議席から大きく後退した。共産党は比例で9議席を,社民党は選挙区3,比例4の計7議席を獲得し,公示前勢力をそれぞれ維持した。公示前4議席のみんなの党は5議席(選挙区2,比例3)に伸ばし,同じく4議席だった国民新党は選挙区での3議席に減らした。新党日本と新党大地は1議席ずつを得た。

この結果そのものが,実に劇的な変化であ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り,その総指揮者

であった小沢一郎という政治家が「国民の総意」という表現をもって、さまざまな政治要求を主張しているのには、十二分な根拠がある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

国内外メディアにおいても、この選挙結果を明治維新と同じような意味をもつ政治革命であると評価するところもあるが、日本における上部構造の変動という意味においては、そういう言い方もまた可能である。

明治維新の時には、軍事的内戦状況があったが、今回の選挙結果は、いわば一定の規則の下の「戦争」の結果であると考えてよい。グラムシ流に言えば「陣地戦」の一つの局面であって、選挙に勝つか負けるかは、候補者とその支援者にとって生死をかけた戦い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からである。暴力的に政権を交代させることは、より複雑化した社会構造をもった現代においてはなかなか難しい。本来的政治目的を完遂するには、いずれにして「陣地戦」が必要となる。グラムシも、「すくなくとも高度に発達した諸国では、「市民社会」はひじょうに複雑な、また直接に経済的要素（恐慌、不景気等）の破局的「侵入」にたいしてねばりつよく抵抗する構造になっている。この市民社会の上部構造は、近代戦における塹壕体制のようなものだ。塹壕体制のもとでは、一斉砲火によって敵の防禦体制を完全に破壊したようにみえても、ただそうみえるだけで、じつはその外観を破壊したにすぎず、いざ攻撃、前進というときになると、攻撃側はなおも強力な防禦線に直面することになる」としている。

実際の戦争とは違って、負けても生き残って捲土重来を期待できるのだが、よほど強い政治的「信念」がなければそれは難しい。「信念」は信仰に通じるので、その候補者が何を信仰しているのかによっても違いが出てくる。

かつて与党であった公明党は、言うまでもなく一種の仏教信徒団体である創価学会の政治組織でするので分かりやすいが、宗教法人の中には自民党や民主党などへの支持母体となることも多々ある。日本国憲法は政教分離原則を採用しているので、公職

者や政治党派において「宗教」が前面に出る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だが、憲法は同時に個人の思想信条の自由を保障しているので、フリーメーソンの会員が内閣総理大臣になる可能性をも許している。

ここで問題になるのは、スーザン・ジョージが現代アメリカ社会において着目したような「有機的知識人」が、日本においてどの程度「文化ヘゲモニー」を握っ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日本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義者の信仰の基盤は存外脆弱である。もともと自民党は新自由主義的というより、むしろ、もっと組織的公共的共同体の権力基盤に支えられてきた政党であった。それが小泉政権以来、アメリカの煽動を受けて、慣れな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主義に邁進した結果、先の選挙によって彼らは自分たちの存立基盤自体を失ったという構図になる。

逆に民主党は、従来自民党に牛耳られてきた組織的公共的共同体の権力基盤への「陣地戦」を目的意識的に展開したことによって勝利した。すでに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それは小沢一郎のもともとの基本戦略であった。次の参議院選挙においても引き続きその基本戦略は継続していくはずであるが、小沢一郎が前回の参議院議員選挙以降倦むことなく一貫して継続してきたのは、日本の農村や地方都市への政治的影響力の浸透であり、その共同体的要素の再構築であった。これは、いったいどういう選挙区で民主党が勝っているのかを細かく分析していくと明らかである。もっとも、民主党がいったいどこまで日本社会にそのヘゲモニーを浸透させているのかをより詳しく確認できないと、日本の政治社会の行方を判断していくことは難しいかもしれない。小沢一郎が獲得したのは、ある意味で日本政治社会に残存する「農民性」に他ならなかったともいえる。

かつては明らかに新自由主義的勢力であった小沢一郎は、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に「宗旨替え」をして、現在のような「非・新自由主義的勢力」となったかの、また、彼らは、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な「信仰」をもってしているといえるのであろうか。多くの「信仰

教義」のうち、一つ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るのは、「無神論」という「信仰」である。これは逆に言うと、宗教勢力を政治的に有効活用するという点において、きわめて現実主義的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から、小沢一郎的民主党勢力が、今後創価学会などを取り込んでいくのは、ある意味で時間の問題である。

他方、鳩山代表の方の「信仰」はどうか。すでに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ように彼は「友愛」思想をモットーにしている。ご本人にどれくらい自覚があるかどうか分からないが、地域によっては、こういう「信仰告白」をすると政教分離原則に抵触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ほど、これは極めて「宗教的表現」であるともいえる側面をもっており、ヨーロッパ近代史の文脈においては、基本的には反カソリック、反キリスト教原理主義でも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もちろん、現実政治との関係においては、「思想信条」というものは不断に再調整され続けるわけであるが、何れにせよ、鳩山首相がかつて発表した、米国主導の新自由主義的グローバル化批判を展開しつつ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建設を提唱した主張は、すでに海外でも複雑な反応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

未だアメリカ国内には広く残存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アメリカ的新自由主義の政治的後退は、何れにせよ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を加速させるであろう。日本における総選挙結果は、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の端的な事例であるといえる。

このアメリカの時代の終わりのプロセスは、政治的言説における「信仰」の諸問題を含め、今後さらに、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どのようなヘゲモニー闘争の激化をもたらすのであろうか。また、太平洋を挟んで巨大な米中関係が構築されているプロセスにおいて、マージナルな存在に変化していく日本の生存戦略はいかにあるべきか。こういった問いには、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他の諸国との相対的關係における「秩序形成」の問題を含め、かなり長いレンジの歴史感覚を必要とされる問題が含まれている。

東アジア地域は、この約2世紀の間に、

いわゆる「中華帝国ネットワークの朝貢システム」から「ウェストファリア体制的クリスティアン主権国家システム」の擬制形態へと移行してきた。そして現在、中国パワーの新たな台頭において「国際秩序規範」そのものの変質過程に直面している。この変質過程にはいったい、アメリカ的新自由主義帝国に表象されるような秩序規範と、どのような質的差異をもつ「秩序規範」があるのか。最後にこの点に言及して、本稿を閉じることにしたい。

中国パワーの新たな「秩序規範」形成プロセスにおいて、旧「秩序規範」との「差異」を確認するためには、アメリカ的新自由主義帝国にはいったい何が「欠如」しているのかを検討しておくが有効である。

そこで私がキーコンセプトとして考えているのは、アジアにおける秩序規範形成の基礎であり、仏教、道教、イスラームなどアジア的諸「信仰」の基盤となっている「農民性」の問題である。たとえば、日本のケースでは、小沢一郎が現在政治的に獲得しているのは、まさにこの「農民性」を基盤とした政治権力に他ならない。

アメリカ的新自由主義帝国の失敗の本質は、その秩序規範やガバナンスの原理の中に、アジア諸地域における「農民性」への理解が欠け、そのこと自体を自覚できないことにある。アフガニスタンやイラクでの介入の失敗は、かつてのベトナムでの介入の失敗同様、この「農民性」への無理解がもたらしているといえよう。

その歴史上封建制を経験していないアメリカ人には、「農民」としての集団的経験が欠如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は、玉本偉氏の仮説である。その一方で、中国封建社会の長期的持続の問題について、金観濤『中国社会の超安定システム - 「大一統」のメカニズム』(村田雄二郎他訳、研文出版1987年)のような議論もある。アメリカにおける「農民性」の不在と中国における「農民性」の持続という主題を重ねることにより、新たな分析視座を構築していくことも可能であろう。

ここで「農民性」と呼ぶものは、政治権

力による統治や支配において、「相互扶助的」で「したたか」かつ「共同体的」で、複雑な地縁血縁関係の中で構築される「権力関係」の性格を表現している。かつて中国共産党により実現された中国の解放は、農村による都市の包囲によって貫徹されたのだが、アメリカ的新自由主義には、そのような農村や農民性を政治秩序形成の基礎にするような認識が決定的に欠けている。そして、それがアメリカのアジア介入の「失敗」の重要な要因であり続けている。封建制を通過しないまま近代に到っているアメリカの歴史には、土地に縛られる「農民」が存在しない。そのため、そうした「農民性」を政治社会に反映できるような基本機能がないのである。アメリカに存在したのは、常に「農業労働者」なのであった。

かつての黒人奴隷の存在がアメリカの政治社会にアジアにおける「農民性」と類似する機能をつくりだしえたかもしれない。だが、南北戦争が北軍の勝利によってアメリカ統一を実現してしまったため、「農民性」を理解可能にする政治社会の形成が難しくなった。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秩序規範の再編成は、農村社会の培ってきたような政治社会における「農民性」の再分析による解明を前提とするような権力によってもたらされるのでない限り、安全安心と安定を構築していくことはできない。アメリカ的新自由主義によるグローバル化は、さまざまな戦争紛争状況を常時作り出すことによって拡張してきた。それとは対照的に、もし中国モデルが、そのアメリカの轍を踏むことなく、東アジアをはじめとした世界各地に一定の秩序規範を形成させる力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われわれは「戦争の20世紀」を超えた「新たな規範による世界秩序形成の21世紀」を迎え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

かつて、19世紀後半、ペリーの砲艦外交による侵略パターンを学習して国家建設を行った近代日本が、20世紀にアジアにおける多大なる惨禍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を鮮烈な教訓とするならば、新たな秩序規範を拡張し

つつある中国が、アメリカの新自由主義的軍需産業の挑発誘発に乗じることなどないはずであろう。アメリカと同等でアメリカに代替可能な軍事力によって東アジアの秩序形成を担うはずだ、などといった新自由主義的発想によっては、そもそもアジアのガバナンスは維持できないからである。

破壊とデカダンスとのモダニズムと対置されるような、したたかな「農民性」の緻密な分析を基礎とした新たな秩序規範構築こそ、アジアの生存をより豊かに保証する鍵となるに違いないという問題を提起して、本報告を取りあえず閉じることにしたい。



中国模式的政治形态：原理及其由来

臧志军¹

引言

大凡一个“新世界”的兴起总会在“旧世界”中引起哗然。19 世纪初，来自旧大陆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实地考察了“新世界”——美国之后，写下了不朽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书中所描绘的新世界的景象在“旧世界”（欧洲）引起了轰动。在当时的“旧世界”精英们的眼中，“新世界”的美国还是一个异类，一个异类居然表现得如此出色，旧世界的人们当然一片哗然。无独有偶，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美世界对于日本的成功反应，提供了同样的案例。当时日本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引起了欧美精英们的关注。赖肖尔写《日本人》（1977 年出版）一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为什么会成功。换言之，在当时“旧世界”（西方国家）精英们的潜意识中，近代以后，所谓“成功”应该只是西方的独有的结果，日本并不是一个西方国家，可是它居然也成功了，这是一个奇怪并因此而有趣，进而值得研究的现象。于是，以曾经担任驻日大使的赖肖尔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开始研究，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为什么会成功？也就是说，当时欧美精英们对于日本的研究兴趣也是基于一种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不解而出发的。

如今，这种哗然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又一次重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持续，快速增长引起了欧美知识界的关注，2004 年 5 月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一文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促进了关于中国式发展道路的大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最初引发大讨论的“北京共识”的概念逐渐消失，但是另一个概念——“中国模式”却日益凸现，并

被普遍使用。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存在两个不足：第一，在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中，偏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方式，而忽视了对其政治形态的分析；第二，在论述中国模式的政治特点时，只是一般和简单地描述为共产党领导或者共产党一党独裁，缺乏对于中国模式政治原理的深入分析。

所谓“共产党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由一个名为共产党的政党掌握着领导权。从本质上讲，共产党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并不是一个政党给自己起名为共产党，那个政党就是共产党了；并不是一个名为共产党的政党在执政，那个国家就是共产党政权，那个国家就是共产党国家了。共产党，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国家是一整套特定的理论，组织，运动和制度的总合。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原理的角度，探讨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在此，作者只是对于这一模式的政治原理进行梳理和揭示，而并不准备对其进行价值分析，因为价值分析涉及领域宏大而本论文的篇幅有限。

I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模式政治形态的第一原理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中国，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人们一直沿用毛泽东的话，他说，将“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有人批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独裁体制，对此毛泽东并不否认，他说：“可爱的先

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的，就是剥夺反对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有人认为，如此赤裸裸的语言表述“太刺激了”，对此毛泽东根本不以为然，他回答道，我们讲的是对付反动派，不是讲对付其他人。对于反动派而言，不存在“刺激”还是“不刺激”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种直言不讳的表述被后来的中国领导人所继承。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就曾经反复强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他还说：“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江泽民，胡锦涛在这方面尚没公开发表那么直白的讲话，但是他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原理的忠实的继承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就被确定为中国的国体。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国为“人民民主国家”（第一条），在该宪法的序言中有“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1975年修改宪法时，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取代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将“人民民主国家”进一步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文革后的1982年宪法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并延续至今。虽然建国以来关于中国国体的表述在文字上有一些变动，但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人民民主专政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II 人民民主专政原理中的核心概念是“人民”

在中国，“人民”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一是作为组织，动员，依靠和服务对象的人民。

首先来看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先后制定的三部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换言之，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的国家主权模式是“人民主权”，人民是主权者，这一点建国六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变化。

所谓主权，当然应该理解为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而“人民主权”当然指的是这种权力属于人民。主权既然是“最高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自然应该是没有错误的，换言之，除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自己，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可以断言人民是否有错；既然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不能被任何外部的存在断言是否有误，那么他们自然就不受来自任何外部存在的“教育”。

“人民主权”的概念并非起源于中国，它也不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提出。人民主权的概念源自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并首先在英国，法国，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变革中得到运用，并成为这些国家变革后的政治体制的基本原理。那么，同样使用“人民主权”（简称“民主”）的概念，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关键性区别在哪里呢？萨托利（Sartori, G.）认为，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或者权力，因此，在讨论“民主”时，首先应该讨论“人民”的定义。笔者赞同萨托利的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对于“人民”概念的两分是中国模式政治形态的最重要的特征。

在西方国家，人们经常用“国民主权”来代替“人民主权”，或者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中国，“人民”和“国民”被认为是两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人民主权”这一表述是不能用“国民主权”来替换的。举中国政治学界集体之力编撰而成，反映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观点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这样解释“人民”这一概念：“人民——政治用语，与‘敌人’一词相对而言。指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顺应历史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有时也泛指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该书的作者还特别指出了人民与公民，国民的区别：“人民与公民，国民是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都反映了一定社会关系和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但两者有明显的区别。（1）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而公

民或国民是个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它反映一定的法律关系。（2）人民指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而公民或国民指一国中所有具有该国国籍的人，不以其是否起进步作用为标志。（3）人民是个集体概念，是众多人的集合体，任何个人都不能称为人民，而公民或国民则可用于单个人。”

“顺应和推动历史前进”，“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大多数人”，“是个政治概念”，“是个集体概念”……，换言之，在中国，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其不仅具有主权者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顺应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进步，代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这一重要特征。

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是什么呢？根据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前进方向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路线的不断演进。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是顺应和推动社会按照这一路线前进的人们。中国共产党因其信仰共产主义这一科学的真理，自觉顺应和推动历史的前进，“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自然就成为“人民”和“人民主权”的集中载体。与此同时，凡是不顺应和推动这一进程的社会势力当然就不属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范畴。

在中国，另一种含义的人民是作为组织，动员（抑或教育）和服务对象的“人民”，这种人民“人民”经常被称为“人民群众”或者是“群众”，“老百姓”。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拥有最高的权力并且代表历史的前进方向，因此从逻辑上讲他们没有错误，也不需要接受教育。但是，现实社会政治中的人民却是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群体的，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分歧因而也就存在着错误，于是这种现实中的人民是需要进行教育，组织，动员和领导的。不仅如此，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来看，现实中的人民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积极推动与消极顺应之分，于是他们可以被划分为领导阶级，同盟军以

及联合对象等不同的类型。在人民民主专政原理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理论，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理论，以及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理论等均由此而来。

按照对“人民”的二分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他们的历史创造活动需要有站在历史前沿，掌握了先进理论的领袖人物领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被指定为大学生政治教育基本教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写到：“历史表明，当先进阶级及劳动人民为了解决新的历史人物和腐朽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时，必然会产生出一些领导运动的杰出的领袖，政治家和思想家。”“任何一个时代，人民要对腐朽的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斗争，都必须在一定的共同思想指导之下动员和组织起来，……这种共同思想总是由某些杰出人物首先提出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总是由少数人发起和组织的。”

该书的上述观点不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完全符合，而且实际上只不过是后者的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写道：“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列宁更加系统地论述了对人民群众进行动员，教育的必要性，后人将他的这方面的思想主张称为“灌输论”。列宁“灌输论”的标志之作是他在1901年秋至1902年春所写的《怎么办？》。在这一著作中，列宁认为，工人自身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社会主义学说是从“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共产党人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

毛泽东十分强调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甚至对共产党的干部说过这样的话：“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属于人民范畴的各个阶级，阶层都还是需要组织，动员和教育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必须经过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毛泽东说过：“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需要教育，1957年毛泽东写道：“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者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重视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天安门事件前后，邓小平在总结10年改革开放的教训时多次指出，当时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对于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III 对于“人民”的疑虑普遍存在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和“需要组织，动员和教育的人民”——导致这种对于“人民”的两分的是对于人民的理性的犹豫：人民是理性的，人民又可能是非理性的；人民是正确的，人民又可能犯错误……其实，这种对于人民理性的犹豫并非共产主义者所独有。在中国，这种犹豫在历代一直存在；在西方，这种犹豫也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时代。

在中国古代，比较而言，儒家思想家对于人性是比较乐观和有信心的。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人民是需要教化的。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主张，统治者要在使人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教化。孟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对于人性最有信心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具有四种善心，他甚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是，他仍然强调人必须接受教化，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善心只是提供了人向善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教化，则这种可能性就无法转换为

现实，人仍然会像野兽一样。

黄宗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激进的思想家，有的研究者甚至将其和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他曾经这样写道：“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段话的意思是：判断整个社会政治是否处于理想状态的标准，不在于特定政权的统治是否稳固，而在于普通的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显然，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极具煽动性和颠覆性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位激进的思想家，他也没有进一步提出，人民有权推翻暴虐的政治统治，而仅仅是把暴虐的政治统治的垮台看作是某种“规律”作用的结果。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还是在于对于民众的不信任。

在中国近代，梁启超是影响巨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文章风靡一时，影响了诸如胡适，梁漱溟等许多大思想家。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深感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之必要。他写道：“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将“新民”（即教育和改造国民）视为当时“中国之第一要务”。关于如何才能养成新民的问题，虽然梁启超曾经强调过人民的“自新”（每个人自我进行改造），并且反对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养性，一味追求自身完善的“自省”之路，但是因为他对于人民的不信任，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新的主张，转而呼唤有一个新的来自人民之外的权威“以铁以火陶冶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于之谈华盛顿之事”，从而走向了开明专制论。

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使用“国民”的概念来建构新的国家，政党和政治，但是他对于国民的素质深怀忧虑。他认为，在政治上，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人民深中皇权主义思想毒害，满脑封建宗法观念；在文化科技教育方面，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一般国民知识程度甚低，绝大多数人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人的人格，堕落已极。孙中山虽然主张立即通过国民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是鉴于对人民素质的担忧，

他精心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主张在革命后先对人民进行教育和训练，然后逐步还权于民。

其实对于人性的犹豫在西方也早已存在。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激进的人民主权论者，但是在笔者看来，他所主张的人民主权中的“人民”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原理中作为主权者的“人民”非常相似。对于现实中的“人民”（即中国政治语言中的“人民群众”），卢梭抱有很大的怀疑和犹豫。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划分了“公意”和“众意”（抑或“共意”）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认为，公意最高，公意无错，主权只能建立在公意的基础上，主权只不过是公意的运用。那么什么是“公意”呢？卢梭并没将“公意”定义为“大多数人的意志”，他认为，大多数人的意志只不过是“众意”。“众意”是会出现错误的。主权无错，主权不能建立在可能出现错误的众人意志基础上，这就是卢梭之所以没有讲公意定义为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原因，这也是卢梭将公意定义为“大多数人的经常性意志”，并将其作为主权之所在的原因。

卢梭提出的“公意”实际上就是中国政治语言中所说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意志”或“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只有作为主权者的意志和利益才是至高无上和永远无错的，而“众意”只不过是算术意义上的大多数人共同的意志或者共同认定的利益。毫无疑问，“数量”不等于“质量”，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未必正确，数量本身不能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但是“大多数人的经常性意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无法形成的，比如什么叫作“经常”，100次选择中有80次选择了A就算是“经常”吗？大多数人的“经常性意志”就不会有错误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或许正是基于大多人的认可并不等于正确这一认识，卢梭认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

卢梭对于“公意”和“众意”的划分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两种“人民”的出现：一种以公意为基础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另一种是以众

意为基础的占据人口多数的人民。前者被视为政治权力的最后依归，而后者则是需要组织，教育（包括对其进行“说明”）的对象。在此，共产主义学说中的“人民”和启蒙思想家卢梭学说中的“人民”有着非同一般的相似。

“共产党领导”通常被视为中国模式政治形态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但是存在着一个不足，那就是它没有清楚地表达出以下的逻辑关系：共产党领导只不过是人民民主专政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原理基础上的，而人民民主专政原理又是建立在对于“人民”概念的二分的基础上的。

IV 民主集中制的原理是人民民主专政原理的必然结果

“民主集中制”最初只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第一次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在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修正党章的决议案中。1928年通过的党章初步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建国以后，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共党内生活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理。在文革之前，党政不分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尽管宪法中没有明确写明“民主集中制”，但是由于党章中有民主集中制的表述，所以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理。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讨论党政分开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就有必要在国家大法中也写入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于是，1982年制定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三条）。

在中国，所谓民主集中制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党的层面，二是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就党的层面而言，民主集中制指的是在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于组织，上级或者中央已经决定的事，个人，下级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坚决服从和执行。刘少奇说过：“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党的领导

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而言，民主集中制指的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所有的国家机关要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以及地方国家机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总之，民主集中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处理干部和群众，上级和下级，国家和地方，整体和部分，组织和个人，执政党与参政党等领域的关系，被认为是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

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民主”，但是其特点更加体现在对于“集中”的强调上。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虽然这里的“集中”在不同的层面可以指组织，上级，整体或者国家，党等不同的主体，但是毫无疑问，贯穿始终并且是最后，最高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所谓“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民主为什么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呢？除了基于现实的利害关系的说明（如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来自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就会是一盘散沙；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将会分裂等）之外，另一个重要理由其实就是：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的物化形态；而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对于“正确”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存在着区别，如果听任其自由作主，则无法保证国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由此可见，中国模式政治原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理其实也是建立在对于人民的二分之一的基础上的，它是人民民主专政原理的必然结果。

V 实践的原理及其意义

共产党代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是人民主权的载体，但是共产党是一个一个的党员构成的，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在内）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在此情况下，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正确成为中国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领导是永远正确的，这只是从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出发所作的断言；在理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

党并不认为自己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是绝对和永远正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方针，政策的调整屡见不鲜，这种调整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实践的原理进行的。

“实事求是”的表述是毛泽东提出的，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此，毛泽东实际上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事物是存在着被称为规律的“绝对正确”的；第二，这种“绝对正确”隐藏在事物的背后，需要我們进行研究才能认识；第三，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可能认识“绝对正确”。很显然，毛泽东并不认为，共产党人天生就是绝对正确的，共产党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真理和检验真理。经历了文革的历史性错误之后，邓小平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实践的原理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要实践；二是通过实践来认识和检验真理。

实践活动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前提，不进行实践就无法认识和检验真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领导人大多主张重视群众，下级或者地方的实践活动。毛泽东所说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其内涵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活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鼓励大胆进行试验，也是基于对实践活动的重视；后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也都鼓励开展各种实践活动。

实践的目的有两项：一是认识真理，这里的“真理”指的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原理及其所包含的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换言之，实践活动不能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为目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非人民民主专政”，“非党的领导”的主张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不是“真理”；那样做不符合实践的本来目的，不能称之为“实践”。实践的第二个目的是检验真理，此处的真理指的是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在这个层面，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发

现错误，认识错误，找到解决办法，然后修正错误……，中国模式的政治形态并不是顽固不化的，在其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有效“试错”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整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

实践活动是和民主集中制联系在一起的，其基本过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种与民主集中制相联系的实践活动吸取民意，维持政治信念（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政治的世俗性）之间的平衡，保持政治统治的理性，调整方针，政策，实现国家不断发展，并且获得新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可以说，实践的原理是人民民主专政原理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没有这一原理，人民民主专政难以保持理性，不可能长期维持。

中国模式的政治形态，就其基本原理而言，是人民民主专政原理，民主集中制原理以及实践原理三者的结合和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历程，就其基本内容而言，是不同时期，不同领导人对于上述原理中不同要点的偏重的调整。

继江泽民概括出“三个代表”的表述之后，胡锦涛一方面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主张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江泽民提出“要始终代表”，以及胡锦涛开始在使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表述的同时使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表述，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似乎已经注意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人民”的概念以及“人民”二分法带来的挑战，但是，基于政治信仰和现实政治，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这一概念和方法。

下一阶段中国政治发展比较现实的方向

也许是：执政党在不改变上述原理的同时，更加自觉地运用“基于人民同意的统治”（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更加注重履行“说明的责任”。在西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人民的统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而是被“基于人民同意的统治”所替代，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变化，不仅有物理方面的原因，更有对于“人民”概念的二分，而后者恰恰是和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原理中的某些成分相吻合的。

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主任·教授。



論文

中国的価値観の拡散と国際社会

遊川 和郎¹

I はじめに

1 国際的影響力拡大の背景

本シンポジウムのテーマである「中国の国際的影響力の拡大」については、経済規模の拡大（生産力、需要の増大）や、経済成長（世界経済の牽引）に伴った国際社会における発言力の増大（G2, G20）といったことがまず挙げられる。

中国の国際的影響力拡大が近年指摘されるのは、WTO（世界貿易機関）加盟と相前後して中国と世界経済との一体化が急激な勢いで加速したことが背景にある。その影響が世界の隅々まで及び、中国の国内問題だったことも含めて国際社会が共有し、直接・間接に引き受けなくてはならなくなったのである。

2 中国台頭とその問題

こうした新たな国の台頭が既存の秩序と様々な摩擦を起こすのは過去の歴史を見ても珍しいことではない。日本の台頭も 100 年前はまさにそうだった。中国の場合、これまでと違うのは、以下のような事情が考えられる。

一つは、世界の 5 分の 1 の人口というその規模が桁外れなことである。人口に伴う需要や生産力が一気に世界経済の中に入り込んできた。その破壊力、影響力の大きさはこれまでの比ではない。

二つめは時代背景である。新自由主義全盛の中、ヒト、モノ、マネーの動きに制約は取り払われ、経済合理性を求めてかつてないスピードでこれらが国境を越えて自由に動き回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った。

三つめに、中国自身の特殊事情である。19 世紀半ばから約百年にわたり半植民地

状態を経験し、建国後は東側陣営の中でさらに 30 年足踏みをしてきた。強さや豊かさへの渴望は想像に余りある。また発展段階に百年以上の差があるので、成熟国家の価値観とは相容れないところもあるだろう。

3 本稿の論点

本稿では、中国から流れ出るヒト、モノ、カネのうち、特にヒトの動きに着目しながら、それに伴う中国的な価値観の世界への拡散、またその特色や国際秩序に与える影響、そしてその中に問題があるとすれば何なのかについて述べたい。

II 外に向かう中国人

1 華僑・華人

(1) 新華僑の規模

中国から海外に出た中国人はどのくらいの規模なのだろうか。中国の華僑・華人向け通信社・中国新聞社が発表した「2008 年世界華商発展レポート」（以下「華商レポート」）によれば、海外の華僑・華人は 4800 万人に上る。

同レポートによれば、1949 年の建国から改革開放の始まる 1978 年までの間、政府が認可した私的な出国（海外移住）は 21 万人にすぎなかったが、改革開放後に出国した所謂「新華僑」は 2000 年までに 220 万、今世紀に入って増加ペースは加速し 417 万、あわせて 637 万人以上に上ると推計している（表 1 参照）。

中国外交部領事司（外務省領事局）によれば、海外在住の中国人は 500 万人を超え、海外に設立された中国系企業は 1 万 2,000 社以上に上るという（『人民日報』2009 年 7 月 9 日）。

「華商レポート」の推計は外交部の発表数よりもやや多いが、ほぼ符合する数字である。

(2) 新華僑の出身地

華僑の出身地は従来南部沿海の福建、広東に集中していたが、新華僑は浙江（145

万）、福建（110万）、広東（100万）、上海（50万）、東北三省（40万）、北京（30万）、天津（30万）と広がり、その他チベットを除けば各省数万から十数万人の規模となり、出国熱は内陸部にまで及んでいるのが特徴である（「華商レポート」による）。

表1. 新華僑・華人の増加推計

1978-1998	1999	2000-2008			改革開放30年	
180万	40万	計算 根拠	1999年	2004年	5年間平均増加率	637万
			40万	46.21万	2.93%	
			増加率を2.93%と仮定した場合 n≠1なら、 $S_n = a \frac{1 - q^n}{1 - q}$			
			417万			

(出所) 「2008年世界華商発展レポート」5頁

表2. 改革開放以来の主要新華僑・華人の出身地

出身省・市・自治区	新移民数(人)	統計時点	データ出所
福建	110万4,970	2006	《福建日報》
北京	30万	2004.10	北京市華僑事務弁公室
天津	30万	2008.12	天津市華僑事務弁公室
浙江	145万	2008.12	浙江省華僑事務弁公室
広東	100万余	2004.12	広東省華僑事務弁公室
上海	50万	2008.11	上海華僑事務弁公室
東北三省	40万	2008.10	韓国《朝鮮日報》

注) データの出所は各省市自治区の華僑事務部門、新聞報道を含む

(出所) 「2008年世界華商発展レポート」6頁

(3) 新華僑の分布とビジネス移住

伝統的な華僑の多くは東南アジアに分布しているが、新華僑は北米(米国、カナダ)、オセアニア(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やEU諸国(仏、英、伊、スペイン、独、他)、ロシア、日本等でのビジネス展開が目立つ。米州地区の華人が海外華人全体に占める割合は1950年代2.12%から2000年前後には10.9%へ上昇、欧州、大洋州、アフリカ華人の比率もそれぞれ3.66%、1.98%、0.61%を占め、アジアは同期間に96.45%から82.25%に低下した²。

新華僑の移住目的は、留学、技術(専門職)、投資、労務、親族との同居など多岐に

わたるが、ビジネス目的の移住が中心である。中口間では「ビザなし観光協定」が結ばれ、行き来する担ぎ屋によって極東には中国製の衣料や日用品、家電などが大量に流入するなど、ロシアは中国製品卸売りを主とした貿易商が中心である。

極東はシベリア経由でロシア中央部を経由して欧州へ密出国する出発拠点にもなっている。欧州委員会統計局(ユーロスタット)の発表(04年)によれば、中国はEUへの最大の移民輸出国で46万2100人に達する。イタリアの中国人は同国の公式統計では14万5千人(06年)だが、不法移民も相当数に上ると見られている。

EU 各国への移民は中国雑貨の卸・小売りを生業とする浙江商人（特に温州人）が主で、地方都市にもチャイナタウンが形成されている。スペインでは靴、イタリアでは革製衣類やバッグなどファッション関連の生産・販売が有名である。

またアフリカには数十のバオディン村が存在すると言われる。バオディン村というのは、中国企業が受注したダム建設工事でザンビアに出稼ぎに出た河北省保定（バオディン）市出身の農民が現地では高価な野菜栽培に成功し、工事終了後も現地に定住したという話に由来する。こうした中国では当たり前前の技術でも現地では大儲けできるという「アフリカン・ドリーム」が中国国内で喧伝され、農村から貧しい農民を引き連れて移住し農業や養殖、縫製、瓦工場、さらに広義では飲食店や貿易などのサービス業も含めた投資移住モデル全般を指すようになった。

一般に先進国に移住する新華僑は中国ですでに高等教育を受けていることが多いので、高度専門職に就いたり、専門技能を活かした新事業を展開するケースも多い。

（４）在日中国人

日本に外国人登録をしている中国人（台湾、香港を含む）は 2007 年にそれまで在日外国人中最大だった韓国・朝鮮を抜いた。2008 年末現在 65 万 5377 人（日本の総人口に占める割合 0.51%）、さらに在日中国人としてではなく、日本国籍を取得（帰化）した中国人も 2008 年までの 10 年間で 4 万 6000 人余りに上る³。

日本で生活する中国人といえば、日中間の圧倒的な経済格差を背景に、日本語学校に通いながら 3K 労働に従事する就学生を

イメージする時期もあったが、今世紀に入り、留学、研修をはじめ、就職、教育、投資・経営、日本人との結婚など多様化し、各分野で活躍する著名人も見受け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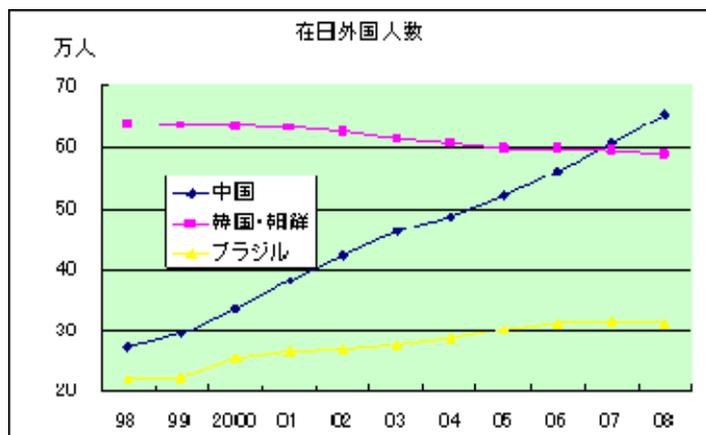
朱建栄東洋学園大学教授が会長を務める「日本華人教授会議」のメンバーには各分野で先端的な研究に携わる大学教授やシンクタンク研究者など約 80 名が名前を連ねる。入管の「在留外国人統計」によれば、中国人の教授・教育職は 2554 名に上る（07 年）。文筆業では、ジャーナリストの莫国富氏、外国人で初めて芥川賞を受賞した楊逸女史もいる。

ビジネスの世界では、留学後に自ら起業したソフトブレン社を東証一部に上場させた宋文洲氏や、CS 衛星放送「スカイパーフェク TV！」内で中国語放送を提供する大富の張麗玲社長（女性）、中国情報を発信するサーチナ社の端木正和社長をはじめ、立志伝中の人物も少なくない。

家電量販店ラオックス（東証 2 部上場）は 09 年 6 月、中国の同最大手・蘇寧電器の傘下となることで合意し、新たに羅怡文氏が社長に就いた。羅氏は在日中国人向けの新聞「中文導報」を発行する中文産業を 95 年に設立した創業社長で、ラオックスのフランチャイズ店を運営する日本観光免税の社長も務める。羅氏を含め、ラオックスの常勤取締役 3 人は全員中国人となった。

東京証券取引所に上場する在日中国人経営者の会社には、ラオックスの他、医薬品開発業務受託のイーピーエス（一部）、システム開発の SJI（JASDAQ）、インターネット通販のストリーム（マザーズ）の計 4 社がある⁴（宋文洲氏は 06 年にソフトブレン社の経営を退く）。

図1) 在日外国人上位3の推移



(出所) 法務省入国管理局「外国人登録者統計」

表3. 東京証券取引所上場で在日中国人が経営する企業

会社名	業務内容	上場	上場年・月	経営者
イーピーエス	医薬品開発業務受託	一部	2006.9	巖浩
SJI	システム開発	JASDAQ	2003.3	李堅
ストリーム	インターネット通販	マザーズ	2007.2	劉海濤
ラオックス	家電量販店	二部	1999.12 2009.8	羅怡文
(ソフトブレーン)	システム開発	一部	2005.6	宋文洲

(出所) 『2008年世界華商発展報告』(中国新聞社)を基に作成
 注) ラオックスは2009年8月に羅怡文社長就任。
 ソフトブレーンは2006年8月に創業者の宋文洲氏が会長退任。

2 影響力を持ち始めた中国人

(1) 国際機関の要職につく中国人

中国の国際社会における発言力の増大は国際機関で要職を獲得することにより高まっている面もある。

06年11月、世界保健機関(WHO)の事務局長選挙で、中国が推すマーガレット・チャン氏(元香港政府衛生局長)が日本の尾身茂氏(WTO 西太平洋地域事務局長=当時)を破って当選、中国人初の国連機関トップとなった。選挙戦では、アフリカ諸国の票が大量にチャン氏に流れたとも言われる。

07年6月には沙祖康氏(元中国駐ジュネーブ国連代表)が国連事務次長(経済社会事務担当)に就任した。沙氏は主に軍縮畑を歩んだ外交官で、米国からの軍事費増加批判に対し、「世界の軍事費の半分を占める米国が、人口が6倍もいる中国を批判する

資格があるか」と発言、米ではタカ派的な発言で知られる。「私が国連で仕事していれば自ずと、中国人の思考パターンや中国の風俗習慣、伝統、文化などもいっしょに持ち込むことになる」「潘基文国連事務総長(韓国出身)とともに東方文化を国連という大家庭の中に持ち込んで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と思う」⁵と語っているように、国連に中国的な思考を持ち込むことに意欲を示している。

沙氏の就任以来、国連事務局職員数も増加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る。日本の113人(5位、全職員に占める比率4.0%)に対して中国は79人(7位、同2.8%)とまだ少ない(任期1年以上)。しかし国連が各国の経済力等支払い能力を基に算出する分担率(分担金の比率)は日本16.6%、中国2.7%であり、中国は分担金に見合った職員をしっかりと送り出していると言える(08年6月

現在)。言語・一般業務関連を含めれば中国人職員は358人になる(09年1月現在)⁶。

08年2月には世界銀行チーフエコノミスト(上級副総裁兼任)に、中国を代表する経済学者の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が任命された。同ポストに欧米以外(途上国)から就くのは初めてのことである。歴代経験者にローレンス・サマーズ元米財務長官(91～93、現在オバマ政権の国家経済会議委員長)、ノーベル経済学賞を受賞したジョセフ・スティグリッツ米コロンビア大教授(97～2000)、「気候変動の経済学」(「スターン報告」)で知られる英国のニコラス・スターン卿(2000～03)といった大物経済学者が並んでおり、このポストの重さと影響力が想像できる。

08年6月、世界貿易機関(WTO)の上級委員に弁護士の張月姣・汕頭大学教授が

就任した。上級委員会はWTO紛争解決手続において、パネル(第一審)が取り扱った問題の申立てを審理する「第二審(最終審)」にあたる機関で、わずか7名の委員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張氏は対外貿易経済協力部(現:商務部)条約法律司司長等を歴任し、中国大陸出身として初めてこのポストを獲得した。「私が当選した意義は、中国がWTOで上級役員の職位を獲得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はなく、中国が規則についての解釈と決定権を獲得したことにもあります」⁷と語ったように、貿易紛争の「主役」である中国にとっては喉から手が出るほど欲しいポストだっただろう。

中国の国際社会の存在感増大に伴って重要ポストも獲得し、さらに発言権力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循環に入っている。

表4. 国際機関の要職に就く中国人

就任時期	中国人名	旧ポスト	就任ポスト
2006年11月	マーガレット・チャン	香港政府衛生局長	世界保健機関(WHO)事務局長
2007年6月	沙祖康	中国駐ジュネーブ国連代表	国連事務次長(経済社会事務担当)
2008年2月	林毅夫	北京大学教授	世界銀行チーフエコノミスト(上級副総裁兼任)
2008年6月	張月姣	汕頭大学教授(元対外貿易経済協力部条約法律司司長)	世界貿易機関(WTO)上級委員

(出所) 各種報道から筆者作成

(2) 米政権中枢の中国系移民

中国系移民が米国で閣僚級の重要ポストに就く例も出てきた。第一号はブッシュ政権で01年から8年間労働長官を務めたのがイレーン・チャオ(趙小蘭)である。1953年台北生まれで8歳の時に一家で米国に移住した。父親は上海嘉定を原籍とする外省人で、交通大学在学中は江沢民元国家主席と同級生だった。中国系アメリカ人として、またアジア系アメリカ人女性として初めてアメリカ合衆国政府の長官となった。

二人目はオバマ政権でエネルギー長官に就任した(朱棣文)で、1948年に米中部で生まれた移民二世である。両親はともに清華大学卒で、第二次大戦後の混乱を逃れて

中国から移民した。母方の祖父にあたる李書田氏は、北洋大学(中国最初の理工大学)を卒業し長く同大工学院院长を務めた。チュー氏は原子物理学を専門とする科学者で、49歳の時に(1997年)ノーベル物理学賞を受賞した。

三人目はオバマ政権で商務長官という重要ポストを担うゲーリー・ロック(駱家輝)である。ロック氏は1950年にワシントン州シアトルで、広東省台山出身の中国系家庭に生まれた。イエール大学とボストン大学で学び、1982年ワシントン州下院議員に当選。1996年ワシントン州知事選に勝利して米国史上初の中国系知事となり、二期8年を務めた。

表5. 米政権中枢の中国系移民

在任期間	英語名	中国語名	就任ポスト	
2001年～08年	イレーン・チャオ	趙小蘭	労働長官	台北生まれ
2009年～	スティーブン・チュー	朱棣文	エネルギー長官	移民二世
2009年～	ゲーリー・ロック	駱家輝	商務長官	移民三世
2009年～	クリス・ルー	盧沛寧	閣議事務官	祖父は台湾法務部長

(出所)『中国 NEWS』2009年10月号76～77頁から作成

3 中国語の普及に伴う中国理解者の拡大
中国人が外に向かって影響力を強めるのと呼応するように、海外にも中国語を解し中国を理解しようとする人物が重要ポストに就く例も出てきている。

2007年12月にオーストラリア首相に就任したケビン・マイケル・ラッド(1957年生まれ)はオーストラリア国立大学で中国語と中国史を専攻し、自ら中国語名「陸克文(Lu Kewen)」を名乗る。最初の外遊先に中国を選び、北京大学では流暢な中国語で講演を行った。オバマ政権で財務長官に就任したティモシー・ガイトナー(1961年生まれ)は81年、82年と北京大学、北京師範大に短期留学した経験を持ち、ダートマス大学での専攻はアジア研究、ジョンズ・ホプキンス大の国際関係論大学院でも

中国研究に多くの時間を費やしたという。米中間で安全保障や経済分野の政策課題を話し合う「米中戦略経済対話」では中国側の王岐山副首相と共に経済分野の共同議長を務める。やはりオバマ政権で米国の駐中国大使に起用された共和党の有力議員ジョン・ハンツマン(1960年生まれ)も「洪博培(Hong Bopei)」という中国名を持ち、流暢な中国語を話す。「われわれアメリカ人は、中国の政治、経済の関連政策をより多く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ためには言葉が分か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語っているように、ユタ州知事時代(2005～09)、中国語教育の普及にも力を入れ、ユタ州では82ヶ所の小中学校で6000人の生徒が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という⁸。自身は5人の実子以外にインドと中国から養子を迎えている。

表6. 中国語を解する海外要人

	中国名	生年	ポスト
マイケル・ラッド	陸克文	1957	オーストラリア首相
ティモシー・ガイトナー		1961	米国財務長官
ジョン・ハンツマン	洪博培	1960	米国駐中国大使

(出所)各種報道から筆者作成

このように中国語学習の普及は中国の良き理解者を作る布石であり、中国政府は海外に孔子学院を設立し中国語教育の拡大、中国文化の伝播に乗り出している。孔子学院は、04年11月に韓国で第一号を設立、09年4月現在世界81カ国・地域に326校設立された。孔子学院は英国のブリティッシュ・カウンシルや独ゲーテ・インスティトゥート、仏アリアンス・フランセーズに相当する公的な文化交流機関で、中国の大学が海外の大学と提携して展開する。孔子学院の08年年次報告によれば、世界中の中

国語学習者は4000万人を超えるという。これに対し、海外の日本語学習者は06年現在約298万人(国際交流基金による調査)、うち韓国(91万人)、中国(68万)、オーストラリア(37万)の3カ国で3分の2を占め、インドネシア(27万)、台湾(19万)、米国(12万)と続く。学習者の広がりや厚みでも中国語が圧倒している。

III 中国の海外進出に伴う問題

1 海外で発生した諸問題

最後に中国人の海外移住、中国企業の海

外進出に伴って生じている問題、摩擦についてみてみよう。

一つは、現地に進出した中国企業や中国人の経済活動、経済行為の凄まじさに起因する摩擦である。スペインやイタリアでは革靴、革製衣類やバッグといった各地の地場伝統産業を脅かす形での進出も少なくないため様々な摩擦も生じている。ナイジェリア、ケニア、タンザニア、ジンバブエ、南アフリカをはじめ多くのアフリカ諸国で衣料品や玩具、家電など安価な中国製品の流入で地元企業は大きな打撃を受けている。こうしたアフリカ諸国の一部では中国人を標的とした武装グループの襲撃や拉致事件、中国系商店に対する略奪、破壊行為も起きている。パプアニューギニアでも 09 年 5 月には首都ポートモレスビーなどで大規模な暴動が連続し、暴徒化した現地住民が中国人経営の店を標的としたが、その背景には 3 万人と言われる現地中国人への反感、敵意が指摘されている。中国人の営む雑貨店や飲食店が地元の同業者の経営を圧迫し、一般市民には高値で商品を売りつけられているという被害者意識もある。華僑も含めた中国人の移住制限や市民権の慎重な審査を求める抗議デモも起きている。

インドにおいては、進出してきた資源・インフラ関連の中国企業（合併）が特別な技術を持たない大量の中国人労働者を引き連れてくることで地元社会との軋轢を生んでいる。短期の商用ビザで繰り返し入国して滞在する中国人労働者が 25000 人に上ることから、インド政府も対中国のみならずビザ発給を厳格化している。

本来、中国企業や中国人のこうしたバイタリティは賞賛されるべきことも多く、それがこれまでの経済成長を実現した大きな原因の一つ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のどん欲さ、旺盛な行動力、生命力、或いは独特のビジネス手法が国際社会や現地の秩序を攪乱し、各所で摩擦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ことに世界は困惑しているのである。さらに、資源獲得のように企業行動の形をとりながら背後に国家の影を感じる不気味さ。逆に対アフリカ諸国のように国が相手国へ援助し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が、現地の主役は中国企業で、

その実体は経済活動にすぎないこと。また実利の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ばないこと。こうした諸現象に対し、世界はどう向き合えばよいのかを模索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もう一つは、中国企業の海外進出に伴うトラブルが国家間の問題に飛び火、発展するという現象である。豪州で起きた事例を簡単に振り返ってみよう。09 年 2 月、中国アルミは米金融危機後の資源価格下落で資金繰りに苦しんでいた英豪系資源大手リオ・ティントの転換社債引き受けなど総額 195 億ドルを出資し戦略提携を結ぶと発表した。しかし、既存株主の中からリオの鉄鉱石が安く中国企業に売り渡される可能性への反発が起き、豪政府も野党からの批判や安全保障上の問題から態度を硬化させ、4 ヶ月後に両社の提携は白紙に戻された（結局リオは別の英豪系大手 BHP ビリトンと鉄鉱石事業を統合）。

提携頓挫から 1 週間後、中国商務省は中国アルミを振ったリオに対し、「BHP との統合により、同社の鉄鉱石輸出は世界全体の 36% を占めることになる。中国（鉄鉱石輸入世界一）での売上高が一定の水準に達するなら、中国の独占禁止法が適用されるだろう」と警告を発した。

さらに 1 ヶ月後、リオの上海支社総支配人と中国人社員 3 名が中国との鉄鉱石価格交渉にからんだスパイ容疑で中国当局に身柄拘束された。リオ社員が価格交渉を有利に運ぶため、首都鋼鉄など中国の鉄鋼大手幹部に贈賄工作を行い機密情報を入手した、というのが中国紙の報道である。拘束から 1 ヶ月後の 8 月、4 人は商業機密侵害と非国家公務員収賄の容疑で正式に逮捕された。国家機密などを管理する中国国家機密保護局の公式サイトには「同社の産業スパイ行為は 6 年間に及び、中国鉄鋼企業に 7 千億円の巨額な損失を招いた」などとする報告書が掲載された。同報告はまもなく公式サイトから姿を消し、逮捕容疑も身柄拘束当初の「国家機密を盗んだ疑い（最高無期懲役）」から「産業スパイ（同 7 年）と贈賄の疑い」へと変わったが、リオに対する中国側の敵意や憎悪が見てとれる。

この事件は中豪間の外交問題にも発展し、

身柄拘束、逮捕に抗議する豪に対して中国は「法治国家への内政干渉」と主張する。しかし中国企業が海外進出して生じた商業上の問題が形を変えて外交問題へとエスカレートするところに国際社会とのギャップや問題の本質がある。中国のこうした行動と世界はどのように向き合えばよいのか、模索が続けられている。

2 中国政府の認識と対応

2009年7～9月、外交部と中国在外公館、各地方の外事弁公室は共同で「海外中国公民文明イメージ樹立宣伝月」活動を行った⁹。この活動は近年海外で犯罪に巻き込まれる、或いは直接の標的とされる領事保護事件が頻発したことを受けたもので、在外公館は過去数年年間3万件以上の事件を処理しているという。

その原因は現地の治安情勢もあるが、中国企業や中国人の行動様式に起因するものも少なくない。現地の法律を遵守しないことから、労務問題が発生したり査察を受けるケースもある。

海外に進出する中国企業や中国人は今後も増加す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こうした企業、個人が現地社会とどのように調和するのか、中国にとっても一つのリスク要因になりつつあることが認識されつつあると言ってよい。今後は現地における中国人社会の管理・組織化などが課題とな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⁸ 中国国際放送局 2009年5月18

日。 <http://japanese.cri.cn/881/2009/05/18/1s140475.htm>

⁹ 「备好“走出国门”这堂课」『人民日報』2009年9月30日付

¹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院准教授

² 「2008年世界華商発展レポート」6頁、原データは、1950年代が『華僑華人口参考資料』（北京華僑問題研究会所編、1956年）、2000年前後は『華僑華人概述』（國務院華僑事務弁公室華僑事務幹部学校所編、2005年）

³ 法務省入国管理局「外国人登録者統計」

⁴ 「2008年世界華商発展レポート」35頁

⁵ 『北京週報日本語版』2007年11月5日

⁶ 『人民日報』09年9月22日付

⁷ 『人民画報』「2008年世界に影響を与えた中国人」



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与国内媒体产业 ---- 以新闻出版业做大做强战略为例 ----

西 茹¹

2008年的北京奥运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扩大,让中国饱尝了成功的喜悦.这一年,无疑将载入中国的史册.但同时,这一年也让中国深深地认识到自己与世界在沟通上的隔阂,并同样饱尝了这种隔阂带来的挫折和苦涩.“3·14”西藏暴乱引发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苛责和此后世界各地相继而起的圣火受阻事件使中国的官民皆为之倍感错愕.一些国民甚至为西方的缺乏理解而愤慨怅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不禁再一次慨叹在国际舆论中“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²

因此,改变“西强我弱”的世界舆论格局,扩大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成为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应对的课题.

2008年12月,总书记胡锦涛为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纪念致电祝贺,并要求央视要“建成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³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则强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⁴新闻出版业的最高行政领导柳斌杰接受媒体专访时呼吁,“现在跨国传媒集团多在几十个国家办报刊、办出版、办电视,一个集团办上千种报刊,当然能左右国际舆论.我们也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必须要培养跟自己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大型媒体.”⁵这些指示、讲话和发言无疑是对媒体进一步做大做强的一次战略动员.在中国官方看来,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弱势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属于自己的强大媒体.反之,西方国家就是仰仗自己的媒体霸权曲解甚至妖魔化中国.⁶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进行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迅速整合大传媒资源,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社会广泛影响力和强大竞争力的大型传媒集团”的新闻出版媒体做大做强的改革目标.⁷用柳斌杰的话说,“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尽快使我们的出版传媒能够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发展,做大做强,成为世界新闻出版市场一个有力量的竞争者,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⁸目前,新闻出版做大做强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在宣传上可谓声势浩大.这种视危机为机遇的思考方式本无可非议,不过如何理解和看待新闻出版总署推出的“打造具有国家队水平的‘航空母舰’和‘联合舰队’”⁹的媒体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有待冷静思考.

众所周知,自1978年始,中国媒体为克服财政困难试行企业管理方式,从此媒体走上了经营改革之路.进入90年代后媒体的产业属性逐渐得以确立,媒体由单纯的意识形态工具转型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双重属性的复合体.中国媒体的改革总体上是由经济的市场化牵动、行进在由党和政府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型的轨道上的.但是两种属性之间并非总是一致没有矛盾的,相反,被双重属性定义的中国媒体由于属性之间的矛盾经常在产业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一次次的反复和停滞.

鉴于上述中国媒体的双重属性特征,本文将在政策层面上围绕中国新闻出版业近期推出的做大做强的战略转型进行梳理,同时对媒体实践进行考察.希望这种考察和分析能对理性而全面地把握中国传媒改革的现状提供有益的参考.

I 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打造“航母”的做大做强战略

2009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¹⁰指出,新闻出版业的突出问题在于“资源过于分散,结构趋同和地区封锁,出版产业集中度低、规模小、实力弱、竞争力不强”。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媒体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指导意见》提出要“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培育一批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的专业出版传媒企业。”而且要“鼓励有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到境外兴办报纸、期刊、出版社、印刷厂等实体,拓展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为了实现这一做大做强的目标,新闻出版单位必须进行转企改制改革。所谓转企改制简而言之是指一部分新闻出版单位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再进一步实现股份制改造,有条件上市的可以通过上市融资实现扩大发展。不过其前提是首先要对新闻出版单位进行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和经营性新闻出版产业的划分,进行转企改制改革的主要是指经营性新闻出版产业。

《指导意见》对出版单位的转制改革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如“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但是对报刊业却表述寥寥,只原则性地提到“研究制定公益性报刊基本标准,适时公布公益性报刊名单。”“制定经营性报刊转制方案,推动经营性报刊出版单位逐步

实行转制”。

众所周知,报刊是传达信息、影响舆论的重要新闻媒体,其在媒体做大做强的发展战略上应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指导意见》为什么对报刊采取隐性战术,没有提出更明确的“指导意见”呢?可以推想的一个理由是报刊业比出版业的政治性更强,更复杂,更难以统筹对待、规定统一的措施。其实,在2003年启动的35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新闻出版业的试点有21家。其中报社和报业集团试点有8家。也就是说报业作为传媒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深化体制改革要务。但是报业的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划分也一直是一大难题。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¹¹规定“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以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实行业务体制”,“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报刊社”需要逐步进行转制改革。

同年9月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¹²则要求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都作为重点新闻事业,国家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并要求报业集团加强对子报子刊的管理,发挥子报子刊的优势,使之成为党报党刊的补充和主流宣传阵地的延伸。”在这份文件中,列入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需要进行转制改革的报刊单位只限于“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报刊社”,另外还有“新闻媒体中的广告、印刷、复制、发行、传输网络部分”。

因此,即将出台的“公益性报刊名单”和“经营性报刊转制方案”是否会对2006年的两个文件有所突破?比如,对报业集团内的子报子刊如何进行公益性或经营性的定义等问题,也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媒体改革总体上是受经济改革牵引的。无论是1996年开始启动的以党报为核心的报业集团化改革,还是2001年启动的以加入WTO为契机启动的跨地域、跨媒体的做大做强改革,都是从经济角度着眼力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这次中国媒体以走向世界争

做一流的做大做强转型改革也不例外，同样也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之所以又开始重视和强调文化产业及传媒产业的生产力意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需要。所以，新一轮的媒体做大做强改革实质上也是一场从解放传媒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的改革。它将推动一批媒体单位转型为企业，进入市场，在适者生存的原则下优胜劣汰，通过市场的手段、资本的纽带实现媒体重组和强大。

不过，传媒业在中国有着备受重视的意识形态属性，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能不能真正突破体制的束缚、实现其改革目标、完成其改革任务？换句话说，从严格规范媒体报道改革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角度看，媒体的政策指向如何？是不是也同样鼓励思想解放，鼓励大胆改革？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从意识形态属性的角度考察是否同时进行着与媒体做大做强战略性匹配的制度改革和报道改革。因为产业的重组可以解决做大大的问题，但是未必能实现做强的目标。

II 打破地域壁垒的跨地域办报

推进转企改制改革，打造大型传媒集团，是目前新闻出版业的重要主题。报刊管理部门的方针很明确，即“要通过走市场化道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作用，运用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突破传媒业不同形态媒体相互分割的产业壁垒，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市场壁垒，鼓励推动传媒业以资本、业务、市场为纽带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实行集团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¹³

阻碍媒体产业化发展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体制。深化产业化改革的媒体做大做强的战略就是通过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经营办报的策略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换句话说，报业跨地域发展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谈得上做大做强。因此，新政策的出台又一次把对报业改革的关注聚焦到 2003 年报业曾一度踊跃尝试的跨地区办报的实践上。

早在 200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

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已经提出了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的鼓励跨媒体、跨地区经营等促进媒体产业化的措施。2003 年第一家为中宣部批准的跨地区报纸《新京报》创刊。《新京报》是由光明日报集团和广东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京创办的报纸。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媒体由于地域分割无法跨地域投资办报的局面，迈出了以资本为纽带打破市场分割状态的意义深远的一步。继《新京报》后，又相继出现了《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时代商报》等由多家报纸、报业集团或传媒集团合作的报纸，出现了积极摸索跨地域办报的局面。

但是，跨地区办报的尝试并不顺利。《新京报》登场不到两年，中宣部就在 2005 年初决定不再审批新的跨地区创办的报纸¹⁴。关于停止审批跨地区办报的理由公开报道很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指出属地管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¹⁵。当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石峰也表示，跨地区合作经营的报社还处于实验阶段，“在操作层面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管理体制问题。如果跨地区合作经营后削弱了对媒体的有效监管，这种形式就值得研究。我认为报刊跨地区经营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现在这几家的形式还比较单一。由于管理体制还不到位，目前还不宜全面铺开。无论何种形式，跨地区经营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就是属地管理的原则。”¹⁶

虽然 2006 年 8 月 4 日发布的《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依旧表明“支持报业集团和大型报纸出版机构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增强资源整合能力，提高市场集中度。”¹⁷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跨省办报的新事例。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宣传 2009 年新政策时指出，“你想要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这样的区域内做大，根本不可能，因为它的资源和市场就那么多，没有发展余地。必须要把它从行政壁垒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公众的社会传媒集团公司，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中参与市场竞争。”¹⁸ 但是

来自报业实践的最新报告来看,被视为报业整合最新亮点的“南北模式”¹⁹也仅停留在省内寻求合作。

所谓南北模式,一是指2009年5月10日,广东的西江日报社与省级党报南方日报社签订《关于西江日报社与南方日报社深化合作的框架协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购买西江日报社旗下西江传媒有限公司49%的股份,形成合作经营模式。此为省级党报与地市党报产权合作的南模式。另一个是北模式,是指08年3月21日,辽宁日报传媒集团和铁岭日报社签订协议,《铁岭日报》更名为《辽沈晚报·铁岭版》。创立省级党报与地市党报联合创办地方版的资源共享模式。《辽沈晚报》用其品牌、新闻资源、管理经验、资金及人力资源出版经营《辽沈晚报·铁岭版》。²⁰这两个模式得以实现都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那就是省委宣传部和地方党委的支持。

从媒体实践来看,不能不说报业集团在跨地域办报实践上持有审慎行事的态度。目前还只见高层旌旗招展却不见众兵群起而上。报业集团的审慎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回顾一下深圳报业集团收购《时代商报》的例子,再重新思考一下跨地区办报的难点所在。

2004年8月,深圳报业集团与新华社辽宁分社达成合作协议,全资购并其主管主办《时代商报》,并授权《深圳商报》全权负责管理、经营。9月28日推出了面貌一新的定位为“城市政经大报,辽沈主流媒体”的《时代商报》。新的《时代商报》一经推出,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广告都曾现出显著增长趋势。旋即位居于当地报业市场的前列。可想而知这给当地的两家报业集团所办的晚报带来不可低估的压力。于是便出不断现与当地媒体主管部门的摩擦。不满一年,2005年7月,《时代商报》并入辽宁日报报业集团,由辽宁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深圳报业集团投资辽宁之举就此宣告结束。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到,当有报业集团外来进行跨地区投资探索时,当地的报业集团也会借发挥属地管理制度力量加紧整合本地区的市场,排斥外来者的“入侵”。

市场分割的局面实际上是由行政管理体系造成的。跨地区经营从本质上讲,冲击和挑战的是原有的媒体管理格局,包括“属地管理”制度。这必然会引发管理制度的反弹。在原有管理体制不能做出改变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暂缓新的改革尝试。有人把跨地区创报遭到地方排斥的现象归因于地方保护主义。实质上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现行媒体管理制度。虽然《新京报》在发刊词中自称是“具有合法地位,受法律保护的媒体集团跨地区经营管理的报纸”。但是,由于报纸本身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企业法人的身份,报业集团异地投资办报的行为也不会被视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地方管理部门会以种种理由,如在办报方针、报纸的思路,报纸的性质,以及报纸的各项具体的运作,如人事、发行、印刷、广告经营、财务成本、投入产出等具体的过程中查找问题并进行干涉。

由此可见,政策的矛盾性或政策的不配套是阻碍跨地区办报的主要原因。从发展壮大媒体产业来讲,中央出台的政策鼓励通过跨地区经营,力图打破阻碍媒体壮大的市场分割的局面,但是从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看,又必然担心资本的合作影响到媒体内容,动摇媒体的管理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就在高调宣传做强做大、深化新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强调对新闻宣传加强管理。内蒙古新闻管理局指示说,“要切实落实好‘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守好自己的阵地,管好自己的队伍。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报刊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跨地区合作办报办刊的,应首先明确报刊的主要主办单位,并接受属地管理。股份制办报办刊的,应首先明确报刊的控股方,并接受属地管理。”²¹

2005年停止跨地区办报的理由就是没有解决好属地管理的问题。如果这种管理制度没有丝毫的改进和松动的话,那么报业集团对越省的跨地区办报也只能持谨慎观望的态度了。

III “管理之笼”中的中国媒体何以做强

上文从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化发展政策的角度进行了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加大力度鼓励媒体转企改制，号召媒体放眼世界做大做强。不能否认，通过转企改制，以资本为纽带进行媒体重组、融合、兼并，媒体可以实现做大，但是，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是：媒体如何才能做强？

强媒体不仅在于它规模大、经济实力强，更在于它要有公信力。而公信力从何而来？用媒体学者喻国明的话说，“客观、公正、及时、平衡、全面、深刻”²²的报道才是取得公信力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媒体做大做强如果仅在产业化上下功夫，肯定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媒体生产内容上下功夫。众所周知，最关涉媒体生产内容的改革的就是报道改革。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媒体的另一个属性来进行考察：报道改革是否与产业化改革同步？对媒体内容进行管理的现状如何？中国媒体是不是具备内容做强的政策环境？产业化的推进是不是也为中国媒体迎来了一个报道改革的时代？这里将从意识形态属性的角度对媒体政策进行梳理。

2009年2月，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重点是贯彻08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8]27号）的文件精神，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具体方案。

27号文件被称为是针对新形势下报刊出版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的管理规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为了贯彻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又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通知》（2009年2月6日）、《关于印发〈报纸期刊审读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2月9日）和《关于规范报纸期刊主要负责人任职资格的通知》（2009年2月24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通知》²³（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当前报刊业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少数报刊主管单位不能很好履行管理职

责，少数报刊出版单位内部管理松懈、出版内容时有差错，少数从业人员缺乏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总署要求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要重点审核“报刊主管主办单位是否履行管理职责；报刊主要负责人是否符合任职条件、岗位资质；报刊记者和记者站是否存在违规问题；报刊刊发重大选题内容是否履行备案手续，以及内容质量是否符合规定；报刊是否存在转让出版权、一号多刊多报等违规问题；报刊刊载广告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现象；报刊经营是否存在违规问题等。”

作为强化管理措施，《通知》强调“健全审读制度，加强报刊舆情检测和分析”、“完善报刊编采人员的准入准出制度，进一步规范新闻采访活动”、“加快建立报刊出版单位评估体系，实施退出机制”、“整治虚假广告”、“展开打击‘四假’即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活动”等等。并要求强化“属地管理”，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最后《通知》要求各省落实总署要求对所辖报刊出版现状和管理问题进行全面自查并提交报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将派员对各地落实情况组织检查，对重点地区、重点报刊进行督查。”

我们知道，中国对媒体报道内容设有严格的事后审查，并实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其一就是审读制度。这个制度始于1988年，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媒体环境的不断复杂化，审读制度也不断得以强化。²⁴下面简单介绍一下2009年最新出台的《报纸期刊审读暂行办法》²⁵对审读内容所做的规定。

报刊审读包括以下10项，即——

(1) 是否刊载《出版管理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的禁止内容；

(2) 新闻报道是否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是否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发表或摘转涉及国家重大政策、军事、民族、宗教、外交、保密等内容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3) 刊载涉及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内容，是否按规定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4) 报道涉及灾情疫情、交通事故、安全生产、刑事案件、社会稳定等重大、敏感和突发事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5) 是否刊载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格调低下的文章，是否含有色情淫秽、凶杀暴力、迷信愚昧等有害内容；

(6) 转载、摘编社会自由来稿和互联网信息，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按规定对其内容进行核实，并标明下载文件网址、下载日期等；是否转载、摘编内部发行出版物的内容；

(7) 刊登广告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刊载虚假违法、内容低俗的广告；报纸刊登广告是否在明显位置注明“广告”字样，是否违反规定以新闻报道形式刊登广告；

(8) 报刊标示的版本记录是否符合规定，专版、专刊、增刊的内容是否与报刊宗旨、业务范围一致；

(9) 出版质量是否符合报刊质量管理的有关要求，出版形式是否符合报刊出版形式规范的有关要求；

(10) 出版质量是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使用语言文字是否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

这些内容除了后几项涉及出版质量和出版秩序以外，大部分都与报道内容和舆论导向密切相关。比起 2001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审读工作的通知》和 2005 年颁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对报刊内容的规定，新办法对审读范围规定得更加详细。例如第 4 条和第 6 条中的对自由来稿的规定，在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没有出现。

另外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向各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区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09 年 3 月 30 日)，笔者注意到它在对媒体内容和导向的要求中，“对涉及灾情疫情、交通事故、安全生产、刑事案件、社会稳定等重大、敏感和突发事件”，除了要求“要按照有关规定报道”外，还要求要“严格执行新闻采编工作制度和稿件送审制度。”(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这就是说，在报道这类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关系到民众生命安全的事件上

甚至存在事前审查。难道这样的审查制度是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更有助于胡锦涛主席在世界媒体峰会上致辞时所说的“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²⁶的实现？

近年来，中国的媒体管理高层总是强调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的方针，也就是在推进产业化改革的同时，不放松对报道编辑出版环节的管理。而且这种管理在层层执行过程中，就经常不免出现媒体在关系到人民生活重大安全的问题报道时的失语和缺位。

北京奥运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连续发出了加强报刊管理的通知。强调主管主办单位管理、属地管理制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特别强调在“应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斗争中，报刊在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必须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²⁷

中宣部新闻局局长胡孝汉引进军事战略思想撰文论述了争夺话语权、掌握舆论主导权的战术和策略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领略新闻管理最高机构的思维取向。胡文指出“新闻宣传如何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我们从每一场舆论战入手，讲究谋略和方法。”²⁸ 比如信息传达这个关键环节上，必须占领制高点。“占领信息制高点，就是要第一时间发出报道，第一时间作出解释，牢牢掌握权威信息发布主导权，先入为主，先生夺人，最大限度挤压负面言论传播空间。”²⁹ 而占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要加快建设覆盖各层级的应急新闻机制，实现与国家有关应急政策法规配套衔接，形成新闻媒体快速反应、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处置的运转高效的系统，使得无论何时、何地发生何种情况，都能迅速发布权威信息、有序开展宣传报道、有效占领舆论制高点。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准确传递政府声音，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和舆论应对能力，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在关键时刻不失语。”³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维护国内

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还是从改变“西强我弱”局面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官方的思路不是向社会开放信息管理体制，而是要建立一个高速高效的信息管理体制。他们力图用最快速度发布把关过的信息以此来改变“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

即使提高政府信息发布速度，即使让政府信得过的中央大媒体享受报道优先权、努力及时准确传递政府声音，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经过政府把关、政府过滤过的信息，其可靠性会受到质疑。

IV 结语

从上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媒体改革一直被置于这样一种困境中。既要在这市场经济发展中求生存，又要保证意识形态的安全。即，从适应经济发展、深化文化产业改革的角度而言，新闻出版业需要转企改制，需要打破原来在计划体制行政划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画地为牢的割据状态。但是，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出发，又要求强化建立在行政区域管理基础上的“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制度”，而且要求各级管理部门对所辖范围的媒体严格负起管理的责任，包括对内容的严格管理。因此从经济角度寻求突破的改革就一次又一次地在意识形态收紧的情况下而收敛手脚。所以说中国的媒体改革总是难以挣脱进退两难的拉锯战。

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其本身就不单纯是一个加速产业化、做大做强的问题。即使通过资本联合实现了打造巨大媒体的目标，大媒体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强媒体。虽然对强媒体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称得上强媒体的组织，恐怕都离不开它的公信力基础。而公信力的提升离不开奉行专业价值观的媒体追求和媒体实践，离不开以报道的客观、公正、真实取得的受众的信任。有关做大做强战略和媒体的公信力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论述，这里不作集中讨论。简而言之，中国媒体欲做强，不对尚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媒体制度进行改革，不展开遵循新闻规律的报道改革，树立传媒的公信力，扩大传媒的影响力就只能成为纸上谈兵。媒

体研究专家彭伟步中肯地指出过“当前我国的媒介政策已经不能适应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管制不放松，非但不会拉近与世界大传媒集团的距离，反而与他们的距离越拉越大”。³¹

最后，笔者想指出，通过上述考察指出的中国媒体政策的矛盾问题实质上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的缩影。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对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解释就永远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框架中，不敢真正解放思想，甚至会以宁左勿右保安全的逻辑来回避政治风险。这样的所谓改革多了，反到使人心灰意冷，改革也必将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¹ 北海道大学传媒研究院·副教授

²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网，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409348.html>，2009年6月22日。

³ 《中央电视台深入开展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指示精神》，央视网首页，

<http://ad.cctv.com/20090104/106140.shtml>，2009年4月12月

⁴ 刘云山：《回顾与展望》，《求是》，2009年第1期。

⁵ 《专访柳斌杰：新闻出版改革下一步》，梅花网，

http://www.meihua.info/today/post/post_da2257fe-6bf5-4788-aa2f-15fe2d8e2397.aspx，2009年11月2日。

⁶ 胡孝汉：《占领制高点——对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思考》，《中国记者》，2009年第9期。

⁷ 《大传媒时代呼唤整合大传媒资源》，《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3日。

⁸ 《打破发展瓶颈 加大改革力度 打造充满活力的新闻出版业——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谈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国报业》，2009年第5期。

⁹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将打造出版业航母》，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10/12/content_12214520.htm，2009年11月1日。

¹⁰ 《我国将在3-5年内建成六七家国际级出版传媒企业》，新华网，

-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9-04/06/content_11137744.htm , 2009年4月25日.
- ¹¹ 关于印发《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http://www.chushu.com.cn/Class/zxzx/zhengce/2006-8/28/08281802263.html>, 2006年6月30日.
- ¹²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7533.htm, 2006年9月20日.
- ¹³ 朱伟峰:《打造国际一流传媒集团让“中国声音”走向世界》,《中国记者》,2009年第9期.
- ¹⁴ 许玮:《2005年中国传媒大事记》,《传媒》,2006年第1期.
- ¹⁵ 同上.
- ¹⁶ 石峰:《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把都市报办成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媒体》,《新闻战线》,2005年第10期.
- ¹⁷ 《全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年)(征求意见稿)》,
<http://www.5book.com/Class/baokan/2006-8/16/08161850595.html>, 2009年11月12日.
- ¹⁸ 《专访柳斌杰:新闻出版改革下一步》
http://www.meihua.info/today/post/post_da2257fe-6bf5-4788-aa2f-15fe2d8e2397.aspx, 2009年11月1日.
- ¹⁹ 《省市报业大整合之“南北模式”》,《传媒》,2009年第8期.
- ²⁰ 《中国报业十种合作模式》,《传媒》,2009年第8期.
- ²¹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区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网页,
<http://whj.xam.gov.cn/xwcb/jyj12/78117.htm>, 2009年10月31日.
- ²² 喻国明:《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代序),参见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10页.
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qkjc/txt/2009-02/25/content_17334980.htm
- ²³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出版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国出版网,
http://www.chuban.cc/cbfg/dlcbfg/bk/200905/t20090504_48019.html, 2009年11月1日.
- ²⁴ 拙作『中国の経済体制改革とメディア』、集広舎、2008年、121-124ページを参照.
- ²⁵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报纸期刊审读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国出版网,
http://www.chuban.cc/cbfg/dlcbfg/bk/200905/t20090504_48021.html, 2009年10月31日.
- ²⁶ 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记者》,2009年第11期.
- ²⁷ 《我省召开2009年全省报刊管理工作会议》,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网页,
<http://www.hnxwcb.com/xwcb/pagesnew/sjxw.jsp?lj=11&&bh=1633>, 2009年10月31日.
- ²⁸ 同前,胡孝汉.
- ²⁹ 同上.
- ³⁰ 同上.
- ³¹ 彭伟步:《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48页.



北京奥运开幕式与“印象中国”

周星¹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和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具有双重的重要性。由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举办奥运会，当然是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富有划时代意义的扩展；对于中国来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意义则有着更加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既有与经济的高速成长相关联的推动中国进一步大发展的意图，又有振奋国民精神、形塑体育大国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谐的氛围与条件的目标。然而，围绕此届奥运会的各种复杂的争议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发生却也是前所未有的。本文试图探讨中国政府通过奥运会开幕式所希望传达给世界的信息，其中包括中国通过奥运会开幕式试图形塑的有关自身的“形象”以及外部世界某种程度的拒斥反映。

围绕着北京奥运会的争议

1992-93年，中国申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主办权以失败告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89年6月初北京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使中国的国际形象蒙受到灾难性的伤害²。在相隔9年之后，中国于2001再次申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并终于获得了成功。但几乎与此同时，有关中国是否具有主办此届奥运会“资质”的质疑，却在西方及日本的不少媒体上频频被提及。大部分的质疑都和中国国内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民主、人权及言论自由的问题、环境问题以及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相钩连，这反映了西方公众和媒体对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及中国社会日趋开放的格局之下，西方媒体和公众对于中国的观感却日趋严厉。

尽管中国国内也有极少数人士对于面临着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耗费巨资举办奥运会持反对或批评的意见，但绝大多数的国民是大力支持政府的此

种举措的。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对于北京奥运的关注角度，始终具有鲜明的差异。国内媒体倾全力报道人民支持奥运的情形，国外媒体则关注政府在申请主办权时所作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或到位，颇有监督的意味。奥运工程涉及的拆迁问题和工人待遇问题，对市民生活积及利益带来的影响，还有对海内外媒体的开放程度等，都是西方媒体更加乐意报道的。

特别是对达赖喇嘛持有同情态度的海外媒体和西方各国的部分公众，借奥运圣火的全球传递计划而频频发难。中国政府的奥运圣火全球传递计划原本就有些好大喜功之嫌，它的影响在达赖喇嘛及其同情者的抗议声中不得不大打折扣。但另一方面，圣火计划受阻反倒空前地激发了海外华人维护圣火的热忱。在笔者看来，围绕着奥运圣火传递的冲突，与其说是达赖喇嘛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倒不如说是西方各国的媒体和公众尚不大愿意接受或者无法适应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奥运及其圣火传递计划所建构或宣传的有关中国的美好形象。

奥运会开幕式的寓意编码和解读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所涉及的施工、组织、运营等自不待言，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它同时还是一项大规模的编码工程，它试图通过各种声、光、电等几乎一切可能的高新技术手段来完成总导演所设定的场景、画面，从而向全世界传递各种在中国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寓意吉祥的数字象征：

2008年8月8日晚8点，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正式上演。进行倒计时计时时，有“缶阵”的表演，这是中国古人“击缶而歌”的再现。由日晷将光反射到缶面，闪现出倒计时的数字。（图1 缶面闪现出这一吉祥数字）。由8名持旗手水平持旗，展示国旗。由56位身着各民族服装的儿童簇拥国旗；

200多名合唱队员合唱国歌，他们是来自56个民族的演员。通过焰火绽放的19个巨大的脚印，沿北京市的中轴路迈向“鸟巢”主会场，象征着第29届奥运会的历史足迹，如今它终于走到了中国北京（图2：中轴线上空的大脚印-历史的足迹）。大脚印化作繁星飘落，聚成“奥运五环”，和梦幻五环同时凌空出现的则是“飞天”仙女，这是来自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壁画里的形象。

（二）以“四大发明”为主要内容，讲述东道国的“中国故事”：

1、火药：绚丽多彩的焰火、焰火表现的奥运历史足迹（大脚印）

2、纸的发明：开幕式的主题场景为一轴中国画卷，它隐喻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画卷成为一个有效的载体，像史册一般地承载和展演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起源及发展。在画卷动态展演的“上篇”里，集中了尽可能多的中国符号与中国象征：文字、戏曲、礼乐、国画（山水画）、陶瓷等。

3、汉字文明及活字印刷：活字表演不仅展示了汉字的演化进程，同时推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性理念：和。不言而喻，这也正是对中国政府旨在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呼应。

4、指南针：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出，不仅内涵着方位罗盘的意义，还表示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渴望。

（三）卷轴画面的“下篇”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与成就，还有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青藏铁路、立体交通、高大的城市建筑群、孩子们的笑脸和人民的精神风貌等。

（四）结合奥运主题歌，表现全人类共享的奥林匹克理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和平、梦幻的地球，以及人类挑战自身极限的体育精神，放飞和平鸽、点燃火炬、升奥林匹克会旗、运动员入场式等这些虽说是既定的程序，依然最大限度地唤起了各国人民和各国运动员的共鸣。

奥运会开幕式的基调是试图用艺术展演的方式诠释中国文化、介绍中国成就，表现奥运会的主题精神。导演们试图用国际化的理念和海外观众也能理解的艺术语言，突出人性人情，采用抒情方式，营造梦幻氛围。

但是，奥运会开幕式所蕴含的所有寓意，

既有很容易被世界各国观众理解的部分，也有较难为他们所明白的部分，根据一项事后在北京举行的问卷调查，理解并为“四大发明”而感到自豪的北京市民高达90%以上，而知道“四大发明”的在京外国人仅有6%，至于国外一般听众这个比例应该会更低。换言之，有关“四大发明”的仪式编码，更容易被国内观众所解码解读，其传播效果自然比起海外异文化的受众更为有效。

海外可能会有一部分公众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规模所震撼，尤其是考虑到全球范围的圣火游行，显示中国政府试图把规模做到最大。的确，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话语体系中往往具有贬义，但是在针对海外、面对国际社会的场景下，延续国内政治逻辑的形象工程建设却极少有机会展开。毋庸讳言，中国长期以来始终无法摆脱国际舆论中某种程度和性质的“污名化”遭遇，这固然有中国自身存在多种问题的依据，但也难以回避有“威胁论”、“崩溃论”等名目繁多和具有冷战遗绪，甚至恶意的诋毁。借助奥运会开幕式，最大限度地倾全国之力运营一个巨大的中国形象工程，在中国政府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奥运会开幕式向来都是全世界一个最引人注目瞩目的典礼，同时也是一场视觉盛宴。中国自古就有礼仪治国的传统，重视仪式和典礼乃是政府教化人民和人民获得自豪感的基本途径。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政治逻辑的人们，都不难理解开幕式何以会有如此的规模。海外部分舆论和公众事后对开幕式的批评，一方面集中在对一些细节的吹毛求疵（烟火大脚印是事先录像的、歌唱祖国的小女孩是个替身之类），另一方面则是暗示甚或指责仪式“规模”背后的“全体主义”。

围绕开幕式的纠葛，主要表现在事前对于“圣火”的抵制和反抵制。其次，表现为以是否参加开幕式（甚至抵制本届奥运会）的西方某些政要的言论和行为。再次，表现为对开幕式之“成功”的不快感和不适感。但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说奥运会开幕式主要体现了中国愿意和世界交流、沟通，愿意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的姿态和自信，那么，2009年的国庆典礼和

阅兵式则更加强调的是“崛起”，当然是“和平的崛起”。

关于“中国形象”的攻防还将长期延伸

很多海外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看重“面子”的特点，中国人在涉及尊严和形象时往往会有较为激烈的反应。讨论中国形象的有关话题，一方面需要认真地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的背景和具体情境之下，探索中国的“自我形象”，亦即自我建构的中国形象；其次才是海外公众及其舆论所属社会里需要“消费”什么样的中国印象，才能够满足其社会的公众心理需求。

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和屈辱经历使得中国政府和人民曾经对外部世界持有强烈的不信任感。长期以来，也不大善于和外部世界的媒体和舆论打交道。中国官方认为重要的涉及国家形象的问题，此次并不是海外公众或媒体所看重的，例如，中国式的官腔、“政治正确”和中国式的举国体制等；同样，西方式的居高临下、“政治正确”、教训的口吻等等，也只能令中国反感。一方面，各发达国家公众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感到不适的心理颇为普遍，往往比较难以适应来自中国的全新的正面信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常常习惯于把国内政治的宣传手法延伸至海外，结果往往是效果逆反。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一方面既要维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却又无法阻止诸如矿难频发、官吏腐败、民族纠纷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多发。对于海外那些反华媒体和部分厌华的公众而言，寻找一些诸如“毒饺子”事件来予以过度炒作，实在是成本最小、效果最大的方式。

最近，中国政府的商务部有计划在全球投放广告，用以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形象。以“中国制造无所不在”和“中国制造、世界合作”为主题，在西方主流媒体 CNN 投放广告，从而为中国商品的全球认知度的提升作出努力。把“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过广告而重新定义成为是由世界上各个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产物，显然这将有助于化解海外实际存在的各种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的抵制、诋毁和误解。不言而喻，比起通过广告形塑产品形象和中国品牌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当然应该在品质管理方面下更大的

功夫。既然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崛起”，既然 21 世纪中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将主要是人才、资源、商品以及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那么，围绕着中国“国家形象”的争议和攻防，可以预料今后还将长期存续。

¹ 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

² 1993 年 6 月 10 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口头决议，反对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举办 2000 年奥运会。1993 年 9 月 24 日，出席国际奥委会第 101 次会议 89 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在秘密无记名投票中选择悉尼获得 2000 年奥运会主办权。



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需要の拡大

渡邊浩平¹

I はじめに

大都市の百貨店や量販店などの入口に「欢迎光临」の看板や、中国語で「銀聯カードが使えます」という文字をしばしば見かけるようになった。入口には、中国語の店内ガイドの冊子がおかれ、アナウンスも日本語、英語とともに、中国語でもなされている。

商店の中国語表示、アナウンスはむろん昨今増大する中国からの観光客に対応するためのものだ。店内に目を転ずると、中国からの観光客と思しき買い物客がおり、店員は片言の中国語で対応をしていたりする。

身近な例から話をはじめたが、商店の中国語表記やアナウンスは、日本の組織の中国人顧客への情報発信であり、中国語の店内パンフレットも中国語メディアのひとつとあってよいだろう。昨今、地方自治体が盛んに行っている中国人観光客の誘致のための観光広報も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一例である。

拙論の目的は、日本における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拡大の歴史を後付けることにある。それは、ひとえに、中国の日本への影響力の拡大に起因する。そして、最後にそ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についてささやかな考察を試みたい。

II 対中広報需要の発生

日系企業は中国が改革開放政策を実施して以降、中国市場に大挙して進出しており、特に1990年代初頭の鄧小平の南巡講話以降、中国の消費者をエンドユーザーとする消費財メーカーが陸続と中国市場での現地生産を開始した。

しかしながら、日系企業の中国における広告広報など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活動は、鄧小平講話以降の市場経済化のなかでも、製品広告が主体であっ

た。企業の理念や社会貢献活動を現地社会に訴求する企業広報はほぼ行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とあってよい。

日系の大手企業が対中広報の必要性を意識したのは、2000年を過ぎてからである。1999年に東芝が米国での消費者と和解をしたパソコンの不具合が、翌年中国において、ネットメディアで大々的に報じられ「中国人には賠償をしない東芝」という声が沸き起こった。さらに2001年には、日本航空が中国人乗客への対応により、乗客からの抗議を受け、それがメディアによって叩かれるという事件が発生した。

日系の大手企業は、中国社会において、消費者権利を強く主張する消費者意識が生まれ、1990年代後半以降、商業メディアが誕生したことにより、メディアが読者の興味をかりたてる扇情的な報道を行う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を知ることとなった。中国社会が大きく変化していること、そのためには中国社会の変容を正しく把握し、リスクに備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意識が生まれたのである。そして、中国に進出する日系大手企業は、それらの事件を機に現地法人に広報部門を設立するに至る。

III 転機となったアジア杯と反日デモ

中国に進出をする個別企業のみならず、日本の経済界が中国における対日認識の問題や対中広報の必要性について強く意識したのは、2004年以降のことだった。その年、中国においてサッカーのアジアカップが開催され、日本チームが激しいブーイングを浴び、その映像がテレビを通じて報じられたのである。2005年春には、歴史教科書問題に端を発して、いわゆる反日デモが、中国全土に発生した。

2005年には愛知県において愛・地球博が開催されたが、日本の広報研究をリードす

る日本広報学会は、その年の8月7日に、創立10周年を記念して、「広報が創る相互理解—日中交流における対話と共創」というタイトルで、愛・地球博会場におい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たのである。その席には、中国における「公共関係（広報）」の対外窓口である中国国際公共関係協会の副会長をはじめとするミッションが招かれた。

さらに、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傘下の経済広報センターは2005年に中国に広報調査ミッションを派遣し現地の広報事情を調査レポートとしてまとめる。その年の12月には中国において中国人学生による弁論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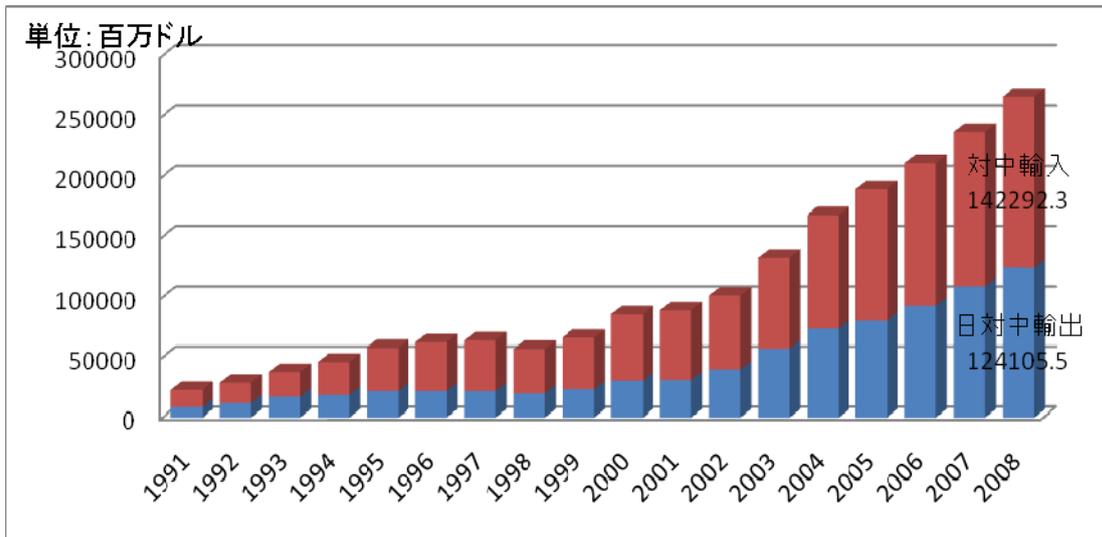
を実施する。経済広報センターによる中国への取り組みは、図表1の通りに、その後毎年続いている。その活動を大別すると、現地の大学生に向けた働きかけと、研究者、ジャーナリストの日本招聘に二分される。前者は、日系企業の中国人ホワイトカラー層のリクルート支援の試みであり、後者は、中国の研究者、ジャーナリストを招聘し、日本社会への理解を促進するためのものだ。つけ加えるとジャーナリスト招聘では、当初は党機関紙などの記者を招聘していたが、順に「都市報」などの商業紙や、ネットポータルなど、近年影響力を強めているメディアにシフトしていった。

図表1 経済広報センターによる中国への取り組み

年	事項
2005	「中国における企業広報に関する調査ミッション報告書」 11月 「中国人大学生日本語弁論大会（陝西省）」 12月
2006	「中国人大学生日本語弁論大会『優秀者発表会ならびに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に関する報告会』」 4月 「国際企業に求められる社会的責任（CSR）」（中国有力大学での講演会） 10月 中国メディア招聘 11月
2007	「中国最新メディア事情—伝統メディアから新興メディアまで—」中国有力大学教授招聘 3月 「中国は環境問題をいかにして解決するのか？-中国メディアの果たす役割-」中国ジャーナリスト招聘 5月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と環境対応」（中国有力大学での講演会） 11月
2008	「インターネットメディアの果たす役割」中国インターネットジャーナリスト招聘 1月 「日本の災難危機マネジメント—行政と企業の取り組み—」中国都市報ジャーナリスト招聘 9月 「国際企業に求められる社会的責任」（中国有力大学での講演） 10月
2009	「水と空気の安心・安全確保に関する日本政府・企業の取り組み」「企業の社会的責任（CSR）に関する日本企業の取り組み」中国都市報ジャーナリスト招聘 7月

出所：経済広報センターのウェブサイトより筆者作成

図表2 日本の対中貿易の推移



出所：財務省「貿易統計」

なぜ、2005年から、日本の経済団体、学会が、対中広報の重要性について認識を深めていったのか。それはすでに述べた通り、2004年と2005年の両年に、中国における対日認識が良好でないことを示す事件が起こったことが一因であったが、同時に、ミレニアムを過ぎたころから、図表2の通り、日中の経済関係が急速に発展したことが要因としてあげられる。

2002年にはトヨタ自動車は天津にて現地生産を開始、さらに、翌年日産自動車が東風自動車と合弁会社を設立する。日本の基幹産業である自動車メーカーの現地生産の開始は、経済界とのつながりの深い日本広報学会（当時の広報学会会長はトヨタ自動車張富士夫会長）、さらには、経済広報センターの対中広報の重要性の認識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

IV 政治と経済の不協和

むろんその背後にあるのは、日中の経済関係と政治との不協和であった。当時は「政冷経熱」と呼ばれたものだ。図表2ですで見たとおり、日中の経済関係は急速な発展を示したが、中国における対日認識は、決して芳しくなく、さらに、日本のそれも良好ではなかった。近年の中国における対日認識の冷え込みの最大の要因は、小泉元

総理の靖国参拝に起因するといえる。しかし、相互の認識の悪化には他の政治要因や社会変動要因も含まれており、その問題を納得のいく形で解析する能力を私はもちあわせていない。それゆえ、近年、中国における対日認識がきわめて厳しいものがあり、それが日中の経済関係の発展の足かせと、経済人が認識をし、中国社会への理解や広報の重要性が強く意識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を書きとどめておくにとどめる。

ひとまず、図表2と同時に、下記の図表3の日中関係の諸問題のリストを見比べれば、両国の政治と経済に不整合があることはおわかりいただけることと思う。

小泉元総理は、2001年靖国参拝直後に訪中を果たすが、その後、中国の首脳とは、双方の国では会えないという異例の事態が生じ、それは2006年の安倍元総理の就任直後の訪中まで続く。その間にも、尖閣諸島の問題や東シナ海のガス田などの問題が生じ、それが民意に反映して、メディアによって増幅されるという事態が起こるのである。

図表3 2000年以降の日中関係の諸問題年表

	総理	総書記	
2000	小渕／ 森	江沢民	1月中央官庁のHPにハッカー侵入。5月対中ODA見直し。 9月中国の団体旅行解禁 10月朱鎔基来日。
2001	森／ 小泉	江沢民	4月日本、3農産品にセーフガード。6月中国、自動車家電に特別関税。 7月中国外交部長、靖国参拝中止を要請。 8月小泉靖国参拝。 10月小泉訪中。
2002	小泉	江沢民／ 胡錦濤	5月瀋陽総領事館、脱北者中国武警連行。 6月冷凍ほうれん草残留農薬。 9月日中国交正常化30周年。 10月天津トヨタ操業開始。
2003	小泉	胡錦濤	6月小泉胡会談（サンクトペテブルグ）。 8月日産自動車東風と合弁設立。 9月日本人の渡航ビザ不要に。
2004	小泉	胡錦濤	1月小泉靖国参拝。 3月中国人魚釣島上陸。 5月中国東シナ海で採掘施設建設。 7月サッカーアジア杯で日本代表にブーイング。 11月小泉胡会談（サンディエゴ）
2005	小泉／ 安倍	胡錦濤	3月対中円借款08年で終了決定。 4月歴史教科書問題に端を発した反日デモ。 4月小泉胡会談（ジャカルタ）。 5月呉儀副総理訪日途中帰国。 10月小泉靖国参拝。
2006	小泉／ 安倍	胡錦濤	8月小泉靖国参拝。 10月安倍最初の外遊として訪中。
2007	安倍／ 福田	胡錦濤	4月温家宝訪日。 11月日中ハイレベル経済対話。 12月福田訪中。
2008	福田／ 麻生	胡錦濤	1月中国製冷凍餃子食中毒事件。 5月胡来日、日中共同声明。四川大地震、日本救援隊派遣。 6月東シナ海ガス田合意。 7月胡サミット出席。 12月日中韓首脳会談。
2009	麻生／鳩山	胡錦濤	10月日中韓首脳会談。

出所：筆者作成

V 拡大する中国の「出境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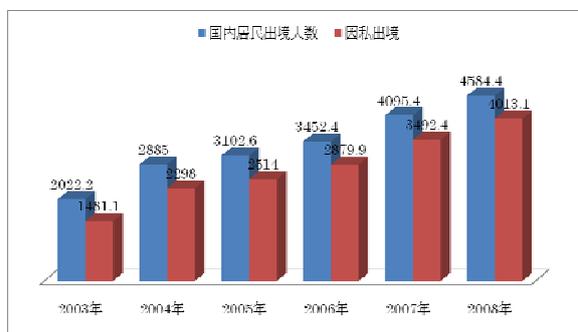
2000年以降にはじまった日系の組織の対中広報は、2005年頃より、日本の経済人によりその必要性が強く認識された。また、異なる文脈のなかで、外務省はアニメやポップカルチャーといったサブカルチャーを、全世界的に宣伝をするという文化戦略を立て、中国を含めた諸外国に展開をしてゆく。

同時並行的に、日本政府は、2005年よりビジットジャパンキャンペーンを展開し、2010年に来日観光客を1000万人に伸ばすことを目標としてたてる。その中の、重点地域として、中国は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た。

図表3でも示したが、中国からの観光旅行は2000年に解禁をされた。その年の9月に北京、上海、広州の三都市に限って、団体旅行ビザを許可したのである。2004年9月に団体査証は、天津、遼寧、山東、江蘇などに拡大、さらに2005年7月には対象地域を中国全土とした。そして、日本政府は2009年7月から個人ビザを一定の制限をつけつつも、解禁をしたのだ。

ビジットキャンペーンでの重点地域指定、さらに、相次ぐビザ解禁の背後にあるものは、中国の旅行者の「出境旅游」の伸びであった。図表4の通り、この5年で「出境旅游」は平均18%の成長率を示し、私用旅行も08年には88%に及んでいる。4584万人という数字は、人口比として4%の数値である。

図表4 中国における出境人数推移



出所：「2009 中国統計摘要」

「出境旅游」は日本語の海外旅行とイコールではない。日本のメディアでもしばしば、08年の中国の海外旅行者は年4500万

人といった説明がなされているが、それは正確な物言いではない。拙論の本筋とは少し離れるが説明を付しておく。「出境」には通常三つの種類が含まれる。1が、中国語で「港澳游」と呼ばれる香港・マカオ観光、二つ目が、広西、雲南、遼寧、吉林、黒竜江など他国と国境を接する地域からの、辺境観光（「辺境游」）。この出境にはパスポートが不要であり、辺境通行証で可能だ。そして三つ目が、われわれが一般に海外旅行と呼んでいる「出国游」である。なお、二の辺境観光は、隣接する他国の国境沿いに、中国人を顧客とするギャンブルや買春などを目的とする店が開かれ、中国政府は漸次廃止の方針をとっている。

また、説明がやや横にそれるが、本シンポジウムの中心テーマである「走出去」戦略との関係で述べると、中国政府は、「出境旅游」にもろ手をあげて賛同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く、「走出去」と同列に扱う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それは、昨年採択された観光業の以下のスローガンを見てもわかる。「大力發展国内旅游，積極發展入境旅游，有序發展出境旅游（国内旅行は大いに發展させ、入境旅行は積極的に發展させ、出境旅行は秩序だって發展させる）」。出境旅行に対しては、国内旅行、海外からのインバウンドと異なり、「秩序だって」と慎重な態度をと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これまでも中国政府は、出境旅行に対しては、積極的な態度をとってはこなかった。それは、1990年代に使われた「適度發展出境旅游（適度に出境旅行を發展させる）」、また2005年に採択された「規範發展出境旅游（規範的に出境旅行を發展させる）」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見てもあきらかである。

出境旅行に対して中国政府が消極的な態度を見せるのは、中国企業の海外進出（走出去）とは異なり、出境旅行が、外貨の流出になりこそすれ、外貨を獲得し、中国のパワーを示すことに直接つながらないからだ。中国当局は、入境との外貨バランスを見て、出境の推移を見守っているといえる。

先の08年4500万の出境の話に戻り、その内訳をみると、以下の図表5のとおりとなる。

香港マカオ旅行は全体の7割を超している。かつ、そのなかのかなりの数が、日帰りであると想像される。入境の場合は、香港マカオからの旅行者の比率は、08年で78.7%、うち日帰り客は59.2%に及ぶ。出境においても、日帰り客が相当数を占めると想像される。つまり純粋に海外旅行といえるものは、4500万よりかなり減額した数字となることが分かる。

図表5 「出境旅游」の第一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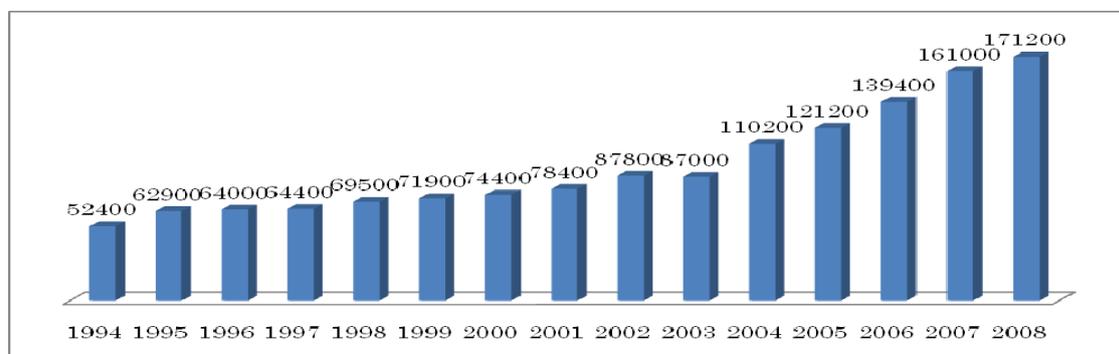
国・地域名	人数 (構成比)
香港	1,755.7(38.29%)
マカオ	1,552.17(33.85%)
日本	155.65(3.39%)
韓国	145.9(3.18%)
ロシア	78.99(1.72%)
アメリカ	77.55(1.69%)
シンガポール	71.26(1.55%)
タイ	62.26(1.35%)
マレーシア	62.26(1.35%)
オーストラリア	41.31(0.90%)
台湾	27.89(0.60%)

出所：出所：中国出境旅游発展年度報告 2007, 2008

VI 動きだした地方自治体

それだからこそというべきか、中国からの先の3に該当する出国游が今後大いに伸びることを、諸外国は期待をしている。下図の国内の観光客の増加を見れば、出境旅游の潜在力が高いことが想像される。

図表6 中国国内の旅行者人数(推移万人)



出所：「2009 中国統計摘要」

海外からの訪日入り込み客数を日本側の数字でも見てみよう。韓国、台湾、中国の東アジアが、全体の64%を占め、うち、中国が100万を占めている。

図表7 海外からの訪日外国人人数

	2007年 (構成比)	2008年 (構成比)
韓国	2,600,694	2,382,397
台湾	1,385,255	1,390,228
中国	942,439	1,000,416
香港	432,042	550,190
上記東アジア計	5,360,430 (64%)	5,323,231 (64%)
総計	8,346,969	8,350,835

つまり、中国の旅行者は08年の数字で100万しかおらず、それが二桁成長を続けるということが予想されるのである。当然、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は、今後の発展が期待できる中国市場の取り込みに動きはじめている。二つの事例を紹介する。九州と北海道である。

九州では、2005年に九州観光振興機構を立ち上げ、「九州はひとつ」として情報発信をおこなっている。九州観光振興機構の戦略は、国内、国外に向けた全方位のものだが、東アジアからの観光客誘致はその中心的なものと位置付けられている。中国への具体的活動としては、中国の観光メディアの九州への招待、プレスツアーの実施、さらに、中国の旅行サイト「携程」とタイアップしウェブ上で人気投票を行ったツアーを「皆さんが選んだ夢の九州ツアーを××で提供」といった形で募集するなど中国ユーザーとの双方向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注力している。

双方向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ほかにもあり、同機構に在籍する中国人スタッフは九州全土を旅し、ブログという形で、地元情報の発信を行っている。また、2010年に実施される上海万博においては、「中国から一番近い九州・沖縄」というコンセプトを掲げて、ALL九州+沖縄で、セールスプロモーションを予定している。

北海道の取り組みとして特筆すべきは、道東を舞台とした映画「非誠勿擾」の成功だ。同映画は、お正月映画の監督として著名な馮小刚によって製作されたものだ。2008年末から上映された同映画は、興行成績50億円を売上、中国映画としては歴代一位の興行成績をあげた。同映画の北海道ロケは、2008年8、9月に行われたが、その折りは、釧路市、網走市、斜里町が全面的に協力をした。

また、映画のヒット後は、日本政府観光局(JNTO)が中国のメディアを道東に招待、さらに09年4月には、北海道が北京で観光誘致のプロモーションを行った。それらの努力によって、2009年1月～4月の阿寒湖の中国人宿泊客は、前年比14倍となった。道は監督に感謝状を贈呈し、麻生元総理も同監督と会っ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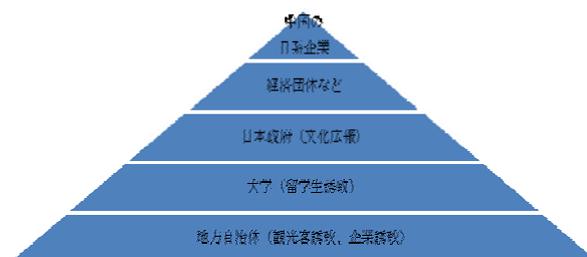
一般的に中国人観光客は、東京から大阪を移動するゴールデンルートに集中するといわれている。ゴールデンルートから外れる地方自治体は、さきの2009年7月の個人旅行ビザの解禁を受けて、積極的に中国への観光広報を図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Ⅶ 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がもたらすもの

これまで見てきたように、今世紀に入る頃から始まった日系組織の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需要は近年地方自治体にまで及んだ。図で示すと下図のようになる。これはあくまで概念図であり、事象を正確にとらえたものではない。

当初は現地の企業にのみ求められていた情報発信機能が、日本国内の経済団体、さらには日本政府、ここでは触れなかったが大学(留学生誘致)、さらには、今後増加が期待される観光客誘致とさまざまな層に増加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そこには冒頭に示した各大都市の百貨店や量販店、ブランドショップなども含まれるだろう。

図表8：日系の組織の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需要の拡大(概念図)



出所：筆者作成

拙論の小括は中国の競争力拡大が、日本におけるさまざまな組織体の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需要をもたらしたという至極当たり前のものだ。だがその波及効果は少なくないものがある。中国社会の変容への調査・分析の必要性、中国対応部門の設立、マーケティングや広報部門における中国担当者の配置、また組織内の中国人社員の雇用など、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求められる知識や制度の整備が行われていったのだ。

日中韓のネット世論を観察している社会学者の高原基彰は、近年の東アジア各国で見られ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を「社会流動化」による「不安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呼び、日本の場合、不安心理を中国や韓国に向け解消する動きがあるとし、以下のように言う(高原2006年)。「すでに企業社会の上層部や施政者たちの間では、日本経済の方向

転換とアジア連携とが連結させて考えられ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国民の多くはそれが実感されていない」と。毎年外務省が実施している「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で明らか通り、近年、中国への好感度は低下しており、昨年も「親しみを感じない」「どちらかという親しみを感じない」が合計で66.6%とマイナス記録を更新した。高原が指摘したように、日中関係の重要性が市井の人々に実感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

同時に「日本経済の方向転換とアジア連携」とを「連結」させて考えている主体が、「企業社会の上層部や施政者たちの間」とどまるかという、2009年現在の状況はそうではないと言える。経済界、企業、地方自治体における意思決定を行う上層部のみならず、実務者にとっても、「日本経済の方向転換とアジア連携」は当然のことと受け止められてい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が中国に投資する企業から自治体のレベルにまで及んだということは、対中認識においてあらたな構造転換をもたらす意味をも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一つだけ示唆的なことを述べて拙論を終えたい。

現在、米国のユタ州の公立学校では中国語が教えられている。公立学校の中国語教育は、州の条例で決められたものだ。ユタ州は2005年から、中国の「国家漢弁」の支援を受けて、中国語教師を数多く招聘、シカゴとならぶ、米国における漢語先進地域となった。漢語教育を推進したのは、現在米国の中国大使をつとめるジョン・ハンツマン Jr である。2009年11月のオバマ大統領訪中の際、上海における学生との対話集会で、流暢な中国語をあやつり、司会をしていた人物だ。

ハンツマンの経歴は特異なものだ。彼は1970年代、高校を中退してロックバンドのキーボード奏者となった。その後、モルモン教の伝道師として台湾で二年間を過ごす。中国語はそこで学んだ。ハンツマンはユタの大手化学メーカー、ハンツマン・コーポレーションの社長ジョン・ハンツマン Sr の子息であり、共和党の父の関係でハワイ

トハウスに勤務し、その後大学を卒業する。ハンツマンは家業の化学メーカーの経営に携わりつつ、官界、政界で地歩を築き、シンガポール大使、米通商代表部次席代表と要職をおなし、2004年から08年までユタ州の知事をつとめる。そして、ユタ州知事の時代に、公立学校における中国語カリキュラム化を実施するのである。彼は「米国人にとって中国語を学ぶことは重要な投資だ」「中国語は米国人にとって戦略的な言語だ」と常々語っているという。オバマ大統領はハンツマンの特異な経歴を評価し彼を中国大使に抜擢した。

むろん、共和党员であり中国大使であるハンツマンがただ中国に友好的なだけであるわけがない。中国政府のペースで進められた上海での学生対話において、オバマ大統領にネットの自由について発言を誘導したことに見られる通り、人権や言論の自由などの普遍的な価値については、米国の主張を強く押し出そうとしている。同時に、「米国人と中国人は相互に学びあわねばならない」と終始語り、謙虚な姿勢は崩さない。彼が、中国人とインド人の養女を養育しているという家庭の事情も含め、中国メディアのハンツマンへの報道は友好的である。

現在日本においても、新政権によって、地方分権化の流れがあるが、日本の自治体にとってユタ州の事例は傾聴に値するものだ。対中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需要が拡大する日本にとって、中国語は米国以上に戦略的な言語であるはずだからだ。

2008年9月4日に開催された北海道大学大学院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院附属東アジアメディア研究センターの設立記念シンポジウムにおいて、記念講演を行った東京大学大学院学際情報学府教授の姜尚中は、北海道の例を引いて以下のように語った。「地益というものを大切にしつつも、それが決して国益と真っ向から勝負するというのではなく、しかし国益の中に入りながらも、もう少し東アジアの中で地益というものを考えていかねばならない時代がきた」と。「考えていかねばならない」背景となったのは、グローバル化であり、

東アジアの域内交流の緊密化である。

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いう問題を考える場合も同様なことがいえるであろう。経済的に日本の地方が疲弊してゆくなかで、あらたな地益を求めて、地方自治体も、中国を中心とした東アジアの成長活力を積極的に取り込む努力を行わざるをえない時代が来た、と。本論に即して言えば、それによって日本のさまざまな組織の対中国へ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需要はさらに高まる。そのことが東アジアの地図をどう描き変えるのか、見守る必要がある。

春秋, 2003 年

¹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院附属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長・教授

参考文献

- 国家統計局編『中国統計摘要 2009』中国統計出版社, 2009 年
- 国際観光振興機構編『JNTO 訪日旅行誘致ハンドブック 2005/2006』国際観光振興機構, 2006 年
- 国際観光振興機構編『JNTO 国際観光白書 2007』国際観光振興機構, 2007 年
- 「2007 年～2008 年中国出境旅游発展的的形成分析与未来予測」『旅游緑皮書 2008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出境旅游発展年度報告 2007,2008』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 年
- 「旅遊中国」『中国 2 1』風媒社, 2008 年 3 月号
- 高橋五郎編『海外進出する中国経済』日本評論社, 2008 年
- 「中国特集②経済力」『朝日新聞 GLOBE』2009 年 10 月 19 日
- 「日中逆転インタビュー集」
<http://globe.asahi.com/>
- 21 世紀中国総研編『中国情報ハンドブック 2009 年版』蒼蒼社, 2009 年
- 「カリスマ大使が北京を魅了する」『ニューズウィーク』2009 年 12 月 2 日号
- 高原基彰『不安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時代』洋泉社, 2006 年
- 渡辺浩平『中国ビジネスと情報のわな』文藝



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変貌する中洋国際政治

イタマール・リー¹

要旨

改革・開放政策にともなう漸進的な中国の経済的、外交的浮上と国際的影響力拡大は、いまや東アジアだけでなく南アジア、中央アジア、さらに中東地域にまで及んでいる。いわゆる中国の浮上に関する既存研究は幅広く行われてきたが、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主にミクロ的には中国東部地域について、マクロ的には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中米関係・中日関係などの二国間関係を中心とした議論に限定されてきた。その一方で、中国の浮上とその影響力拡大がアフガニスタン情勢から中東和平問題に至る「中洋国際政治」の行方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今後どのようにこれを変貌させるか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まだ不十分な状態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問題意識に基づいて、本研究は、次のような問いに対する包括的な回答を模索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まず、脱冷戦期中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国の漸進的な浮上はどのような形でなされてきたか。次に、中国の中東政策はどのように発展してきたか。第三に、中国が主張する中東和平案とは何か。第四に、中東および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は中洋国際政治の行方をどのように変貌させるか。最後に、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の拡大は今後の米中関係と日米関係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か。換言すれば、この論文は中国・中央アジア・中東の「三中関係」を戦略的に結びつける中洋国際政治における中国の浮上と影響力拡大に関する研究である。

21世紀に入って、経済発展と政治安定の必須条件である海外エネルギー源の優先確保をめざして中国は中央アジアと中東で幅広い石油外交を展開している。特に、2001年に「上海協力機構」(SCO)が、2002年に中国中東問題特使が設立されて、中国西部地域から中央アジアと中東を戦略的に結ぶ中洋国際政治の流れがよりいっそう複雑化している。本研究は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脱冷戦時代における中国の中東政策の変化、及びその地政学的意味を探索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これを通じて、中東地域を巡って深化する米中両国間の協力および競争関係を包括的に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けでなく、中洋国際政治構図の中における将来の東アジアの平和と発展を予測することも可能となる。

はじめに

現在、世界政治経済の現実と未来を論じるときに、二十世紀末から相当程度に進んでいる「中国の浮上」を排除してしまうと意味のある議論が展開できない。

「BRICs」と称されるブラジル、ロシア、インド、中国の並行発展とともに、特に注目されているのは、アメリカの9/11テロ、イギリスのロンドン7/7テロ、インドのムンバイ10/26テロ事件で明確になっているイスラーム教の政治的再覚醒であり、その世界的な連帯の流れである。このため、

米国と西欧主導の「西洋国際政治」の枠組みを超え、中国と中東の相互連携を包摂する、より包括的でマクロ的な視野が必要となる。中国と中東を結ぶ戦略的な圏域として登場するのが「中洋」²であり、これを巡って行われる「中洋国際政治」の再発見と研究は、今までになく切実に求められている。

1970年代末の改革・開放以来、中国の経済成長は、特に2001年中国の世界貿易機関へのメンバー登録後急速に強化されており、2009年初めに日本を抜いて経済(GDP)

規模で世界第2位の座を占めるものと見られている。³ このような中国の浮上については、これまでも継続的に議論が展開されてきたことは事実である。⁴ また、漸進的な経済力の向上に伴う中国の強大国化が中東地域とどのように連携して発展してきたのかについての研究も、部分的に進められてきた。⁵ いわゆる中国の浮上に関する既存研究は幅広く行われてきたものの、しかしそれらは主にミクロ的には中国東部地域について、また、マクロ的には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米中関係、日中関係、韓中関係など二国間の関係を中心とする議論に集中されている。⁶

その一方で、中国の浮上とその影響力拡大がアフガニスタン情勢から中東和平問題に至る「中洋国際政治」の行方によ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今後これをどのように変貌させるか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まだ不十分な状態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問題意識に基づいて、本研究は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変貌する中洋国際政治を鳥瞰して、米中関係と日米関係における潜在的な「中洋変数」を説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I 中国の中東政策：その歴史と発展

中国と中東の関係は、唐朝の高宗永輝2年、即ち652年に中国とイスラーム教が正式に関係を結ぶことで始まった。⁷ 元朝のジンギスカンが世界を制覇した時代は、北京で色目人と呼ばれる中東出身の重臣たちが国家を経営した時期でもあった。元朝に次いで出現した明朝の朱元璋は、世界中に存在していた「モンゴル・イスラーム」の連帯勢力へ対応するために、数多くの宦官を世界各地に派遣し、鄭和は数回にわたる海洋視察の中でメッカを訪問した。伝統的に中国は内陸アジアから中東地域につながる西北辺境からおこる安全保障上の脅威に敏感に反応した。清朝末期、左宗棠と李鴻章の間で行われた「陸防」と「海防」の論争で、西北辺境地域の重要性を強調して左宗棠が最終的に勝利を収めた例は言うまでもない。中国共産党が政権を握った後

の文化大革命期にも、核施設が設立されている西北内陸部の安全保障を維持するために、いわゆる「三線建設」が推進されたことがある。最近、中国のチベットと新疆で勃発した武力衝突と中国西北部の辺境に隣接するアフガニスタンとパキスタンでの不安要因の増大は、経済的誘因に加えて、中国がより大きな視点から中央アジアと中東地域を平和的に管理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う一つの理由を提示している。

冷戦期中国の中東政策は、基本的に米国とソ連の両極体制に帰結される世界システム中で行われてきた。上記の中国国務院の歴代政府報告書に公表された「中東」に関する言及回数を見れば、中国の中東への集中的な言及は、中国が直接参加した朝鮮戦争以後、一方では米国主導の世界体制への不満やこれを突破するための戦略的な変数として出現し、また他方ではソ連が消滅して共産圏が崩壊する過程で国際的孤立から脱皮しながら国際的連帯を拡大し、社会主義路線の道徳的優越性を強調する傾向を示しながら行われている。少なくとも修辭的な側面では、「現状打破的な性格」を持っていた。

もちろん、中国の中東政策は、これらの現状打破的な修辭のように革命的には実施されず、現実順応的に執行されてきたことは、異議の余地がない。モハメド・ビン・フワイディンによると、1949年から1999年まで中国の中東政策は、二つの要因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たが、それは中国の米国と旧ソ連に対する認識及び相互関係と中国の経済的、政治的、軍事的能力を向上しようとする戦略的意図であった。⁸ 国際政治理論の構造的現実主義論に立脚した研究者は、冷戦期の中国の対外政策は、米国とソ連による構造的な変数に収束された受動的なものであったと主張している。⁹ これに対し、中国の積極的な戦略文化を強調する研究者たちは、中東政策を包括する中国の対外行態と安全保障戦略は持続性を堅持していることを主張する。¹⁰ 冷戦期の中国の中東政策に対する評価も、大成功だったという評価と、かなり限定的だったという議論が

[表-1] 中国国務院政府工作報告における「中東」に関する言及回数¹¹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4	1975
1	0	0	0	0	0	0	0	0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4	4	0	0	0	0	1	0	0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0	2	4	3	0	3	2	0	0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0	0	0	0	0	0	0	0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0	0	0	0	0				

相互に対立している。¹² 何よりも、中国の中東政策の弱さは、リーダーの個人的な信念志向によって決定された非構造的な矛盾にあった点も指摘されている。¹³

ソ連の崩壊とともに、中東地域は戦略空間として中国にとって新しく出現してきた。特に、1993年に中国が石油の純輸入国になって以降、中東地域は中国の平和的発展と調和的な世界建設に必要な政策の対象地域となっている。毛羽豊によると、中国の中東政策は、次の3つの政策目標の達成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すなわち、(1) 中東地域における経済外交の拡大、(2) 中東地域の包括的なバランス維持、中国の経済的利益を確保しながら自国の政治的影響力を失わないこと、(3) そして長期的な善隣関係を培養するために、中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を拡散することである。¹⁴ 中国は2002年に「中東問題特使」を設置して、中東平和交渉への新たな参加者として正式に登場し始めている。これにより、中東地域をめぐる米国との交渉能力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で、中国は中東地域だけでなく日米関係をはじめとする東アジアの政治経済の構図にも一定の変化をもたらす可能性を探っ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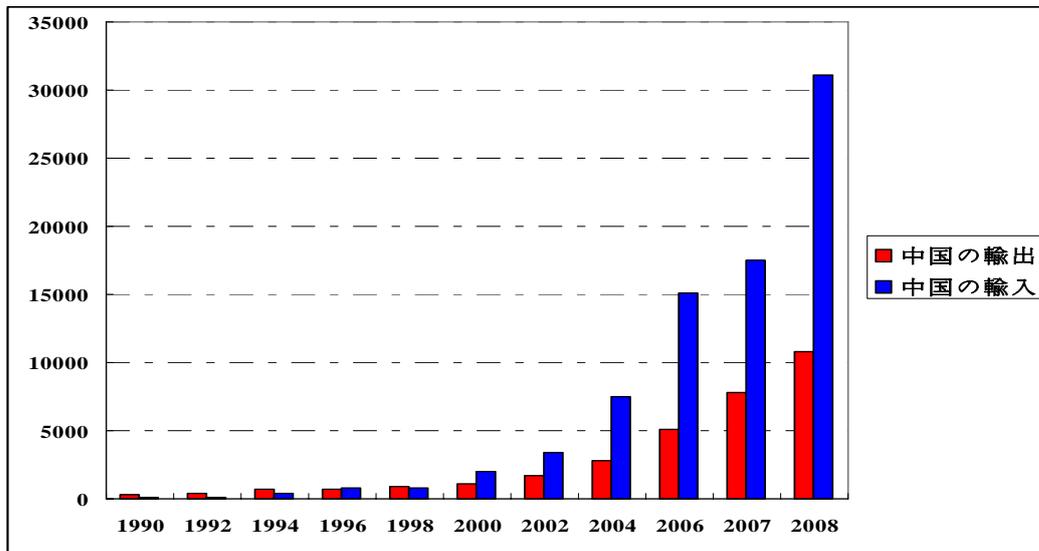
中国の中東政策においては、同盟体制に

固定される外交関係を超えて独立的なアプローチを強調することで、戦略的な柔軟性を担保する努力がなされている。¹⁵ 急変する中洋国際政治の流れに対する対応として中国が提案して設立された「上海協力機構」を見ると、中東と中央アジアで「北大西洋条約機構」(NATO)や「集団安全保障条約機構」(CSTO)とは区別される独自の地政学的な勢力になるための中国の外交努力と戦略的視野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中国のある中東研究者は、中東地域において中国は政治力拡大の努力をすべきだと提案し、「米国がすべての中東区域を独占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主張している。¹⁶ 中国の中東政策は、冷戦期の相対的・受動的なものから全面的な関与政策および制度化のレベルに漸進的に進化してきている。

II 脱冷戦期中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国の漸進的な浮上と発展

中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国の浮上は、経済領域においてより顕著である。2005年のイランとイスラエルを除く中東諸国と中国の貿易額は512.73億ドルで、その中で中国の輸入額は287.05億ドル、輸出額は253.68億ドルであった。これは10年前の1995年の輸

[図-1] 中国の対サウジアラビア貿易規模推移 (100万ドル)¹⁷



入額52.8億ドルと輸出額24.2億ドルに比べてそれぞれ9.7倍と21倍の急増であり、中国と中東相互間の経済関係が全面的に発展していることを如実に示している。¹⁸ 中国と湾岸協力会議（GCC）国家間の貿易規模は2003年の70億ドルから2008年には800億ドル超まで増加しており、今後5年間で1,600億ドルを超えるものと推算されている。また、米国側の調査によると、2020年に中国と中東地域相互間の年間貿易額は3,500億ドルから5,000億ドルに達すると予測されている。¹⁹

特に、2001年に中国が世界貿易機関に加入したことで、中国の中東地域における経済活動は大幅に増加している。中東地域への中国の貿易増加や経済協力の深化は、2002年の「中東問題特使」設置、2004年の「中国-アラブ協力フォーラム」設立など、様々な姿で表出されている。とりわけ2004年の胡錦濤中国国家主席によるサウジアラビア訪問は、中国の中東地域への関心と経済的利益が前代未聞の重要性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を対外的に標榜する重要な契機となった。

1990年に4.17億ドルに過ぎなかった中国とサウジアラビア両国の貿易規模は、2008年には417億ドルに達し、18年間100倍以上

の急速な伸びを示した。米国の戦略的同盟国と見なされてきたサウジアラビアは、既に8年間中国の域内最大貿易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貿易関係を発展させており、サウジアラビア国王から、「中国はわれわれの兄弟国」とまで呼ばれるほどの信頼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る。²⁰ これらの現象は、サウジアラビアに限ったものではなく、中東24カ国全体で観察されている流れである。一例として、中国は連続4年間、ドバイの最大貿易パートナーとなっており、2008年に中国とドバイの貿易額は約269億ドルに達した。中国浙江省義烏市の小商品市場は、中東24カ国との貿易関係を結んでおり、アラブ首長国連邦は、2008年に米国を抜いて義烏市の小商品の最大輸出相手国となった。また、2000年以来、中国は日本を抜いてアラブ首長国連邦の最大輸出相手国となっていた。関連統計によると、義烏市を毎年訪問する中東地域のディーラー数は約20万に達し、中東地域の国々が同市に設立した貿易代表処は既に800箇所以上あり、中でもイラクとドバイからのものが多い。中国浙江省義烏市は、ドバイに接続する中洋の経済的なネットワークの拠点として速いスピードで成長している。²¹

中国のエネルギー外交の中心は、主要な産油国が位置する地域である中東からのエ

[表-2] 中国の歴代中東問題特使と主な経歴

王世杰 (2002年9月-2006年3月)	前バーレーン大使, 前ヨルダン大使, 前イラン大使
孫必干 (2006年4月-2009年3月)	前サウジアラビア大使, 前イラク大使, 前イラン大使
吳思科 (2009年3月-)	前サウジアラビア大使, 前エジプト大使, 前アラブ連盟全権代表

エネルギーの供給を確保し、これを拡大することにある。²² 中国のエネルギー依存度は、中東地域では45%、アフリカ地域で30%である。特に、中東地域ではサウジアラビアとイランから最も多くの石油を輸入している。²³ 中国上海外国語大学中東研究所の錢学文は、2008年に中国とサウジアラビア両国間の石油協力の規模は3,500万トンと決定され、2009年は5,000万トンを突破すると予想した。²⁴ 中国はイランとサウジアラビアの隙間を上手に活用するバランス維持政策を推進し、実利を最大化している。2009年2月に胡錦濤中国国家主席はサウジアラビアを訪問して、「中国はサウジアラビアの中東における平和維持と世界の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における重要な役割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と述べた。中国の平和的発展と調和的な世界秩序のために必要不可欠なエネルギー資源の供給源かつ中国の輸出市場である中東地域への中国の外交戦略と政策は、複雑な中東平和交渉のプロセスと結びついて、「世界の問題について中国的解決策を模索する」段階に入っている。²⁵

III 中国が主張する中東和平案

東アジアの国際政治において、極東-中東のネットワークをもって「中洋国際政治」の再編を目指す流れは、1909年6月7日に、東京でイスラーム教に改宗した大原武慶を中心に設立された「亞細亞議會」が中央アジア地域の反ロシア勢力と共同結成したことに、その源流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1911年10月10日に中国の孫文によって辛亥革命が勃発して以来、この「亞細亞

議會」は「大亞議會」に改名し中国瀋陽に本部を移動した。²⁶ 日本は当時イギリスの国際資本家の協力で構築された日英同盟の枠組みの中で、中東における戦略的な動きは、独自に実行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限界に直面していた。²⁷ また、現在の日米同盟体制下でも、中東の経済再建のために経済的貢献を着実にし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日本が中東で独自の戦略的なスペースを確保することは多分に困難な状況である。

これに対し、中国は非同盟運動を使って、冷戦期にも、中東地域で独自の戦略空間を確保するために努力した。特に、米国との外交関係正常化の過程で、連合常任理事国の座を合法的に承継し、中東和平交渉の過程を含む中東問題に全面的に関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資格を得ることになった。前に指摘したように、中国の中東地域での石油輸入依存度の増加や経済関係の深化などにより、2002年9月17日に中国政府は中国外交部スポークスマンの声明を通じて、中東問題特使を設置し、中東和平交渉の過程で、独自の政治勢力として登場することになる。中国政府の声明によると、中国が中東問題特使を設置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背景には連合常任理事国の一つとして一貫して中東の和平プロセスに関心を持って積極的に参加してきたことと、中東諸国が平和的な方法で現在の中東問題を解決できるように中国に要求してきたことを挙げている。多くのアラブ諸国が一貫して中国に対し、中東問題においてより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すよう要請してきたため、中国としては中東諸国の指導者のこのような態度表明に合わせて、このような決定をすでに下したと明らかにしたのである。²⁸

もちろん、中国の中東問題特使設置は、1990年湾岸戦争の時に、中東12カ国の外務

大臣が中国のより積極的な役割を要求したこともその遠因となっていた。しかしより直接的には、2000年4月12日から18日まで江沢民中国国家主席が中国の国家元首としては初めてパレスチナとイスラエルを訪問した際、ヤセル・アラファト・パレスチナ解放機構前議長が、中東和平プロセスにおいて中国が強大国としての役割と影響力を発揮するよう江沢民に要求したことに起因する。²⁹

中国の中東問題特使は、2002年4月に江沢民をはじめとする中国指導部によって考案され、同年9月に対外的に宣布された後、現在までに三人の中国外交部の中東地域元大使から構成されて活発な活動をしている。現中東問題特使である吳思科氏は、イスラエルとパレスチナの紛争の問題において、双方が交渉を通じて問題を解決すべきで、これらの交渉には知恵が必要なのはもちろん、一定の条件下で抜本的な決定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ている。中国がイスラエルとパレスチナの紛争や中東和平問題において積極的な役割を担い、国際社会との協調を行うべきだと強調しながらも、彼はエルサレムの地位問題など敏感な問題については、「ユダヤ人とアラブ人は、悠久の文明と文化を持っており、平和を実現し、長期間にわたる安定を実現していく上で、双方が最終的に解決方法を探す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と、迂回的に回答するのにとどまった。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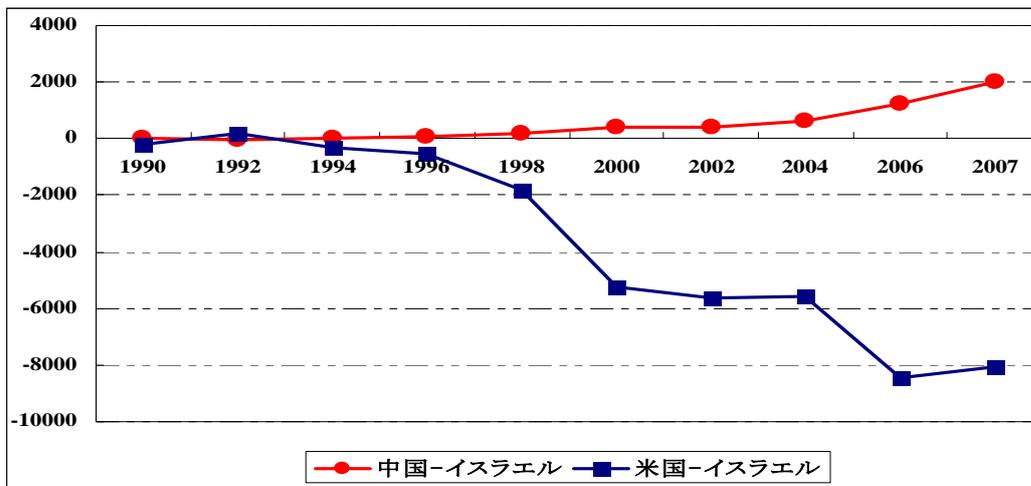
それでは、中東和平に対する中国の主張は何か。1997年末に中国副首相兼外務大臣錢其琛は中東5カ国を訪問した際、中東和平への五つの新たな主張を提案した。それ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まず、連合国の中東問題に関するそれぞれの決議に基づいて、マドリード平和会議の『土地と平和の交換』という原則下で、中東和平交渉を進行させる。第二に、既に合意に達した部分を実行に移し、中東和平プロセスの障害となるすべての行為を可能な限り行わないこと。第三に、あらゆる形態のテロと暴力行為を放棄し、各国の安全保障と

国民の正常な生活を十分に保証すること。第四に、平和プロセスの発展に応じて、地域の経済協力を強化し、共同発展と繁栄を実現すること。最後に、国際社会は中東の関係国と一緒に責任意識をもって中東地域の全面的で公平な、そして持続的な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努力すること。中国はこのために自ら努力する」。³¹ 最初の中東問題特使であった王世杰の見解によると、中国は中東地域の公平で持続的かつ全面的な平和を主張しており、「正義がなければ全面的な平和をもたら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と強調している。³²

2006年4月23日にサウジアラビアを訪問した胡錦濤中国国家主席は、「中東和平を促進し、調和的な世界を建設しよう」というテーマのスピーチを通して調和的な中東を建設するための長期的方法として、地域の平和安定への努力、相互尊重の実行及び共同開発を積極的に実行する3つの青写真を提示した。³³ 2007年11月に米国アナポリスで開催された中東平和会談に参加した中国外務大臣楊洁篪は、次のような中東和平への五つの方案を提示した。「まず、歴史を尊重し相手国の懸念に対応して、和平交渉が正しい道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維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二に、暴力を止揚して障害物を除去し、同時に和平会談にしっかりと集中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三に、和平会議においてバランスのとれた姿勢を維持して、和平交渉に有利な環境を造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四に、発展と協力を優先し、和平交渉の基盤を確固たるもの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最後に、平和会談のために合意を構築し、責任を増やすためには、もちろんそのための支持基盤を向上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³⁴

中国外務大臣楊洁篪は2009年4月26日にシリアのダマスカスでシリア大統領と会見したときに、上記の方案を提起したが、これは過去の中国の中東和平に関する主張と比べると大きく異なる点がなく、伝統的な平和共存原則の外縁拡大として見る事ができるものだった。特に、中国の中東和

[図-2] 中国-イスラエルと米国-イスラエル両国間の貿易収支推移 (100万ドル)³⁵



平案は、既存のすべての決議に基づいて推進しようという立場を明らかにして包括的な立場を如実に示している。³⁶ これは、中国が中東の和平交渉の過程において、平和という目的に依存せず、プロセスを重視する傾向にあることをよく見せてくれるところである。このような中国の戦略的な負担の回避は、米国を中東問題に没頭させ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の相対的地位上昇を誘引するきっかけとして活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³⁷

IV 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拡大と中洋国際政治の行方

冷戦期、中東はアメリカとソ連の「グローバル・ヘゲモニー」掌握のための最大激戦地として数回にわたる戦乱を経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ソ連が解体された後も、9/11テロ以来米国によって全世界的な規模で行われている対テロ戦争とその事後処理を中心に、既存の中東紛争を除いても、アフガン戦争、イラク戦争やイランの核武装の試みなどで中東は、さらに熱戦の姿を露呈している。中国の急速な経済成長とこれに伴う中東地域での影響力の拡大は、中東-中央アジア-中国をつなぐ「三中関係」の構図とともに、中国共産党によって新中国が成立した後に最近再発見されている「中洋国際政治」という新たな流れをな

お一層複雑にしている。

中国の経済的な浮上に応じて、中国の国家利益が東アジアのカテゴリに分類される地域利益を超越して、全世界的な規模に拡大されている。中国は、アジア太平洋経済協力会議などを通じて域内の交渉力を向上させながら、「上海協力機構」を独自に運用して国際舞台における発言権の拡大や活動範囲の拡大を可視化している。パキスタン、スリランカ、ミャンマーにおける最近の中国海軍基地建設などの動きは、海洋の方向での国民の安全を死守する必要があると主張する最近出版された中国人民解放軍内部の著書からも見られる。³⁸ このような拡大された海洋安全保障の概念として、中国と中東を結ぶ「中洋」の地政学的重要性はますます増加している。中国の総体的な軍事作戦と軍事機密を担当している熊光楷は、非伝統的安全保障の脅威を指摘し、特にテロの他、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の確保を担保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³⁹ 企業戦略家鄧正紅は2030年頃中国の石油輸入規模が2005年の米国の石油輸入量に相当する6億トンに達することを展望しながら、次のように中国の石油業界の海外進出戦略を全般的に整理した。それは、「中東を強固にし、周辺を發展させ、アフリカを拡大し、米州大陸を開拓する」というもので、中東を最初に言及したのは決して偶然ではない。⁴⁰

平和的発展と調和的な世界という中国指導部の強調にもかかわらず、中国の国防予算は継続的に増加している。これによって触発された周辺国の安保不安を払拭しながら国防関連の透明性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に、国防部直属のスポークスマン制度が設立された。しかし、中国と中東諸国間の関係深化により、最近米国の安全保障研究所は、「米国は中東地域で中国からもたらされる潜在的な脅威を目撃している」と中国の中東における影響力拡大とその波及効果を警戒している。⁴¹ このような懸念は、中国が持続的な経済成長を通じて総合的な国力が強化した後に、現行の世界秩序を変化させたり、或は改革しようとするを想定する現実主義国際政治理論の視点とも一脈相通するところがある。⁴² 例えば、2001年2月に米軍がイラクへの空爆を敢行するとき、中国が防空網の強化と接続されている光ファイバー通信技術をイラクに提供した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た事実である。⁴³ 何よりも、中国が「上海協力機構」などを通じて東アジアでは日米同盟を弱体化させたり、あるいは除去しようとする努力にも注目する必要がある。⁴⁴

おわりに

中国の中東における影響力の拡大に関連して、一方では中国の浮上が米国と西欧主導の民主主義的価値を基盤とした現行の国際システムを急激に変化させることは短期的には不可能だと見る意見がある。⁴⁵ また、中国と世界経済の深化に伴う統合のプロセスの中で、中国が建設的な参加者として世界経済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という肯定的な評価もある。⁴⁶ さらに、中国は将来の中東に対するひとつの「政治的な緩衝地帯」を形成す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見方もある。⁴⁷ しかし、これらの仮説は中国国内政治の安定性が持続的に維持される場合のみ可能である。⁴⁸ 中東の国々が米国と中国間における東アジア地域の主導権をめぐる戦略的な空間として浮上するようになるか、あるいは米国と中国の協力の中で、東アジアでは中国が相対的な地位を向上さ

せることができる有用な戦略空間になるかについては継続的な研究が必要である。同時に、中国と中東を貫通する全地球的な規模の「新しいシルクロード」の誕生に直面して中国と中東を媒介とする世界経済の再編に関する研究も求められている。⁴⁹ そして、中国の国際的影響力の拡大と今後中国の対外行動を予測するときに「中洋変数」を除外してしまうと、包括的な教訓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事実を再認識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たい。中国の「万里長城」とイスラエルの「嘆きの壁」を連繋する「中洋国際政治」の視野が、中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国の浮上に応じてどの時代よりも切実に求められている。

¹ インド防衛問題研究所・客員フェロー。

² 「中洋」(the Medient)という概念は、日本では戦前、小林元氏と戦後の松田壽男氏によって考案され、1970年代梅棹忠夫氏によって「中洋の提唱」を本格化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具体化された生態学的な圏域で、一般的に中東地域に含まれていないインドが含まれている。本稿では、国際政治研究の視点から中東、中央アジア、中国を結ぶいわゆる「三中関係」が体现されている国際政治の場として規定する。「中洋」に関する日本の基本的な議論については、次を参照。梅棹忠夫、「中洋の提唱」、『梅棹忠夫著作集』、第4巻、(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年)、398-439頁。

³ “China may top Japan as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China Daily*, March 10,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3/10/content_7559222.htm

⁴ 例えば、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Kevin J. Coone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merica and Asia Respon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N. S. Sisodia and V. Krishnappa, eds., *Global Power Shifts and Strategic Transition in Asia*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09).

⁵ 例えば, John Calabrese,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1);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Co., 1993); P. R. Kumaraswamy, ed.,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Influence* (New Delhi and London: Sage, 1999); Jon B. Alterman and John W. Garver, *The Vital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8); Jon B. Alterman,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in Carola McGiffert, ed.,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pp. 63-76; Itamar Y. Lee, "Linking Mecca with the Great Wall: Sino-Saudi Arab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010, forthcoming).

⁶ このような「中洋国際政治」を全く考慮しないまま中国の将来像を眺望する限界を露呈している研究としては、鄭在浩編、『中国の強大国化：比較および国際政治的アプローチ』（ソウル：ナナム、2006年）；金泰虎編、『中国外交研究の新しい領域』（ソウル：ナナム、2008年）。

⁷ 博統先、『中国回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22頁。

⁸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p. 52.

⁹ Michael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1983), pp. 203-224;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John Calabrese,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1).

¹⁰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¹¹ "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至2009年）," 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0719.htm *中東と近東を区別;

**アラブ国家とイスラーム国家を区別

¹² 中東における中国の限界については、北

村文夫、「中国外交の軌跡と中東からの視点」、『中国21』、第7巻、1999年11月、42-44頁。これに対する反論は、Pan Guang, "China's Succes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Quarterly*(December 1997), <http://www.meforum.org/article/373>.

¹³ A.H.H. Abidi, *China, Iran, and the Persian Gulf*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 1982), p. 308.

¹⁴ Mao Yufeng, "China's Interests and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rab World," in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p. 113-132.

¹⁵ Deng-ker Lee, "Peking's M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sue & Studies*, Vol. 30, No. 8(August 1994), pp. 86-87.

¹⁶ 李偉建, 「中東在中国戰略中的重要性及雙邊關係」, 『中国外交』, 第二期, 2005年, 46頁。

¹⁷ 国際通貨基金の貿易統計をもとに筆者が作成。

¹⁸ "中国和中東国家合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新华网, 2006年12月8日, <http://news.wx216.com/china/38027.html>

¹⁹ "全球经济重心转向亚洲," 21世纪网, 2009年9月14日, http://www.21cbh.com/HTML/2009-9-14/HTML_VPNVQE2PITTF.html

²⁰ "沙国王称中国是兄弟 盛赞邓小平和香港回归," 中国日报网, 2009年02月12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02-12/155017202409.shtml>

²¹ "义乌小商品贸易中东兴衰录," 21世纪网, 2009年12月9日, <http://www.21cbh.com/HTML/2009-12-10/157205.html>

²² Willy Wo-Lap Lam, "China's Petroleum Diplomacy: Hu Jintao's Biggest Challenge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24.

²³ Michael Richardson, "China's ties with Iran vis-à-vis the West: Marching to the drumbeat of oil," *The Strait Times*, July 25, 2008.

²⁴ "胡锦涛中东行前瞻：中沙经贸合作升级," 内蒙古新闻网, 2009年2月10日, <http://jjxx.nmgnews.com.cn/system/2009/02/10/010177295.shtml>

²⁵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December 2008), p. 759.

²⁶ 杉田英明, 『日本人の中東発見: 逆遠近法のなかの比較文化史』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5), 228頁.

²⁷ 横山三四郎, 『ロスチャイルド家: ユダヤ国際財閥の興亡』 (東京: 講談社, 1995); 平間洋一, 『日英同盟: 同盟の選択と国家の盛衰』 (東京: PHP研究所, 2000); 田畑則重, 『日露戦争に投資した男: ユダヤ人銀行家の日記』 (東京: 新潮社, 2005).

²⁸ “中国决定任命王世杰为中东问题特使, 阿以表示欢迎,” 新华网, 2002年9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9/17/content_564966.htm

²⁹ “江泽民出访纪实: 访巴以确立中东问题特使机制,” 中国新闻网, 2006年7月31日, <http://news.qq.com/a/20060731/000985.htm>

³⁰ “中东局势处于新十字路口: 访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新华网, 2009年6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26/content_11602667.htm

³¹ “中东和平进程,” 2004年9月20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g.il/chn/zt/dqzc/t158964.htm>

³² “解读中国特使外交,” 环球时报网, 2008年1月19日,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08-01/49566.html>

³³ 胡锦涛, “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 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 人民网, 2006年4月2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4322140.html>

³⁴ “杨洁篪在中东和会上阐述中方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网, 2007年11月28日, http://www3.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xgxw/t384916.htm

³⁵ 国際通貨基金の貿易統計をもとにして筆者が作成.

³⁶ “杨洁篪外长提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主张,” 新华网, 2009年4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4/26/content_11262192.htm

³⁷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 2005), p. 143.

³⁸ 葛東升編, 『国家安全戦略論』 (北京: 軍事科学出版社, 2006年), 223頁.

³⁹ Xiong Guangkai, “China's Security Policy Today,”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o. 4(October 2008), p. 3.

⁴⁰ 邓正红, “论中国海外石油战略,” 博锐管理

在线, 2006年5月11日, <http://www.boraid.com/darticle3/list.asp?id=55007&page=2&size=>

⁴¹ “*The Rise of China: Beijing'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hosted by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June 16, 2008,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08/0626_middle_east.aspx

⁴² John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April 2006), pp. 160-162.

⁴³ 脇祐三, 『中東: 大變貌の序曲』 (東京: 日本經濟新聞社, 2002年), 275頁.

⁴⁴ Stephen J. Blank, *China's Military Power: Shadow over Central Asia* (Arlington, VA: Lexington Institute, 2006), p. 13.

⁴⁵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January/February, 2008), pp. 23-37.

⁴⁶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2), p. 164.

⁴⁷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Co., 1993), p. 279.

⁴⁸ 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2), p. 158;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⁹ Ben Simpfendorfer, *The New Silk Road: 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中国の対外教育—孔子学院を中心に

馬場 毅¹

はじめに

文化面で中国の対外進出を考えると、最近めざましい現象は全世界での孔子学院の設置である。2004年に韓国で最初の孔子学院が設置されて以来、2009年10月末で、国家漢弁の発表では、世界に孔子学院が282校と孔子課堂が241カ所、計523カ所開校されており、87カ国（地域）に広がっている。本稿では、中国の国家プロジェクトの一環としての孔子学院のその創立と普及の過程、日本国内の状況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場合に、中国語教学の立場から如何に教えているかというという観点より、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²の全世界への影響という観点から分析をすすめたい。ところでこのテーマに関連した先行研究は非常に少ないが、その中で黒田千晴論文³は、中国の対外教育戦略という視点から、留学生教育と対比しながら、孔子学院にも簡単にふれている。また李尚永論文⁴は孔子学院構想の樹立の経過と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について分析している。さらに佐々木論文⁵は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関係の協議会の簡単な報告をし、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の現状を知るには便利である。ただ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テーマに関連した研究が非常に少ない中で、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の現状については、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に、愛知大学の主催で行われ、全国の孔子学院関係者が参加した第3回孔子学院協議会に参加して得た資料や知見を加えて本稿をまとめた。

I 外国人留学生への中国語教育の強化から孔子学院の設置へ

国家的プロジェクト統括・遂行組織の成立

1987年7月、中国国務院の批准を経て、国家対外漢語教学領導小組が成立した。こ

の組織は「全国の対外中国語教学工作に責任を負う」となっており、中国国内での留学生などに対する中国語教育の統一的指導組織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その宗旨は「外に対しての中国語教学を押し広めることに力を尽くし、世界に中国を理解させ、中国に世界へ向かわせる」とある。その後、2004年11月、韓国のソウルで最初の孔子学院が成立した。その後各国で続々と孔子学院が設立された。

2006年、世界中の孔子学院設立という事態に対応しさらにこの政策を遂行するため、国家対外漢語教学領導小組は、国家漢語国際推广領導小組(国家中国語国際普及指導班)と改名し、その組織には、国務院弁公庁、教育部、財政部、国務院僑務弁公室、外交部、国家発展と改革委員会、商務部、文化部、国家广播電影電視總局(国家ラジオ映画テレビ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国務院新聞弁公室、国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会の政府の関係する12の部や委員会より構成されている。そしてその組長には陳至立国務委員がなった。領導小組の下の執行機関としての弁公室を国家漢弁と略称した⁶。これから見ると、単に教育部のみならず関係する国家機関を組織化しており、また組長は閣僚レベルであることから孔子学院の設置は国家戦略としての位置づけがされていることが伺われる。

II 急速に世界へ広がる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本部としての国家漢弁の役割

国家漢弁は国家漢語国際推广領導小組の日常事務機構であり、中国教育部に属した事業機構で、「非政府機構」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⁷。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国家対外漢語教学領導小組が、国家の12の部や委員会を結集したものであり、形式的には、非政府機構だとしても、中国政府の国家プロジ

エクト遂行のための日常的な事務組織であると考えらるべきであろう。

ところで国家漢弁は自らの仕事を以下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1. 国家漢語国際推广領導小組(国家中国語国際普及指導班)の指導の下, 中国語を世界に普及するための方針政策と発展計画を作成する。
2. 各国各レベル各種教育機関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の展開を支援する。
3. 孔子学院総部を指導して孔子学院を設立する。
4. 対外中国語教育基準を作成して評価を統一化し, 中国語教材を開発普及する。
5. 対外中国語教師資格基準を作成して研修を行い, 国外で活動する中国語教師とボランティアを選考して, 外国語としての中国語の教育能力認証を行う。
6. 対外中国語教育ネットワーク設立基準を作成し, 関連するネットワーク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作りリソースを提供する。
7. 各種対外中国語試験の開発と普及を行う⁸。

このように国家漢弁は孔子学院総部を指導しての世界各地の孔子学院設立のほかに, 世界各地への中国語普及のための政策立案, 中国語教育の基準の標準化や評価の統一, 中国語教師資格の標準化, さらに各種中国語試験の開発と普及など中国語普及の諸施策を行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る。国家漢弁の行っている中国語試験としては, 留学生の中国語能力を測る漢語水平考試(中国語水準試験, HSK)があり, また中小學生漢語考試(YCT), さらにビジネス用の商務漢語考試(BCT)もある⁹。

そのほかに全世界の中国語学習者を対象にした中国語コンクールとしての漢語橋が, 2002年に第1回が行われて以来, 毎年行われており, その決勝大会は, 中国で大々的に行われ, その点でまさに国家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の性格が強い。また, 毎年1回中国で全世界の孔子学院の大会を開き, その中で先進的な孔子学院20を選びモデル例として顕彰するとともに, 経験交流をしている。

一方孔子学院は, 非営利の教育機構とされ, またその業務は, 国家漢弁の業務に基本的に相応し, 「孔子学院規則」によれば以下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1. 社会各界に向けた中国語教育
2. 中国語教師に対する研修, 教材等の提供
3. 中国語試験と中国語教師資格認定業務の実施
4. 中国語教育, 文化, 経済及び社会に関する相談業務
5. 現代中国研究の展開¹⁰

特に国家漢弁とくらべて, 中国語教育や文化, 経済, 文化などの相談業務や現代中国研究の展開などが目をひくのである。

急速に拡大した要因—世界各地の大学などの教育機関との協力方式

国家漢弁によれば2009年10月現在, 世界に孔子学院が282校と孔子課堂が241カ所, 計523カ所開校されており, 87カ国(地域)に広がる。孔子学院は84カ国計282校開校されている。そのうち, アジアは28カ国70校, アフリカは15カ国21校, ヨーロッパは29カ国94校, アメリカは11カ国87校, オセアニアは2カ国10校。孔子課堂は25カ国(ミャンマー, マリ, バハマは孔子課堂のみで, 孔子学院はなし)計241カ所に開講されており, そのうち, アジアは10カ国27カ所, アフリカは2カ国2カ所, ヨーロッパは7カ国34カ所, アメリカは5カ国176カ所, オセアニアは1カ国2カ所である¹¹。それをさらに詳しく表示したのが, 表1である。この表はインターネットの該当頁にアクセスして, 実際の孔子学院や孔子課堂が設置されている教育機関の名称から各国の数を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が, 国家漢弁の発表した数とは異同がある。ただし各国の孔子学院・孔子課堂の数の概数はつかめる。それによれば大陸ごとに孔子学院の数が多くはごく限られており, 多くの国はごく数カ所しか設置されていない。

ところでこのように孔子学院が2004年以来急速に世界に普及した背景には, 現地の大学などの教育機関との協力方式をとったことにある。そのメリットといえれば以下のいくつかが考えられる。

表1 世界中の孔子学院・孔子課堂の数

アジア	孔子学院	孔子課堂	アフリカ	孔子学院	孔子課堂	ヨーロッパ	孔子学院	孔子課堂	アメリカ	孔子学院	孔子課堂
日本	14	3	ベニン	1	0	モルドバ	1	0	ジャマイカ	1	0
ヨルダン	1	0	トーゴ	1	0	マルタ	1	0	ブラジル	2	1
アルメニア	1	0	マリ	0	1	ギリシア	1	0	アルゼンチン	1	0
中国	(本部)1	0	モロッコ	1	0	スペイン	4	0	チリ	2	0
中国(香港)	1	0	スーダン	1	0	ウクライナ	2	1	キューバ	1	0
アフガニスタン	1	0	南アフリカ	4	0	スロバキア	1	0	コロンビア	2	0
イスラエル	1	0	マダガスカル	1	0	セルビア	1	0	ペルー	3	0
インドネシア	1	0	ルワンダ	1	0	スウェーデン	1	0	メキシコ	5	0
インド	2	0	リベリア	1	0	ポルトガル	2	0	アメリカ	53	46
イラン	1	0	ケニア	2	1	ルウェー	1	0	カナダ	6	1
シンガポール	1	0	カメルーン	1	0	ルーマニア	2	0	計	76	48
ウズベキスタン	2	2	ボツワナ	1	0	チェコ	1	1			
トルコ	1	1	エジプト	2	1	オランダ	1	0			
スリランカ	1	1	ニジェール	2	0	フィンランド	1	0			
バングラディシュ	1	1	ジバブエ	1	0	フランス	12	1			
ミャンマー	0	2	計	20	3	ロシア	12	3			
モンゴル	1	1				デンマーク	1	0			
マレーシア	1	0				アイスランド	1	0			
レバノン	1	0	オセアニア	孔子学院	孔子課堂	ポーランド	4	0			
キルギス	2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1	0	ベルギー	3	0			
カザフスタン	2	0	オーストラリア	9	1	ブルガリア	1	0			
韓国	14	1	計	10	1	ベラルーシ	1	0			
パキスタン	1	1				オーストリア	1	0			
タジキスタン	1	0				イギリス	11	23			
フィリピン	2	0				イタリア	7	0			
タイ	12	11				ハンガリー	1	0			
ネパール	1	1				ドイツ	12	0			
計	68	25				アイルランド	2	0			
						計	89	29			

出所: Confucius Institute Online 網絡孔子学院 <http://www.chinese.cn/en/> に載せられている孔子学院, 孔子課堂の置かれている大学, 高校名により作成. なお日本では, 課堂以外に学堂があり, そのうち孔子学院の学堂は孔子学院の数に入れたが, それ以外の2つは孔子課堂の中に入れた. なお全体の数は国家漢弁の発表している数と異同がある. 特にそれはアメリカの孔子課堂の数で甚だしい. アジアについては,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41.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66.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68.htm,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70.htm~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70.htm より作成. アフリカについては,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261.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23.htm~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36.htm より作成. オセアニアについては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38.htm~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37.htm より作成. ヨーロッパについては,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88.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03.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05.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20.htm より作成. アメリカの孔子学院数については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77.htm~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87.htm, 孔子課堂数については『孔子学院通訊録』(2009年 P162~ p 196)より作成した.

中国側のメリット

①世界各地の教育機関の既存の施設・設備を利用できる. そのため自前の施設・設備のための投資をしなくても済む.

②世界各地で中国語教育をしている人的リソースを利用できる. ただし国家漢弁は中国から副院長などの教員派遣をしている.
③世界各地である程度中国語教育が行われていれば, それを尊重して押しつけではなく極めてソフトに中国語教育を開始できる. ただしこれでも後述する日本のように既存

の中国語教育が普及している場合には、摩擦が生じる場合がある。また世界各地の中国語教育の基盤の上に孔子学院を設置し、急速に孔子学院が拡大する中で、質の保証をどう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も生じる。

世界各地の教育機関側のメリット

①教育機関側の行っていた中国語教育が、孔子学院の設置を中国側に許可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側から認められ権威づけられ、いわば「お墨付き」を得たことになる。

②教育機関側が、教員や教材の点で不十分な点があれば、国家漢弁から教員の派遣、および各国語に訳した教材の提供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点は特に従来中国語教育があまり盛んでない国では大変魅力的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③孔子学院の規則の第21条には、「新設される孔子学院に対し、一定の初期経費を投入する。年度プロジェクト経費は外国側と中国側が共に負担し、その割合は通常1:1の比率となる」とある¹²。すなわち教育機関側は必要な経費の補助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孔子学院総部は、世界各国の学生や教員が中国に留学して中国語や文化を学ぶときに、奨学金を提供し、資金面の援助を行っている。その対象になるのは、中国籍以外で、各国の孔子学院・課堂の優秀な学生、海外で中国語の教学に従事または従事することを計画している教員、孔子学院総部の主催した中国語試験で成績が優秀な者、漢語橋世界大会で優秀な成績を収めた大学生・高校生、国外の関係ある大学・学院などで学んでいる者、孔子学院総部の特定な協議条件に符合する者となっており、大変範囲が広い。そして毎月進修生 1400 元、本科生 1400 元、修士課程生 1700 元、博士課程生 2000 元の奨学金が生活費として出されている¹³。

以上のような中国側と世界の教育機関との関係が、お互いに利益となっている関係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が、孔子学院が急速に世界に普及した原因であろう。無論その背景に中国のプレゼンスが経済、政治、文化など各方面において世界に大きな影響力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ことはいままでもないことである。

なお最近注目されるのは、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の存在である。これは 2006 年 4 月 6 日、教育部と英国企業の香港上海銀行グループ (HSBC)、ブリティッシュ・ペトロリアム、デロイト・トウシュ会計事務所、スワイア社、スタンダード・チャータード銀行が、ロンドンに共同で世界初の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を設立する覚書にロンドンで合意してから始まった。これは英国の金融の中心ザ・シティにロンドン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を設立し、中国語と中国文化を教えることで、英国経済界の中国に対する理解を深めること目的とした。そして国家漢弁と前述の 5 社が出資し、清華大学とロンドン政治経済学院 (LSE) が、同学院の具体的な運用を行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は他国にも広がり、アテネ大学に設置されたアテネの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さらにはコペンハーゲンビジネススクールに設置されたコペンハーゲン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がある¹⁴。

III 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と国家漢弁

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の現状

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の現状は、表 2 の通りである。日本では最初に立命館大学(2005 年 6 月開校)、翌 2006 年には桜美林大学(1 月開校)、北陸大学(2 月開校)、愛知大学(4 月開校)、札幌大学(11 月開校)に孔子学院が設置され、その後ほかの大学などにも拡大していった。

これらのうち孔子課堂は基本的には、高校生以下を対象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だ日本には孔子学堂と称するものがある。これは比較的少人数なものを対象に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と国家漢弁副主任・孔子学院総部副総幹事の胡志平氏は、筆者の質問に対して答えてくれたが、国家漢弁のホームページを参照すると、英訳では課堂を意味する「class room」となっている。ただ大学に設置した孔子学院の教える対象は、孔子学院協議会に配られた資料『日本孔子学院、学堂、課堂 2009 年度事業案内』¹⁵から見る限り、社会人などで高校生ではない。つまり実質的には分室という意味かと思う。それ以外の組織が設置した孔子学堂の中には、

高校生を対象にしたり(福山銀河孔子学堂), 社会人を中心にして高校生も含まれる可能性もある(長野県日中友好協会長野ラジオ孔子学堂). 後者の例は中国側の協力先は, 中国国際放送局であり, このようなラジオを利用した孔子学堂もある.

学院, 学堂, 課堂で行われている. 教員は協力する中国の大学から副院長などが派遣されることがあるが, 基本的には各大学で自前でまかなっている.

表 2, 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孔子課堂(2009年10月現在)

学院・課堂・学堂名	住所	国家漢語弁公室調印日	開校日	中国国内協力校
立命館孔子学院	京都府	2005/6/28	2005/6/28	北京大学
	東京学堂			
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	大分県	2006/10/25	2006/10/25	浙江大学
立命館孔子学院大阪学堂	京都府	2008/3/3	2008/4/1	同濟大学
桜美林大学孔子学院	東京都	2005/11/1	2006/1/18	同濟大学
桜美林大学孔子学院高島学堂	滋賀県	2006/11/1	2006/11/1	
北陸大学孔子学院	石川県	2005/12/15	2006/2/15	北京語言大学
愛知大学孔子学院	豊橋事務室	愛知県	2006/2/24	2006/4/1
	車道事務室			
札幌大学孔子学院	北海道	2006/8/3	2006/11/22	広東外国語外貿大学
早稲田大学孔子学院	東京都	2007/4/12	2008/4/1	北京大学
岡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	岡山県	2007/6/12	2007/11/25	大連外国語学院
大阪産業大学孔子学院	大阪府	2007/8/28	2007/11/26	上海外国語大学
神戸東洋医療学院孔子課堂	兵庫県	2007/10/25	2008/4/5	天津中医薬大学
長野県日中友好協会 長野ラジオ孔子学堂	長野県	2007/11/7	2007/11/7	中国国際放送局
福山大学孔子学院	広島県	2007/11/16	2008/1/8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学 上海師範大学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	東京都	2008/1/22	2008/5/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福山銀河孔子学堂	広島県	2008/3/24	2008/4/4	海澱実験中学 上海実験学校

*愛知大学車道校舎孔子学院事務室作成の資料による。

これらの各大学の事業を2009年4月以降の事業を主なもの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なお資料として前述した『日本孔子学院, 学堂, 課堂 2009年度事業案内』を用いる.

①中国語講座

これは孔子学院設立の主要な目的であり, 早稲田大学孔子学院を除いてすべての孔子

②文化講座および単発的な講演会, あるいはどちらかの実施

これもすべての孔子学院, 学堂, 課堂で行われている. 講師は日本人あるいは日本在留中国人の場合もあるし, 中国から招請した中国人の場合もある. ただし国家漢弁から講師が派遣された例はない.

③中国語教員の養成, あるいは中国語教員の研修の実施

中国語講師の養成を行っているのはそれほど多くなく、立命館大学、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学、桜美林大学、岡山商科大学、工学院大学の孔子学院で行われている。また中国語教員の研修講座は札幌大学孔子学院で行われている。

④中国語資格試験、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の実施及び受験、並びに参加

H S K (漢語水平考試)については、立命館大学、岡山商科大学の孔子学院の受講生が受験しており、実施並びに受験した受講生がいるのは桜美林大学、北陸大学、札幌大学、大阪産業大学の孔子学院であり、多くの孔子学院がH S K試験の実施校になっている。また新H S K試験については、桜美林大学、岡山商科大学の孔子学院の受講生が受験している。

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では、国家漢弁が力を入れており世界的範囲で予選が行われる漢語橋については、立命館大学孔子学院で西日本地区予選が行われ、桜美林大学孔子学院で東日本地区予選が行われ、札幌大学孔子学院で北海道予選大会が行われた。また漢語橋の大学生部門の西日本地区予選が大阪産業大学孔子学院で行われた。また北陸大学では受講者が漢語橋の東日本大会に参加した。

その他に全日本の範囲で日本独自に行われる日中友好協会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予選を長野県日中友好協会ラジオ孔子学堂が実施し受講者も参加した。また孔子学院独自の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を行っているものとして立命館大学、札幌大学があり、さらに神戸東洋医療学院孔子学堂は、兵庫県中国文化交流会として、高校生や一般・大学生も参加して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を行っている。

⑤高校生への働きかけ

神戸東洋医療孔子課堂は、課堂という名称が表しているように前述したように兵庫県中国文化交流協会として高校生を含んだ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を行い、また高校へ向けての中国文化などの出張授業を行っている。高校向けの中国語の授業をやっているのは、北陸大学孔子学院、福山銀河孔子学堂である。桜美林大学孔子学院は、高校生

対象の出張講義・体験授業を行っている。また愛知大学孔子学院では、東海地区高校生中国語発表会への協賛を行っている。

⑥中国での現地研修など

桜美林大学、愛知大学、大阪産業大学、札幌大学の孔子学院、神戸東洋医療孔子課堂、長野県日中友好協会長野ラジオ孔子学堂が協力先の大学などで中国語などの現地研修を行っている。また北陸大学孔子学院は平成遣中使という名目で、「高校生・北陸大学学生」「高校教員」「受講生」の3班を中国に派遣している。そのほか札幌大学孔子学院では、2009世界遺産「蘇州古典園林」見学ツアーを行っている。

以下に特色ある試みを述べる

⑦研究に特化した孔子学院の例

早稲田大学孔子学院は特色ある孔子学院である。前述したように中国語教育は行わず、毎週開講する講座は、大学院の正式単位認定科目として設置し、北京大学を中心に複数の教員を招き、早稲田大学の教員とともに講義を行っている。その他に中国の研究者を招いてのシンポジウム、若手研究者の中国研修育成事業、孔子学院叢書の発行など研究活動に特化した活動をしている。

⑧全日本青少年中国語カラオケ大会の実施

これは日中青少年文化交流イベントとして桜美林大学孔子学院が行っているものである。大会には100名以上の応募者があり、観客が1750名集まるなど大いに盛り上がり、初学者の中国語への関心を引くという点では大変有効な手段である。

⑨アジア地区孔子学院 2009 連合会議の開催

北陸大学孔子学院が中心となり、初めてアジア地区孔子学院連合会議を開催した。その時には、21カ国51校、協力校14校が参加した。

IV 日本国内での既存の中国語教育との棲み分けと軋轢

ここで述べることは、前述した孔子学院協議会に参加して得た情報と知見をもとにしている。

日本国内では孔子学院設立以前から各大学が独自の中国語教育を行っていた。孔子

学院の設立自体がそのような既存の中国語教育と対立する面がある。そのせいか多くの中国語教育を行っている大学が、孔子学院設立には模様眺めの傍観者の態度をとり、その数が爆発的に増える状況ではない。

既存の中国語教育との対立という面で、いくつか具体的な例をあげれば、例えば中国語資格試験では、日本で中国語検定試験が前から行われており、それとHSKをはじめとする漢弁の行う試験と競合する。また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では以前から日中友好協会が行っている全日本中国語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などいくつかの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があり、漢語橋と競合する。漢語橋は特殊な人材養成を目指しており、一般的ではないという意見も孔子学院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また各大学の孔子学院では独自で編纂したり、あるいは市販されているテキストを使って中国語教育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り、漢弁の編纂したテキストを使う必要もない。このような構造が国家漢弁と各大学との間で孔子学院を舞台としての潜在的な対立の要素としたあり、国家漢弁が自らの方針を強要すると摩擦の原因となる。

そのほか国家漢弁が日本国内の各大学の事情を斟酌しないで、事を行うと摩擦がおこる。例えば最近国家漢弁から中国図書2000冊段ボール箱60箱分が送られてきたが、独自に図書室を持っているところはいいが、そうでないところは置き場所に困っているという苦情が孔子学院の中から出された。また贈られた本が必ずしも必要なものばかりではないという意見も孔子学院側から出された。さらに2009年年末に200人を各孔子学院から中国へ派遣することが国家漢弁から決められ、各孔子学院へ人数の割り当てが決められたが、大学によってはまだ授業中であり、日程を決めるときには事前に孔子学院側の要望も聞いて欲しいという希望が出された。そのほか一部に孔子学院から財政面で大学から持ち出しになっているのもっと財政面で援助して欲しいという意見も出た。

現在、日本国内では中国へ好感を持っている人間が少ないという状況の中で、ある孔子学院から「孔子学院は一般の人から中

国の宣伝機関と見なされている」という意見がされた。ただ現実には前述したように、中国語授業のやり方や中国関連講座の運営をはじめとして、各孔子学院の国家漢弁に対して独立性が保たれていると思うが、前述したような意見のように孔子学院が見なされていることは、中国文化の魅力の伝達者としての孔子学院の役割および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の影響力という点でもマイナスであろう。

国家漢弁は今後も各国の事情に応じたきめ細かい配慮と各孔子学院を完全に支部扱いして自らの方針を強要したりせず、各孔子学院のある程度の独立性を維持する必要性があろう。そうでなければ日本国内で孔子学院が飛躍的に増加することもないばかりか、既存の孔子学院の中でその看板を返上するところも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ただし日本の大学と協力するというやり方を維持しかつ各孔子学院の独立性を保証し、さらに前述した点を注意していけば今後も日本でその数は拡大していくだろう。

おわりに

最後に本稿で述べたことを簡単にまとめておく。中国は1980年代後半期から、留学生に対する中国語教育を国家的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遂行してきた。孔子学院の設立は、それをさらに全世界へ広げたものと位置付けられる。そしてその政策を遂行する国家漢語推广领导小组は、中国政府の関係する部や委員会を結集しており、国家的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の陣容を誇っている。

孔子学院、さらに孔子課堂は2004年に最初に成立して以来急速に拡大し、それだけ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は世界に影響力を拡大した。このように急速に拡大した原因は、世界各地の大学、高校などとの協力方式をとり、それが相互に利益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

日本国内の孔子学院は、中国語教育、文化講座・文化講演会、中国語試験の実施など多様な事業を行っている。ただし日本の大学は以前から中国語教育を行っており、伝統もある。以前からあまり中国語教育が盛んでない国と異なり、孔子学院の事業は

既成の中国語教育と摩擦を生じることも起きる。ただし国家漢弁が今後も現在の協力方式を維持しつつ、日本を含めて各国の事情に応じたきめ細かい配慮と、各孔子学院を完全に支部扱いして自らの方針を強要することをせず、各孔子学院のある程度の独立性を維持していくならば、孔子学院は今後も拡大していくであろう。

本稿を執筆するに当たって、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に行われた第3回孔子学院協議会の際にお会いして筆者の質問に応じてくれた国家漢弁副主任・孔子学院総部副総幹事の胡志平先生、2009年12月に行われた孔子学院世界大会に出席され、その際取得された資料を筆者に借覧を許された愛知大学佐藤元彦学長、またいろいろとお世話になった愛知大学孔子学院荒川清秀院長、さらに貴重な資料や情報を提供された愛知大学車道校舎、豊橋校舎の孔子学院事務室の方々に感謝の意を表す。ただし本稿の文責はこれらの方々ではなく筆者にあるのはいうまでもない。

また本稿は、2009年12月19日から20日にかけて行われた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現代中国の国際的影響力拡大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の文化部会での討論で得られた知見やその後得られた情報を加えてシンポジウム提出の原稿に若干の補訂を加えた。特にこの面では北海道大学大学院メディア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院附属東アジアメディア研究センターの渡邊浩平センター長に感謝したい。

¹ 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教授、国際問題研究所長

² ソフト・パワーについては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邦訳『ソフト・パワー：21世紀国際政治を制する見えざる力』山岡洋一訳 日本経済新聞社 2004年)を参照。なおナイは、ソフト・パワーとは、「強制や報酬ではなく 魅力によって望む結果を得る能力である。ソフト・パワーは国の文化、政治的な理想、

政策の魅力によって生まれる」と述べている(前掲邦訳 10頁)。

また渡邊浩平によれば、中国はナイを招請し、2006年末に放映された中央電視台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番組「大国崛起」の中でソフトパワーの重要性を述べ、ナイは上海で『環球時報』の取材を受け、ソフトパワーとなりうる伝統文化として儒教をあげている。

さらに2007年10月に行われた中国共産党第17回報告の胡錦濤報告の「7、社会主義文化の大発展と大繁栄をうながす」の前文において「全民族の文化創造力を強く刺激し『国家文化軟實力(ソフトパワー)』を高める」必要性を述べ、初めて公式に中国共産党の文書の中に入れられた。(渡邊浩平『変わる中国 変わるメディア』講談社現代新書 2008年 177頁～179頁)

³ 黒田千晴「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中国の対外教育戦略」(『留学生教育』11, 2006年12月)

⁴ 李尚波「孔子学院に関する研究」(『桜美林大学紀要 日中言語文化(孔子学院紀要合編)』第7集, 2009年3月)

⁵ 佐々木浩二「第一回日本国内孔子会議および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東方』312号 2007年)

⁶ http://www.edu.cn/dong_tai_421/20071220/t20071220_271853.shtml, 前掲李尚波論文, 121頁。

⁷ <http://japanese.hanban.org/hbsm.ph>

⁸ <http://japanese.hanban.org/hbsm.php>

⁹ <http://japanese.hanban.org/hanyukaoshi.php>

¹⁰ http://japanese.hanban.org/kzxy_list.php?ithd=xyzc

¹¹ <http://japanese.hanban.org/kzxy.php>

¹² http://japanese.hanban.org/kzxy_list.php?ithd=xyzc

¹³ 「孔子学院奨学金」(孔子学院総部『孔子学院』編集部編『孔子学院』第3期, 2009年7月 78頁)。

14

http://j.people.com.cn/2006/04/07/jp20060407_58822.htm

(「人民網日本語版」 2006年4月7日),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onfuciusInstitute/>

(ロンドンビジネス孔子学院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814.htm ,

http://college.chinese.cn/en/node_3799.htm ,

前掲黒田千晴論文 7 頁.

¹⁵ 平成 21 年度日本孔子学院協議会『日本孔子学院, 学堂, 課堂 2009 年度事業案内』2009 年 10 月



現代中国の儒教運動 — 蔣慶の政治儒学に見る文化主権の諸問題 —

緒形 康¹

I 五四運動と中国の近代性（モダニティー）

1919年の五四運動は現代中国の思想的な起源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ただし、張灝が指摘するように、その起源としての近代性（モダニティー）は、理性主義とロマン主義、懐疑精神と「新宗教」、個人主義と集団意識、民族主義と世界主義など相反する側面がからみあった両義的なものであった²。特に、懐疑精神と「新宗教」という異なる2側面は、1919年以後の中国思想史に複雑な陰影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る。徹底的な懐疑精神は、中国伝統文化を総体的に批判する「全面的西洋化」の主張となって現れたが、他方で「科学」を誤謬なき絶対的な真理であるとする価値観は、そうした「科学」に裏付けられた共産主義や社会主義に対する盲目的な信仰を生み出した。「科学と理性も五四以来の中国知識人の共通認識と共通信念であった。けれども、偶像崇拜と権威崇拜はこれによって減少す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く、それどころか、政治宗教がかえって長期にわたり中国を覆い、さまざまな神を創出する運動がかえって尽きることがなかった³。この神創出運動の頂点が文化大革命であった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懐疑精神による総体的な中国伝統文化批判の矢面に立たされたのは、儒教であった。中国の政治・経済・文化・イデオロギーの支柱であった儒教は、それ自体が総体的な政治思想体系であったから、儒教を代表とする伝統文化に対する批判が、総体的な偶像破壊の色彩を帯びることは必然だった。五四運動の直後に、梁啓超を中心として梁漱溟や杜亜泉が東西文化論争をリードし、東方文化の復権を試みたが、儒教が政治・経済・文化を基礎付ける総体性としての姿を取り戻すことはなかった。

総体性を剥奪され断片と化した儒教の自己主張は、1919年以後、次のような2つの言説の間を絶え間なく振幅してきた。1つは、儒教の世界思想としての普遍性を強調する言説である。論理や認識論のレベルで儒教の思想内容を抽象化した上で、その内実が西洋の思想と同じであると主張する馮友蘭の「抽象継承法」は、この言説の典型であった。2つは、西洋思想との比較を通じて儒教の特殊性を確認し、さらに儒教の西洋思想に対する優位性を主張する言説である。牟宗三の「心性哲学」はこの立場に立って、儒教をドイツ観念論、特にカント哲学との対比で捉えた。理性と感性の衝突を美的な超越論で克服するカントに対して、自然主義的で内在超越の立場を採る儒教を樂觀主義と高く評価する李沢厚も、牟宗三と同じ立場から儒教の西洋思想に対する優位を主張した⁴。

儒教のこうした一種の「形而上学」化に対して、1919年における偶像破壊運動の目撃者であり、「新宗教」による儒教批判の被害者の一人でありながら、1988年の中国文化書院院長就任と共に儒教復興の最大の立役者となった梁漱溟が、ガイ・アリトーのインタビューに答えて、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のは、興味深い⁵。

アリトー 梁先生の、五四運動、「五四」時代に対する評価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すか。

梁 陳独秀、胡適、口語文運動については、今しがた話したばかりです。五四運動が、後世に影響与えたのは当然のことですが、それは新しい潮流、新しい思想、新しい人生を創出し、古い中国の人生に対する見方には拘らず、孔子に対して懐疑と批判を始めました。「孔家店を打

倒せよ」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があったでしょう、これは避けられないことでした。孔子は宗教ではありませんが、歴代の皇帝は彼を宗教のように看做したので、孔廟ができたり、読書人も孔子を崇拝するようになり、本来は宗教の孔子ではなかったのが、彼に孔教の衣を着せたのです。とりわけ、後に「礼教」と呼ばれる名詞が生まれ、「礼教」は礼の遵守をたいへん重視し、尊卑長幼の区別がやかましく、多くのきまりができました。こうしたきまりは統治階級にとって役に立つもので、統治階級は「礼教」を大いに利用し、そうして時間がたってから、五四運動の時期になると、そうした時代があまりにも長かったものですから、統治階級を助ける礼教に対する反発が生まれ、反対や破壊があったのです。こんな訳で孔子を引っ張り出すことになった。けれども、責任は孔子にはなかったことが重要です。広大な社会のために、それは「礼教」というものを必要とし、統治階級はもっとそれを必要とし、それを使って統治の役に立てましたが、時間が経つと、それが停滞し、動か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で、人々は停滞したものに反感を抱いて、五四運動の時期になるや、停滞したこんな「礼教」に反感を持つにいたり、孔子を悪者に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す。

アリトー 「五四」時代には、多くの人が西洋のあらゆるものを盲目的に崇拝して、(梁、そうです、そうです) 全面的な西洋化を試みました。それでは、現在でもこの数年、少しばかり、特に若い世代が、それに似てきていることに対して、あなたは、こうした現象に何か意見がありますか。

梁 これは自然の勢いです。事態が今日ここまで発展してきたのも自然なことです。何も不思議ではなく、誰を責める必要もない。実際、根本的なことは動揺させようがないはずです。

アリトー 根本的なことは動揺させようがない？

梁 実際、根本的なことは動揺させようがないはずです。何ら不都合はなく、

何も恐れることはない。何でもありません。

楽観主義者、梁漱溟の面目躍如たるやり取りだが、東方文化主義者として、全面的西洋化論の最大の論敵の一人であった梁漱溟でさえ、儒教は本来は国家宗教ではなかったと述べ、当時の孔教運動が儒教の歴史の本流からはずれたものであると認識していたことは注目される。五四運動と並行して生まれた20世紀の新儒教の運動は、儒教を政治・経済・文化・イデオロギーを基礎付ける総体的な思想体系とは看做さなかった点で、五四運動の懐疑主義から遠く隔ってはい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21世紀を迎え、儒教を語る言説空間に新しい流れが生じた。

II 儒教の国教化

2002年、康曉光(1963～)は、「“文化民族主義”随想」という長大な論考⁶の中で、新世紀の中国における儒教の国教化を主張し、それは欧米文化を排除するものではなく、欧米とアジアの文化の融合の上に立った文化民族主義の戦略であると主張した。

康曉光は、中国科学院生態環境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員で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教授を兼任する。六四民主化運動の衝撃から政治文化への関心に目覚め、1993年のサミュエル・ハンチントン『文明の衝突』の発刊、94年の『戦略と管理』創刊を機に、民族文化の諸問題に注目し始めた。9・11以後は、アメリカのワシントン研修の中でアメリカ宗教史の研究に従事した。康有為の孔教運動を独自の視点から論じる素地は、このアメリカ体験から生まれた。

康曉光は、民族・文化・国家の三位一体関係は近代性の産物であると言う。21世紀は、この三位一体関係に対して、中華民族が「文化民族主義」を再提出し、儒学をグローバルな現代社会生活に適応した「現代宗教」へと復興し再編する好機である。ハンチントンが述べるように、近代性は多様であって、単一文明の勝利に帰着するものではなく、近代性(モダニティー)は認めても、その西洋的要因とは距離を置く「改

良主義」こそ、中国の文化民族主義の方途である。

そもそも、中国において、政治と宗教、政治と文化は二にして一であり、国家が儒家文化を推進すると同時に儒家文化は国家を支持してきた。国家は教会であり、教会は即国家だった。しかし、五四時期に、政治民族主義が、こうした伝統中国の文化民族主義を圧倒し、爾来、1976年まで中華民族はユダヤ民族にも比すべき精神的ディアスポラの道を辿った。しかし、第三代新儒家が登場し、1970年代には任継愈が儒学宗教説を唱える等、儒学の宗教化を求める呼び声はますます強くなっている。こうした潮流の中でなすべきことは3つある。第1に、儒学教育を正規の学校教育体系に組み入れること。第2に、儒教を国教とし、エリートの指導と全民衆の参加による組織システムを創設して、民間自治を実行すること。第3に、儒教を日常生活に浸透させ、全民衆レベルの宗教とすること。総じて、宗教化された儒学はラディカリズムと保守主義の2つの側面を併せ持つ必要がある。

康暁光の儒教国教化論は、先に見た梁漱溟とは全く違う状況認識から生まれたものである。梁漱溟にとって、儒教の宗教化は、それぞれの時代の政治権力者による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から生じたもので、儒教はそもそも宗教とは無縁な思想体系であった。だから、五四運動における偶像破壊主義は、権力者の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を暴き、儒教本来の精神哲学を取り戻した点で非難されるべき運動ではなかった。しかし、康暁光によれば、儒教とはそもそも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な総体性としてあり、五四運動こそ、欧米の国際関係の主流である政治民族主義の名において、儒教が含意した総体的な文化的民族主義を破壊したのである。

2002年における康暁光のこの儒教国教化論を受け、より踏み込んだ儒教改革構想を提出したのが蒋慶の「政治儒学」論である。

III 政治儒学という言説の登場

2003年の夏、湖南省長沙で「全国児童經典誦読經驗交流会」が開催された。60以上

の都市から500万の家庭の児童が参加したとされる⁷。この読経運動において、『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を自ら編集したのが、蒋慶であった。

蒋慶(1953～)は文革時代、雲南の楚雄で兵役に服した。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に入学、卒業後、同校で勤務した後、1988年から深圳行政学院に職場を移した。2001年、職を辞し、王陽明が心即理を体得した貴州の竜場にて陽明精舎を創設、自ら山長として王道政治の実践に当たっている。

すでに蒋慶の儒教構想は、1995年の『公羊学引論』にそのあらましが述べられている。中国儒学には「心性儒学」と「政治儒学」の2つの系統がある。前者は宋明理学に代表され、後者は『春秋』の一解釈学派である公羊学に代表され、春秋時代に創設、戦国・秦帝国時代を経て、両漢時代に完成した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千年の中国思想史は前者に厚く、後者を軽んじてきた。そのため、政治哲学の資源を西洋の学問に依存する過ちを冒してきたのである⁸。

既に述べたように、「心性儒学」とは牟宗三が集大成した宋明理学(新儒教)の哲学的営みを指しているから、「心性儒学」から「政治儒学」へと回帰せよという蒋慶の主張は、新儒教以前の原始儒教への回帰を意味する。中でも儒教の政治性を最も先鋭に表現した「公羊学」への回帰が、蒋慶の目指したものである。康暁公は康有為への回帰のみを語ったが、蒋慶は康有為の思想的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に共和(民主政治)が存在することをむしろ問題視し、そのような西洋の文化資源に全く依拠しない政治体制を構想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2003年に蒋慶が世に問うた『政治儒学』(生活・読書・新知三聯書店)は、公羊学を近代性へと創造的に転化する試みであった。政治儒学を復興し、中国の政治制度を再建するには、欧米民主主義を乗り越え、儒家の本質を省察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古今、東西を折衷する王道政治を唱導するに際し、蒋慶は王道政治における「3重の合法性」の基礎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した。

① 超越的合法性。儒家は、宇宙秩序

には超越神聖な純粋な価値の源があり、政治秩序もその例外ではないと考える。政治秩序の源が正しくなく、天よりする元（はじまり）に由来せず、超越神聖な合法性を備えていなければ、ここから生じるあらゆる政治活動は、制度との間に齟齬をきたし、いずれも超越神聖な合法性を持たないことになる」。

②「民意の合法性. 政府の施政方針について言えば、民意の合法性とは具体的には仁政を施すという思想に表現される。仁政を施すとは国家の政治権力の統治基礎が暴力の上に建てられるのではなく、つまり、軍隊、警察、監獄等の暴力機構の上に建てられるのではなく、人民の人心の向背と民意の認可の上に建てられることだ」。

③「文化の合法性. 自由主義や民主主義が純粋な西方文化によって中国を治めようとしたことは言うに及ばず、社会主義もプロレタリアート民主によって中国を治めようとし、中国文化を広めることを自己の任務とする新儒家でさえ、民主科学の「新外王」を持ち出そうとする。

（中略）現代中国の政治が直面している最大の問題は、中国政治の「復古更新」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あり、中国のこの百年来の治国理念の岐路を正すことであり、民族の歴史文化伝統、即ち「周公の道」へと再回帰して、中国政治秩序と政治権力の合法性（歴史文化の合法性）を確立することである」。

康暁光のように儒教の国教化という急進的な主張を行わない蔣慶だが、「歴史文化の合法性」を追求してゆけば、プロレタリアート民主を否定することになるは自然の勢いであった。では、こうした「3重の合法性」に対応した、政治権力の新しい分権システムと相互チェックの在り方とは何か。それは、儒教議会3院制（「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である。蔣慶によれば、「庶民院」は人心の合法性を代表し、「国体院」は文化の合法性を代表し、「通儒院」は超越的合法性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ある。

「通儒院」は推薦と代表派遣により生まれ、「庶民院」は普通選挙と職能団体選挙により生まれ、「国体院」は儒教公認推薦の大儒が担当し、終身任命制で、自らは赴かず、代表を派遣して院事を主催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議員のリクルートには2つの道があり、1つは社会から公認推薦された儒家の民間賢人であり、2つは、国家が儒学院を通じて専門的に『四書』『五経』等の儒家經典に精通した儒士を養成し、政治実習と試験によって、国家・省・市・県級の議会に派遣して議員を務めさせるものだ。その議員創出の規則制度は、わが国古代の「推挙制」と「科举制」に基づく。「庶民院」の議長議員は、欧米民主政治議会で作成された規則手続きに応じて作られる。「国体院」議長は孔府衍聖公の世襲で、議員は衍聖公が指名したわが国歴代の聖賢の子孫、歴代君主の子孫、歴史文化著名人の子孫、社会の賢人及び道教界、仏教界、回教界、ラマ教界、キリスト教界の人士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る⁹。

そして、「3院のいずれの院も実質的な権力を有し、法案は3院を同時に通過して初めて施行され、最高行政長官は3院の共同の合意によって初めて任命される」とあるように、儒教議会3院は完全に対等な政治権力を行使する機関として構想された。

では、こうした「3重の合法性」に基づく議会「王道政治」はどのように運営されるのか。蔣慶は、儒教議会3院制を基点に、儒教大学や儒学院における教育、儒教協会や儒教基金会による物権・遺産・文芸作品の管理、儒教的慈善組織を通じた環境保護や終末医療を提言する。蔣慶の「政治儒学」の復興は、中国儒教協会という民間団体を通じた、以下のような社会全体にわたる儒教復興へと発展するものであった。実は、2003年の『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編集の仕事は、彼の構想の4)のプランを実践に移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1) 儒教の政治形態（仁政、王道政治と大同理想）

- 2) 儒教の社会形態(礼楽教化, 郷村自治, 社区文化を中心とした中国道德振興運動)
- 3) 儒教の生命形態(上帝信仰, 鬼神信仰, 良知信仰)
- 4) 儒教の教育形態(全民読経運動, 書院講学)
- 5) 儒教の慈善形態(貧民救済, 災害救助, 孤児院, 臨床心理, 終末治療など)
- 6) 儒教の財産形態(文廟, 孔廟, 祀廟, 城隍廟の建設, 「中国儒教復興基金会」による援助, 「儒教遺産使用税」の徴収)
- 7) 儒教の教義形態(中国儒教大学, 地方各級の儒教学院の創設)
- 8) 儒教の伝播形態(儒教出版社, 儒教報刊雑誌, 儒教ネットワーク論壇, 儒教TV, 海外伝教センター)
- 9) 儒教の集会形態(全国各級の「講経堂」を儒教の宗教的公共活動の場とする)
- 10) 儒教の組織形態(「中国儒教協会」が省市県各級儒教協会を統括・管理・指導)¹⁰

IV 政治儒学と自由主義

蔣慶による読経の実践や經典テキストの編纂は、2003年に「蔣慶読経運動」と称され、その当否をめぐって学界と社会に大論争を惹起した。人々を驚かせたのは、自由主義に属する秋風、劉海波、王怡などが蔣慶の行動に賛意を表したことであった。2004年7月8日、薛涌は『南方周末』に「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を発表し、蔣慶の行動を「蒙昧な文化保守主義」と非難した。7月22日、『南方周末』は、薛涌、蔣慶、秋風、朱国華、劉海波の関連文章を掲載し、「児童読経運動」の特集を組んだ。この中で、秋風と劉海波が蔣慶に対する支持を表明したのである。2004年10月24日、『原道』同人とのインタビューで、蔣慶自身が、これら「中道自由主義者」の賛同に率直な驚きを示しつつ、その理由を次のように推測している。

彼らの受け入れるのはハイエクの自由主義理論で、伝統価値をたいへん重視するから、彼らも中国の自由主義者である

以上、西方の伝統を捜し求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だろう。ハイエク学説の角度から出発すれば、儒家の伝統を重視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る。しかし、この変化はきわめて大きく、私は彼らが誠実であり、自由主義のために土着の資源を捜し求めているのだと思う¹¹。

こう述べた上で蔣慶は、中国土着の自由主義を、徐復観のように「儒家自由主義」と命名することは適切ではなく、「自由主義儒家」と命名すべきだと述べる。なぜなら、「五四運動以来、近代の儒教運動は、自由主義儒家、保守主義儒家、カント主義儒家、ヘーゲル主義儒家などの幾つかの類型へと発展したからであり、儒家自由主義と呼んでは、儒家思想が西洋文化における自由主義の一類型に矮小化されるからである」(同上)。

蔣慶が固執するのは、中国の文化価値そのものの宣揚であり、この観点からすれば、1935年の中国文化本位宣言も、季羨林や王蒙らによる2004年の「甲申文化宣言」も、中国の文化価値をその内在的な側面から十分には説明していないのである。蔣慶は中国の文化価値を「文化保守主義」と呼ぶが、それは、中国の多くの文化保守主義のように、政治上は自由主義を奉じながら、文化面においてのみ保守主義を主張するのではなく、文化と政治の両面における真正の保守主義を指すものであった。ラディカリズムと保守主義の結合という、康暁光の考えを蔣慶は採らなかった。

「文化保守主義」の価値の分裂は、蔣慶によれば、香港と台湾の新儒家に顕著であり、その分裂の無残な姿は、台湾の民進党政権の文化政策にのみみじくも表現されている。「私は主に「港台新儒家」による「外王」問題の解決、つまり、政治の面で西方文化を中国文化の発展方向であるとしたことに不満だ。けれども、こうした解決は逆説的なもので、最も中国の儒家文化に反対してきた民進党が、「港台新儒家」の追求した「外王」問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だ。現在、台湾の民主には多くの弊害が出ており、全民を挙げて台湾を中国から離脱させよう

としている。これは「港台新儒家」が民主を追求した当初は予想もしなかったことだろう。

こうして蔣慶は、茅宗三の「心性儒学」を斥け、現代中国の政治社会組織形態に「合法性」を付与するような「政治儒学」の復興を目指すのである。しかし、蔣慶の「政治儒学」は儒教の国教化、儒服の採用、儒教の国家イデオロギー化を唱え、康有為の孔教運動を現代に再現することを企図する康暁光のような、エキセントリックな儒教の政治化を目指している訳ではない。台湾の民進党に対する批判も、政治的な動機や戦略を持った上で発言されたものではない。秋風や劉海波が共鳴するのは、ハイエクが古典的自由主義の倫理規範とした中道的な自由主義を、蔣慶の「政治儒学」が提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ある。自由な公共空間に必須の倫理規範を伝統的な文化資源から吸収しようという志向は、中道自由主義者だけの試みではなかった。夏勇は儒教の民本主義から新しい民権思想を構想し、武樹臣は中国司法の伝統から普遍的な判例法を発見しようとし、杜鋼建は儒家憲政主義を、蕭澣は科举憲政主義を提出し、楊鵬は老子思想から消極的自由という古典的自由主義を取り出すのである。

中でも杜鋼建（1956～）は、公式に蔣慶の主張に賛意を表する一人である。彼はごく最近、勤務先である汕頭大学法学院院長を退任したばかりであるが、中国共産党第16回全国代表大会の「政治報告」の起草者の一人としても知られる。儒教憲政主義を唱え、①仁憲観、②義憲観、③礼憲観、④智憲観、⑤信憲観の5つの憲理憲制による政治を唱えるユニークな主張の持ち主である。杜鋼建は、政治体制改革において自由人権を保障する憲法体制を樹立するには儒家の新仁学が必須であると考え論者であり、自らの新仁学の考えと蔣慶の「政治儒学」が、いずれも現代中国の政治体制改革にとって不可欠の方途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る。¹²

あの經典誦読運動の渦中、多くの知識人は蔣慶を文化保守主義と非難し、そのアナクロニズムを嘲笑した。しかし蔣慶の「政

治儒学」は、この百年に及ぶ儒教運動の歴史において、ほとんど初めて西洋の文化資源に全く依拠せずに自由主義に通ずる儒教思想の復興を目指すものであった。

V 蔣慶の主張はポピュリズムか？

蔣慶と康暁光の儒教論は、いずれも五四運動以来の「形而上学」化した儒教に総体的性を復活させる試みとして共通している。また、公羊学という、儒教の諸類型の中で最も政治実践的な言説に基づく点でも共通する。しかし、康暁光は欧米の政治思想を完全に拒絶せずに、近代性の枠組みと「文化民族主義」を接合させようとするのに対して、蔣慶の近代性拒否の姿勢ははるかに徹底している。

呉稼祥（1955～）は、こうした蔣慶の近代性拒否の姿勢を「右翼ポピュリズム」と呼び、「左翼ポピュリズム」と合わせて激しく非難するのである。

中国の新ポピュリズムの左翼は自由に反対するが、代議制民主主義も要らないと考え、右翼は民主主義に反対するが、平等な自由も要らないと考える。不幸なことに、この2つのポピュリズムは相互に矛盾することはあり得ず、ますます双方を強大化しており、一方の存在は他方の存在の理由となり、一方が極端に向かうのは、他方が極端に向かうことの促進剤となっている。

けれども、左翼と右翼のポピュリズムはそれぞれが抱える問題に答えようがない。右翼にとっての問題とはこうだ。過去数千年の歴史に「天下を公となす」ようなものが何もないなら、貴兄はどうやって「天下を公となす」のか。左翼にとっての問題とはこうだ。毛沢東のような偉大な人物が大民主や公有制をうまくやれなかったのに、貴兄はどうやってそれを行うのか。貴兄たちと一緒に過去に遡っても、元の木阿弥にならないことを、どうやって保障するのか。¹³

蔣慶の「政治儒学」は、ここでは、新左派の文化大革命再評価や改革開放への異議

申し立てと大差のない考え方であると捉えられている。だが、すでに見たように、中道自由主義者は、蔣慶をかえって自らの陣営の人物と考え、次のように康暁光との差異を論じているのである。秋風は述べている。

康暁光は康有為と一脈通じるところがある。康暁光の主要な理論枠組はハンチントンの『文明の衝突』である。康暁光はこう断言する。これは全面的な競争の時代であり、一国の文化競争力はその経済・政治・軍事力に基づくのである。強大な文化は経済・政治・軍事方面における国家のグローバルな競争力を高めるのに有効である。民族の復興を実現するには、どうあっても儒学を復興せねばならない。だが、たんなる学説の復興では全く不十分で、大多数の華人の日常生活に深く入り込んだ宗教となって始めて、儒学は真正の復興を遂げられるのだ。したがって、民族文化を復興させる根本は儒教の復興である。以上は厳密な論理展開である。だが、このような論理にあって、儒教はかえって道具化されよう。元来、宗教的な関心とは人心の最も奥深くにあり、人そのものが目的であれば、宗教は人の価値にあってそれ自体で自足したものであり、他の目的に支持される必要がない。¹⁴

ここから読み取れるのは、中道主義者が「政治儒学」を支持する場面が、日常生活における公共空間の文化規範に限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だろう。

確かに 2003 年に経典誦読運動を組織した蔣慶の「政治儒学」論は、こうした日常生活における公共空間の形成をも目指していた。思い返せば、儒教が特殊か普遍かという五四運動以来の論争は、儒教の体現してきた総体性の喪失への危機、すなわち儒教の合法性の危機に対応していた。蔣慶が、儒教が優れて歴史的な政治構成体であり、政治儒学が公羊学の成立と共に形成されたと述べる時、蔣慶は儒教の特殊性に対して、これまでの儒教普遍論者が抱いたよう

な後ろめたさを持たない。「政治儒学」というテーゼによって近代性を拒絶することで、現代中国の儒教運動は「文化民族主義」を通り越して、「文化主権」の主張を代弁する運動へと変化したと言えるであろう。この運動は、儒教が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特殊中国的であることを前提とした上で、儒教を民族主義(ナショナルリズム)の文脈に置き、民族の主権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文化的に保障するものと看做す。儒教に基づく「文化主権」は、近代国民国家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抗できる唯一の土着的な文化資源なのである。呉稼祥は、こうした土着的な文化資源は喪失されたと考える点で、いまだ五四運動以来の懐疑主義の世界の中にいる。

蔣慶の主張にはもちろん課題も多い。特に、その儒教議会 3 院制の中でも、3 院議員の選出方法や、3 院の合意形成のあり方については、その感が深い。しかし、五四運動以来の「心性儒学」に対して、「政治儒学」という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再発見し、それに基づく政治体制改革を構想することを通じて、蔣慶が、現代中国における伝統と近代性という問題に新しい視点を提供したことは、紛れもない事実である。

¹ 神戸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

²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251～79 頁。

³ 同上、277 頁。

⁴ 鄭家棟「『中国哲学』の「合法性」について」『中国—文化と社会』第 19 号、2004 年、323～334 頁。李沢厚『実用理性と樂觀文化』生活・読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55～67 頁。

⁵ (美) 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這個世界会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東方出版中心、2006 年、288～89 頁。

⁶ 康暁光「“文化民族主義”随想」2004-6-27“Confucius200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whmzzysx.htm> (2009 年 11 月 15 日)

⁷ 秋風「保守主義浮出水面」2004-08-10 『博客中国網』

<http://www.blogchina.com/2004081040110.html> (2009年8月13日)

⁸ 蔣慶「復興儒學的兩大傳統——“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的重建」2008-11-10“Confucius200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801> (2009年9月23日)

⁹ 趙妙法「蔣慶政治儒學批判」2009-6-29“Confucius200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46> (2009年9月22日)

¹⁰ 蔣慶「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中國儒教研究通訊』第1期、2005年。

¹¹ 蔣慶「讀經、儒教與中國文化的復興——『原道』同人 2004 北京蔣慶先生訪談錄」2004-11-16“Confucius200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408> (2009年8月14日)

¹² 杜鋼建「儒家仁學憲政主義之我見」唐晉主編『大國策：國學熱與文化傳承』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107～112頁。

¹³ 吳稼祥「民粹主義只會把社會拉向倒退」『改革內參（評論版）』2008年第15期、4頁。

¹⁴ 秋風「儒教浮出水面之後」2005-07-11『博客中國網』

<http://www.blogchina.com/2005071179725.html> (2009年8月13日)



中国における差異の政治と民主主義 ——新疆「民族問題」の経験が示唆するもの——

小嶋 祐輔¹

I 差異の政治と敵対矛盾なき中国

中国に限らず、現代社会においては文化や政治のあらゆる領域において、さまざまな非同一性が交錯している。そしてそこには、非常に分かり易くはあるが、根深い対立がある。例えば、日本国内を見ても、増え続ける外国人やアイヌのような地域の先住民とのエスニックな差異をめぐる対立や偏見を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また、より普遍的な問題としての女性蔑視、異性愛主義の席卷、さらに近年取り上げられる機会の多い社会階層間の対立も、やはり対立する集団間の非同一性に端を発している。

I.M.ヤングは、「差異の政治」という概念が以降ひろく議論される契機ともなった著作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において、近代政治哲学は、「政治的な諸主体を統一的なものへと還元し、種差性や差異よりも共通性や同一性を評価する傾向」(Young 1990: 3) をもっていたと述べている。こうした傾向のなか、わたしたちが信奉してきたデモクラシーという概念、政治体制もまた平等で、統一的な主体＝市民たちの諸権利獲得運動と、それに対する統一的中央政府による利益分配の関数として捉えられてきた側面がある。このような関係においては、劣勢で、周縁的な集団に対する支配や抑圧が不可視化される。換言すれば、そこでは優勢で、中心的な集団、特にそのエリートたちの寡頭制支配が暗黙の了解となってきた。

この点は、本シンポジウムが議論の対象とする中国も決して例外ではない。もちろん、中国の「市民」をめぐる議論において、その定義の西欧資本主義諸国との相違が強調されるのは当然である。例えば、中国には国家／社会の二元モデルで捉えるような市民社会、公共領域は存在しない（梁

1998: 79）、中国では社会階層として市民が歴史的に十分に形成されて来ず、公民という概念も存在して来なかった（甘 1998: 25）という主張もある。また、西欧の市民社会を「後ろ向きに私的領域を保護し、国家権力の介入を避けようとする」ものと呼ぶような批判も存在する（王紹光 2007: 408）。

しかし仮に中国における市民や公民といった概念の存在を否定できたとしても、「人民内部の矛盾」テーゼが示しているように、中国内部の社会集団間の差異もまた、あくまで副次的で非決定的なもの、非敵対的なものとして取り扱われてきたと言える。すなわちここにもまた、政治的諸主体の統一性への礼賛が見て取れる。またこれには、1981年の11期6中全会での「歴史決議」において、継続革命論が公式に否定されて以降定式化された、中国社会にはすでに敵対的矛盾がないという言説も強く影響している。

例えば、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のウルムチで2009年7月5日に起こった大規模な「騒乱」は、中国政府がこれまで行ってきた、国内の敵対的矛盾は既に存在しないという前提にたった「差異の政治」に重大な誤認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騒乱」の直接の原因は、広東省韶関市において漢族とウイグル族の間に起こった暴力事件——漢族が突如集団でウイグル族を襲撃したとも、その発端はウイグル族が漢族女性への暴行をはたらいたから或いはその逆だとも言われている——であった²。この暴力事件後に出された「世界ウイグル会議」の抗議声明、インターネットを介して世界各地へと広がる反中国・反中国共産党デモ、新疆他地域への「騒乱」の飛び火、繰り返される暴力および現地の人々による

「証言」の映像、ウルムチ在住漢族による対抗デモの組織といった出来事も手伝って、事件はウルムチ或いは韶関という直接の衝突が発生した場を超えて、漢—ウイグルの間の「民族」境界に沿った根源的な対立の領域へとシフトしていった。すなわち今や漢—ウイグルの対立は、インターネット、TV、新聞、雑誌、様々なメディアを通じて、当事者と第三者によって共有されるものとして、情報によって調停された社会関係として表象されている。それは、「純粋な客観性を装ったフェティッシュな外観は、そこに含まれた人間どうしの間の、また階級間の関係を隠蔽する」(Debord 1992=1993: 25)とギー・ドゥボールが述べるような、一種の「スペクタクル」として「実在」すること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そしてそれは明らかに、ウイグル族或いは漢族に対する敵としてのイメージをもう一方の側に付与するものとも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7.5」のような出来事が起こったからといって、例えばウイグルの独立こそが民族問題を解決する唯一の道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民族国家幻想」に依拠した主張は誤りであろうし、恣意的な人権批判や共産党批判によって本質的な「悪者」を暴き出したという満足感に浸ればそれでよい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だろう。ここで問題にしたいのは、いまや漢とウイグルの対立が、他者を理解不能な、恐ろしい、憎むべき敵にしたあげようとするような関係にあることをまず指摘したい。そのうえで、こうした対立を内側にはらんだ中国社会が今後如何にそれと向き合っていくべきなのか、そして新疆での所謂「民族問題」の経験が、現代世界共通のアポリアであるエスニック集団間の対立に関して、如何なるものを示唆しているのかについて初歩的な考察を行いたい。

II 中国社会は多元的なものとなり得るか？

とはいえ、これまで中国国内でも、「平等で、統一的な中国」というテーゼが、決して差異の政治を排除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については様々な主張がなされてきた。文

化大革命後の所謂「北京の春」における民主化モードとそれへの反動のなか、「民族問題」の領域においては、民族問題の階級問題化が否定されたことにより、確かに同化主義的傾向の実質的な後退が見られた(加々美 1992)。こうした状況のなか登場したのが費孝通による「中華民族多元一体構造論」(費 1999)であり、そこでは階級に代わり「差異ある集団」間の平等と統一を担保する主体概念として中華民族の復興が企図されている。ここにおいては、「文化相対主義な、差異を固有化し拡大する」ものではなく、「異なる文化が共通価値と相互影響の下に発展する」ような集団間の関係(郝 2007: 5)が、「多元主義」として捉えられている。しかし「民族文化の多元性と政治、国土の一体を表象する中華民族」(納日碧力戟 2000: 222-223)自体は与件として設定されているため、この与件の「外側」として捉えられる支配／被支配、抑圧／被抑圧の関係は、やはり不可視化されてしまう。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国憲法および民族区域自治法それぞれの序言には、ややニュアンスは異なるものの「統一された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人民の平等・団結・共同」が謳われている。しかし、相次ぐ民族問題は、中国政治の諸主体が決して平等でも、統一されてもいないこと、そしてこれが常に係争中の政治的課題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かつて金観涛は、中国の大伝統が専制体制の存続を可能にする「超安定社会システム」となっており、これによって中国の民主化が阻害されていることを主張した(金・劉 1983=1987)が、まさにこれと同様に、中国エスニック集団間の差異の政治も大伝統のもつ専制性への批判から開始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現在の中華民族の多元構造は、それが中華文明による周縁の絶えざる教化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たことが自明視されてしまうため、こうした「本質的で起源的な「多元性」」(小嶋 2008: 134)を受け入れない諸主体としての「少数民族」の可能性は存在しない。「多民族国家の現状を過去に投影して解釈

するという遠近法的逆立」(村田 1994:45)という村田雄二郎の批判は、「7.5」以降中国の民族関係が深刻な危機に瀕している現在にこそ、真剣に検討される価値があるだろう。

ヤングはこうした「逆立」を「文化帝国主義的な集団が自らの価値観、経験、見方を規範的で普遍的なものとしようとする」(Young 1990: 123)行為と呼ぶ。そこでは、差異ある他者は、有徴化 (marked) され、支配的な規範から逸脱した存在、「人間」と等置される無徴項と対照を成すものとして取り扱われる (Laclau 1990: 33, Young 1990: 123)。こうした有徴化は、ヤングが言うように「嫌悪」の経験と深く結びついている (Young 1990: 123)。「ウイグル族は野蛮だ」、「新疆は危険なところだ」、「ウイグル族は泥棒が多い」等々中国国内でしばしば耳にするこうした言及は、普遍的な中国の公民から有徴化される何か欠落した諸主体を現出させる。より厳密に言うのならば、「少数民族」としての名指しが、それを固定的なカテゴリ (制度化されている民族籍) として確立させる時、すでにこうした有徴化は行われている。かつての教化は、現代では漢語の十分な習得、世俗的な生活・思考の体現によって成立したとみなされる。この通過儀礼を経ていないもの、或いは十分に終えたと見なされないものは、教育・保護・支援或いは排除のいずれかの対象となる。

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で 1992 年から開始された「漢語による「単言語」(モノリンガル)教育」(清水 2004: 71)である双語教育、第十一次五カ年計画における自治区への経済支援、分裂主義者・恐怖分子・汎トルコ／汎イスラーム主義者に対する非難は、「少数民族」を普遍的なるものへとつくり変え、「平等で、統一された中国」を成立させようという試みと言えらるだろう。

現在の中国における多元社会の解釈においては、差異の承認は、それが普遍的で体系化された文化のヒエラルヒーに回収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前提とされている。そのために、これまでの少数民族に対する様々な優遇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分裂主義者や双汎

主義と名指しされるような国家への挑戦が生まれるのかという、この不可解な現象の背景にある国内の構造的な問題を改善・対処が必要なものとして受け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ず、対立が暴力的なものとして噴出する事態となっている。「7.5」発生の構造的な原因として最も軽視されているのは、ウイグルの諸権利要求のなかに正当なものとして政治的承認を得られない部分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³。

元来「複雑で多元的な社会においては、あらゆる集団には、それを横断する集団的差異があり、それは知と刺激、抗争と抑圧の潜在的源泉になっている」(Young 1990: 172)はずである。普遍的で、その他一切の価値の上位の審級となるような価値が永続することを認めず、各々の歴史と社会空間に文脈化された価値の体系を、より理想的な多元社会実現に向けた批判のための依拠としてもちこむことによって、差異の政治が真に有効なものとして機能する多元社会を成立させるであろう。

確かに、これまでも少数民族の政治参加を推進することが多民族社会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と主張する見解が存在している。かつて「民族共治」という概念を提起した朱倫 (2002)によれば、少数民族の諸権利要求が自治区内にとどまることによって、むしろ要求の排他的民族主義化を招いていること、経済支援への依存・従属傾向が強くなり、自集団の利益に直結しない次元の政治参加に消極的と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とが問題視されている。朱倫の主張に基づけば、「自集団の個別利益と民族間の共通利益の対立と統一」(朱倫 2002)が中国的多元社会の差異の政治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しかし、すでに見てきたように集団の「個別利益」は、共通利益に抵触しない限りで認められるという前提が存在する以上、多様な集団の多元的政治参加はやはり限定的なものとなるだろう。個別利益と共通利益の対立の次元は、「諸民族の固有の生活生産、文化・風俗・言語の異質性を保有することを前提にして、初めて成立する」(加々美 2004: 54)ものである。この異質性の保有に、何らかの留保がつくのであれば、それはもは

や真に対抗的な個別利益とは呼べないであろう。

Ⅲ 少数民族による対抗的な個別利益の表明——新疆での「双百」を例に

そもそもデモクラシーは、「権力の階層制への嫌疑と社会的弱者への連帯の視座こそ、民主主義の世界像の背景にある基本的な価値観である」（千葉 1995：36）という言葉にあらわれるような、より下層からの政治参加を可能とする理念および制度を指している。そのため古代ギリシア以降、社会の上層に位置するエリートたちが、一貫してデモクラシーを脅威と見なしてきたことは、これまでも多くの論者によって指摘されている（王紹光 2007：47）。

ここでデモクラシーの歴史について論じる余裕はないが、しかし既存の権力に抗しようとする被搾取者による連帯、或いは特にネーションの想像が可能となった近代以降においては、クリフォード・ギアーツが「原初的な愛着」と呼ぶような紐帯を介した連帯——ナショナリズム、エスニシティ主義——が、つねに権力エリートたちへの脅威を構成してきたことには留意したい。

こうした脅威は、つねに「小文字のデモクラシー」且つ「未完のプロジェクト」（千葉 1996：7）、恒久の「ヘゲモニー的諸実践」

（Laclau&Mouffe 2000=1985: 93）として「根源的な民主主義」（radical democracy）打ち立てようと企図してきた。しかし、こうした社会的弱者の個別利益の表明が、「不穏な体制転覆的な原理」（千葉 1995：21）として排斥の対象ともなってきたこともまた事実である。

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のエスニシティ主義への中国共産党（以下中共）の対応は、定期的な変動を繰り返してきた。時には、寛容と承認へ傾き、また時にはその反動として排除と否定を示してきた。これは無論、新疆地域限ったことではなく、中共の対少数民族政策自体がこのような変動を繰り返してきたことのあることでもある。

1949年8月、毛沢東は三区革命の中心的指導者であったウイグル人、アホメトジャン・カスィミ宛の書簡を送り、第一期全国

人民政治協商会議への参加を要請、アホメトジャンを中心とする三区革命の主な指導者たちはこれに応え、ソ連経由で空路北京へと向かった。しかし、三区指導者たちの乗った飛行機はソ連領空で遭難、ウイグル族の「民族エリート」の死は、彼らを中心に組織されるであろうはずであった、エスニシティ主義に基づくヘゲモニーの生成機会をも葬り去った。

上述の毛の書簡においては、三区革命は「我々中国全体の人民民主革命の一部である」と評価され、アホメトジャンらは「国内各少数民族」の代表として見なされている。無論、アホメトジャンらが新中国において党中央への異議申し立てを可能にし、ウイグル、或いはムスリムといっ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依拠したヘゲモニーを構築し得た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ない。しかし結局、アホメトジャンらの後任に就いたブルハン・シャヒドやサイピディン・エズィズらは、一貫して中央による政策決定の「仲介者」としての役割しか果たしてこなかった。

その結果、50年代前半には、新疆各地でウイグル族らをはじめとするトルコ系ムスリムの武装蜂起が各地で起こったことが確認されている。これら背景には、宗教的動機や、漢族の入植によって起こった農村における水利権争いといった経済的動機などさまざまなものがあつたが、ブルハンやサイピディンらは、こうした各々の動機を「地方民族主義分子」および「反革命分子」というラベリングのもと隠蔽し、彼らに対する批判・摘発を推進していった。そこには、「民族主義と社会主義の間の闘争は、実質上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という二つの道の闘争である」（賽福鼎 1958: 19）と見なすような解釈、すなわち「民族問題」の原因を少数民族内部の一部の搾取階級の反動性で見なし、相次ぐ武装蜂起への対処を「善と悪の対決」として誤認していく図式があり、それはその後の反右派闘争期にも繰り返しあらわれることになる。

確かに、新疆という「少数民族地区」における土地改革が進められていたこの時期には、いわゆる集団化過程での大漢族主義的傾向に対する批判もあらわれ、特に牧畜

業地域での改革の穏健化が考慮されるなど、政策上は一定の譲歩が示されていた。しかし、問題なのは共産党政権の大部分を占める漢族幹部・党員たちのショービニズムそれ自体ではなく、それに対抗可能なウイグル族らトルコ系ムスリムのヘゲモニーが一切排除されていたことであろう。

1953年に「過渡期の総路線」が毛沢東により提起され、新疆においても社会主義化の推進は急務であった。この運動の主体を全人民という普遍的単位から、各民族の単位へと多元化するような企図は、まさに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が「決定的事態において決定する単位」(Schmitt 1932=1970: 44)と呼ぶ国家の存在意義を揺るがすものと見なされたのであろう。ここにおいても、少数民族のヘゲモニーは「不穏な体制転覆的な原理」として排斥されていた。そして、ウイグル族らの武装蜂起もまた止む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なか、56年に毛沢東によって提起され、新疆では翌年から本格化した「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以下「双百」)の過程においては、少数民族による異議申し立てのための政治的回路制度化の兆しが見られた。「双百」は、元来共産党党外の民主派知識人による党批判の許容や一定の言論・思想の自由化を意図したものであり、一定の党派的「文闘」を国内政治に呼び込む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し新疆においては、保守派と改革派の間の文闘ならぬ、多数派民族と少数派民族の間の文闘を形成しつつあった。

1957年5月末から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党委員会によって主催された「党外民主人士座談会」は、約半月にわたって学术界、芸術界、工商界の各民族知識人による党批判を通じ、党内の反共産主義・反社会主義的傾向の「整風」に貢献したという(『新疆日報』1957.6.16)。

また、この間党内のトルコ系ムスリム幹部たちからは、新疆の分離・独立、「新疆」という名称の「ウイグルスタン」などへの変更、党組織の「民族化」、漢族入植の停止、社会主義化の延期といった様々な要求が提出されたという(加々美 1992: 155)。但し、こうした直接的な不満・要求が噴出したケ

ースについては、事後的に構成された曲解としての側面もあると判断しておいたほうが良いだろう。というのも、新疆での「双百」がまさに最高潮に達していた6月8日には、中共中央が既に反右派闘争の開始を宣言しており、同月末には新疆においても「右派分子の反動的謬論」(『新疆日報』1957.6.28)が攻撃対象となったからである。このため、「双百」という状況下になされた党批判は、間髪おかずして反右派の文脈下での解釈にさらされたのである。

その後の反右派闘争期間中に少数民族幹部に向けられた批判の主な根拠となったのは、彼らが「地方民族主義」を鼓吹し、中国の分裂を画策してい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賽福鼎 1958)。例えば新疆少数民族社会歴史調査グループの副長として56年から約一年間ホータン地区の調査にあたったウイグル・サイラニ(Uyghur Sayrani)は、その調査成果に基づく編著『1933年のホータン・イスラム起義』を理由に「地方民族主義者」として批判の対象となった。また、イリ・カザフ自治州では現地への計画的漢族の入植(新疆生産建設兵団)への批判を理由に、カザフ族の幹部たちが批判され(『新疆日報』1958.10.17)、自治州副州長のアブドリヒム・エイサはその過程で自ら命を絶ったという(Sherip-niyaz 2002: 342)。これらの地方民族主義批判には、明らかに国内政治、党内政治における対抗的ヘゲモニーの存在を認めず、「対抗者」たちを体制外の「敵」へと仕立てあげ、抹消を図るような意識が作用していた。

だが、実際この時期にあらわれかけた「文闘」からは、ウイグル族の文化的、非物質的な個別利益の表明を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をよく示す例としては、上記のサイラニに対する批判が挙げられるだろう。当時の『民族研究』誌上に掲載された論文(定 1958)に基づきサイラニの主張と、それに対する批判を概括してみれば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まず、サイラニの主張を整理すれば、①ウイグル族をすべからく後れたものと見なすような中央の視点、ウイグル族社会においても特に後進的な地域ばかりを歴史社会

調査の対象地とすることに反対する。②清末の左宗棠の出兵以前、新疆は独立した国家であり、その後初めて中国の版図に入った。③ホータン起義の指導者は、抑圧された人民を組織し、ムスリム大衆からの信頼も厚かった。④起義の過程でウイグル族による漢族の殺戮が起こったのは、抑えることのできない深い恨みがあったためである。

つぎにサイラニの各主張に対応する批判をそれぞれ見てみると、①少数民族社会の後れた側面を認めず、封建統治階級とその統治制度を美化している。②地方民族主義者の分裂主義に歴史的根拠を与えようという試み。③イギリス帝国主義に煽動されたホータンの暴動を「起義」呼ばわりし、ウイグル族のなかの帝国主義の間諜、大トルコ主義者を擁護している。④一部の統治階級の殺戮行為を全ウイグル人民の恨みにすりかえ、民族間の敵対心を煽ることによって、漢人を新疆から追い出そうとする反動的論調に呼応している。

これらの批判は1958年5月に北京で開かれた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討論会での公式批判に依拠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しかし、上記のサイラニの主張を見る限り、そこに直接的な分離・独立の要求などは見られないように思える。サイラニはむしろ、中国国内の対立関係から目を背けることなく、漢—ウイグル間の怨嗟の存在を提示して見せた。そしてこの怨嗟の存在が漢およびウイグル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フィケーションの一部を構成していること、その拠り所としての歴史解釈を提示して見せた。そして先進的漢族による後進的ウイグル族の支援という構図を脱却し、対等な「対抗者」としてウイグルが承認されるべきことを提唱しているようにも思える。しかし、サイラニに対する批判は取り消されることなく、文化大革命中にも引き継がれ、党籍剥奪、投獄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Abdurahman 2006: 109-110) ⁴。

IV 客体化される少数民族——攻撃・排除・管理されるもの

「双百」の後、反右派闘争から文化大革命へといたる過程においては、こうした「対

抗者」の存在を曲解によって抹消しようとするような地方民族主義批判が猖獗を極めた。国内政治、或いは党内での承認を求めて声をあげた「対抗者」たちは、許されざる「敵」として排斥され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こうした定式は文革中にも継続して適用され、新疆における文革においてウイグル族ら少数民族を待っていたのは徹底した排除或いは客体化であった。

そもそも文革期には、いわゆる「継続革命論」テーゼに基づいて、「民族問題は実質的に階級問題である」(劉春 1964: 16)とされ、プロレタリア新文化に対置される反動的旧文化が打倒の対象となっていた。階級のもつ普遍性のもとで、各民族の差異、個別性は否定され、新疆においても当初は紅衛兵による少数民族文化の破壊、特にイスラームに対する弾圧が見られるなど、いわゆる「四旧打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風俗・旧習慣の打破)が展開された。しかし、66年9月、紅衛兵が当時の自治区主席サイピディンと自治区党委員会第一書記の王恩茂に対する奪権闘争を要求した際、中央はウイグル、漢をはじめとする民族の団結を第一とすることを説いてこれを退け、サイピディンの保護を決定したといい (何 2005: 216)、また年末には王恩茂が北京入りし、少数民族の文革への取り込みが国防にもたらす危険性を訴えるなど、少数民族の文革からの隔離が図られた。こうした隔離や保護という方針は、文革期の奪権闘争に関与できるような少数民族幹部・知識人がすでに反右派闘争の過程で批判・粛清され、政治から排除されていたことを考えると、少数民族大衆が「武闘」に動員されることへの警戒のあらわれ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無論、こうした隔離や保護の意図が完全に奏功し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く、例えば67年7月には保守派によるカザフ農牧民を巻き込んだ造反派紅衛兵に対する「武闘」が展開され (加々美 1992: 182)、またウルムチでは68年5月に「王恩茂の大漢族主義打倒大会」の名のもと新疆紅二司によって数万人の少数民族を参加させての奪権闘争が計画された (朱培民 2000: 323)。だが、こ

うした動きに対しては、主に中央による軍部への働きかけによってすぐさま対応・対策がとられるなど、少数民族の文革関与の動向に対する管理は徹底したものがあつた。このような新疆における文革の状況のなかで、少数民族は、ただ多数派による攻撃を受ける対象としての、そして権力闘争から排除され、ただ管理・保護されるだけの対象としての自己という客体化を経験したのである。

確かに、1969、70年には「東トルキスタン人民革命党」による武装蜂起が発生するなど、ウイグル族らによる民族独立闘争自体は継続されていた（Muawin-ali 1999: 149-150, 朱培民ほか 2004: 166-167）⁵。しかし、それは国内の政治的対抗関係というよりはグローバルな脅威をもたらすものでしかなかった。後年、鄧小平も文革期の問題は階級闘争の過度の拡大にあり、民族差別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そして文革の被害は主に漢族社会にもたらされたことを述懐している（朱培民ほか 2004: 173）。このような認識にもまた、少数民族を正当な対抗者として位置付けず、「民族問題」をめぐる政治的闘争はつねに「差別」に起因すると見るようなア・プリオリな態度が看取されるだろう。

こうした中共の傾向の擁護は、つねに「人民民主主義」の名のものに展開されてきた。人民民主主義の擁護者からみれば、少数民族のヘゲモニーの承認は、利益集団エリート間の競合/協調という多元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にほかならず、こうした政治体制の主役は人民で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王紹光 2007: 51-52）。確かにこうした観点はリベラル・デモクラシーへの批判には妥当する。エリート間の競合は、利害をめぐる妥協の模索でしかなく、既存の権力諸関係の変容をもたらすことなく、社会的弱者への関心を示さないであろう（Mouffe 2005=2008: 39）。しかし、もしもこうしたエリートが「合理的なやりかたでは決して調停しない」（Mouffe 2005=2008: 39）少数民族のヘゲモニー的企図を代表しているとすれば、彼らの排除は、その周囲に構造化される少数民族社会を中

国の公共領域から排除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やはりここにおいても問題となっているのは、「双百」のなかで提出されたサイラニの歴史解釈のような文化的、非物質的な個別利益の表明を、国家への脅威とみなすような、種差性や差異を忌避し共通性や同一性を評価する傾向なのである⁶。

では、現代中国において主張されている社会主義国家のデモクラシー、「社会主義民主」には、こうした傾向を克服し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のだろうか。最後にこの点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

V 政治—経済体制と多民族社会の脱政治化

1978年、中国がいわゆる「改革開放」路線への転換を公式に確認した11期三中全会においては、鄧小平により「思想解放」が主張され、「双百」の効用についても見直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また、82年の中国共産党第12回全国代表大会以降、「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の建設」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のもと、社会主義的民主政治の実現が提唱されている。

今日の中国においては、「デモクラシーは一種の政治手続きであり、いかにして資源の分配、すなわち誰が、何を、どれくらい、どうやって獲得するかといったことが最重要の問題である」（王紹光 2007: 序2）といわ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観点は、差異の政治の領域にも導入されている。そこでは、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の個別の集团的利益要求は、脱政治化された文化的なものにとどまるか、或いは利益集団としての各「民族」より高次の利益集団として人民が想定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副次的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

エスニッ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存在自体は承認しながらも、「分散した諸個人という視点から民族間の関係を処理し、少数民族文化の特徴を強調すると同時にその政治的利益を薄める」（馬戎 2004: 123-4）、或いは人民の共通利益のための政治参加がエスニシティ主義を薄める（朱倫 2002）といった主張、或いは数々の少数民族自治地域への経済支援政策は、こうしたエスニシテ

ィの脱政治化と物質的利益の過度の重視をよくあらわしている。

内部にさまざまな差異を内包する社会の脱政治化は、中国のみならず、欧米においてもこれまでに危機感をもって論じられてきた。政治 - 経済体制の席卷は政治的なるものの凋落であり（千葉 1995 : 52）、強者による支援や保障という姿勢は弱者の依存を加速させ、彼らの有していた政治文化を破壊する（千葉 1995 : 92）。物質的利益の分配権を掌握するエリートの支配が多民族社会の階梯的な構造を維持、強化し、分配される側の政治はいかにして最大限の支援や保障を勝ち取るかという「依存の権利」獲得運動に随してしまう。

確かに、中国国内にも差異の政治の短絡的な脱政治化への批判も存在する（王建娥 2006, 小嶋 2008）。しかし、「各民族の政治的権利を保障する政策を制定・実施し、少数民族に国家の政治権力と利益を平等に与える」（王建娥 2006 : 2）という試みは、大きな障害にぶつからざるを得ない。政治過程への参加の権利としてのシティズンシップは、当該国家の国籍を有していることを前提としている（千葉 1995 : 125-126）。だが、既存の権力の正統性を揺るがすようなヘゲモニーの実践が承認されていない現状において、少数民族が国籍を保障されようとするれば、その異議申し立ては必然的に妥協を含まざるを得ない。この妥協もまた、脱政治化のひとつのあらわれであろう。

脱政治化が正当化される理由としては、中国は「強い民主国家」であることを必要としているという認識がある。しかし「必要なのは民主的な権威であり、民主的混乱や民主的無政府状態ではない。良き民主制度は強い民主制度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王紹光 2007 : 28）と述べられる時、そこには既存の権力への挑戦をすぐさま混乱や無政府状態と同一視するという傲慢を含んでいる。

こうした脱政治化の進行、中国国内における差異の政治の不在は、むしろ、まさに「7.5」事件において中国政府が批判したような国外の扇動者たちと結託した分裂主義のような、外側からの権力への挑戦を招

い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本稿で取り上げたものは極めて限られた事例ではあるが、新疆地域における「民族問題」の経験もまた、国民国家内部の政治的主体の多元化に向けた議論が喫緊の課題として展開される必要性を提示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¹ 慶応義塾大学総合施策学部非常勤講師

² 在外ウイグル組織による報道の例として、“Rabiyä xanim pütün uyghurlarni 'shawguän qanliq wäqäsi' üchün xitay hökümitini soraqqa tartishqa chaqirdi”http://www.rfa.org/uyghur/xewerler/tepsili_xewer/rabiye-guangdong-weqesi-07032009173608.html（最終アクセス 2009.8.9）。韶関の事件は、ウイグル女性への強姦、出稼ぎ労働者の帰郷申請が許可されないことに対する抗議が事件に発展したとい、中国政府がそれへの公正な対処に失敗したため、「7.5」に発展したと批判する。

「7.5」について、日本では新聞各紙が「背景に民族抑圧」、「漢族中心主義に反発」などと構造的差別、格差を報道、中国国内では在外ウイグル人組織による「煽動」が原因として批判された。

³ 「怨嗟を表現するための正当な政治的回路が不在の状況においては、テロリズムが頻発しがちである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Mouffe 2005=2008: 121-122）というジャンタル・ムフの批判は、まさにこの状況を指し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⁴ なおサイラニは文革後名誉回復され、主に学術分野での要職を歴任したが、その活動は主に古代、中世ウイグル史の研究に向けられた（Abdurahman 2006: 111-113）。

⁵ 同党は、前述の「王恩茂の大漢族主義打倒大会」の画策にも関与したとされている（朱ら 2004: 167）。

⁶ とはいえ、この個別利益もまた、その集団に本質的なものとして捉えるべきではないだろう。少数民族の集合的同一化の行為もまた、その内部の「複合的な集合的同一化」（Young 1990: 236）を不可視化するからである。つまり、ウイグル族の共通利益が、ウイグル諸個人の個別利益の上位の審級として存在す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はまた別のかたちの多元的な政治参加の制限となるからである。少数民族内部にもまた、種差性や差異を忌避し共通性や同一性を評価する傾向が

あることについては、稿を改めて論じたい。

参考文献

- Abdurahman Abdulla, 2006, *Tashkanchilär 3-kitab*, Shinjang Uniwersiteti Näshriyati.
- Anwar Rahman, 2005, *Sinicization Beyond the Great Wall: China's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Matador.
- 千葉眞, 1995, 『ラディカル・デモクラシーの地平——自由・差異・共通善』新評論.
- , 1996, 「デモクラシーと政治の概念——ラディカル・デモクラシーに向けて」『思想』(867): 5-24.
- Debord, Guy, 1992,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Éditions Gallimard.(=1993, 木下誠訳『スペクタクルの社会』平凡社.)
- 定正清, 1958, 「批判少数民族社会歴史調査工作中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民族研究』2:12-15.
- 費孝通編, 1999, 『中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訂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甘陽, 1998, 「“民間社会”概念批判」張静編『国家與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24-41.
- 郝時遠, 2007, 「社会主義和諧社会的重要概念: 尊重差異, 包容多樣」『民族研究』(1), 1-8.
- 金観涛・劉青峰, 1983, 『在歴史的表象背後——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穩定結構の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若林正丈・村田雄二郎訳『中国社会の超安定システム——「大一統」のメカニズム』研文出版.)
- 何龍群, 2005, 『中国共産党民族政策史論』人民出版社.
- 加々美光行, 1992, 『知られざる祈り——中国の民族問題』新評論.
- , 2004, 「中国の民族政策をめぐる新思考」『中国21』19: 43-56.
- 小嶋祐輔, 2008, 「中国「和諧社会」論と少数民族——中華民族の多元性という本質主義の批判的考察」『現代社会学理論研究』2: 128 - 140.
- Laclau, Ernesto,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Verso.
- Laclau, Ernesto. &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2000, 山崎カヲル・石澤武訳『ポスト・マルクス主義と政治——根源的民主主義のために』大村書店.)

- 梁治平, 1998, 「習慣法, 社会與国家」張静編『国家與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78-95.
- 劉春, 1964, 「当前我国国内民族問題和階級闘争」『紅旗』12:16-25.
- 馬戎, 2004, 「理解民族關係的新思路——少数民族問題の「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6): 122-33.
- Mouffe, Chantal, 2005, *On the Political*, Routledge.(=2008, 酒井隆史監訳・福原雅武訳『政治的なものについて』明石書店.)
- Muawin-ali Muhärrir, 1999, *Shärqi Türkistan Qollanmisi, Shärqi Türkistan Wäqpi Tätqiqat Märkizi*.
- 村田雄二郎, 1994, 「中華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最後の帝国」」蓮實重彦・山内昌之編『いま, なぜ民族か』東京大学出版会, 30-49.
- 毛里和子, 1998, 『周縁からの中国——民族問題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
- 納日碧力載, 1999, 『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雲南教育出版社.
- 賽福鼎, 1958, 「堅決反对地方民族主義, 為社会主义的偉大勝利而奮闘」『新華半月刊』(2):19-25.
- Schmitt, Carl, 1932,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Duncker & Humblot.(=1970, 田中浩・原田武雄訳『政治的なものの概念』未来社.)
- Sherip-niyaz Hushtar, 2002, *Shinjang Yeqinqi Zaman Tarihida Ötkän Shähslär*, Shinjang Hälq Näshriyati.
- 清水由里子, 2004, 「近年の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における「双語」教育を巡る動向について」『イスラム世界』63: 65-77.
- 王建娥, 2006, 「族際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設和諧社会的重要課題」『民族研究』(5): 1-11.
- 王紹光, 2007, 『安邦之道——国家転型的目標與途径』三聯書店.
-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朱培民，2000，『20 世紀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朱培民·陳宏·楊紅，2004，『中國共產黨與新疆民族問題』新疆人民出版社。

朱倫，2002，「論民族共治的理論基礎與基本原理」『民族研究』(2): 1-9.



中国环境问题的国际化与日本的学术贡献

一之濑俊明（赖俊明）¹

I 概要

当今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本国，且有国际化的趋势。这里将介绍两个由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推进的代表性课题。一是环境污染源在中国的事例，二是国外的废弃物影响中国的事例。

II 超越国境的污染

1 无国境大气

首先是污染对中国的影响。近几年，随着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东南亚和东亚的大城市中的硫氧化物(SO_x)和氮氧化物(NO_x)的排放量也正在显著地增加。大气无国境，这些排气物作为酸雨的组成物质，也影响到了日本。

臭氧层所在的平流层中的臭氧浓度的不断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与之相反，对流层的臭氧浓度正持续增加着。臭氧(O₃)是被汽车和工厂排出了的NO_x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等污染物的光化学反应的产物。这些大气的氧化性物质，对人和生态系统带来危害的同时，在对流层的平均浓度也有上升趋势。在远离日本的隐岐等孤岛，也发现了从中国大陆而来的大气污染物，其浓度超过了日本的环境标准。(秋元，2003)。

2 东亚诸国的能源消费

酸雨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发生在污染源地区，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涉及到了更广大的范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东亚，在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当中既有能源消费量增加的问题，也有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2)的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比例，将从

2000年的23%上升到2030年的29%(图1)。198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能源需求量增加迅速，且呈持续增长趋势，预计2030年将达到45亿吨标准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消费迅速增加，以大气污染为中心的环境问题在东亚地区日益严重。东亚的环境问题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能源的构成中对煤炭的过度依赖(图2)。2000年的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到近26%，但在东亚煤炭占到43%。特别在中国，能源消费大部分依赖于国产煤炭，在所有能源供给中占69%。从能源供给的角度考虑，认为发电部门的煤炭利用量的增加是东亚煤炭需求扩大的原因。其中，中国的煤炭需求占东亚全体的70%以上。

在中国，来自固定污染源，即发电站等的悬浮粉尘和二氧化硫(SO₂)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引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SO₂的三级标准是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市一般动、植物(敏感者除外)正常生长的空气质量要求。空气质量未达三级标准的城市，中国北方有14个，南方有7个。南方的重庆市SO₂年排放量超过100万吨，呼吸道疾病等疾病危害显著存在(小川，2003)。

在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与能源消费量增加并存的是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图3)。东亚的发展中国家里面的许多地方，对煤炭未进行污染物去除，便直接进行燃烧。抑制来自煤炭燃烧的污染物排放、提高煤炭的发电效率，这对亚洲的煤炭依存问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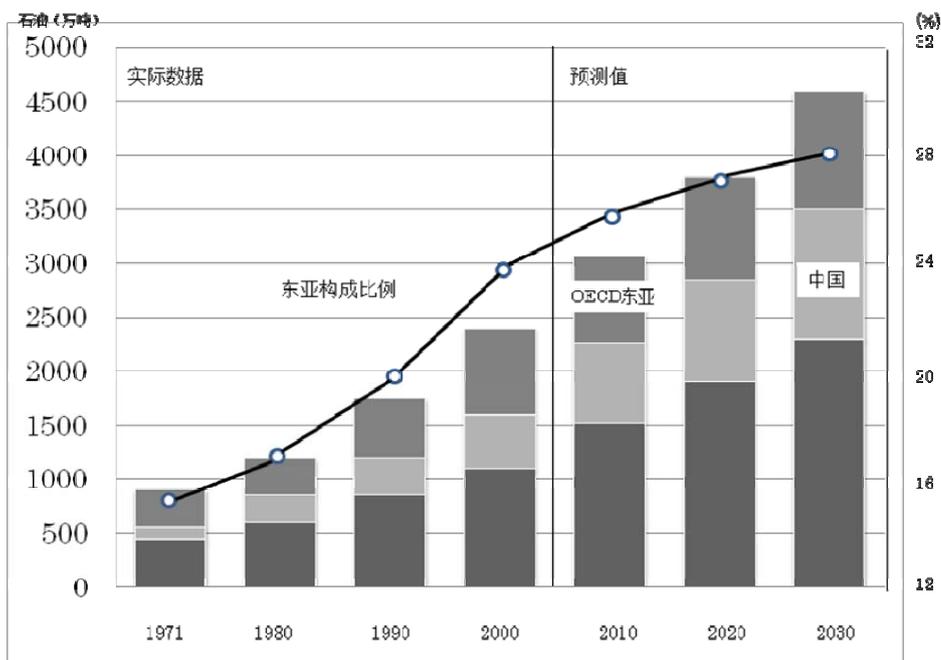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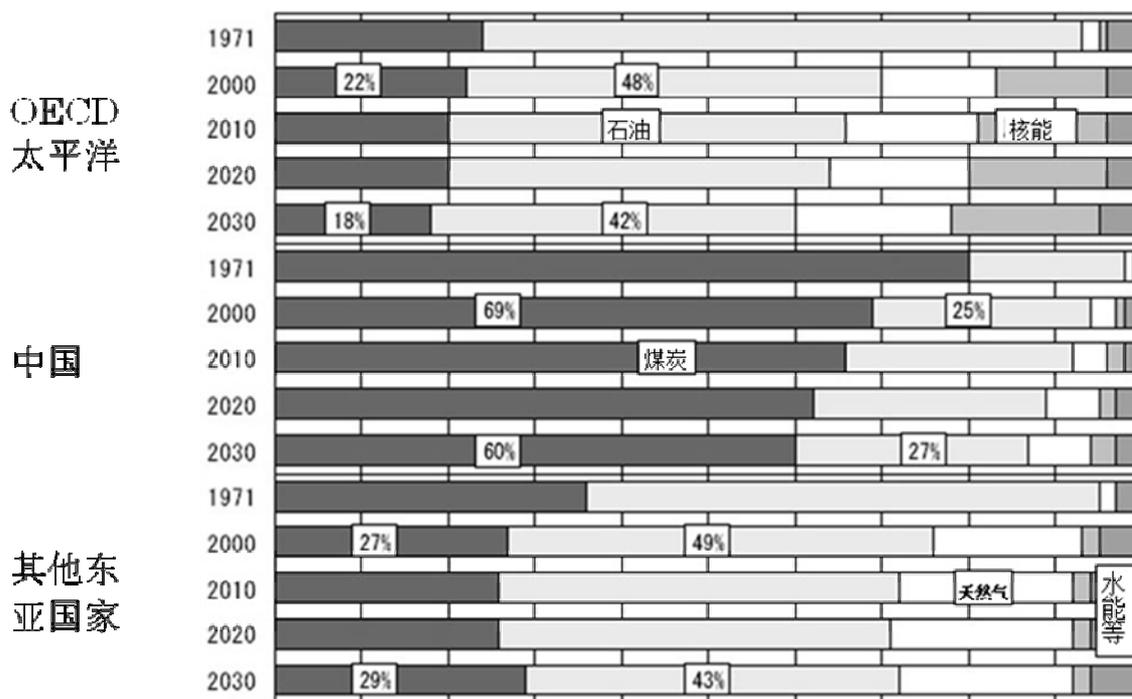


图1 东亚能源需求预测 (IEA, 2002)



(注) 不包括非商用能源

图2 东亚能源供给对煤炭的依赖 (IEA,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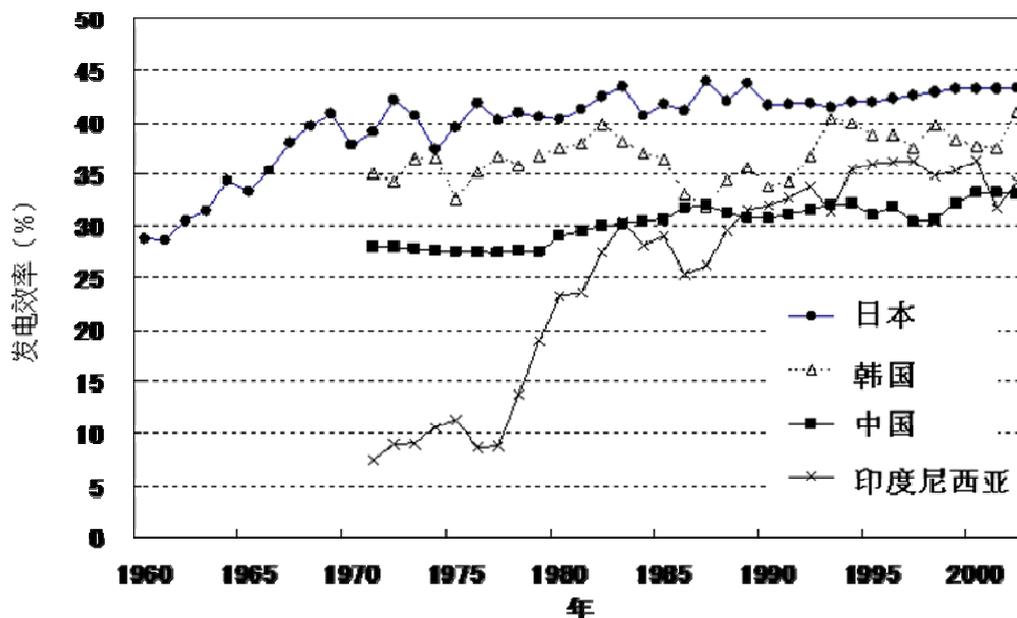


图3 东亚主要国家的发电效率 (IEA, 2004)

3 东亚大气污染物转移的现状

大气无国境，来自境外的含有能导致酸雨污染物的大气也给日本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995 年进行的东北亚的酸雨前驱物质产生量的分析结果，1990 年

NO_x 的产生量是年约 14,174 万吨，其来源为中国 68%，日本 15%，韩国 9%，台湾 4%。同时，在东北亚，SO₂ 产生量约为年 26,959 万吨，NH₃ 产生量是年 12,585 万吨，中国各占据其中的约 90% (表 1)。

表 1 根据 IIASA (2000) 东北亚的酸雨前驱物质产生量的推算 (单位: 万吨)

	中国	日本	北朝鲜	韩国	蒙古	台湾	俄罗斯	总计
SO ₂	23,914	957	256	1,086	74	444	231	26,959
NO _x	9,645	2,121	300	1,230	25	521	242	14,174
NH ₃	11,738	355	73	168	96	154	—	12,585

由于日本工厂等的脱硫系统高度发达，观测到的酸雨特征是，SO_x 所占比例比其他亚洲各国低，由汽车排出的 NO_x 所占比例反之较高。日本海方面冬季的硫酸盐的沉降比夏季多，因此认为硫酸盐是由亚洲大陆冬季风带而来的。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以中国、台湾、韩国、北朝鲜、蒙古、日本 6 国的 SO_x、NO_x、非烃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为对象，开发了能阐明大气污染、酸雨实际状态的模型。该模型由能计算酸雨的大气污染物质运送情况的三维酸雨长途运输模型构成 (图 4)。研

究表明，日本 1997 年 1 月 26~27 日的空气污染，是受 25 日中国大陆高空的高浓度 SO₄²⁻ (硫酸离子; 硫氧化物的一种) 影响，含 SO₄²⁻ 大气随着时间推移，经过并覆盖了日本列岛 (图 4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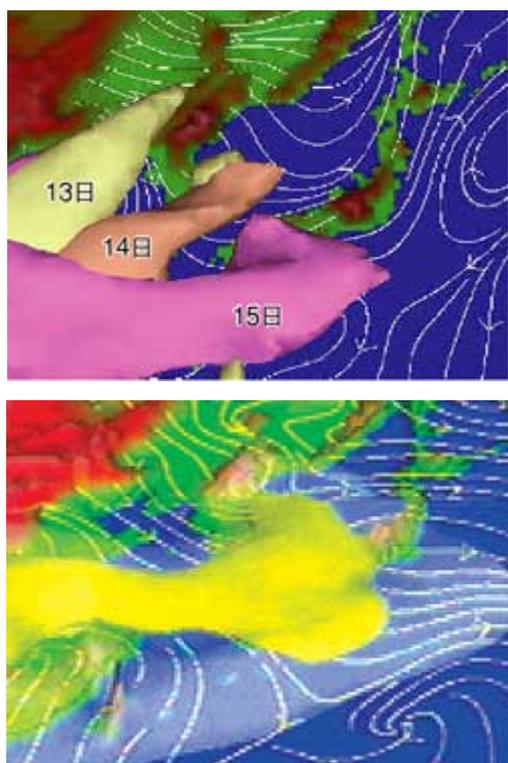


图4 大气污染的迁移例子
(国立环境研究所编辑, 2004)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以东亚地区为对象, 构建了多成分大气污染物质发生起源物的清单。大气污染物质的产生量是由引发大气污染的各种各样的人工的“活动量”和各活动的单位产生量“产生量原单位”积算得出的。以计算活动量为例, 可由各种燃料的消费量和汽车的行驶距离算出。研究表明, 每 0.5 经纬度网格间的 SO_x 、 NO_x 差异很大, 地域间的排放量差异很明显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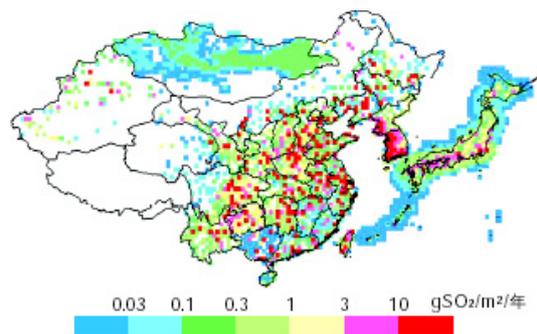


图5 东亚 SO_2 排放量分布(国立环境研究所编辑, 2004)

近几年, 尽管日本的 NO_x 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减少了, 但首都圈的光化学反应的警报发布日数却增加了 (图 6)。我们的研究认为, NO_x 等能引发光化学反应的物质可能来自远方。我方的研究基于东亚酸雨监测网络 (EANET: Acid Deposition Monitoring Network in East Asia) 与全大气监视程序 (WMO/GAW: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Global Atmosphere Watch), 用 1998 年到 2003 年对亚洲各国 7 地点的观测数据, 分析臭氧和光化学氧化物的关系, 结果表明, 春季从亚洲大陆而来的气团含有的 NO_x 的浓度超过日本环境标准 (60ppb), 研究也表明, 中国、韩国等东亚各国的 NO_x 的排放导致 5~20ppb 的对流层臭氧浓度增加 (Tanimoto *et al.*, 2005)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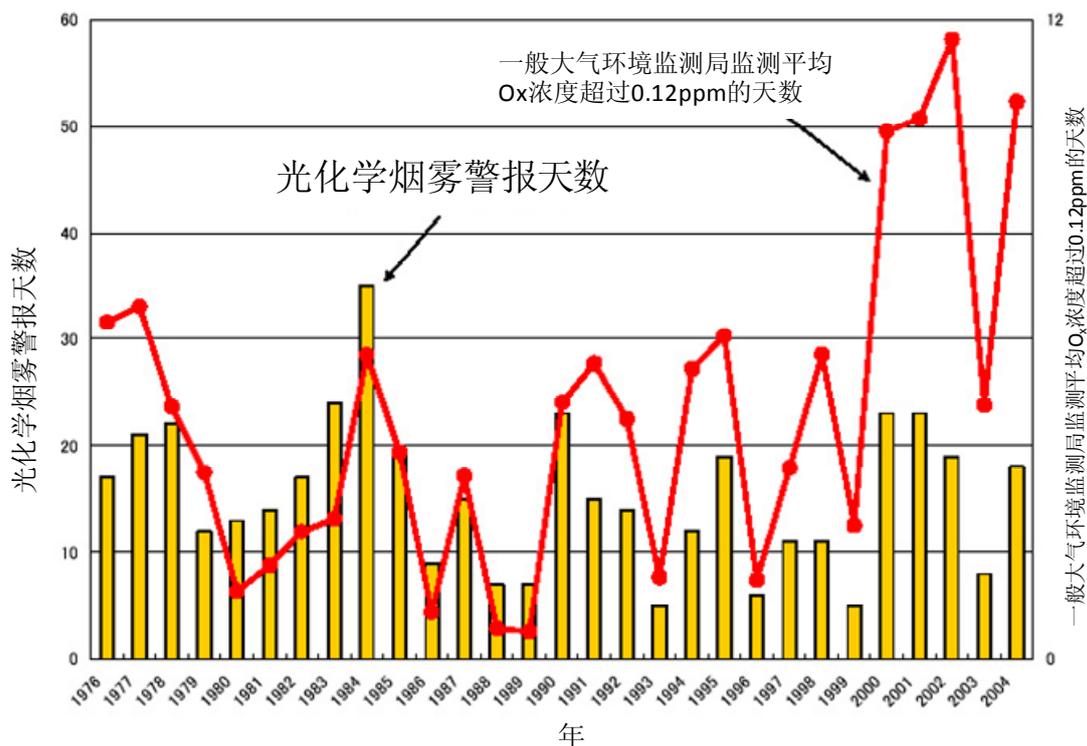


图6 东京都内光化学烟雾警报发布日数与一般大气环境监测局监测平均O₃浓度超过0.12ppm的日数
(東京都環境局光化学オキシダント対策研究会, 2005)

又例如，每年3~5月，从塔里木沙漠、戈壁、黄土高原而来的黄沙，被西风吹到日本。1950年以后，中国沙尘暴发生的次数增加，其原因被归结于气候变化和地表植被的变化。但至今没有数据能充分说明1970年以后的沙尘暴增加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研究，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年年增加(王·大坪, 2000)，土地荒漠化的人为原因是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森林破坏、野生动物的滥捕、水资源的滥用。作为沙尘暴的防止对策，植被的保护和再生是必要的。

III 境外废弃物流入中国

其次是国外的污染物对中国的影响。当今中国，仅靠国内资源已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每年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进口废塑料，废纸，废铁、废铜等资源进行废弃物再

利用。2003年，进口废塑料约302万吨，废纸约938万吨，废铁约929万吨，废铜约316万吨，废铝约65万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会编, 2004)。据硅谷毒性物质联合(SVTC: 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和巴塞尔·行动·网络(BAN: Basel Action Network)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报告书，来自美国的废旧电脑、家电、手机等电气电子产品的废弃物，即所谓e-waste，正导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严重的环境问题(图8)。报告主张美国批准巴塞尔条约，强化生产者的责任，唤起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而向中国出口电气电子产品废弃物的不仅是美国，日本的出口也在逐年增加(アジア環境白書,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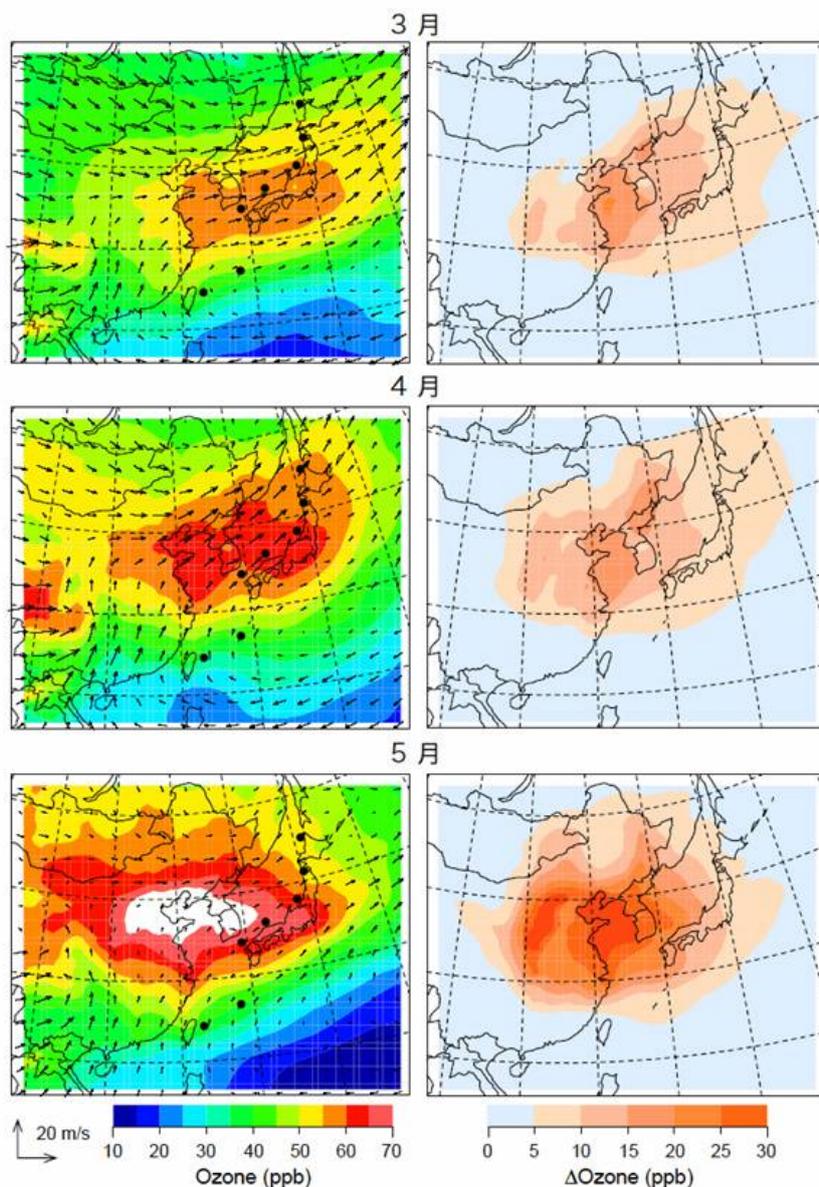


图7 根据观测数据再现日本附近臭氧背景值的季节变化与经纬度的联系
(Tanimoto *et al.*, 2005)

BAN 报告，以广东省潮阳市的贵屿为例。当地利用地理优势繁荣了废弃资源再利用产业（图 9）。报告披露了当地以雇佣廉价劳动力从废弃电气电子产品中取出电线、燃烧电线外皮，燃烧所产生的致癌物质污染了空气；工人不戴防护用具就燃烧电路板、用酸浸泡电子元件以取出金银等贵金属；破坏含铅的

显示器等情况（AP 通信，2002）。结果，这个地域的地下水被污染，不得不从其他的地域输送饮用水。对这个地域的河流进行采样，其水质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容许的水污染水平的 190 倍（AP 通信，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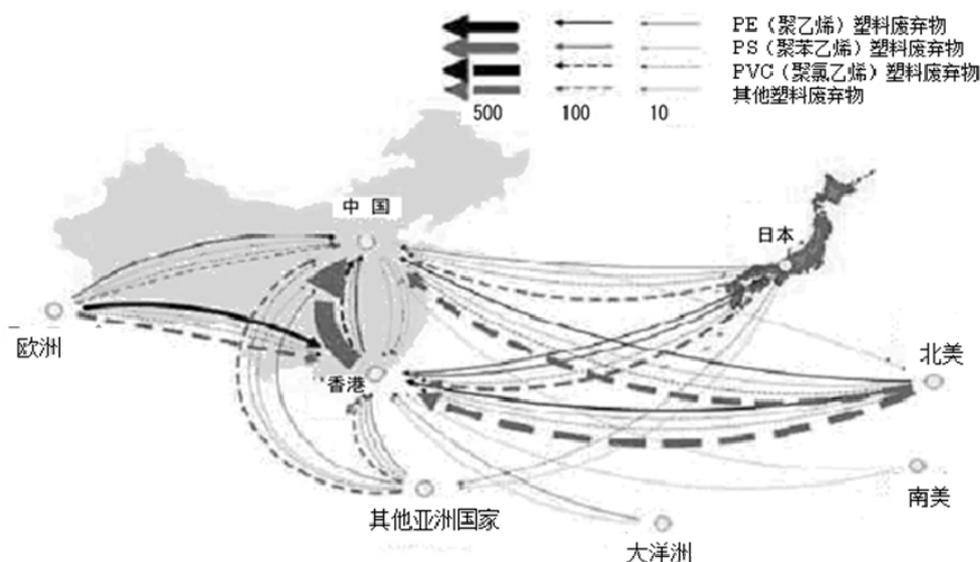


图 8 根据 2001 年以亚洲地区为中心的循环资源的越境迁移情况
Terazono *et al.* (2004)



图 9 电子产品废弃物堆（中国广东省潮阳市贵屿）
女性们正从废电线中回收铜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2002)

IV 今后的课题

今后，作为生产方的发达国家政府、企业，需要扩大生产者对进行废弃物处理的责任（EPR: Expa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而发展中国家应掌握其国内的废物利用处理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废物回收处理。同时，为了使有害废弃物污

染实现最小化，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包含保管、运输、处理、再处理等等概念的“环境性健全管理”（ESM: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也值得注意。近来，由人造卫星对产业垃圾非法丢弃进行监视的系统开发（松井等，2003）也正在推进，我们认为，中国在这一新系统的开发上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¹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名古屋大学环境学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

[文献]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Conventions of UNEP, The Basel Convention, GRID-Arendal and DEWA-Europe (2004): *Vital Waste Graphics*
IEA (2002):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2*, IEA
IEA (2004):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4*, IEA
IIASA (2000):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East-Asia*, IIASA

-
-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2002):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 110, Number 4
- Tanimoto, H., Sawa, Y., Matsueda, H., Uno, I., Ohara, K., Yamaji, K., Kurokawa, J., and Yonemura, S. (2005): Significant latitudinal gradient in the surface ozone spring maximum over East Asi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2
- Terazono, A., Yoshida, A., Yang, J., Moriguchi, Y., Sakai, S. (2004): Material cycles in Asia: especially the recycling loo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Journal of Material Cycles and Waste Management*, 6, 82-96
- The Basel Action Network, 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 (2002): *Exporting Harm: The High Tech Trashing of Asia*
- 秋元肇 (2003): 東アジアオゾン汚染の日本への影響, 資源環境対策, 39 (11), 90-96
- アジア環境白書 (2003): 日本環境会議/『アジア環境白書』, 東洋経済新報社
- AP 通信 (2002): 「発展途上国を危険にさらす米国の電子機器廃棄物」, 2002年2月25日
- 王勤学・大坪国順 (2000): 中国における砂塵あらしの増加と土地利用変化, 土木学会誌, 85, 64-67
- 小川芳樹 (2003): 「東アジアのエネルギーと環境問題」, 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 その他研究材料
- 中国環境問題研究会編 (2004): 「中国環境ハンドブック 2005-2006年版」
- 松井康弘ほか (2003): 不法投棄の発生要因に関する構造モデルの構築, 環境衛生工学研究, 16(3), 41-46



中国の乾燥地域における日本人による緑化活動について

藤田佳久¹

はじめに

近年における地球温暖化にともなう気候変化、人口増加に伴う居住空間の拡大、経済活動の発展にともなう環境汚染などにより、地球上の環境が多面的に大きく変化しつつある。それはかつて他人事に近かった地球環境の変化が、いまやわれわれの日常生活にも直接的な影響を与えるようになりつつある点で、地球環境変化が人類共通の課題として認識されつつある。

そのような中でそれに密接な関係をもつ現象に乾燥地域の拡大、砂漠の拡大の問題がある。とりわけ、アフリカのサヘル地域と中国の内モンゴルから西部地域にかけてはそれが著しく、しかも大規模な展開がみられる。中国の場合、国内のこれらの地域から発生する飛砂、黄砂のダストの発生頻度は年々高まりつつあり、中国はもとより韓国、さらに日本もかつて経験したことの無いレベルで影響を受けつつある。近年はこの飛砂起源のダストに工業生産廃棄物などがまじりあい、単なる飛砂だけではなく、複合汚染のスモッグも目立っている。たとえば、中国に近い九州では、日本の中では技術改良と規制により克服した光化学スモッグが近年再現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ったく光化学スモッグとは縁がなく漁村の多い九州西部の天草島では、春先から光化学スモッグがくりかえし発生し、人々の外出が制限されてきた。一方、日本列島中央部にある名古屋を含む東海地方では、かつて春先に「春霞」と称し、春の季語でもあった人々の気がつく黄砂現象は、年に2、3日であったが、近年は年に20日を超えるほどで、それも「春霞」のようなのどかさはなく、身近な例では、近くの山山が見えない視界の悪さや空気の汚染、洗濯物の汚れ、自動

車の窓ガラスの汚れ、さらには家畜の糞が黄砂への付着による子供の病気などをもたらすほどになっており、人々も関心をもつ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現象の背景には内モンゴル地域や黄土高原地域の乾燥化、砂漠化の進行があり、気候環境の変化と中国の経済発展に伴う生態系の変化がある。中国の生態系の変化が国際的に影響を及ぼし、国際問題にもなりつつあるといえる。

そのような中で、まだささやかな取り組みではあるが、中国のダストの発生源である内モンゴル地域や黄土高原を中心とした緑化活動が日本人のNGO諸団体の手で1990年代当初から行われてきている。中国も長江や黄河の中上流域での1990年代末の大洪水に懲りて「退耕還林」政策を実施したが、直接的には砂漠の緑化ではない。また中国にも近年植林を目指したNPOが生まれ始めている。

本論では、中国の乾燥地や砂漠の緑化に最初から積極的に取り組んできた日本人による緑化活動の状況とその先駆的実践団体であり、中国政府からもその活動の指導者である遠山正エイ氏が立ち上げた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の事例も紹介し、その実態、課題、将来についてふれたい。

I 日本で増加する黄砂

日本では1960年代の高度成長にともなうさまざまな公害問題が多発し、とくに水俣や四日市、富山—新潟で発生した三大公害とその対処・解決法は、日本の公害問題を全国的に解決していく基調な経験になった。そのような過程のなかで日本人の環境意識は高まり、学校教育のカリキュラムの中にも環境問題が取り込まれることにな

った。その関心は日本の中に限らず、次第に海外にも及ぶようになった。東南アジアでの海岸保全のためのマングローブ林の植林活動や、やがて中国の乾燥地域での緑化活動にも関心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

そのうち中国での先駆的緑化活動は前述した遠山氏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が、中国への観光旅行や学術交流がすすむようになると、中国のはげ山や砂漠化も実感し、また前述したように中国からのダストの飛来が日本人の生活の中で認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る中で、遠山氏の中国での実践活動に共感する人々も増え、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現地で参加する人々も次第に増えた。

図1は日本における毎年の飛砂の飛来回数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る。全国103地点での延べ数を示したもので、それによれば1980年代までは例外的に多い都市が1例みられるが、概して300日以内であるのに対して、1990年代以降になると300日を超える都市が増え、さらに600日を超える年もみられ、最高は1,000日を超える年(2002年)さえみられる。あきらかに1990年代以降は増加傾向にあることがわかる。背景には、気候変化と中国における経済活動の活発化にともなう生態系の変化としての乾燥化、砂漠化がある。

図2は、北京で大規模に黄砂に見舞われた時の北京での清掃風景と、その黄砂が名古屋にも到達して名古屋の街を覆った時の新聞記事である。名古屋駅前の高層ビルが黄砂によってかすみ、視界がきわめて悪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かつて名古屋でこれほどの黄砂に見舞われた事はなく、それが新聞記事に取り上げられる理由になったのである。中国での黄砂ダスト情報は日本では的確に把握されており、春先にはテレビの天気予報番組の中でこれまでなかった黄砂予報情報が流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ほど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1990年代以降、日本人も否応なしにこの黄砂にまみれることになり、近年では春だけでなく秋も黄砂にまみれることになりつつある。こうして黄砂は中国

だけでなく、日本にとっても重要な問題になりつつある。

II 中国での日本人による砂漠緑化活動と先駆的事例

こうして日本人の間で黄砂が中国国内に大きな問題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ことと同時に、日本の中にも新たな問題を引き起こしつつあることが認識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もちろん、これまでは少しでも中国の砂漠化の防止によって中国の生態系の安定化への貢献を願う日本人の気持が、多くの日本人に中国での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よる砂漠緑化活動への参加を進めてきた。そのような思いが東京を中心にしながらも全国各地に中国の砂漠緑化を進める多くのボランティア組織を誕生させた。

図3は現在の日本の中で中国の砂漠緑化を中心に実践している主な団体を、日本の中での本部のある位置と中国国内での砂漠緑化の主な場所とをラインで結ぶ形で示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多くはNPO(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であり、その組織の中で多くの日本人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費用は自己負担で砂漠緑化活動に参加している。日本の団体の位置をみると前述したように本部を東京におくケースが多いが、大阪、京都、名古屋、仙台、北九州など各地域の中心都市にも見られ、また高知や岩手、茨城、三重、宮崎、鹿児島などの地方中心都市にも見られ、さらに農村部の町などもみられる。日本全国に環境意識の高まりがみられるといえる。

なお、そのほかに、トヨタやホンダなど机上による乾燥地、砂漠緑化の活動があり、多くの資金を投入してその事業の展開がみられるが、ここでは企業による緑化事業については対象としない。

一方、中国の砂漠などの緑化地点は、北は東北の吉林から南の雲南まで南北に広がりを見せ、東は安徽省から西は新疆省近くにまで及んでいる。そのうちでは内モンゴルが最も多く、山西、寧夏、陝西などの各省がそれに次ぎ、北京周辺がそれに次ぐ。いずれも砂漠化に直面している地域に集中

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また、これらの団体の設立年代は1990年がもっともはやくついで1991年の各1団体、1992年の2団体と続いたあと、1955年、1996年で5団体、1998年、1999年の各1団体、そして2000年になると4団体、2001年に4団体と増え、その後も毎年1から2団体が加わっている。全体としてみると1990年代前半期が創設の試行期、1990年代後半記が展開期、2000年以降が発展期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える。

組織としてもっとも早かったのは1990年に立ち上がった沙漠植林ボランティア協会で、設立と同時に中国内モンゴルの沙漠で植林活動を行っている。この協会は東京ではなく、東北地方の岩手県それも衣川村という小さな村にあり、リーダーの菊池氏の指導のもと、うちモンゴルのホルチン沙漠で「森林農場」という新しい発想をえて、地元の農民を巻き込み、沙漠の緑化と低地での水田開発を実現している。当初はやはり失敗の連続であったが、「囲柵、樹方格防風林農場」というアイデアを工夫し、砂の固定に成功、地元農民にも受け入れやすい方式を確立した。そのため、沙漠近傍の農村も農業が発展し、おおくの村々がこの方式の導入により安定化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

菊池氏は岩手で10年間も地元の森林組合長を務め、農業にもおおくの経験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が、単なる沙漠の緑化でなく、地元の農村も巻き込んだ村づくりとしての「森林農場」を実現した点で特筆される。最大の問題は基金だというのが、篤志家もふくめ、多くの方々からの寄付で実行で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の菊池市によるこの協会はまさに個人のリーダーからスタートした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だといえる。

III 「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の展開

また、今ふれた菊池市の協会とほとんど同じ時期に中国のオルドスの一角、グプチ沙漠で鳥取大学名誉教授遠山正英氏が沙漠緑化のため、「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を立

ち上げた。すでに遠山氏は1980年代に黄河中流域の中衛近くの黄河沿いの沙漠で自らの経験と学識をふまえ、ぶどう園5ヘクタールの栽培に成功し、沙漠での植林に自信をつけていた。そんなときに、パオトウ近くの沙漠で、カシミア用のヤギを飼育しようとする青年O氏が、いきなり草地化を目指そうとしている青年に出会い、いきなり草地化は無理だとして、ポプラの植林を自ら実践し始めた。中国での最初の沙漠緑化の実践である。しかし、広大な沙漠に一人で向かう困難さもあり、日本に向けてこの事業の有効性を講演などで強調し、1991年、多くの協力者のサポートを得て、「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を立ち上げた。遠山氏は80歳代の半ば、その後10年間、多くのサポーターを得て、グプチ沙漠の一角にある恩格貝の知に緑化を進めた。当初出会った青年が中国側のパートナーとなり、遠山氏を支えた。

当初牧民が2戸存在していただけの恩格貝では植林が進むにつれて、裏方の苗木作り、灌漑作業、補植、などの従事者に地元の人たちの雇用も必要となり、しだいに緑を目指して人々が集ま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住宅や商店もでき、また日本からくる協力隊の人たちが滞在する宿舎もでき、250万本の植林が実現すると、出来上がった植林地を観光地として人々が遠くから見に来るようになった。宿舎はさらにホテル風の建物を増やし、フフホトの鉄道会社は浴場や国際会議場を建設、大雨が降ったときに溜まった池にボートを浮かべ、パオの観光宿舎も建設されて一気に観光地の様相を帯びるようになった。

遠山氏は10年間会長を務めたあと、2004年97歳で亡くなられた。「やればできる。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沙漠開発は世界の平和」などの名言を次々と本心からの叫び声として吐かれ、多くの人達に感動と協力の実践をもたらした。これらの遠山氏の名言とその魅力的な人柄に多くの人々がこの回に参加し協力して、沙漠の緑化に従事してきた。当時まだほかにこのような沙漠緑化を進める組織は、前述した岩

手の団体以外になく、それも遠山氏のこの会が強い求心力を持ったといえる。この砂漠緑化の事業は中国でも注目され、地元政府のみならず、中国政府からも称賛され、遠山氏は田路の江沢民主席と数回会見している。遠山氏が亡くなった後、その墓とともに現地の砂漠を見下ろす高台に彫像が立てられ、また遠山氏を転生する記念館も建てられていることも中国政府が遠山氏のこの砂漠緑化事業を高く評価したものとと言える。

ところで、この遠山氏のもとで遠山氏から多くの砂漠緑化の実践的なノウハウを取得し、砂漠緑化に一層の関心を持った参加者の中から、自らがリーダーとなって、その植林技術をベースに中国各地に散って独自の砂漠緑化活動を展開する人たちがあらわれた。それが前述した2000年以降の新たな砂漠緑化団体の誕生である。その点で、この遠山氏が立ち上げ、多くの日本人が参加協力した「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は中国での日本人の砂漠緑化活動の出発点であり、次世代を育成する学校であるともいえる。なお、新たなリーダーの中には、中国だけでなく、東南アジアやさらにブラジルでの緑化活動を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展開し、活動のグローバル化を図っている例もみられる。

IV 今日の恩格貝での砂漠緑化状況

現在の恩格貝における砂漠緑化は、いろいろ試行錯誤を経験しつつ、現在は植林本数も400万本に近づいている。毎年30を超える団体が現地入りし、また個人の資格で参加するケースもみられる。現地にとどまり、植林後の補植や給水、苗木づくりなどに従事するボランティアもいる。現地に参加できないが、寄付をしてくれる個人や企業も続いている。参加団体は、図4に示すように日本各地に広がり、遠山氏がかつて砂丘と取り組んだ鳥取大学のある鳥取にはこのほど鳥取支部が誕生した。私のいる愛知大学も現地に「ポプラの森」と称してここ12年間毎年植林活動を進め、植栽本数は1万本を超えている。社会人も多く

参加するが、近年学生の参加が増えているのが新しい傾向で、学生たちにも環境意識の高まっていることがうかがわれる。

このような近年の経過の中で、2007年には新たな植林地を「日中平和の森」と称して近接地に展開し始め、恩格貝での植林地の拡大をめざしている。また、それより前から西域のエジナの砂漠でも砂漠緑化の実践を始めている。新たな砂漠緑化の段階に入ったといえる。そしてそれらの成果をベースにして、2008年5月、恩格貝の地で画期的な「日中砂漠サミット」を企画した。しかし、その1週間前に四川大地震が発生し、実施が危ぶまれたが、日中双方の工夫と努力で無事達成できた。中国側は全省から150人、日本側からは180人が集まり、合同の植林作業を行い、会議を通じて日中間の共通の意識をもたらした。

V あらたな問題と課題

恩格貝の知は今やかつての砂漠の存在を思わせないほどの緑地空間に姿を変えつつある。しかしその前線では、植林が強風で吹き飛ばされたりして、砂漠の緑化が簡単でないことは以前と変わらない。新たに草方格による植林方法も取り入れたりして工夫の連続である。

一方、前述したように恩格貝の地が緑地へと変貌する中で、観光地化が進み、かつて遠山氏と会って植林事業に協力したO氏も観光事業化に力を入れている。人口はかつて牧民2戸だけだった恩格貝は1000人をこえ、一つの独立行政区になったほどである。かつて、遠山氏は植林の目的の中心に、植林によって農業が可能になり、農村ができて、豊かな暮らしを実現することがおかれた。植林事業で雇用効果も生まれ、新たな観光事業による雇用も生まれている。農業では遠山氏が工夫した果樹やサージ栽培、農民によるハウス栽培、O氏による大規模灌漑ピボットも動き出したことからいえば、遠山構想は実現しつつあるといえる。

しかし、新たな問題も生じている。農業の企業化や観光地化の中で、地元で育ててきた植林関係の従業員が、地道な農業や植

林よりもそちらへ移行する傾向が強くなり、植林を核としたシステムが不安定になりつつあること、これは植林地の維持管理を怠れば、また植林あつての農業であり、観光であることを忘れれば、もとの砂漠への回帰してしまう恐れのある認識が地元の人たちの中で弱まりつつある前兆ともいえる。また農業の企業家も大量の地下水をくみ上げており、アメリカの乾燥地では地下水の枯渇で農地が放棄された例は多い。生態系の変化の中で、植林された木々が枯渇しかねない面もある。

また、多くの観光客が入り込む中で、隣接する砂漠に4輪駆動の自動車を運転するグループが遊びのために入り込み、走り回って、植栽したばかりの木々をつぎつぎとなぎ倒すという光景も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かつて予想もしなかった事態に直面したりしている。植林道具の盗難も増え、あらたな事態に力を取られる状況が生じつつある。

これらのことは、これまでの砂漠緑化だけ実践すればよかつた段階が、その緑化事業がもたらす、新たな要素、とりわけ新たなむらづくり、まちづくりをも考慮に入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段階に入った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生態系が極度に弱い砂漠、乾燥地における生態系の保持と開発のバランスを含めた検討の必要性である。その意味では、地元政府や研究機関との協力が必要になり、このような乾燥、砂漠地域での地域づくりの在り方について日中間での共同作業が必要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

恩格貝のこの事例は、ほかの砂漠緑化事業の先駆的位置にあり、このような問題も先駆的に表れた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たがって、新たに展開しているほかの日本人による中国各地での砂漠緑化事業も、今後このような問題に直面するケースが多いと思われる。それゆえにこの恩格貝の地で、生態系を重視した広くモデルとなるような新たな地域づくりの在り方の検討を日中両国の共同で行う必要があることを提案した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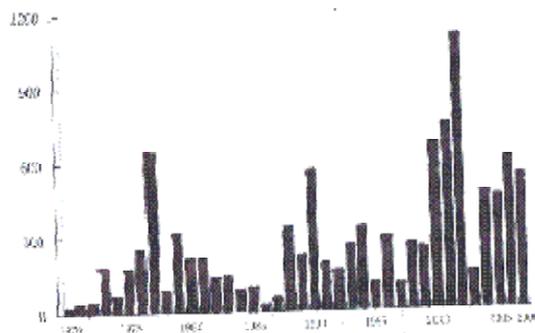


図1. 日本における1970年以降の降日数(日数)の推移 (資料中)



中国北西部「砂漠化の進行」



図2 北京で大規模に黄砂に見舞われた時の北京での清掃風景と、その黄砂が名古屋にも到達して名古屋の街を覆った時の新聞記事



図3 日本の中で中国の砂漠緑化を中心に実践している主な団体



図4 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の日本における支援組織

¹ 愛知大学文学部教授，同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長，日本沙漠緑化実践協会会長。

日本風水史

渡邊欣雄¹

序 本発表の意図・目的

風水研究で本シンポジウムに沿うテーマといえば、学際的に進んでいる中国を中心としたグローバルな風水占いの研究であり、それが日本にも及んでいることの紹介だろう。現在、日本の風水書のどれと問わず風水が中国起源であることに触れていて、グローバルな風水の表象研究として十分な意味を持っている。しかしわたしは現代的な風水の世界的な普及以前の、基本的な東アジア風水史に興味を持ってこれまで研究しており、たいへん遺憾ながら「現代」中国ではなく、中国の影響を受け続けてきた日本史としての風水史の一端をここに紹介したいのである。なおまだ日本風水史の復元はほとんど誰も注目しておらず、中国の影響力を知るには、その基本としてその歴史過程を知る必要があるためだ。

本発表では時間の許す限り、日本に与えた中国の風水思想の影響と日本における風水思想の形成を、科学史と占術史の2つに分けて略述し、お話ししたいと思う。

I 日本の風水科学史

1 中国に発明・発見をもたらした「地理」

風水科学の歴史は中国を中心に東アジアに普及した歴史なのではなく、世界初のさまざまな発明・発見を伴った世界史だ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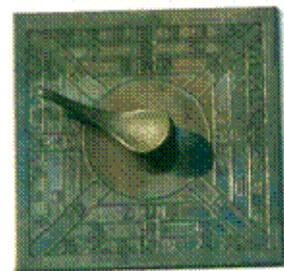
「火薬・紙・製紙技術・羅針盤」が中国による世界の四大発明とされている。羅針盤(羅盤)の発見と発明こそ、その典型例である。羅針盤はいかなる必要性から発明されたのかといえば、それは「地理」のためだった。中国の科学技術史を復元したJ・ニーダムは「磁気羅針儀が最初『風水』目的に開発されたことは疑いない」²とし、したがって「紀元1~2世紀以前には、地理は疑いなく地相占い(風水)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った」とする³。同じく中国の科学技術史を復

元してニーダムの主張を補強したR・K・G・テンプルもまた、「中国人にとって航海よりはるかに重要な羅針盤の用途として地相占いがあった」⁴と記している。

2人が当時の風水=地相占い=「地理」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ったとする羅針盤(羅針儀)とは、磁鉄を用いて方位を測る指南針のことであり【写真1】、テンプルによれば紀元前4世紀頃に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というものだ⁵。その後地相占いと結び付いた「地理」の知識は羅針盤の改良と発展を促し、やがて現在風水師が用いているような羅盤へと発展していくが、中国における「地理」の知識とコンパスの発展が日本に与えた影響は少なくなかったはずである。

そこで、類種の日本の風水科学の歴史がどこまで復元できるのか、わたしがいま理解していることの一部を、ここに簡単に紹介してみたいと思う。

写真1 漢代の指南模型



2 日本への「地理」知識の伝来と応用

何人かの学者たちが一様に指摘する日本への「地理」知識の伝来は⁶、『日本書紀』に記録された「[推古天皇10年(602)]冬10月、百済の僧觀勒かんろくが来た。暦の本、天文地理の書、また遁甲方術の書を貢上した。こ

のとき書生3~4人を選び、観勒について学習させた」という一節によっている。百済から輸入されたのは、『易経』(繫辞上传)の「天文地理」と同じように天文観察と対になった地理の観察知識だった。

この記録のあとに「地理」と同義の用語が、さまざまな日本古代の記録に散見できる。まず『日本書紀』には皇都造営にあたり、たびたび陰陽師が「看地形」を行った記録がみられ、また『続日本紀』の和銅元年(708)、元明天皇は中国の遷都の例にならい「卜世相土」(日選びと土地観察)を行って、今日にいう四神相応の地に平城京を置くことを宣している。「堪輿」という難解な風水の別名もまた、「日者(日選見)や占人の言うところの堪輿雑誌に載せたる説は、賢聖の格言にあらず」などとして、『日本後記』巻20[平城帝・大同2年(807)]に登場している。

下って9世紀の『令義解』(職員令)には、陰陽寮の陰陽師6人が「占筮・相地を掌る」とある。『令義解』に記された陰陽師の職掌の一つもまた「相地」であり、風水の前身たる判断だった。「相地」とは、中国の文献にもたびたび登場する風水の別名である⁷。ここにいう「陰陽師」と称する役職もまたあやしい。こんにちの中国、とりわけ浙江省一帯には、「風水先生」ではなく「陰陽先生」(陰陽師)が活躍している。「風水先生」(風水師)とは、こんにちの中国では、いわば共通語の呼称であって、方言や地方の生活語を反映したこととは限らない。だから中国では、こんにちでもある地域では風水師のことを「陰陽先生」と呼ぶのである⁸。

「地理」と同義の名称は、このように古代日本の記録のなかに、おびただしく見いだせる。名称はよいが、なにか「地理」の観察法の記録はないだろうか。そう考えると、奈良の地に平城京を造営するにあたって用いられたであろう測量法の載った、つ

ぎの『続日本紀』の一節はたいへん興味深い。

「古^{いにしへ}から近代に至るまで日を揆^{はか}り星を瞻^みて、宮室の基を起こし、世をトし土^みを相て帝皇の邑を建つ・・・」[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

この記録のあとに、「四禽図に叶い」という四神相応の地の判断を行った記録が続くのだが、ここに記録された「日を揆り星を瞻て」とは、国都造営にあたって行われた測量であろう。しかしこれは磁鉄を用いた羅針盤による測量ではなく、それ以前の「土圭法」に類似した方法による方位確定であろうことが分かる。すなわち日中は太陽の影で方位を測定し、夜は北極星その他の星辰を測定して方位を定めていた、中国殷周期からの測定法とすこぶるよく似ているのだ【図1】。

図1 土圭による方位測定法(土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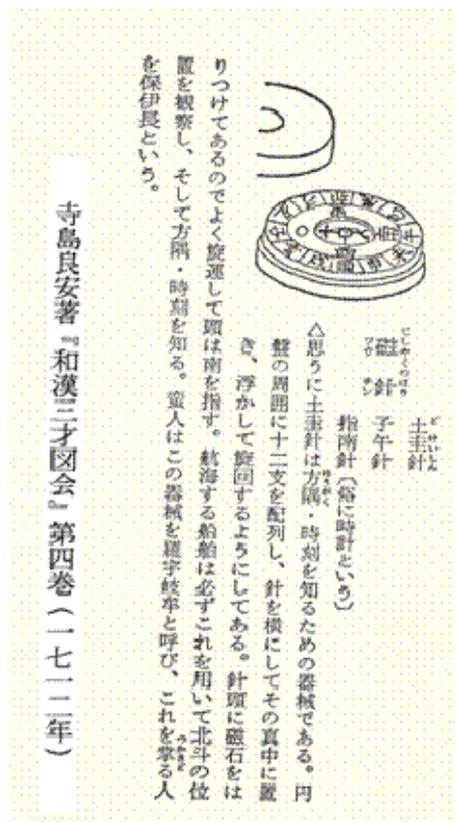


3 江戸期の方位測定具

時代はずっと下って江戸時代。その江戸時代の百科辞典である寺島良安著『和漢三才図絵』巻四に、日本の風水科学を知るうえで興味深い図と記述がある。のちのちに発展したコンパスを当時は「土圭針」と呼び、「土圭針は方隅・時刻を知るための器械である」などと解説しているのである⁹。その別名を「磁針・子午針・指南針」とし「俗に時計という」と解説している【図2】。方

位を測る方法としての「土圭」が、のちのち日本では「時計」となったというわけだ。

図2 寺島良安解説の指南針



『和漢三才図会』は18世紀初期の書物だが、しかし「土圭」が時刻を知る道具の名称だったことは、じつはそれより100年以上前、1603年に日本イエズス会によって刊行された『日葡辞書』に記録がある。この辞書には、「土圭」は「Toqei トケイ(土圭)時計」とある。訳を「時計」としているが、それというのもその用例や関連語に「Sunano toqei(砂の土圭)、関連語としてRococu [ロッコク漏刻]; Toqifacari(時計り)」とあるからで、当時からイエズス会宣教師たちが主として滞在した西日本では、時間計測具として「土圭」を認識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¹⁰。

注目したいのは時刻を計る器械としての「土圭」より、「方隅を知るための器械」としての「土圭」だ。寺島良安の図によると、それは現在の日本で家相判断に用いられているようなコンパスなのだ。だから「指南

針」なのであり「磁針」なのだ。寺島良安が載せた「土圭針」は、中国宋代において、羅盤の発明後、さらに航海用に開発された「航海用羅盤」である¹¹。この「航海用羅盤」は地相判断の羅盤を簡略化したもので、日本ではじじつ近年まで小型船舶の航海用コンパス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きた【写真2】。これをいまの日本では、家相判断の道具に用いているのだから皮肉だ。中国では風水判断の道具としてではなく航海用に改良した道具なのであって、むろん家相判断などできるはずがないものだ。

写真2 小型船舶用方位磁石(日本)



鋼の針を用いた羅盤が中国で発明されたあと、それまでの日影計測による「土圭」の方法を引き継いで、羅盤を測量具に用いた歴史が中国にある。何重にも目盛りを刻んだ羅盤ではなく、目盛りを1種類にして密にし、正確な方向や角度を計測しようとした羅盤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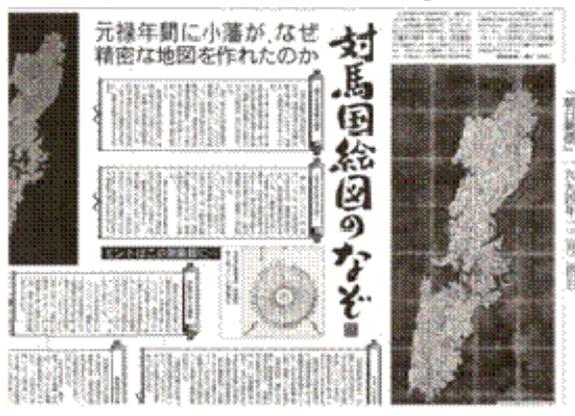
このような羅盤もまた、江戸期の日本で用いられていた記録がある。地相占いの羅盤と混同しやすいので、これを当時の日本の測量術の名にちなんで「盤鍼羅盤」と称しておこう。江戸期には鉱山開発が盛んで、坑道の掘削などに正確な方位や角度を計測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その例に佐渡の大疎水工事に用いた「盤鍼羅盤」が残っている¹²。

「羅盤は32.4cmの角板の中央に羅針を装

置し、径 30cm 余の円周を 480 度に分け東西の符号を逆に銘刻している。別に羅盤の付属器があって細線が張られ、これを羅盤に重ね磁針と細線とを一致させて円周の度数を読んだものだという。この「盤鍼羅盤」が使用されたのは元禄 4 年(1696)以降の工事だというから、江戸時代初期には羅盤は測量具としてすでに鉱山開発に用いら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

日本風水科学史の探索は続く。1994 年 12 月 24 日の『朝日新聞』の記事に、「対馬国絵図のなぞ」と題する特集記事が載った【図 3】。その解説によると「江戸時代の元禄年間に、幕命により各藩が『国絵図』を作った。対馬藩が元禄 13 年(1700)に献上した対馬全島図は、その形の正確さで際立っている。宇宙衛星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と比べてみれば、一目瞭然である。江戸後期の地理学者として知られる伊能忠敬が、対馬の測量に訪れる 110 余年も前に作製されたが、忠敬も正確さに驚嘆している」と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正確な地図を描くのに、どのような道具が用いられたのか。その答えは古文書中に描かれた「磁針盤」にあった。その「磁針盤」は、「十干十二支による 24 本の方位線、さらに 96, 192, 384 と 3 種の目盛りに細分してある」道具だという。

図 3 新聞記事「対馬国絵図の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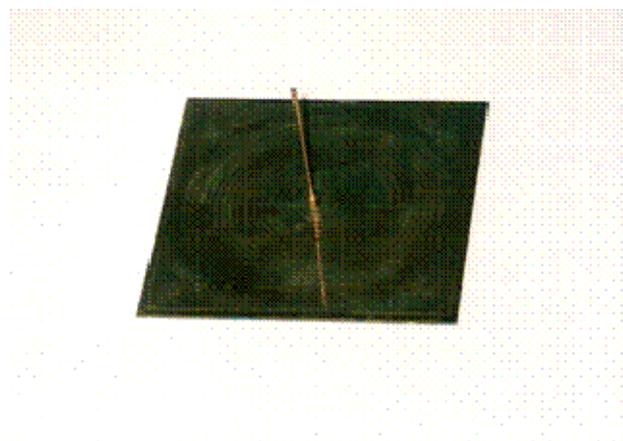


4 謎ではない日本の風水科学

これだけの記述から判断しても、その「磁針盤」が先の「盤鍼羅盤」と基本が似たよ

うな方位測定具だ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と思う。先の記事では、対馬の国絵図は日本の地図測量史上謎とする。なるほど日本の測量史上の謎にはなるだろうが、風水研究を推し進めていくと、このような謎が決して謎ではなく、科学技術史のある種の必然性のうえに発展してき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ような測量方法は中国では天然磁石の使用以前の漢代から、太陽で方位を測る測定具としてすでに開発されていた¹³。俗称「太陽羅盤」(正方案)がそれだ【写真 3】。「太陽羅盤」そのものは日影計測による方位測定具だが、その後の羅盤の発展により中心の棒が磁針に変化して用いられてきた。それを日本では少なくとも江戸初期には「盤鍼羅盤」として、すなわち「盤鍼」(磁針)による測量具として鉱山開発などに用いられていた。そんな科学技術が日本にすでに蓄積されていたからこそ、宇宙衛星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と比べても決して劣らないほどの対馬国絵図ができたのだと思われる。

写真 3 清代の太陽羅盤(正方案)模型



風水判断が動機で発達した中国の方位測定法や土地測量の技術は、その後アラビアやヨーロッパにも波及した¹⁴。だからいまは、風水研究を改めて全世界的規模で見直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んな時代に至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II 日本の風水占術史

1 日本における「風水」の出現

すでに述べたように「地理」には「風水」のほか、「相地」「相宅」「堪輿」「陰陽」「青

鳥」などのさまざまな別名があった¹⁵。日本古代の文書記録にも、おおかた中国古代に用いられていた「地理」と同義のことばが散見できた。しかし知るところ、こんにち広く普及している「風水」の二文字が、日本の古代文献に見当たらない。だから日本には、「風水」はもとより、風水の知識までほとんど受容さ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などという指摘もある¹⁶。じっさいはこのような指摘とちがって、金孝敬がかつて指摘したように¹⁷、日本古代には風水の知識が受容され役立てられていた。しかし果たして「風水」という地理の別名は中国や韓国(朝鮮)にあつて、日本になかったのだろうか？

のちほど述べるように江戸時代には、「風水」、あるいは「地理風水」という名称は、当時普及していたさまざまな家相書に認められるようである。この時代の家相書を分析した村田あがによると、寛政10年(1798)刊の松浦東鷄の著した『家相図解』には、「風水」の名でさまざまな占法が解説されているという¹⁸。それ以後、その他の江戸期の家相書にも、「風水」の語や用例も至って豊富に見いだされ、風水判断が中国や朝鮮と同じだったかはともかくとして、占術としての「風水」の知識はまぎれもなく日本に導入されていた。

2 環境判断としての「風水」

つぎの疑問は、では「風水」の語は近世の輸入語だったというほど、日本では新しい知識だ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だ。なおまだわたしは探求中だが、目下わたしが知る最も古い証拠は、鎌倉にある臨済宗円覚寺派の総本山・円覚寺の記録『円覚寺文書』に残る一節に認められる¹⁹。

「一、塔頭事 所望人雖帶御教書、於敷地者、寺家評定衆並官家奉行人相共、見知其地形、爲山門風水無相違者、就寺家注進、可有其沙汰矣、・・左馬頭源朝臣(花押)〔境内に塔頭(別院)]を建てることを希望している者は幕府の許可状をすでに所持している。しかし、さらに建てる敷地については、寺家の評定衆と官家の奉行人の双方が地形を判断し山門を造り風水の善し悪し

を見定めたいうえで、寺家から注進を行って、その沙汰を待つべきであろう。・・左馬頭源朝臣(花押) [文和3年(1354)9月22日]。

一言で「風水」とは言っても、中国・韓国や日本では「風水」は、大別して二様の意味がある²⁰。一つは「自然」の言い換えとしての風水で、用例としては日本語の「風水害」がその典型例だ。「風水害」とは自然災害を言うのであって、決して「風水(術)の害」なのではない。もう一つは、なんらかの判断対象となって再認識された自然環境をいう。人間にとって「善いのか悪いのか」、「吉か凶か」という判断を伴う自然およびその影響だ。『円覚寺文書』に登場する「風水」は、明らかに後者の自然であり環境を指している。『円覚寺文書』の「風水」は、明らかに何らかの判断対象となった風水だということは、前段の「見-知其地形、爲山門」という一節でわかるだろう。みなみな周囲の地形を十分に知って、山門を位置づけた「風水」だからだ。

『円覚寺文書』に記録された「風水」が、目下わたしが知る日本で最も古い「風水」という語の出現だが、では室町時代初期から江戸期にかけて、「風水」の語が出現したと考えるべきかどうか、なお疑問が残る。

刊行の時期は江戸期の家相書に見られる「風水」より古い、記述されたその内容がおそろしく古い日本の記録がある。医師で儒学者だった黒川道祐は、山城国の地誌として『雍州府志』を著した。貞享3年(1686)のことだ。そのなかにたいへん興味深い記述がみえる。

「平等院 朝日山と号す。宇治川の西にあつて、ここは昔、左大臣源融公の別荘のあつたところである。その後、陽成院・宇多帝・朱雀帝三代の主上が、しばし御遊の地として遊獵飲の興を催され、行宮を宇治院と号した。一条院のとき、左大臣雅信公の領地となったところである。長徳4年[998]、御堂関白道長公はこの地の風水を愛でて、ここに別荘を構えた。ときどき往来しては息男宇治関白頼通公の永承7年[1052]には、住宅を廃して仏寺とした。その構えは中華

の模範を慕って造られたものである。堂は鳳凰形を象り、左右の閣は両翼を比べ、後廊は尾を表現している。これ鳳凰造という[『雍州府志』巻5]²¹。

黒川道祐は、何を根拠として平安期に「道長がこの地の風水を愛でて、ここに別荘を構えた」と記したか、わたしにはわからない【写真4】。黒川が原資料とした文書に、「風水」の二文字があったのかどうか。江戸期にはすでに「風水」のみならず、「地理風水」などと称してひろく巷間に風水術が知られていたから、文中にいう「風水」とは黒川自身の解釈とも考えられる。しかしこの文中の「風水」は、いずれにしても二様の「風水」のうち、両様の意味でとれる内容となっている。文中の「風水」を「自然」と訳しても、「整えられた吉祥の自然」と訳してもなんらおかしくはない。ただ風水判断は、こうした住宅の自然環境の吉地にこそなされるべきものだった。

写真4 風水を愛でて藤原道長が建てた別荘＝平等院鳳凰堂



3 子孫の禍福を説く「風水」

『円覚寺文書』や『雍州府志』に登場する「風水」は、いずれも土地測量に伴う「地理」の知識というより、環境や方位の善悪・吉凶を判断するための「地理」の知識だと考えられる。すでにわれわれは、方位測定具の発展史を追うなかで、土地測量術としての「地理」の知識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た。土地測量術の「地理」の知識には、しかし環境や方位の善悪・吉凶を判断するという

内容がなかった。したがってわれわれは、江戸時代前後にすでに二様、あるいはそれ以上の「地理」の知識があったと想像できるのだが、全体に「地理」は当時、どのように認識されていたのだろうか。このような疑問に関して、その答えを知るに興味深い記録が見られる²²。

江戸期の地理学者・西川如見の著した『両儀集説外天文義論』(正徳2年[1712])には、以下のような問答がある。要点をかい摘まんで、これを現代語に訳してみると・・・

「問い：中華の書で地理というのは、みな風水という意味で、家宅廟墓の吉凶だけを論じている。地理というのは、そんな意味なのだろうか」

「曰く：地は太虚のなかにあり大気が上がっている。大気が乾燥すれば地は乾き、湿れば地は潤う。寒くなれば固くなり、風が吹けば動き、火があれば温まる。これが本来の地理学である。地理には大地全体を論ずる地理、一国について説く地理、一家一宅の地理がある。地理を選ぶとき、日がよく照って陰湿でなく、清水が潤沢で氾濫することなく、風がよく通って滞ることなく、土地が堅固なところは、人が住む宅としては病気が生ずることなく、また廟墓では死体が安穩になる。一郷一国においてもその違いがあつて、土地の豊饒・不毛状態は、みな風水の細則によっている。だから一草一木を植えるのである。そのようにすることは風水を選ぶことなくして、ありえないことだ。これこそ上古の風水の吉凶を選ぶということの意味である。しかし中古以来陰陽禄命家がいたずらに興つて、もっぱらその子孫の禍福を説いており、その弊害はいまに至るまで収まらない。ただし日本ではこれまで、あえてこのような風水の吉凶を説いてこなかった。これは却つて上古の風に近い。どうして子孫繁栄のために、地理を選ぶ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か。」

中国では「地理」とは「風水」であり、家や廟、墓の吉凶だけを判断することをいう。しかし「地理」というのは、そんな意味なのだろうか、という問いに対する答えである。

西川如見の考えでは、「地理」には大地全

体から一つの家に至るまで、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における意味がある。「風水」とはその地理的条件であり、その条件にこそ吉凶がある。上古の昔からの判断は、地理的条件の善し悪しを判断することがその吉凶判断だった。日本ではこのような判断を説いた者はいなかったが、地理的条件はあえて解説する必要のないほど必然的なもので、だから説いてこ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それ自体、本来の地理認識に近く上古の習慣に近い。

しかし中古より興った「陰陽禄命家」たちは、もっぱら子孫の禍福という吉凶を説いており、その弊害はいまに至るまで収まっていない。どうして子孫繁栄のために、地理を選び地理的条件の吉凶を判断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か。「地理」は日本では、子孫のために選び取る対象ではなく、自然に備わった条件をよくするために選び取るものだ。そんな意味だとわたしは理解している。

しかし西川如見の指摘で興味深いのは、中古には「陰陽禄命家」が興って、もっぱら子孫の禍福という吉凶を説いており、その弊害はいまに至るまで収まっていないと指摘していることだ。これは文脈から判断して中国の事情を言ったものだろうが、しかし当時の日本もまた、子孫の禍福、人間生活の吉凶を説く家相見が存在し、時代を経るにしたがって増大したことは家相書の刊行の増大がそれを裏付けている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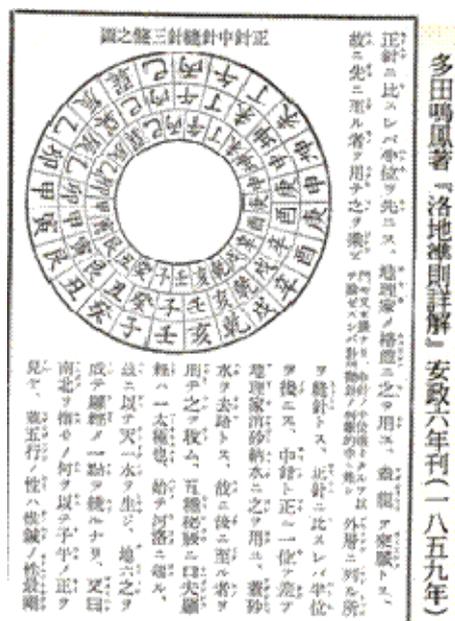
4 風水占術に残された科学知識

こんにちの家相判断や風水判断書を見ると、煩わしいほどに非科学的でスコラ的な判断項目があがっている。しかも家相書・風水書ごとに判断は違うから、学術的な価値があるなら家相見や風水師たちの主観や偏見を比較検討してみたい衝動にかられるが、ここは風水の科学技術が残した「科学の痕跡」を紹介することだけに留めておきたい。

日本の家相判断は東アジアに類例がないほど特殊で奇妙な判断項目が多いが、なかには東アジアに共通した判断も認められる。それは原典や学派が同じだから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が、それを越えた科学的根拠に根差していたことにもよっている。

江戸時代末期の安政6年(1859)、多田鳴鳳が著した『洛地準則詳解』という家相書に載せられた「正針中針縫針三盤之図」という図がある【図4】²⁴。これは幾層にも方位判断の項目が描かれた羅盤に記された、3つの方位判断項目だけを取り出したものである。その3つとは、「正針」(最内円)、「中針」(中間円)、「縫針」(最外円)と称する項目で、十干十二支と八卦がそれぞれ24に配分されて刻まれている。

図4 多田鳴鳳著『洛地準則詳解』に描かれた風水判断の例



おかしなことに、この3つの円は、みな同じ文字の配列の目盛りになっておりながら、最内円と中間円は7.5度、中間円と最外円は15度ずれている。これで方位の吉凶を判断するのだが、第一に方位を判断するなら同種の目盛りを3つも描く必要が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だ。方位を知りたいなら、1つだけでよいのではないか。第二に同じ配列でありながら、なぜ3つの円はそれぞれ微妙にずれ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どの目盛りに合わせて方位を測ったらよいのか、判断者を迷わせる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か。

答えはいずれも否である。同種3つの目盛りがあるのは、方位に偏角があるからだ。そして磁北極は常に変化している。偏角と

は、地理的な北極と磁気の北極との角度の差である。ある世紀に真北だった方位は、つぎの世紀には真北を示さないだろう。もしも末長く吉福を得たいなら、常に変化する方位の変化を予測して、つぎの世紀の吉方をも定め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そのため未来の(しかし実際の目盛りは過去の)方位を判断するために、3 つもの同種の方位が用意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ある。中国ではこの偏角を遅くとも 8~9 世紀には発見していたとされ、ヨーロッパで偏角を知ったのは、中国に遅れること数百年、14 世紀末だった²⁵。

方位の目盛りがずれておらず、一種しかないコンパスで吉方を計測するだけで済むなら、それは東の間の吉方判断でしかない。原則的な同種 3 つの目盛りの存在理由はそうなのだが、かつての日本の家相見や現在の中国の風水師が判断しているのは、室内の方位は「正針」、門の位置は「中針」、山川の方位は「縫針」などと対象によって項目を違えるにすぎない。偏角という、この世界の科学技術史上の大発見を知ってか知らずか、こうしていまも中国では風水師(陰陽師)が精巧な目盛りの描かれた羅盤を用いて、お客のために方位の禍福判断に勤んでいる。

結語 模範や表象としての「中国」

日本の古代史料に見る限り、少なくとも 602 年に百済から「天文地理」の書がもたらされ、それ以後の宮都造営には風水判断がたびたびなされてきたことは、以上のように疑いないようである。風水知識が日本にもたらした国が、当時の「百済」だったとはいえ、その後の日本の記録では中国を模範とし、中国の例にならって遷都から風水判断までなされてきた。たとえば『続日本紀』巻四、「和銅元年(708年)二月戊寅(十五日)」の元明天皇の詔の一節には、次の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

「・・・昔、殷の諸王は五回遷都して、[国を]中興したという聞こえを受け、周の[西伯・武王・成王らの]諸天子は、三たび都を定めて太平のほまれを致した。安んじて、

その久安の住居を遷(うつ)そうと思う。まさにいま平城の地は、[青竜・朱雀・白虎・玄武の]四つの動物が河(か)に相応じ、三つの山が鎮(しづ)めをな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²⁶。

この一節は藤原京から平城京に都を移そうとしたときの、元明天皇の詔にみるその理由の一つだが、遷都の例を中国の歴史の数々の例に求め、日本もそれらに倣おうとしていたことが、これで分かる。またすでに紹介したように江戸時代、黒川道祐の描いた『雍州府志』の「長徳4年[998]、御堂関白道長公はこの地の風水を愛でて、ここに別荘を構えた。・・・永承7年[1052]には住宅を廃して仏寺とした。その構えは中華の模範を慕って造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記録もまた、「中華」を模範とし「中国文明」を表象する日本建造物の創造だった。さらに西川如見の「風水占術」の普及に対する批判や懸念も、中国上古の例を模範とした中古以降の時代批判であったし、じじつ西川如見が懸念したように、日本では江戸中期以降、風水による家宅の吉凶判断が盛んになされていた。長崎から取り寄せた中国の風水書の多くが、日本式に翻訳されて普及していた²⁷。江戸期に至って中国の影響は、「家相」などという日本式の発想に改造されてはいたものの、もはや日本の生活の隅々にまで至っていたというわけである。

明治期以降、今度は欧米を模範とするようになり、日本政府は東アジアに根付く淫祠邪教を禁止し、戦後も政府は迷信撲滅や生活改善運動を行ってきた²⁸。こうした政策は現中国にもあるが、政策的に禁止や撲滅を進めると、なぜか地下活動や民間の活動として「盛んに」なり、かえって風水占い判断が巷に普及してしまう。現代日本の風水占いブームは 1990 年代からだが、その知識を香港・台湾・韓国からだとして輸入改造し、いまや日本的な独自の風水民俗にもなっていることは、時代が移ろうと前近代の日本がなしてきたこととほぼ同じである。そして改造された特殊日本的な「風水」もまた世界に広がっていることは、決して不思議ではない。インドの「ヴァストゥ」(風

水術)を含めて、風水が中国スタンダードばかりでなく「複数の東洋スタンダード」な知識や思想が、グローバル化している証拠でもあろう²⁹。

¹ 中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² Needham, J. & Wang, L. 1959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2.Part2.* [東畑精一・藪内清監修 1991 『中国の科学と文明』 巻3, 思索社, 403 頁]

³ Needham, J. & Wang, L. 1959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Part3.* [東畑精一・藪内清監修 1991 『中国の科学と文明』 巻6, 思索社, 5 頁]

⁴ Temple, R.K.G. 1986 *China: 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牛山輝代監訳 1992 『図説・中国の科学と文明』, 河出書房新社, 258-259 頁]

⁵ Temple, 『前掲書』, 258 頁

⁶ 牧尾良海 1994 『風水思想論考』, 山喜房仏書林, 170 頁, 黄永融 1999 『風水都市—歴史都市の空間構成—』, 学芸出版社, 65 頁, ほか

⁷ 王其鈞 1991 『中国民居』, 上海人民出版社, 87 頁

⁸ 渡邊欣雄 2001 『風水の社会人類学—中国とその周辺比較—』, 風響社, 183 頁ほか

⁹ 寺島良安 1712? [島田勇雄・竹島淳夫・樋口元巳訳注 1986 『和漢三才図絵』 巻4, 平凡社, 10 頁]

¹⁰ 『日葡辞書』: *Vocabulário da Língua de Iapam com a declaração em Portugues* [土井忠生・森田武・長南実編訳 1980 『邦訳・日葡辞書』, 岩波書店, 662 頁]

¹¹ 王其亨編 1992 『風水理論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226 頁

¹² 小林行雄・小葉田淳 1962 「採掘・冶金」 『日本科学技術史』, 朝日新聞社, 404 頁

¹³ 程建軍・孔尚朴 1992 『風水与建築』, 江西科学技術出版社, 80 頁

¹⁴ Temple, 『前掲書』, 255 頁

¹⁵ 王玉徳 1991 『神秘的風水』, 広西人民出版社, 7-11 頁

¹⁶ 池上・島園・徳丸・古家・宮本・鷺見編 『日本民俗宗教辞典』, 東京堂出版, 89 頁

¹⁷ 金孝敬 1938 「日本に於ける風水信仰に就いて」 『日本宗教学大会紀要』 4, 154-159 頁

¹⁸ 村田あが 1999 『江戸時代の家相説』, 雄

山閣出版, 23-25 頁

¹⁹ 鎌倉市史編纂委員会編 1956 『鎌倉市史』 (史料編第2), 鎌倉市, 192 頁

²⁰ 王玉徳 1991 『前掲書』, 6-7 頁

²¹ 立川美彦編 1997 『訓読・雍州府志』, 臨川書店, 192-193 頁

²² 田里友哲 1983 『論集・沖縄の集落研究』, 離宇宙社, 176-177 頁

²³ 村田あが 1999 『前掲書』, 各所

²⁴ 多田鳴鳳 1859 『洛地準則詳解』 [水魚道人注解 1933, 大文館書店, 22 頁]

²⁵ Temple, R.K.G. 『前掲書』, 262 頁

²⁶ 直木孝次郎他訳注 1986 『続日本紀』 1 巻, 平凡社, 99-100 頁

²⁷ 宮内貴久 2006 『家相の民俗学』, 吉川弘文館, 59 頁

²⁸ 宮内貴久 2006 『前掲書』, 172 頁

²⁹ Christian Daniels ed. 2006 *Remarking Traditi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所収の諸論文参照

nal Knowledge; Knowledge as a Resourc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所収の諸論文参照



人水和谐理想之地-东北三江平原自然环境与水资源开发思考

宋献方, 张兵, 张应华, 韩冬梅¹

摘要: 三江平原在中国黑龙江省东部. 位于黑龙江, 松花江, 乌苏里江汇流处. 由于长期的构造下陷和三江的泥沙堆积, 所形成的低洼平坦的平原. 降水集中夏秋的冷湿气候, 径流缓慢, 洪峰突发的河流, 以及季节性冻融的粘重土质, 促使地表长期过湿, 积水过多, 形成大面积沼泽水体和沼泽化植被, 土壤, 构成了独特的沼泽景观. 沼泽与沼泽化土地面积约 240 万公顷, 是中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 三江平原素以“北大荒”著称, 在 50 年代大规模开垦前, 草甸, 沼泽茫茫无际, 亦有成片森林, 野生动物繁多. 开垦后建有许多大型国营农场, “北大荒”已变成了“北大仓”, 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 需要粮食安全战略, 作为我国东北粮仓的三江平原地位举足轻重. 粮食安全依赖于合理水资源调配及精准农业. 长期以来, 由于大规模的水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等一系列人类活动, 已产生土地次生盐碱化, 水污染, 河流和湖泊以及湿地面积萎缩等生态与环境问题, 本研究在科学院三期创新项目水资源群项目支持下, 以三江平原为重点, 探索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和水资源变化机理, 科学评价和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带来的水资源演变趋势; 研究经济, 生活, 生态需水变化规律, 建立该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模式, 通过多情景, 多目标分析, 提出区域水资源承载力; 通过水资源供需分析, 城市, 农业区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研究和水资源配置理论的建立, 提出实现我国最大的商品粮主产区—三江平原生态与湿地保育的环境目标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式, 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三江平原; 湿地; 水资源; 人水和谐

I 三江平原自然概况

三江平原, 又称三江低地, 即东北平原东北部, 中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 三江平原的“三江”即黑龙江, 乌苏里江和松花江, 三条大江浩浩荡荡, 汇流, 冲积而成了这块低平的沃土.

1 地理位置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地处北纬 $45^{\circ}01' \sim 48^{\circ}27'56''$, 东经 $130^{\circ}13' \sim 135^{\circ}05'26''$. 其西部为小兴安岭山地, 南部为完达山, 北部和东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行

政区域包括佳木斯市, 鹤岗市, 双鸭山市, 七台河市和鸡西市等所属的 21 个市(县)和哈尔滨市所属的依兰县, 境内有 52 个国有农场和 8 个森工局. 总面积约 10.89万km^2 , 总人口 862.5 万人, 人口密度约为 79 人/ km^2 .

三江平原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玉米, 大豆, 小麦, 平均单产 $6,000\text{kg}/\text{hm}^2$, 粮食商品率达 75%,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达 80% 以上, 是我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 三江平原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黑龙江垦区历年粮食作物产品产量统计见下表.

表1 黑龙江垦区历年粮食作物产品产量统计(1949--2000) 注:单位:吨

年份	粮食									
	总产量	谷物							豆类	
		总产量	水稻	小麦	玉米	高粱	谷子	其他	总产量	大豆
1949	10151	7577	3810	1963	425	254	497	628	2574	2574
1950	30409	17739	7532	6035	1349	623	1157	1043	12670	12670
1951	33969	21242	4218	12798	1080	486	1862	798	12727	12727
1952	57227	38148	8832	22359	1360	1190	1898	2509	19079	19079
1953	60655	48109	14055	24563	2476	1135	2761	3119	12546	12546
1954	103772	85433	22391	46278	2173	1153	1942	11496	18339	18339
1955	164190	124296	33875	68236	6876	1477	5449	8383	39894	39894
1956	283538	225032	49101	127291	15662	1592	12944	18442	58506	58506
1957	327191	270359	30486	192641	11610	1448	11894	22280	56832	56832
1958	454896	351710	38200	220289	21244	1906	30221	39850	103186	103186
1959	783743	477223	71701	249243	47300	6406	45194	57379	306520	306520
1960	491085	354763	47011	219982	32605	6174	28131	20860	136322	136322
1961	471704	319579	29960	181314	62926	4362	23654	17363	152125	152125
1962	562225	385092	26598	206510	103695	7973	18204	22112	177133	177133
1963	758013	538171	27254	306595	151696	9157	21002	22467	219842	219842
1964	903487	725574	21770	511584	143287	5115	19525	24293	177913	177913
1965	1137360	824371	22238	543807	190047	5330	31053	31896	312989	312989
1966	1364608	1025068	27273	663014	262016	6805	35563	30397	339540	339540
1967	1715163	1361468	25611	970178	279226	11348	37082	38023	353695	353695
1968	1590296	1223776	32022	864904	248444	11081	36663	30662	366520	366520
1969	1170731	942288	21137	694669	179429	4239	15930	26884	228443	228443
1970	1559767	1181240	19349	846654	235190	12556	34082	33409	378527	378527
1971	1605217	1274200	30933	829722	349197	11355	26266	26727	331017	331017
1972	1358901	1089682	12985	870330	167312	5974	13422	19659	269219	269219
1973	1036676	677010	11680	474965	156203	7986	17251	8925	359666	359666
1974	1861067	1464779	26916	1066413	321778	9280	19897	20495	396288	396288
1975	2284606	1695060	38521	1052403	538614	13330	32977	19215	589546	589546
1976	2291529	1862658	34740	1182718	612451	9075	11303	12371	428871	428871
1977	2116262	1676665	40541	1159323	442740	6921	16746	10394	439597	439597
1978	2327138	1576444	39831	1018266	482387	7705	19399	8856	750694	750694
1979	2673962	2068585	32401	1641213	362199	7158	14047	11567	605377	605377
1980	3247305	2476467	35739	2052748	364534	8559	5856	9031	770838	770838
1981	1768372	1376864	17646	1253212	95887	2520	2287	5312	391508	391508
1982	2347352	1342349	29748	1195097	92815	2259	3330	19100	1005003	1005003
1983	3310437	2506506	32432	2244818	169216	2463	2761	54816	803931	803931
1984	2739949	1783774	43596	1553092	153476	890	965	31755	956175	956175
1985	2523653	1713948	72044	1520038	95392	115	261	26098	809705	809705

1986	2990814	2030390	105584	1691502	192359	285	175	40485	960424	960424
1987	3095582	2033181	122009	1595222	217155	313	165	98317	1062401	1062401
1988	2571177	1481975	128103	1167808	116669	318	36	69041	1089202	1089202
1989	3556477	2434079	167015	1973870	224654	513	50	67977	1122398	1122398
1990	4602621	3482435	250726	2678139	444493	1029	11	108037	1120186	1120186
1991	3665609	2725918	274700	2041543	332033	253		77389	939691	939691
1992	3748940	2934079	374382	2245505	279436	2237	2	32517	814861	811304
1993	4020256	2425519	508549	1597071	251228	2574	8	66089	1594737	1594474
1994	4144379	2483452	715899	1174573	424953	3485	104	164438	1660927	1621171
1995	5145803	3651251	1238760	1356677	969940	8549	26	77299	1494552	1462054
1996	7156390	5883478	2449896	1691549	1595375	11427		135231	1272912	1257467
1997	8519638	7010823	4049746	1475454	1376591	1598		107434	1508815	1494345
1998	8685468	7473844	4758487	1408724	1226452	4989		75192	1211624	1199335
1999	9052941	8070419	5175982	1607090	1197488	6979	1288	81592	982522	949581
2000	8141318	6518426	5286365	645111	535983	4607	372	45988	1622892	1493855

注：摘编自《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 2001》

2 气候

三江平原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夏季受海洋暖气团影响，高温多雨；冬季受西伯利亚寒流控制，寒冷干燥；春秋两季是过渡时期，天气过程频繁，春风较大。全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450~650mm，其中以阿布沁河伐木场最大为 655mm，以挠力河本德北站最小为 464mm。该区降水年际变化大，以富锦站为例，最大为 829.6mm(1959 年)，最小为 338.5mm(1977 年)。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大部分集中在 6~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左右，尤其是 7 月，8 月雨量较为集中，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40%~50%；春季 5 月，6 月降水量较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20% 左右，因此本区春季干旱频繁，夏季多发生洪涝灾害。气温南高北低，平原高山区低，1 月平均温度 -21~-18℃，7 月平均温度 21~22℃，年平均温度在 1~3℃，初霜期为 9 月中下旬，中霜为 5 月上中旬，无霜期 120~140 天；结冰期长达 150~180 天，平均最大冻土深 1.6~2.0m。平均年≥10℃活动积温为 2,300~2,500℃；多年平均蒸发量在 550~840mm(E601 蒸发皿)，其中以穆棱河鸡东站最大为 835.8mm，以别拉洪河别拉洪站最小为 554mm。

3 水文

(1) 河流径流

三江平原流域总面积 $2.61 \times 10^6 \text{km}^2$ ，区内有大小江河 190 余条，分属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 3 大水系，沿河两岸多遗留古河道，牛轭湖，碟形洼地密布，地表径流滞缓，内水不能外排，地表水为沼泽形成提供了有利空间和充沛水源，每到汛期一些河流受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洪水顶托，提高了河流承泄水位，使两岸底平地排水更为困难，促使沼泽形成。

黑龙江发源于大兴安岭，有两个源头：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在洛古河汇合，汇合口以下称为黑龙江，黑龙江全长 2,821km，流经本区长 406km。

松花江有南北两源，北源嫩江发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南源第二松花江发源于白山天池，两江在三岔河汇合后称松花江干流，东流至同江注入黑龙江，全长 2309km，流域面积 55.68 万 km^2 ，流经本区长达 357km。

乌苏里江为我国东部中俄界河，是黑龙江下游我国侧第二大支流。乌苏里江发源于俄罗斯锡霍赫特岭西麓，左上源为中俄界河松阿察河及兴凯湖。两支流汇合后由南向北注入黑龙江，河道全长 890km，流域总面积

18.7万km²，流经本区长达478km。

三江地区支流大部分发源于山区，小部分发源于平原。发源于山区的河流有：穆棱河，挠力河，倭肯河等，上游坡陡流急，山洪很大；中下游河道弯曲狭小，比降甚缓，洪水宣泄不畅，河水蔓延，有的成为无尾河。发源于平原的河流有：别拉洪河，青龙莲花河等，上游是连串的水泡子及低湿地，中游为沼泽性河流，无明显河身，坡降平缓，宣泄能力极差，排水困难；至下游比降较陡，但往往受外江加水顶托。

全区主要河流有：松花江及其支流倭肯河，安邦河，梧桐河，嘟噜河，蜿蜒河；黑龙江及其支流鸭蛋河，莲花河，浓江鸭绿河；乌苏里江及其支流别拉洪河，挠力河，阿布沁河，七虎林河，穆棱河，松阿察河等共计18条河流，另外，区域内还有大小兴凯湖。

(2) 沼泽径流

沼泽径流是维持沼泽湿地生态系统重要因素。沼泽径流主要包括表面径流和表层流两部分。一般情况下，不易产生沼泽表面径流，当沼泽水位低于沼泽表面时，沼泽径流为表层流，当沼泽水位上升到沼泽时才产生表面径流。一般年份，除降雨集中季节外，多数降雨条件下沼泽径流是表层流。

三江平原典型沼泽湿地地区地表常有薄层积水，积水状况随季节的变化而各不相同，有常年积水型，季节性积水型以及土壤常年过湿润型。常年积水型多见于地下水和泛滥补给的低河漫滩和较深洼地的沼泽，积水深度一般小于1m；季节性积水型多见于河漫滩较高的部位和阶地上各种洼地边缘，主要是泛滥水，地表径流和大气降水补给。沼泽湿地的水文网状况与沼泽的类型及发育阶段有关，积水存在于其团状草丘的洼地之中，旱季水流停滞或积水消失，汛期可产生丘间水流，水文网形态转为网络状；其他类型为片状薄层积水。

(3) 地下水

三江平原地区是由山丘区与几个平原区构成，从山丘区到平原区，其含水岩组分布及水文地质条件基本相似，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也差别不大。三江平原地下

水水位埋藏浅（小于3m）及较浅（3~5m），水力坡度甚小，山前地带水力坡度为1/1,000左右，平原内部水力坡度为1/5,000~1/10,000。邻近江河两岸水力坡度为1/500~1/150。故平原内部径流微弱，排泄边界径流相对较强，故地下水流向分别指向所排泄的江河或湖泊。三江低平原地下水总体流向为西南~东北，穆棱兴凯湖平原地下水总体流向为西北~东南。

三江平原地区地下水类型有：第四系松散砂砾石孔隙水，第三系碎屑岩类裂隙水和基岩裂隙水。山丘区基岩裂隙水埋藏条件下复杂，富水性不均一；山前台地水量贫乏；平原区含水层结构单一，厚度大，水量丰富，具有良好的开发条件。

4 土壤

(1) 土壤类型

三江平原地表土壤多为富有机质的黑土，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泥炭土和暗棕壤。

(一) 黑土类

黑土类包括黑土和草甸黑土，主要分布在富锦，宝清，集贤和佳木斯市一带的漫岗地上。垦殖率已达80%，基本上已没有荒地。黑土层厚达75~95cm，理化性质较好，是区内好的耕地土壤。但属坡耕地，干旱，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是该土利用中的主要问题。

(二) 草甸土类

草甸土类是非地带性的土壤，在黑土和白浆土区均有分布，包括草甸土，盐化草甸土，潜育草甸土和白浆化草甸土，是本区最主要的耕地土壤。垦殖率达55%，地形平坦，黑土层厚达50~100cm，是发展农业最有潜力的土壤，但土质多粘重，易发生黏朽冷浆，雨水集中时有内涝威胁。盐化草甸土分布在富锦，集贤，宝清三个县的平原中，以友谊农场，五九七农场，二九一农场，三个国有农场中为多，盐分类型以苏打为主，需要逐步进行改良。

(三) 白浆土类

白浆土类包括白浆土，草甸白浆土和潜育白浆土，集中分布在穆棱，兴凯湖平原和抚远三角洲，是三江地区的主要耕地土壤，

仅次于草甸土。白浆土的黑土层肥力较高，白浆层贫瘠且淀积层坚硬。白浆土的好坏因其黑土层厚度而异。本区白浆土的黑土层厚度一般为 10~20cm，少数达 30cm，还有一部分不足 10cm。总的趋势是由西往东越接近乌苏里江黑土层越薄，白浆土的垦殖率已达 43%，部分荒地可以开垦为耕地。

(四) 沼泽土类

沼泽土类包括草甸沼泽土和泥炭沼泽土，分布在区内各地的低洼地中。沼泽土类表层有厚度不等的泥炭层，下部为腐泥层或潜育层，季节性积水或常年积水。草甸沼泽土排水后可做农用地，现在该土的垦殖率为 15%，其他沼泽土可作为牧用地。

(五) 暗棕壤类

暗棕壤类包括山地暗棕壤，草甸暗棕壤

和砂质暗棕壤，分布在山地丘陵，平原中的残丘，岗地陡坡和河岸砂丘上。除了坡度稍缓的草甸暗棕壤可开为耕地外，多数只适于做林业用地。

此外，小面积的泛滥地土壤，分布在河流两岸，间歇性受河流泛滥影响，包括泛滥地草甸地和泛滥地沼泽土。防洪排泄后部分可做耕地利用，多数用于牧，副用地。

(2) 土壤养分

三江平原地区主要土壤养分状况及评价统计情况见下表。三江平原地区耕层土壤养分为有机质及全量养分含量高，属于中等-丰富级；速效养分缺乏，农业生产中应该增施速效肥料。

表 2 三江平原地区主要土壤类型养分含量

土壤类型	土层	有机质 (g/kg)	全 N (g/kg)	全 P (g/kg)	全 K (g/kg)	速效氮 (mg/kg)	速效磷 (mg/kg)	速效钾 (mg/kg)
棕壤	耕层	59.1	3.2	2.2	19.2	66.3	35.2	222
黑土	耕层	36.9	1.9	2.0	-	52.8	188	-
白浆土	耕层	66.6	3.7	2.2	15.7	78.2	6.0	119.8
草甸土	耕层	61.2	3.5	2.0	12.0	72.2	23.1	117.6
沼泽土	耕层	74.7	6.7	2.7	19.0	60.0	16.0	102.7

5 地形地貌

三江平原全区总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情况为：本区西北部是隆起的小兴安岭东南缘，以及零星分布的孤山残丘，构成低山丘陵地貌单元。南部有隆起的完达山东西横贯，在完达山西部，有勃依弧形构造断陷盆地形成倭肯河河谷；在小兴安岭东南缘，有梧桐河，嘟噜河等南北向河谷，以及完达山岭中的纵横割切河谷，组成山区河谷地貌单

元。

三江平原北部为两岭之间的中生代合江内陆断陷，第四纪以来一直间歇性沉降，尤其全新统以来下沉更甚，经三大江冲积形成沉降的三江冲积低平原。在完达山以南，有沉降的穆稜河，兴凯湖冲积低平原组成平原区地貌单元。三江平原地区可分为山地与平原两大单元，自西北向东南，依次由小兴安岭山地，三江平原，那丹哈达岭山地和穆稜

兴凯湖平原构成.地貌形态类型可分为低山,丘陵,山前台地,扇形平原,河谷平原,低平原与山间平原.其中平原,洼地和沼泽为 664.3 万 hm^2 ,占 61%;山地,丘陵为 424.7 万 hm^2 ,占 49%.

6 植被分布

三江平原的天然森林是以柞树为主的杂木林和以山场,白桦为主的次生林,乔木高 8~11m,郁闭度 0.4~0.6.灌木高 0.5~0.9m.草本植物为以禾本科和菊科为主的杂草类.在残丘背阴的山坡上分布着杨桦林,覆盖度

0.3~0.5,禾木高 10~20m,林下植被与阔叶林相似.天然森林多分布在平原中残丘,山前台地,河流两侧,呈岛状分布,以蒙古柞林为主.在江心岛,多生长柳树和灌木等.

人工林多为柳,杨,榆,槐树,落叶松,樟松等,分布于城市附近及公园,农田防护林和道路两侧.三江平原现有草原 $4.2 \times 10^4 hm^2$,分布于富锦,集贤,宝清,桦川等县的漫坡漫岗和松花江平原上.沼泽植被主要分布在抚远,同江,绥滨,饶河,萝北及富锦,宝清县的低湿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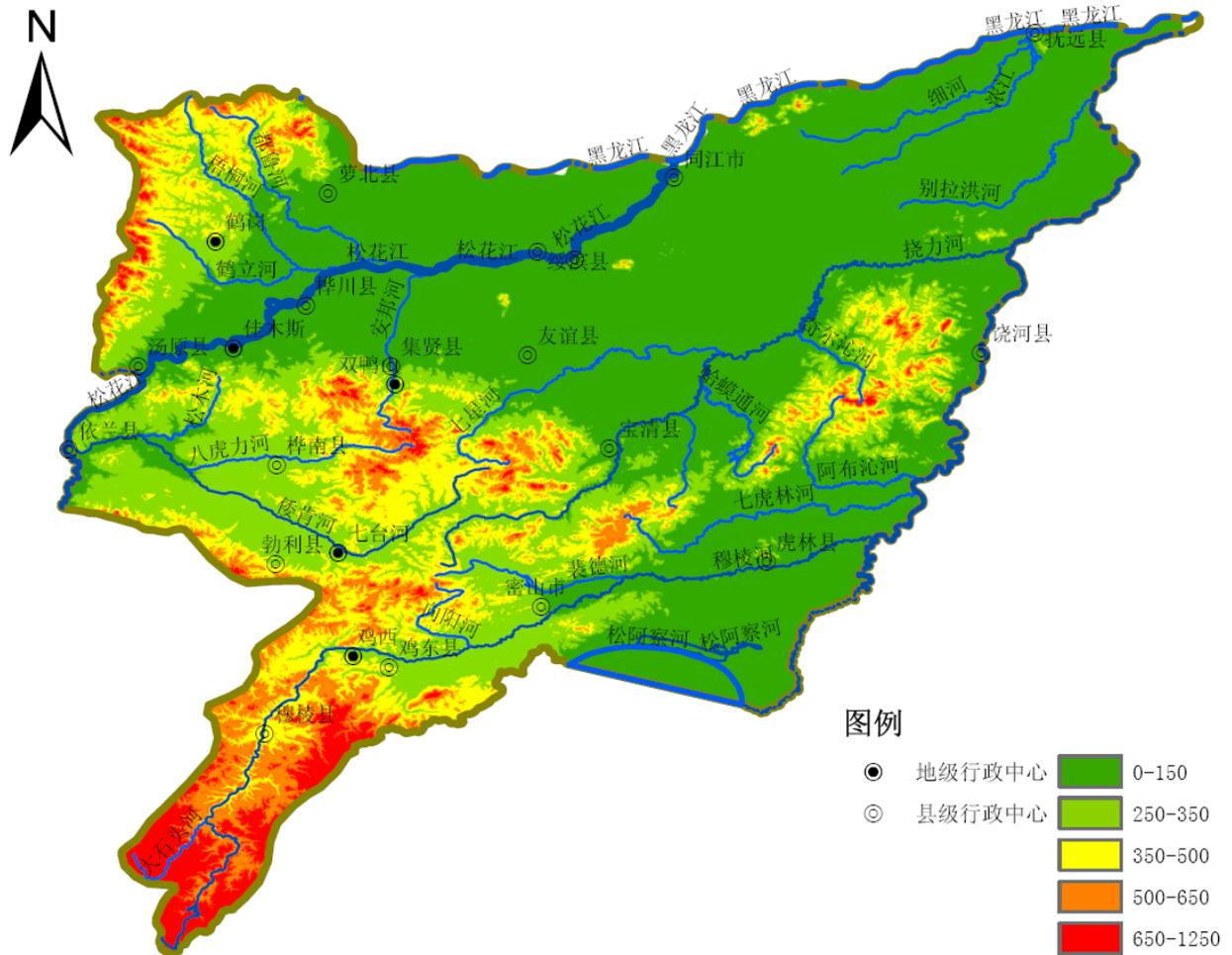


图 1 三江平原地貌,水系

II 三江平原湿地

1 三江平原湿地分布

三江平原地区的天然湿地总面积为 156 万公顷，是黑龙江省湿地总面积的 36%。湿地主要位于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及浓江，别拉洪河，七星河，挠力河，嘟噜河，穆棱河等流域地区。

三江平原沼泽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亚洲东北部的禽类繁殖中心和亚洲北部水禽南迁的必经之地。有大片沼泽湿地，如地跨中俄两国的兴凯湖湿地是三江平原野生动物迁徙和繁殖的重要栖息地。兴凯湖湿地被列入了 Ramsar 名录。因此，三江平原的沼泽湿地的区位优势不仅在我国，在世界也具有重要影响。

2 三江平原湿地现状

三江平原在未开发前存在大面积的沼泽湿地（占三江平原总面积 3/4 以上）。湿地是三江平原原始生态环境中最主要的影响因

素，因此，我们称三江平原为“北大荒”。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 4 亿人的吃饭问题，国家组织了十几万转业官兵和 40 余万城市青年来此开荒。50 年来，建设者们通过对三江平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开发，在三江平原地区开垦出 200 余万 hm^2 的黑土地，造就了 36 个农场和数不清的连队村庄，将苍莽荒芜的原野改造成富饶美丽而生机勃勃的良田，使这里成为中国重要的年产 70 亿公斤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然而，过度地开荒也破坏了这里的原始生态环境，三江平原已由原来自然生态为主的环境系统转变为半自然生态为主的环境系统。湿地面积缩小了 80%，空气湿度减小，降水量减少，气温增高，许多野生动物被迫迁徙他乡，曾肥得流油的耕地也正面临着日益贫瘠的威胁。

表 3 三江平原各时期的自然湿地面积

年份	湿地面积($\times 10^4 hm^2$)	占平原总面积的比例(%)
1954 年	353	32.42
1976 年	221	20.30
1986 年	139	12.77
1995 年	121	11.17
2000 年	96	8.81
2005 年	81	7.45

注：黄妮,刘殿伟,王宗明,等. 1954~2005 年三江平原自然湿地分布特征研究,湿地科学,2009,7(1):33-39

三江平原的湿地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之一，一直倍受全球的关注，特别是 1994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实施之后，三江平原就成为了国家高度重视的湿地保护区域。1995 年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保护三江平原的湿地。1996 年农业部再次强调在三江平原注意湿地保护和农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性。1998 年黑龙江省政府决定在省内停止任何形式的湿地开发，对不宜耕种的土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地，以恢复这里的生态环境。2002 年三江平原被世界湿地公约组织列入世界公

约名录。2003 年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

III 水资源现状

1 水资源储量

三江平原区内共有大小河流 190 余条，其中主要河流 20 条，分属黑龙江，松花江及乌苏里江三大水系。三江平原地区水资源总量为 161.96 亿 m^3 ，其中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为 116.30 亿 m^3 ，地下水 85.56 亿 m^3 ，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水量 39.91 亿 m^3 [1]。

地表水资源量是指由降水形成的河流，

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中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用多年平均年河川径流量表示。三江平原地区多年平均地表水径流总量为116.30亿m³。p=75%年径流量59.91亿m³，p=50%年径流量99.36亿m³。

地下水资源量是指浅层地下水中参与水循环且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用多年平

均年补给量(不含井灌回归补给)表示。三江平原的平原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67.04亿m³(含与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间的重复计算量)。全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85.56亿m³，山丘区与平原区之间的重复计算量为5.95亿m³，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24.47亿m³

表4 三江平原各分区地表水资源

水资源分区名称	面积 / km ²	多年平均径流量/亿m ³	设计年径流量/亿m ³			
			P = 25%	P = 50%	P = 75%	P = 95%
穆稜河	18829	23.69	31.07	20.94	13.14	6.01
阿布沁河	1667	3.87	4.88	3.55	2.57	1.46
七虎林河	2690	3.31	4.20	3.00	2.10	1.10
挠力河	23283	23.51	31.57	19.41	10.87	4.11
倭肯河	11123	12.53	16.62	10.82	6.52	2.76
梧桐河	4565	12.26	15.87	11.07	7.32	3.69
嘟噜河	1849	3.66	4.80	3.30	2.10	1.00
安邦河	1679	1.55	2.13	1.31	0.73	0.28
青龙莲花河	2825	1.55	2.14	1.16	0.55	0.13
浓江鸭绿河	4051	3.56	4.91	2.67	1.25	0.29
别拉洪河	3059	2.38	3.24	1.76	0.88	0.27
松花江干流	11749	9.71	13.01	8.14	4.71	1.89
黑龙江干流	6589	6.83	9.29	5.70	3.31	1.31
乌苏里江干流	11719	7.90	10.46	6.53	3.86	1.67
全区	105677	116.30	154.19	99.36	59.91	25.97

表5 三江平原各分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

水资源分区名称	区域面积 / km ²	地下水资源量			平原区可开采量	降水补给量		河川基流量		平原区	
		合计	山丘区	平原区		平原区	山丘区	平原河道排泄量	山丘区	山前侧向补给量	河川基流地表水补给量
穆稜河	18829	14.03	8.07	7.12	7.1009	3.75	8.07	0.15	7.48	0.46	0.7
阿布沁河	1667	1.37	0.92	0.48	0.4607	0.39	0.92	0.01	0.89	0.01	0.02
七虎林河	2690	2.35	0.48	1.99	1.9679	1.59	0.48	0.04	0.46	0.03	0.09
挠力河	23283	14.13	3.88	10.82	10.7711	8.66	3.88	0.09	3.49	0.11	0.45
倭肯河	11123	5.53	2.93	2.95	2.4671	2.13	2.93	0.06	2.39	0.21	0.14
梧桐河	4565	3.68	2.18	1.71	1.7157	1.03	2.18	0.02	1.84	0.08	0.13

嘟噜河	1849	1.76	0.54	1.37	1.361	0.88	0.54	0.02	0.47	0.05	0.09
安邦河	1679	1.09	0.61	0.48	0.46	0.46	0.61	0.00	0.52		0.01
青龙莲花河	2825	3.84		4.21	4.2028	2.56		0.06			0.36
浓江鸭绿河	4051	4.44		4.83	4.8181	3.07		0.07			0.39
别拉洪河	3059	2.28		2.32	2.3541	2.13		0.04			0.04
松花江干流	11749	14.3	1.4	14.2	14.2536	8.43	1.4	0.12	1.28	0.04	1.26
黑龙江干流	6589	6.11	1.22	5.35	5.3133	3.31	1.22	0.07	1.11	0.02	0.44
乌苏里江干流	11719	10.66	2.25	9.23	9.1802	5.85	2.25	0.2	2.16	0.02	0.79
全区合计	105677	85.56	24.47	67.04	66.4266	44.24	24.47	0.95	22.09	1.03	4.92

表6 三江平原各分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亿m³

水资源分区名称	区域面积 /km ²	多年平均径流量	地下水资源量			平原地下水可开采量	地表与地下水重复量	水资源总量
			合计	山丘区	平原区			
穆棱河	18829	23.69	14.03	8.07	7.12	7.10	9.84	27.88
阿布沁河	1667	3.87	1.37	0.92	0.48	0.46	0.95	4.29
七虎林河	2690	3.31	2.35	0.48	1.99	1.97	0.78	4.88
挠力河	23283	23.51	14.13	3.88	10.82	10.77	5.18	32.47
倭肯河	11123	12.53	5.53	2.93	2.95	2.47	2.93	15.14
梧桐河	4565	12.25	3.68	2.18	1.71	1.72	2.34	13.59
嘟噜河	1849	3.66	1.76	0.54	1.37	1.36	0.84	4.58
安邦河	1679	1.55	1.09	0.61	0.48	0.46	0.54	2.10
青龙莲花河	2825	1.55	3.84		4.21	4.20	1.35	4.05
浓江鸭绿河	4051	3.56	4.44		4.83	4.82	1.44	6.56
别拉洪河	3059	2.38	2.28		2.32	2.35	0.19	4.47
松花江干流	11749	9.71	14.30	1.40	14.20	14.25	5.87	18.14
黑龙江干流	6589	6.83	6.11	1.22	5.35	5.31	2.74	10.19
乌苏里江干流	11719	7.90	10.66	2.25	9.23	9.18	4.93	13.63
全区合计	105677	116.30	85.56	24.47	67.04	66.43	39.91	161.96

注：钟幼兰,王启东.三江平原水资源现状及开发利用方向分析.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08. 36(6): 133-136

水资源总量为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量。水资源总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地表水资源量，第二部分为地下水资源量中与地表水资源量计算之间的不重复量。三江平原地区水资源总量为161.96亿m³，其中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为116.30亿m³，地

下水85.56亿m³，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水量39.91亿m³

2 地下水水资源开发利用

三江平原地下水大规模开发历史较短，主要是从1958年10万军垦大军进入北大荒

后才开始的。

三江平原地势低平，大部分地区土壤质地粘重，排水能力差，很容易形成涝灾而减产。因此，为了改良低湿地，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三江平原开始种植水稻，实现“以稻治涝”，取得了显著的效益。三江平原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增加，1981 年仅为 7 万 hm^2 ，90 年代后迅速发展，2006 已达到 101.53 万

hm^2 。从 1996~2000 年，在三江平原实际灌溉面积中，97%左右为水田面积，69%为井灌水稻。由于水田面积的迅速增加，地下水开采量也迅速增加，再加上人为浪费严重以及管理不力，使得三江平原地下水普遍下降，吊泵和局部超采现象时有发生，三江平原地下水资源的平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表 7 1996~2000 年三江平原水田面积 单位：万 hm^2

年份	灌溉面积	水田面积	井灌水田面积
1996	57.0	55.0	33.6
1997	78.1	75.1	51.4
1998	87.7	85.8	61.0
2000	99.3	95.3	65.9

表 8 三江平原地下水开采量 单位： $\times 10^8 \text{m}^3/\text{a}$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初
地下水开采量	5.67	11.76	12.38	21.38

表 9 2000 年三江平原地下水开采分区情况

项目	萝北	同抚	挠力河	安邦河	倭肯河	穆棱河	合计/平均
平原面积 ($\times 10^4 \text{km}^2$)	1.04	1.53	1.63	0.40	0.50	1.29	6.39
地下水资源量 ($\times 10^8 \text{m}^3$)	15.79	16.10	14.15	6.42	4.05	13.81	70.32
地下水可开采量 ($\times 10^8 \text{m}^3$)	12.86	12.96	11.17	5.38	3.10	10.47	55.94
可开采比例 (%)	0.81	0.81	0.79	0.84	0.77	0.76	0.80
可开采模数 (mm)	123.7	84.7	68.5	134.5	62.0	81.2	92.4
总开采量 ($\times 10^8 \text{m}^3$)	6.56	8.51	12.26	6.5	2.95	11.11	47.89
开采利用率 (%)	51.0	65.7	109.8	120.8	95.2	106.1	91.4
实际开采模数 (mm)	63.1	55.6	75.2	162.5	59.0	86.1	83.6
可开采模数与实际 开采模数之 差 (mm)	60.6	29.1	-6.7	-28	3	-4.9	8.9
超采量 ($\times 10^8 \text{m}^3$)	-	-	1.09	1.12	-	0.64	2.85

IV 人-水和谐水资源管理

三江平原水土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大规模农业的有利条件. 经过近50年的开发, 三江平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而且正担负着保障我们未来粮食安全的重任. 但是, 大规模防洪治涝工程的建设, 改变了原始的水文条件. 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和生活用水不断增加. 尤其是排水导致湿地补给水源的减少, 使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这些问题和矛盾促使人们反思以往水利工程及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得失, 提出了人水和谐的水资源管理理念.

(1) 探讨排灌结合, 排蓄结合的途径

过去三江平原的水利工程建设主要以防洪治涝工程为中心, 开挖了大量的排水沟渠, 排除地表积水. 经过几十年的运行, 一些排水沟渠周边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设计的排水量过大, 甚至有的沟渠不应再仅仅担负排水的任务, 出现了过度排水的问题; 另一方面, 某些地区的水资源已经出现短缺的现象, 从排水区域周边更大的范围考虑, 宝贵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洪水和排水的贮蓄工程, 开展洪水与排水的资源化实验, 研究, 改变过去只排不蓄的单一模式, 探讨排灌结合, 排蓄结合的途径, 保证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2) 兼顾湿地生态需水, 实施湿地补水工程, 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湿地是三江平原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有5处, 省级自然保护区15处, 其中大部分为湿地自然保护区. 三江平原的农业开发和湿地用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 目前湿地普遍存在着缺水的问题, 严重地威胁到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三江平原的农田面积已经相对稳定, 湿地保护以尽量维持现有湿地保护区的湿地面积为原则. 特别是对从流域的角度出发, 考虑上下游的湿地用水需求, 考虑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研究就近利用洪水和农田排水对湿地进行补水, 以缓解湿地缺水的不利局面, 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3) 恢复生态流量, 重建河流生态廊道

河流的形态, 特别是河流的生态廊道对

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上下游间的物种交流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河流生态廊道的重建对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要保证河流不断流, 保证枯水季节河道中一定的径流量; 另一方面研究和调查河流中下游地区的具体情况, 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 在保证下游现有农业生产安全的情况下, 调整和改造原有的上游排水工程, 实施对下游河道的补水, 重建河流纵向的生态廊道. 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尽量拓宽已经被束缚的狭窄河道, 最大可能地恢复已经不连续的横向与纵向生态廊道.

(4) 充分利用地表水资源, 控制地下水的开采

三江平原泡沼众多, 大小河流190余条, 地表水资源比较丰富, 还有松花江, 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丰富的过境水量. 三江平原下部普遍沉积了较厚的砂砾石含水层, 厚度大, 透水性强, 贮水条件好, 地下水资源也比较丰富. 但是整个三江平原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存在着地表水利用程度低, 地下水过度超采的现象, 两者的失衡问题比较严重. 三江平原地表径流的利用率仅为27.2%, 地下水超采近5亿吨, 地下水位在不断下降. 与利用地表水相比, 利用地下水具有取水方便, 工程简单, 费用较低等优点, 所以地下水成为了用水户的首选. 特别是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发展水稻种植的积极性, 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而新增的水田面积很大部分是依靠地下水灌溉, 加剧了地下水的用水危机.

面对水资源开发利用中严重的不平衡状况, 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 一方面要在规划上加大对地表水的开发了利用, 优先考虑利用地表水资源. 另一方面加强地下水开发利用的规划, 尤其是水田发展的规划, 严格地下水用水审批制度, 控制地下水超采.

(5) 倡导和推广绿色农业, 控制水质污染

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农业生产在三江平原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此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 农业用水的比重也非常的大. 据《三江平原综合治理修订水利规划报告》, 农业用水量约占总用水量的87.5%, 所以农业回归水量也相当的大. 另据《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近期

防洪治涝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05)》,三江平原地区河流的水质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污染主要为有机污染,污染物为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个别河流也有重金属污染.造成污染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向河流,另一方面是农业的面源污染.推广和倡导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水环境的重要措施,应该对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实施严格的管理和限制,确保农田排水的水质.同时,良好的农田回归水也为农业排水的综合利用提供了条件.

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

参考文献

- [1]. 梁春英,王熙,杨天维. 精准农业在三江平原的应用研究与探讨[J]. 农机化研究, 2004(3): 193-194.
- [2]. 马向东,于建国,李宝林. 三江平原水利建设中的环境问题分析[J].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2006, 18(2): 104-107.
- [3]. 王立峰. 三江平原发展灌溉和保护湿地工程建设的必要性[J]. 现代化农业, 2007(7): 21-22.
- [4]. 刘东,付强,马永胜,等. 三江平原井灌区水资源系统分析与可持续利用[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 [5]. 李伟业.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调控模式研究[D]. 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 2007.
- [6]. 栾兆擎,章光新,邓伟,等. 三江平原50a来气温及降水变化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 21(11): 39-43.
- [7]. 张桂华,郭洪彬,等. 三江平原古水文网变迁[J]. 黑龙江水专学报, 2002, 29(2): 17-19.
- [8]. 罗先香,何岩,等.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水系统研究浅析[J]. 生态学杂志, 2003, 22(1): 40-42.
- [9]. 王勇,柏钰春,尹喜霖,等. 三江平原生态地质环境分区研究[J].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004, 31(6): 11-18.
- [10]. 尹喜霖,王子东. 三江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系统[J]. 地下水, 2004, 26(1): 17-19, 37.
- [11]. 赵德林. 三江平原低产土壤与改良[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12]. 李伟业,付强,赵青.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水文水资源环境变化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 2007, 14(6): 298-300, 305.
- [13]. 周志强. 三江平原地区植被与植物资源[M].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5, 342.
- [14]. 章远钰,崔瀚文. 东北三江平原湿地环境变化[J]. 生态环境学报, 2009, 18(4): 1374-1378.
- [15]. 刘红玉,吕宪国,张世奎. 三江平原流域湿地景观多样性及其50年变化研究[J]. 生态学报, 2004, 24(7): 1472-1479, i005.
- [16]. 黄妮,刘殿伟,王宗明,等. 1954—2005年三江平原自然湿地分布特征研究[J]. 湿地科学, 2009, 7(1): 33-39.
- [17]. 钟幼兰,王启东. 三江平原水资源现状及开发利用方向分析[J].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08, 36(6): 133-136.
- [18]. 王韶华,田园. 三江平原地下水埋深变化及成因的初步分析[J]. 灌溉排水学报, 2003, 22(2): 61-64.
- [19]. 王韶华,刘文朝,刘群昌. 三江平原农业需水量及适宜水稻种植面积的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 2004, 20(4): 50-53.
- [20]. 杨湘奎,孔庆轩,李晓抗. 三江平原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模式探讨[J].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006, 33(3): 49-52.
- [21]. 曲德双,韩守江. 三江平原生态友好水资源管理的思考[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9(1): 72-73.
- [22]. 王艳丽,艾晓燕,韩守江. 三江平原水资源

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与可持续利用
对策探讨[J]. 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
科学学报, 2008, 24(5): 95-98.



図們江流域開発の兆し

大澤正治¹

I 経緯と UNDP の役割

図們江は長白山（北朝鮮では白頭山と呼ぶ）等に源を発し、中国、北朝鮮、そしてロシアの国境地域を流れ日本海に注ぐ全長約 500km の国際河川である。

図們江河口は、1860 年の中露北京条約、中露通商協定の締結により、19 世紀は、中口による国際商業港として栄えた。しかしながら、20 世紀に入ると、1913 年に中露通商協定が破棄され、さらに、1930 年代の旧日本軍による東北 3 省の占領などにより、国境はにわかに緊張感が漂い、図們江を介した交易は中断した。

このような歴史を重ねた図們江河口地域、具体的には中国琿春、北朝鮮羅津（現在、羅先直轄市）及びロシア・ポシェット湾岸地域で囲まれる地域の開発に国連 UNDP の係わりが表面化したのは 1991 年からである。

当時は、中国においては天安門事件、ロシアにおいては 80 年代の東西冷戦の終結、北朝鮮においては金日成体制の終焉など当該地域の諸国はすべて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たこともあり、図們江河口を中心とした下流域では、関係諸国刷新された体制による新たな多国間協力による新たな開発構想が浮上した。中国は図們江河川港ないしロシア、北朝鮮の港を借港出港する政策を打ち出し、ロシアはナホトカ自由経済区構想、北朝鮮は羅津・先鋒自由経済貿易地帯を提案した。このような関係諸国の動きから、東アジアの安定を求め、国際経済発展と国際政治均衡の両面からの調整の必要性を重視し、まさに予防外交の観点を UNDP は重視した。

プロジェクトは、UNDP がこの地域のインフラの整備のために 20 年間に 300 億ドルの投資を行い、国際共同管理の経済特区建

設構想が打ち出された。実際には、関係国が主体となる中国、ロシア、北朝鮮、韓国、モンゴルの北東アジア 5 カ国による 1995 年 12 月締結「図們江経済開発区及び東北アジア開発協商委員会の設立に関する協定」によって一步を踏み出すことになった。

しかしながら、図們江河口地域自由経済開発地域構想は、北朝鮮の核疑惑、ロシア経済の停滞などの障害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が難しく、苦渋の道を歩むことになった。

この難局を打開すべく、開発のインセンティブを強化するために、2005 年より開発地域の対象を中国東北 3 省、サハリン、ハバロフスクを含むロシア極東地域、さらにモンゴル東部や韓国の東海岸地域までに拡大し、GTI (Great Tumen Initiative) 体制を整備した。GTI 体制では関係 5 カ国が前衛となり、UNDP はこれらの国々を支援する後衛と位置づけられた。従来の図們江河口地域は Small Tumen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この推進体制の変更では、UNDP は国連としての予防外交のスタンスを支援という形で維持しながら、関係諸国の主体性をさらに明確にするとともに、この広域地域の豊富な資源の活用及び道路、鉄道、海路等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インフラの範囲拡大を狙った強化の重要性を明らかにする等投資の機会を関係諸国以外にもアピールする効果を求めたと理解できる。

GTI 体制では、エネルギー、環境、観光、交通及び開発のための投資促進に重点を置き、具体的な 10 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を目指すことになった。なかでも、道路、鉄道のネットワーク型インフラの整備と河川汚場と北朝鮮茂山鉦山の排水が主たる原因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た。

このような図們江開発構想に対して、日

本は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Non-governmental 参加の係わりを当初から続けてきた。

II 中国の長吉図開発計画

2009年11月18日、中国国務院は「中国図們江区域協力開発計画」即ち、長吉図（長春、吉林、図們）開放開発先導区を正式に認可した。

同計画は、総面積 2.36 万km²、人口 800 万人におよぶ帯状の長吉図地域において、交通、水、エネルギーのネットワーク・インフラの開発により、物、人、情報の流れを整備し、2010年の一人あたりGDPを2002年の倍増させる目標を掲げた。

本計画で注目されることは、先ず、西部大開発に焦点を置いていた従来の中国開発政策から取り残されていた東北地方吉林省の図們江流域地域にスポットライトをあてたことであり、中国国内的にみて、当該地域の開発計画が地方レベルから中央レベルに格上げされたことに大きな意義を見出されている。他でもなく、西部、あるいは北京、上海における開発の限界を示していることとの見方もできるが、当該地域では、今後、中央レベルの新たな支援政策が打ち出されることに期待が集まっており、「先行先試」即ち社会実験としての挑戦が認められたとの認識が広まっている。

本計画が中央レベルに格上げされたとの意義については、従来の Small Tumen 開発計画では中国側の係わりの範囲が延辺朝鮮族自治州に限定されていたのに対して、自治地区に限定せず長春を含めた帯状の開発地域に拡大し、ネットワークによる物、人、情報の動きを重視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もうかがい知ることができる。本計画の実施にあたって、延辺自治区は前線であり、琿春市は国際的な窓口機能をはたし、長春は後衛に位置する司令機能として中国中央との調整にあたる役割分担がなされている。

本計画への投資として、日本、韓国、欧米諸国など海外とともに、香港、上海、浙江省、広東省など中国国内にも期待しており、中国国内の経済の東北シフトのアクセラを踏む動きとして同計画は注目される。

ここで留意すべきことは、本計画と GTI

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日本を含め東アジア諸国が注目することである。計画には、中ロ、中朝間の交通ネットワークの整備など資源豊富な国境地域の開発として省際その他、国際的な協力を重点が置かれ、総合保税区、国境経済協力区、図們江地区国際自由貿易区の検討課題が明らかにされており、改めて、国際間調整の重要性が提起されている。

その推進にあたっては、長春に図們江地域協力開発事務機構や東北アジア地区地方政府首脳会議連絡処を設置し、東北アジア投資協力基金を設立するなど、GTI における中国のリーダーシップ発揮に連動する推進体制の基盤整備のプログラム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中国の動きに対して、GTI 内の諸国バランスがどうなるか、隣接国のみならず東アジア諸国の反応に改めて世界の関心が寄せられている。

2009年12月4日、日本の各新聞に北朝鮮が UNDP の図們江開発プログラムから脱退する旨の報道が成された。確かに、北朝鮮からの脱退の申し出は 2009 年の初頭に出され、今般の中国・長吉図開発計画直後にこの年 2 度目の脱退申し出がなされたことになる。北朝鮮の出方に中国の動向が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と推察できる。北朝鮮の UNDP へのスタンスは明らかに揺れており、2010年2月24日の時事速報（中国時事通信社）によれば、北朝鮮は UNDP・GTI 脱退を改めて撤回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III 琿春市

ロシア、北朝鮮と国境を接する辺境都市である中国吉林省琿春市には人口約 22 万人が居住しているが、実際には、一時滞在者を含めて約 25 万人規模の都市であると推測されている。琿春市役所の説明によれば、吉林省のなかにあつて、延辺朝鮮族自治州に属する琿春市の人口の約半分が漢族であり、約 4 割が朝鮮族であり、残り 1 割が満州族である。琿春市は延辺朝鮮族自治區の中心である延吉までは車で約 1 時間半のところに位置している。延吉琿春間の高速度道路はこの 1,2 年の間に前線の供用を開始する。

また、琿春周辺の地域は、石炭をはじめ、

鉄鉱石、金、タンゲステン、フルオライトなど地下資源が豊富である。石炭の埋蔵量は吉林省最大である。さらに、木材資源、水産資源にも恵まれている。金（鉱山資源）、木（林業資源）、水（水資源）、火（電力資源）、土（農業資源）及び人（人力資源）の5行を抱える都市である。このため、農業も含め、様々な物流の国際的基地となる潜在性が高く、それだけに道路、鉄道路、海路の開発が期待されている。

現在、琿春には国境を越える四つの税関がある。北朝鮮との窓口は圈河、沙坨子である。羅津港への道は圈河からであり、圈河税関が主たる税関となっている。ロシアへの道は長嶺子にある税関で国境を越えるが、現在でも、年間の貨物通過能力60万トン、旅客通過能力は60万人であり、賑わいをみせている。

4番目の税関は中口琿春鉄道税関であり、琿春边境経済合作区の鉄道積み換え駅内にある。しかしながら、現在、ロシア側の鉄道運行会社の経営問題から、線路はつながっているものの、中口間の鉄道は中断しており、復旧が望まれている。

琿春市にある琿春边境経済合作区は、市の南部に位置し、約100km²の規模を有し、1992年に認可された中央レベルの開発区である。

現在、以下の開発が進んでいる。

電子工業団地	宝力通信等
縫製工業団地	小島衣料, TRY (韓国) 等
生物製品工業団地	医薬品製造等
中口共同市場貿易区	中口流通基地 (市場)
木製品工業団地	木材加工等
ロシア工業区	木材加工等
輸出加工区	食品加工等

琿春市の共同市場貿易区内では、中国人と中国産商品が出該区への出入の制限を受けず、ロシア人は許可された証明を提出すれば、ビザを持たずに自由に取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また、両国民が区域外に持ち出す商品に対しては、1人につき1日の価格3000元以

下であれば、輸入関税等が免除される。この貿易区は今後の図們江流域の自由経済の実験的、先導的役割をはたしている。

琿春市の経済開発に関しては、西部開発と同等の扱いを行い、国家奨励プロジェクトリストに記載された産業に従事する内外企業に対しては、企業所得税率を15%に引き下げている。

また、東北旧工業基地振興、边境少数民族としての優遇策も適用される。

IV 日本海横断定期航路

2009年6月、琿春からの荷を韓国、日本へ運ぶ目的を掲げたロシアのザルビノ港、韓国東草（ソクチョ）港と新潟港を結ぶ日本海横断定期航路が実現した。日韓口中による国際的北東アジアフェリーである。これまで琿春からの荷は、陸路、空路を使っても大連経由で4~6日を要していたが、日本海横断定期航路によれば20~30時間で新潟港に到着する。この大幅な時間短縮と輸送コスト削減が急速に、図們江流域と日本を近づけ、この地域の開発への期待を大きく膨らませる。

また、この他にもわが国の国土交通省の社会実験として、北東アジアフェリー同様15~20千トンクラスのコンテナ船が、2010年1月（実際には3月に延期）にはザルビノと新潟、金沢、敦賀間で運航される準備も進んでいるなど様々な日本海横断海路開発の構想が検討され始めている。検討は港、ルートを選定の他、費用負担、リスク負担をめぐる多国間の調整が焦点となる。日本海横断海路では国際的な様々な主体が考えられるが、北東アジアフェリー構想が4国による共同運航であることの評価も改めて論議される。

日本海横断のこれらの航路がこれから普及するための日本側の課題は、日本から中国、北朝鮮、路亜シア側へ何を輸送するかというニーズと日本国内における日本海岸から太平洋岸への国内輸送効率そして経済性である。

一方、中国はこのようなロシア・ザルビノ港を利用するとともに、北朝鮮羅津港の借港出港の準備を進めている。

中国は、羅津港から日本向けへの航路を計画するとともに、中国国内航路のあつかいとして羅津上海間航路構想も検討している。この航路については、中国国内物流促進を目的とする他、韓国浦項へ寄港することにより、ここからの自動車部品を羅津経由で長春など中国東北地方の自動車産業へ搬入することも念頭に置いている。

なお、中国北朝鮮間では中国による羅津港借港の合意がなされているが、実際には、北朝鮮側の受け入れ整備とともに琿春・圈河から羅新までの陸路整備を急ぐ必要があり、「中国図們江区域拋8字力開發計画」の一環としていち早く、取りかかっている。

日本海、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海路の開発に中国が積極的な役割をはたすことは、中国国内の経済発展のみならず、北朝鮮、ロシア・シベリア経済の活性化にも効果をあげてを視野に入れてのことである。このようなことから、この海路開発が長年、夢見てきた図們江流域の国際経済開発をはじめて現実へ向け、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先行先試となる重要なきっかけとな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V これからの課題

中国が動いた。中国の長吉図開發計画は確実に、GTIをゆさぶるに違いない。

きっかけは様々なことが積み重な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る。国内の事情に基づくとともに、ロシア、北朝鮮の隣国として、これらの国々の変化の確かな予感を中国は感じずに違い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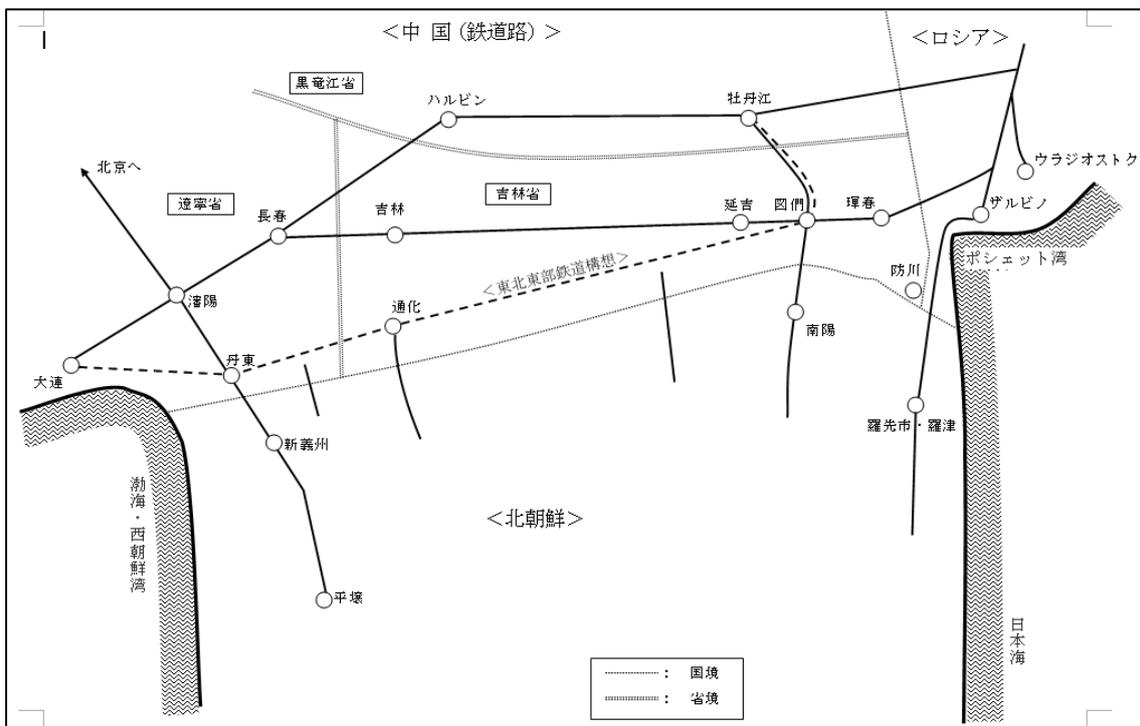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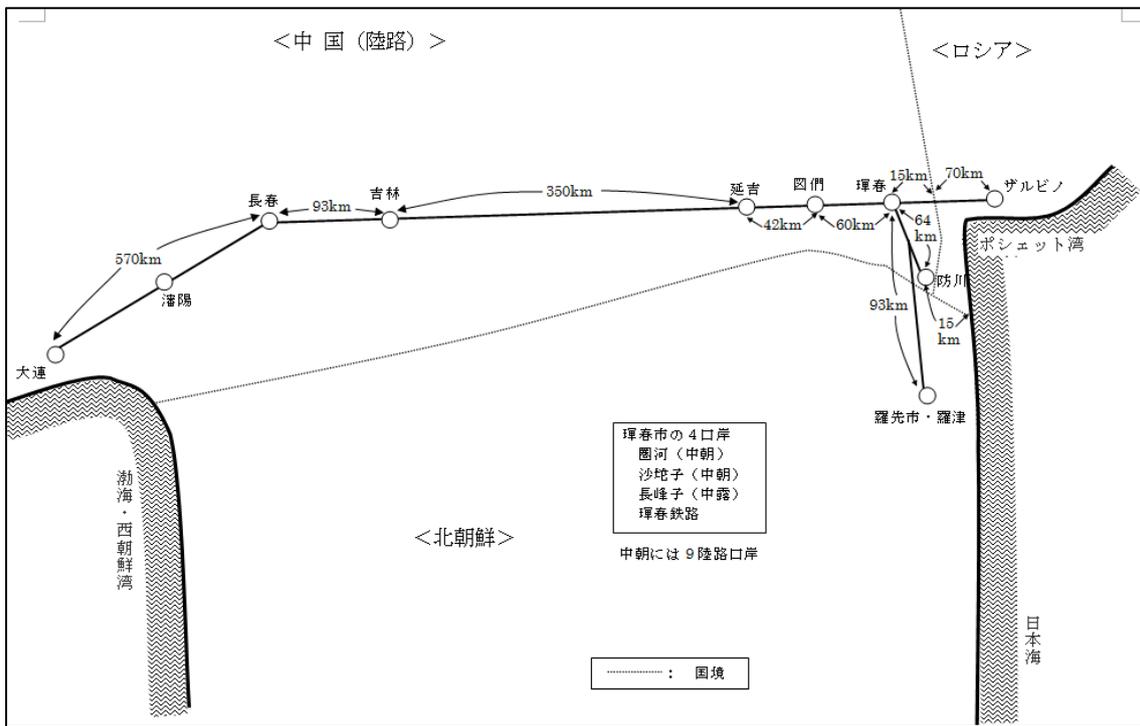
だれかが動かなければマルチ・ラテラルな活動は始まらない。中国が動いたことは、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機関車が発車したこと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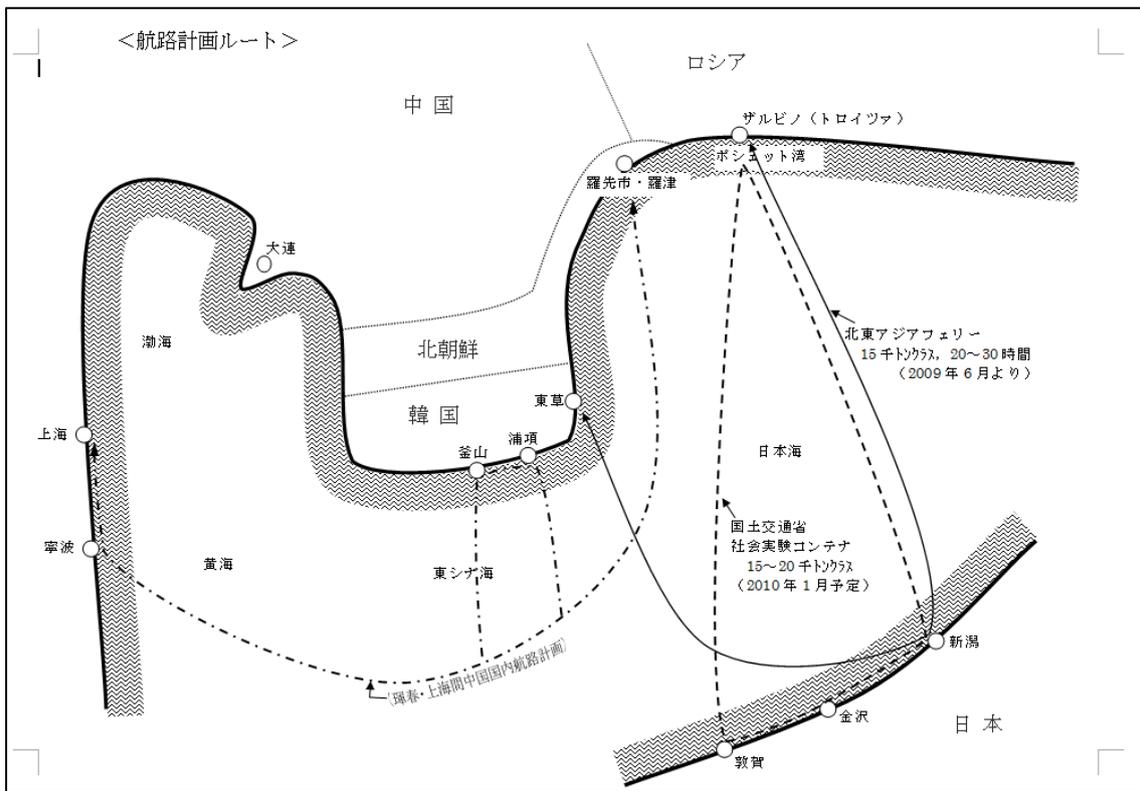
意味し、GTIは動き始めるはずである。ただし、中国機関車の動きが、どのような動きとなるか、中国以外の国々がどのように連動して動くかはいまだに不確実性におおわれている。UNDPの役割も改めて議論されるようになり、日本あるいは米国などの存在も議論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われる。UDNPなくして、この地域の安定的な発展はまだリスクが多いと懸念される。UNDPの予防外交はこれから真価が発揮されるはずだと考える。

開発にあたっての、関係諸国の権利と義務もUNDPのような公平な立場からの調整が期待される。GTIの開発は、先ず、道路、鉄道などネットワーク・インフラの整備から始まる。一般的に最初に開発されるネットワークにおいては均衡のとれた既得権益の独占が進みがちな傾向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の点でも公平な立場からのジャッジが必要である。また、様々なネットワークを個々の存在として考えるのではなく、企画のみならず工事スケジュールも含めて横の連携をはかることによって、地域全体の合理性を見出すことも重要である。

環境対策に対して、地域全体の環境容量を考えながら、都市計画、産業計画の配置を考えながら、汚染者負担の原則に予防の観点を加えて考え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り、開発のインセンティブと兼ね合わせて受益者負担の原則も十分に検討すべきである。

具体的な開発に関連する課題はまだまだ多い。最後に、これらの課題に立ち向かうためには、正しい答えとともに、正しいタイミングを逃がさないことと将来を見据えたオープンなバランスのとれた体制の重要性を指摘しておきたい。





琿春市防川
池：ロシア，図們江右岸：北朝鮮
撮影地：中国 2009年12月9日撮影



図們江税関より
2009年12月8日撮影



圈河税関
2009年12月9日撮影



図們駅
2009年12月8日撮影



圈河税関より北朝鮮をみる
2009年12月9日撮影



中口税関
2009年12月9日撮影



広軌（ロシア）標準（中国）
2008年6月25日撮影



ザルビノ港
2008年6月25日撮影

¹ 愛知大学経済学部教授.



国連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の中国による受容と政策展開

加治宏基¹

要旨

アナン国連事務総長（以下、当時）が 1997 年の報告書で強調したとおり、「国連は 52 年間の歴史で行政効率の向上にもっとも注力してきた。しかし、この点をもっとも改革の遅れた点である」。なぜなら、国連システムをとりまく諸アクター（加盟国はもとより国連機関も）が、自身にとって有益な国連像の実現を目指して別々のベクトルを示す機構改革を訴えてきたからだ。

中華人民共和国は、1971 年に国連における正統中国国家として議席を獲得して以来、一方で安保理常任理事国の一角として、他方では総会の多数を占める開発途上国、いわば国連の「周辺」の代表として国連外交を展開してきた。李肇星外交部長は第 58 回国連総会で、国連の機能強化により平和と発展が推進されると、機構改革を支持した。そこで経済社会理事会における各国政府の「和諧」（協調）による機能向上を訴えると同時に、経済社会領域の諸課題解決にむけた国連による開発計画と世界保健機関（WHO）のイニシアティブを要請した。

今日、UNDP は「人間開発」という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を掲げるが、その底流には“development”の理念転換があった。つまり、1972 年の国連人間環境会議（ストックホルム）とローマ・クラブによる『成長の限界』の発刊を契機として、国連の経済社会領域では開発から発展へと“development”の再定義が喚起される。この変動は、「環境と開発に関する世界委員会」（ブルントラント委員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が 87 年に提起した「持続可能な発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という概念により決定づけられた。

A・エスコバー（1995）は、「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はその領域の達成可能な目標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るものでなく、またそれが語る対象も一連の諸関係のなかで創出され編成されることで特有の統一性が付与される」と指摘する。殊に中国が国連経済社会領域での変動を認識・受容し、独自ディスコースを創生した政策過程に着目すれば、その政治思想空間において「モダニティ」をめぐる論争が伏線として看取される。

こうした視座をふまえ本報告は、1) オルタナティブ開発をめざす UNDP により提唱された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の形成過程から国連経済社会システムの変動力学を分析する。2) そして中国が、UNDP により提唱された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を受容し独自ディスコース「小康」へと接合した政策過程について検証する。

はじめに 研究課題の所在

Annan 国連事務総長が 1997 年の報告書「国連の再生：改革に向けたプログラム」のなかで指摘したように、「国連は 52 年間

の歴史で行政効率の向上にもっとも注力してきた。しかし、改革がもっとも遅れたのがこの点である」²。そもそも「国際機構創設の動因」とは『すべての国に共通ではな

い』共通利益』によるもので³、創設後は加盟国のみならず諸機関など国連システムをめぐる各アクターが、自身にとって有益なものへと機構改革を訴える。それが、「国連の歴史は、改革議論の歴史だった」と指摘される所以である⁴。

中華人民共和国（中国）も他の加盟国と同様、望ましき国連像の実現を目指して国連改革を提言する。第58回国連総会（2003年）の一般討論演説において李肇星外交部長は、国連が「時勢に即した合理的改革と機能強化、および効率化されること」を支持し、世界もまた強い国連を望んでいると言明した。その上で「発展とは国際の平和を維持し人類社会の進歩を実現する基礎である」との認識を示し、「人間開発」のため加盟各国に対して和諧（調和・協調）、理解、そして寛容を求めた⁵。

一方の国連機関も、「改革」の波にのみ込まれ淘汰されぬように権限拡大・機能強化を模索してきたが、こうした政治性、とりわけ経済社会機関のそれを論究した先行研究は皆無に等しい。しかし、いまや国連システムの大部分が人道支援や社会発展など経済社会分野で機能しており、平和維持活動さえも当該分野の機関が不可欠である。殊に国連開発計画（UNDP）は、紛争後復興活動において国内避難民の対応、除隊兵士の社会復帰などについて関係諸機関（OCHA, UNHCR, UNICEF など）の調整機能を果たす。

そのUNDPは、冷戦終結に前後して「人間開発」という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を提唱しはじめた。ディスコース、すなわち言説や論説とは政策理念の表出である。A・Escobarは、「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はその領域の達成可能な目標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るものでなく、またそれが語る対象も一連の諸関係のなかで創出され編成されることで特有の統一性が付与される」と指摘する⁶。構成主義的に解釈するならば、国連をとりまく諸アクターの関係性に規定される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が、「機構改革」のダイナミズムを醸成する。

本稿は、オルタナティブ開発をめざすUNDPにより提唱された「人間開発」とい

う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をこうした文脈のなかで捉え、その国際的インパクトを検証する。特に中国がこの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をいかに受容し、どのように独自の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へと変容させたのかを論究する。鄧小平時代に中国政府は「小康」という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を提唱するが、結論として国連の動態に随伴する中国の認識変化が国内政治へと還元される政策過程の解明を試みる。

I UNDPの開発ディスコース

- 「人間開発」へむけて -

冷戦終結当時、国連研究の多くが安保理重視およびPKOの増強に紙幅を割き、「人間開発」という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の提唱に象徴される国連経済社会分野での革新的動向については、大半が国際開発論の領域で議論された。政治安全保障分野への傾倒は、Sydney D. Bailey⁷や浅井基文⁸らにより考察されるも、そのなかに経済社会分野に関する章・節は見当たらない。なお、国連の経済社会分野における変動を国際政治学の視座から論じた数少ない研究書として、武者小路公秀 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平和研究所『国連の再生と地球民主主義』、柏書房、1995などを参照されたい。

国際開発論の観点からは、Mahbub ul Haq, *Reflections on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や、西川潤編『社会開発—経済成長から人間中心型発展へ』、有斐閣、1997 が論究している。なにより、開発・発展の方法論について活発な論考が展開される。Talcott Parsonsは、社会変化論の視点から近代化について「外生的変化」と「内生的変化」とに区分し、前者の重要性を強調した⁹。これに対し鶴見和子は、後者に着目して「内発的発展」という思考枠組みを提起した¹⁰。

“development”の理念転換の胎動は、冷戦期中葉にすでに看取される。1950 - 60年代の開発至上主義に対する省察から、環境資源の厳格な分配を必要条件としたローマ・クラブの『成長の限界』¹¹が発表された直後、人類史上初の国際環境会議である国連人間環境会議がストックホルムで開催され

る。先進国と途上国との対立、いわゆる南北問題の構図を改めて顕在化させる場ともなった一方で、“Only One Earth”という共通概念を掲げ採択された人間環境宣言は、今日なお国際環境法の基本文書とされる。ただし、こうした胎動がUNDPに波及するには、冷戦終結を待た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ことも事実である。

UNDPの歴史については、大平剛『国連開発援助の変容と国際政治—UNDPの40年』有信堂高文社、2008年に詳述されるが、第20回国連総会（65年）は、国連諸機関による支援活動の相互調整を期待してUNDPを設立した¹²。しかし国連改革案「ジャクソン・レポート」（Robert G. A. Jackson, *A study of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system*,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69）は、当該機関が技術協力と資金供与という二大事業について機能不全にあると指摘した。さらに75年には、開発援助に係る他の国連専門機関からの抵抗が要因となり、UNDPは財政危機に陥っている。

そうであるがゆえに、1970年の国別計画¹³や77年には国連常駐調整官制度が改革的に導入されるなど、UNDPは財政面で権限拡大を模索し続けた¹⁴。その半ばには、国際開発をめぐる機構変動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た非同盟諸国を中心とする開発途上国が、新国際経済秩序（NIEO）の樹立を目指している¹⁵。同じく74年、国連改革の専門家グループからは開発業務と財源の強化を担う新たな機関として国連開発庁（UNDA）の創設が模索された¹⁶。しかし、同年に総会決議3405(A/RES/3405)（XXX）が採択された結果、この段階ではBradford Morse 総裁の下、UNDP改革を通じた存続路線に落ち着いた。

1980年代、William H. Draper III が第3代UNDP総裁に就任すると、当該機関は財政的には自律的運用を可能とし、独自活動の幅を広げていく。さらに冷戦の終結に際し、国連システムが安保理中心のそれへと機構変動しはじめると、UNDPは経済社会分野強化へのパワー・シフトを試みる。

国連人間環境会議から20年目にあたる1992年、国連事務総長報告「平和への課題」¹⁷が提出され安保理機能の強化が要請されたこの年以降、国連環境開発会議（地球サミット）を皮切りに国連会議・サミットが毎年開催される。それは国連経済社会領域の機能拡充が表象化した好例である。地球サミットでは、「環境と開発に関する世界委員会」（ブルントラント委員会：WCED）が87年に提起した「持続可能な発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¹⁸について集中討議がなされた。この概念提起は、国連の“development”理念の転換を決定づける。

国家開発ではなく社会発展に焦点を絞った国連主催会議の背景として、UNDPで起こった「開発/発展」（development）理念の転換が具現化される。それが、1990年から刊行される『人間開発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である。その立役者が、UNDP総裁特別顧問に就任したばかりだったMahbub ul Haqである。UNDPの設立当時、経済成長と環境への配慮は両立しないものと考えられ、国連人間環境会議（72年）は頓挫寸前にまで追い込まれる。この状況に際し彼は、国家単位の経済成長のみに着目する開発論とは対極的な「環境にやさしい人間中心の開発パラダイム」¹⁹を提示した。

『人間開発報告』は、GDPなどマクロ数値ではなく人間の自由と「潜在能力」（capability）の向上にフォーカスした「人間開発」を世界に提起する。30年来の開発途上国における開発プログラムは失敗だったという従前の経済指数に基づく認識は、人間開発指数（HDI）の前に覆された。実はこの間に、途上国の平均余命は16年延び、成人識字率は40%増加し、一人あたり栄養摂取レベルも20%向上していたのだ²⁰。この指数を考案したのがAmartya Senであるが、「人間開発」という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とそれを補完する当該指標は、「開発の10年」から「貧困根絶のための10年」への転換をもたらした²¹。

II 中国の開発ディスコース

- 「小康」から「全面小康」へ -

1970年代半ば以降、国連では非同盟諸国を中心とする開発途上国が、新国際経済秩序(NIEO)の樹立を目指し総会中心的国連像を具現化してく。こうした国際的潮流のなか、文革の終焉から間もない中国では鄧小平が全職権を回復する。78年末の中国共産党第11期中央委員会第3回全体会議(11期3中全会)では、全国規模の工作戦略の重点を社会主義現代化建設に移すことが決定され、翌年より本格始動する。改革・解放路線の初年度にはUNDPの現地展開も本格化し²²、国連システムの開発のあり方は大きく転換をとげた。

同じく79年に中国政府は、「今世紀末から遅くとも来世紀半ばまでに」近代化を達成するため、20世紀末までに「人民の生活を小康水準に引き上げる」ことを戦略目標に設定した²³。その内容は「やや余裕がある経済水準」とされ、改革開放路線の開始から1984年までの5年間、中国政府は計画経済の枠内に限って市場形成を促した。

中国共産党第13回大会(13全会)の初日、87年10月25日に趙紫陽はその報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義道路前進」において、2000年までに中国全人民が達成すべき政策目標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言明した(以下、抜粋)。

11期3中全会以後の中国における経済建設を三段階に区分すれば、GNPを80年レベルの2倍に引き上げて「温飽」問題の解決をめざす第一段階。第二段階には20世紀末までにGNPをさらに倍増(80年の4倍)させ、人民生活を小康レベルにもっていく。第三段階としては、これまでの基本どおりに進展すれば、来世紀半ばまでに一人あたりGNPを中所得先進国レベル(一人あたりGDPで4,000ドル)²⁴に向上させることで現代化は実現されよう。

GNP、国家財政と都市住民の平

均収入はこの9年間で倍増し、12全会で提起された目標はすべて達成された。人口10億の大多数が「温飽」レベルにあり、その一部は「小康」レベルに達している。とはいえ、「温飽」実現へ向け苦しむ地域もあり、改善はなお必要である。

改革開放政策のおかげで、沿海部では新たな解放とも呼ぶべき生産力の増加、経済成長が見受けられる。全党、全民族の人民による協力によって、「温飽」問題は基本的に解決された。

この直後の12月、国連では「将来の世代のニーズを満たす能力を損なわずに今日の世代のニーズを満たすこと」が、国連、政府、民間部門、企業にとっての中心理念とな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ブルントラント委員会により「持続可能な発展」が提唱される。UNDPをはじめ国連の経済社会分野では、格差を肯定するトリクル・ダウン仮説に対する反駁がもち上がったこの時期、開発途上国・中国ではこの理論をなぞらえた先富論が鄧小平により提唱され²⁵、持続可能な発展とは対照的なマクロ数値目標を最優先する開発が推進された。90年12月に開催された13期7中全会は、11期3中全会以来の改革開放政策と社会主義現代化建設を高く評価したうえで、「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国民經濟和社会發展十年規画和『八五』計画的建議」を採択する。

そこでは1991年から2000年を現代化にむけた重要な時期と位置づけ、以下の戦略目標が立てられた。1) 経済効率の向上とすぐれた経済構造を基礎として、GNPを80年の4倍とすること、2) 人民生活を「温飽」から「小康」へ引き上げ、より豊富な生活物資、居住環境のいっそうの改善、より豊かな文化的生活、保健レベルの向上、社会サービスの完備を進めること、3) 教育事業の進展、科学技術の進歩、経済コントロールと経済構造の調整、および重点建設の強化を来世紀初頭におけるわが国の経済社会

の持続的発展をめぐる技術的基礎とすること、4) 公有制を基本とする統制された商品経済を備えた社会主義発展と計画経済と市場コントロールをあわせもった経済体制とその運用メカニズムを構築すること、5) 社会主義精神文明建設を新たなレベルに引き上げ、社会主義民主と法制のさらなる健全化。

陸学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長)を中心とする李培林や朱慶芳など中国社会科学院「小康社会研究」課題組の一部メンバーは、「小康」の概念、目標、そして国際比較など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陸学芸主編《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を出版する。同書は、中国的「モダニティ」(現代化)の要諦として「小康」政策を評価する一方で、GNPの伸長を主要目標とした国連「開発の10年」が途上国にもたらした経済格差、債務超過、環境汚染や生態系破壊などの弊害を指摘し、「発展なき成長」と総括する²⁶。そして、UNDPなどでみられる“development”の理念転換を反映した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についてその重要性を認めている²⁷。

しかし、国連のディスコースがリアルタイムで中国へ「輸入」されることはなく、「本土化」までには一定の時間を要した。李肇星駐国連大使は1994年11月21日の第49回国連総会で、国際社会および国連経済社会システムによる国際開発協力は途上国の経済成長に寄与す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と主張し、目下、注力すべきは「軽々に新しい手法を提唱することではなく、これまでのものを敷衍し消化していくことだ」と牽制している²⁸。

こうした消極的姿勢の要因は、米国クリントン政権下で展開された人権外交やいわゆる台湾問題をめぐる内政干渉への警戒、ひいては国連という看板の下で展開される主権侵害を懸念していたからだ。こうした外来概念に対する中国の政策決定者らの留保については、王宏周「評美国对外政策的『新干涉主義』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05期、pp.31~36、李少軍「論干涉主義」《欧州》1994年第6期、pp.28~35、およ

び閻学通「国際環境及外交思考」《現代国際関係》1999年第8期、pp.7~48などを参照されたい。

逆説的にいえば、中国特有の民主主義を前提とする「小康」にも、「人間中心の発展という理念」を所与とする「人間開発」が内在している。つまり、中国的「モダニティ」は発展概念に関して世界的底流を内包している点に留意すべきであろう。2002年の中国共産党第十六回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全会)で江沢民が提起した「以人為本」は、07年に開催された十七全会の胡錦涛報告において「科学発展観の核心」と位置づけられる。この演説で彼は、「以人為本」とは「古代の思想家が『民唯邦本、本固邦寧』、『天地之間、莫貴於人』として提唱した民に利し、民を裕かにし、民を養い、そして民を恵ませるという社会思潮や価値観念であったと述べた。

劉志光は、マルクス主義の提示する民族モデルが中国に土着化(本土化)される過程において、中国の特色ある社会主義社会に通底する「小康」理念によって、民粹主義を超越した中華民族の多元一体構造が形成されたと指摘する。また、中国の思想文化の発展においては「小康盛世」が求心力として機能し、「文景の治」や「貞観の治」といったモデルを提示したとも強調する²⁹。反近代化の近代化を経てのち、一見すると伝統的思想に回帰するかたちで提唱された「小康」は、改革・開放以来の現代中国の社会主義現代化建設において伝統と「モダニティ」との紐帯を担う機能をも付与されていた。

しかも、1990年代に高まった中華伝統文化への保守主義にのみ込まれ発展概念の基軸がなし崩しにされることなく、2006年には政治指針としてより強調された。十六全会での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会、開創中国特色社会主義事業新局面」において江沢民は、格差是正を主眼とする下記の政策目標を掲げる。「全面的な小康社会の建設」目標は、工・農産業別、地域間、および地域内に拡大しつつある格差を削減し、社会保障体制の健全化と家計の充実によってゆとり

ある人民生活の実現することと策定される。

Ⅲ 開発ディスコースの受容

- その適合と限界 -

「小康」から「全面小康」へ、この開発ディスコース展開を中国政府に促した背景には、2000年に国連ミレニアム総会で採択されたミレニアム開発目標（MDGs）がある。表1で示すとおり社会発展、「貧困の根絶」に特化した項目の並ぶMDGsであるが、この世界公約の達成へむけてUNDPをはじめ国連諸機関（UNDAF）は、同政府との緊密な連携を基軸にしたロードマップを提示し、具体的支援プログラムを展開した³⁰。03年にMDGsの進展状況に関する評価を行い、翌年には「全面小康」の均衡発展に焦点を当てた*China CCA 2004*が発刊されている³¹。

2010年までの発展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会的奮闘目標」を策定した02年の十六全会では、江沢民から胡錦濤へと党総書記が交代する。また、共産党が「広範な人民の根本的利益」などを代表すると定めた「三つの代表論」を党規約に盛り込み、私営企業家も含んだ大衆政党への脱皮が中心テーマであった。江沢民報告は先富論の調整を表明したが、経済的数値目標を全否定したわけではなく、2020年までに一人あたりGDPを3,000ドル以上、都市部の一人あたり可処分所得を2000年ベースの4倍とするなど、10項目におよぶ指標も提示された。ただし、UNDPが提示する人間開発指数も一人あたりGDPなど経済指数と相関関係にあることを考慮すれば、さして矛盾するものでない。

陸学芸らが指摘するように、1990年代末にはすでに中国において近代的な社会構造はすでに形成されており³²、統治能力の向上を至上命題とする共産党は、このころより公平性の向上や共同富裕を実現すべく人間中心型の発展を志向する。富裕層と貧困層の階層間格差が固定化されつつあるなかで、調和のとれた社会建設をめざす「和諧」理論は、格差是正の処方箋として十六全会で提起される。「和諧」理論を提唱したのは

江沢民であるが、新政権が当該理論を継承したことから、当時の胡錦濤政権は「まだ江沢民の垂簾聴政なのではないか」との指摘もある³³。

この視点は、当該理論の発展について考察する上でも重要である。第四世代指導体制の発足当時、政治局常務委員には9名の「上海グループ」が坐していたが、第四世代の権力基盤の安定は、「和諧」理論を多様な分野に推し進めるのと比例した。胡錦濤が軍部権力を掌握する（党中央軍事委員会主席就任）と同時に、中共第十六期四中全会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党的執権能力建設的決定」を採択し、「社会主義和諧社会」へ向けた政策実行力を高める。これにより、「和諧」理論は多岐にわたる内政政策へと敷衍していく。

その指導理念が2007年10月の十七全会において党規約に明記されたことは、胡総書記の理念・思想面での権威が確立された象徴的決定であった。これまでも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毛沢東思想、鄧小平理論、そして「三つの代表」という重要思想が党規約に盛り込まれた。しかし、在職中の党指導部トップの指導思想が明記されることは異例であることから、党内での権力基盤が強化されたことを物語る。同時に、「以人為本」や「社会全体の均衡的發展」を基本とする当該理念の明記は、江沢民路線からの離脱ともいえよう。

表1 MDGsの初期進展状況

I. 極度の貧困と飢餓の撲滅		
栄養不良の人々（全人口に占める比率）（%）	1990～92年：16	1998～2000年：9
II. 普遍的初等教育の達成		
若年層識字率（15～24歳）（%）	1990年：95.3	2001年：97.9
III. ジェンダーの平等の推進と女性の地位向上		
非農業部門賃金労働者のうち女性の割合（%）	1990年：38	2001年：39
IV. 幼児死亡率の削減		
乳児死亡率（1,000件あたり）（件）	1990年：38	2001年：31
V. 妊産婦の健康の改善		
医療従事者の介護による出産（%）	1995～2001年：89	
VI. HIV/エイズ、マラリア、その他の疾病の蔓延防止		
結核による患者と死亡率（10万人当たり）	1990年：107	2001年：21
感染報告累計（2003年6月現在）：45,092例　うち陽性3,532例　死亡1,800例 推計：感染者約84万人　うち陽性約8万人		
VII. 環境の持続可能性の確保：大陸と大気		
森林被覆率（%）	1990年：15.6	2000年：17.5
VII. 環境の持続可能性の確保：水と衛生		
安全な飲料水を持続的に利用できる人口		
農村部（%）	1990年：60	2000年：66
都市部（%）	1990年：99	2000年：94
VIII. 開発のための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推進： 雇用機会、医療品の入手、新技術の利用		
若年層の失業率（15～24歳労働力人口のうち）（%）	1990年：3	2001年：3
安価な必須医療品を持続的に入手できる人口（%）	1999年：80～94	

（連合開発計画署駐華代表処および連合愛滋病計画署駐華代表処資料）

¹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ICCS研究員。

² Kofi Annan, *RENEWING THE UNITED NATIONS: A PROGRAMME FOR REFORM*, 14 July 1997 (A/51/950), p.2.

アナン事務総長は、この報告「国連の再生：改革に向けたプログラム」でミレニアム・サミットの開催を提案し、1998年12月、国連総会によって正式に承認された。国連総会決議 202(A/RES/53/202)(draft resolution: A/53/L.73)。

同総会決議は、新世紀の到来が「新時代の国連に活力を与えるビジョンを明確に表明し、確認するためのユニークで象徴的意義のある機会」との確信の下、第55回総会（2000年）をミレニアム総会に指定し、ミレニアム・サミットを開催することを決

定した。

³ 最上敏樹「第二章 国際機構創設の動因」『国際機構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pp.50-70。

なお、国連創設過程については、Jacques Fomeran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7などを参照。

⁴ 河辺一郎「『国連改革』と日本の役割」、日本平和学会『平和研究』第19号、1995年6月。

⁵ “To Enhance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Promotion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UN. Doc., A/58/PV.9, pp.27-30.

⁶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7.

⁷ Sydney D. Bailey,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 ⁸ 浅井基文『新しい世界秩序と国連—日本は何をなすべきか』, 岩波書店, 1991. 同様の枠組みでは, 川上洋一『国連を問う』,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93 など.
- ⁹ T・パーソンズ, N・J・スメルサー 富永健一訳『経済と社会』2巻, 岩波書店, 1956.
- ¹⁰ 鶴見和子 川田侃編『内発的発展論』,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9.
- ¹¹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A Potomac Associates Book, 1972.
- ¹² 国連総会決議 2029(A/RES/2029)(XX).
- ¹³ 国連総会決議 2688(A/RES/2688)(XXV).
- ¹⁴ 国連総会決議 197(A/RES/197)(XXXII).
- ¹⁵ 1974年の国連資源特別総会では「新国際経済秩序に関する宣言」(NIEO宣言)とその行動計画および「諸国家の経済権利義務憲章」が採択された.
- ¹⁶ 第29回国連総会(1974年)の総会決議3343(A/RES/3343)に基づき, 25名からなる専門家グループが, 第7回特別総会(75年)で議論しまとめた報告書A new United Nations structure for global economic co-operation: report of the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E/AC.62/9)を参照.
- ¹⁷ Boutros Boutros Gali, *An Agenda for Peace, Preventive diplomacy,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New York: 17 June 1992 (A/47/277 - S/24111).
- ¹⁸ 国連総会決議42/187(A/RES/187)(XXXXII)(December 11 1987), およびWCED, *Our Common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¹⁹ Mahbub ul Haq, *Reflections on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マブール・ハク著 佐藤秀雄他訳『人間開発戦略: 共存への挑戦』, 日本評論社, 1997, p. v.
- ²⁰ マブール・ハク著 佐藤秀雄他訳, 前掲, pp.31~32.
- ²¹ 佐藤元彦は, 第4次「開発の10年」の最終年である2000年時点で「新世紀の最初の10年のための国際開発戦略」がなお検討段階であった一方で(A/55/89), 第1次「貧困根絶の10年」が97年に先行的に実施されたことから, 後者が「事実上」取ってかわったと指摘している. 佐藤元彦編, 前掲, p.121.
- ²² 1979年, UNDPの常駐代表が国連常駐調整官として原則任命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国連総会決議 34/213(A/RES/34/213).
- ²³ 李培林 朱慶芳等著《中国小康社会》,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p4.
- ²⁴ 李培林 朱慶芳等著, 前掲, p.5.
- ²⁵ 1985年10月, 「一部の地域, 一部の人がまず豊かになれば, 他の地域や人々を助け, 最終的に共同富裕が実現される」と鄧小平が言及したのが, 「先富論」の初見とされる. 翌86年8月には「私の一貫した主張として, (略)大原則は共同富裕にある」と, 改めて貧富格差, 両極化を批判した.
新華社ウェブサイト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7/21/content_4863377.htm (2009年10月22日).
- ²⁶ 陸学芸主編《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p.13.
- ²⁷ 陸学芸主編, 前掲, p.13~14.
- ²⁸ UN. Doc., A/49/PV.62.
- ²⁹ 劉志光《小康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論与实践的解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pp.81~115, および116~143.
- ³⁰ UNDA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amework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2010)*, Beijing: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2005.
- ³¹ 連合国開発計画署駐華代表処《中国実施千年发展目标 進展状況2003》, 連合国駐華機構協調代表弁公室, 2004, およびUN Country Team in China, *Common Country Assessment 2004 Balancing Development to Achieve An All-Round Xiaokang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Beijing: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2004.
- ³² 陸学芸主編《当代中国社会階層研究報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を参照.
同書において彼は, 中国の社会階級の二極化と固定化される階層間格差を批判的に指摘した.
- ³³ 田島英一『弄ばれるナショナリズム』, 朝日新聞社, 2007, p.184.
また彼は, 同書において江沢民からの権力移譲の時期は「実質2003年頃?」と指摘する.



国際社会に向かい合う中国の民間組織の可能性

高明潔¹

序文

1 本稿の問題提起と目的

21世紀の現在、国際社会の中国に対する評価は、中国の経済力の急成長の側面に集ま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その評価の背景には、市場経済がグローバル化し世界規模の経済不況の状態が続いている一方、中国のGDPが増長し、「官企結合」という民間企業が国家資金の助けにより海外市場の進出や資源開発も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る現状であると考えれば、その評価にも納得できる。

また、中国政府も国際社会と向かいあうに、経済力のみならず、海外で孔子学院を設置するような文化措置にも寄与している。いわば、急成長している経済力と孔子をシンボルとする中国文化は、中国と国際社会とをつなげるための重要なパイプになる。

中国の対外的な影響力が次第に広がりつつあるが、それと同時に、社会的な領域では依然として数多く課題を抱えている。例えば、経済発展に伴う地域格差問題、チベット問題や新疆問題に見られる民族摩擦、汚職腐敗現象、公民の権利に関わる法制問題などで、中国には依然として国際社会から厳しい眼差しが向けられることも事実として否めない。と同時に、その厳しい眼差しには客観性に欠けるものがあることも事実である。それゆえ、中国経済の急成長に評価を与えると同時に社会の諸問題を理由にして中国批判をするというような対中姿勢が国際社会に一般化している。

その原因は二つの側面にあると考える。

内側の要因として、中国は自国の社会内部に現れている自国をよりよい理想的な方向に導く動向を単に社会レベルの問題とし

て扱い、それらは国家全体を代表するシンボルとして国際社会にアピールする、あるいは発信する環境をまだ備えてない。

国際社会では、表に表れている経済力ばかりに注目を集めるか評価を与えるが、中国内部社会の動向に対する関心や評価がまだ集まらないようである。

本報告は、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のテーマである『現代中国の国際的影響の拡大』に基づいて、事例を分析する方法で、中国に現れている非経済的・社会変革を求めるための民間組織が登場するまでの歩みとその試みとそのプロセスに現れている中国社会内部の国際社会と向かいあう姿勢を提示することで、21世紀の現在、グローバル化や市場経済化の影響を受け、流動的な状態にある中国社会の実像に関しての全般的な理解を集め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2 本稿に用いる用語について

国際社会では、一般民間組織を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組織) と 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営利組織) としてそれぞれに示している。

NGO とは、国連の場合、政府機関とは区別される民間団体を指す用語。国連は社会福祉団体、労働組合・女性団体・経営者団体・専門家集団・宗教団体などのさまざまな分野と組織形態の非政府組織である民間団体すべてを指している。また、国際民間団体と国内民間団体と分かれている。そして、その活動の発展は①救済と福祉、②コミュニティ開発、③民衆(市民)運動の4段階にあり、その役割も各段階に応じて

変化し、①実施者、②動員者、③触媒、④運動体、が個別的に成立するのではなく、社会変化の中で相互に関連し合いながら展開するとされている。

NPOの場合、国際的に通用するNPOとして、①会則を有し、代表者を持つ組織である、②政府機関の一部ではない、③利潤追求や利益配分をしない、④独立の意志決定を持つ、⑤ボランティアな要素を一定にもつこと、と定義されている²。

中国では、1980年代半ばより、数多くしかも種類煩雑な民間組織が相次いで登場してきた。それゆえ、1998年に中国政府は『社会团体登記管理条例』の修正版および『民弁非企業単位登記管理暫定条例』を公布し、同年民政部に民間組織管理局を設けており、公民の結社に関する権利を審議する制度を確立することになった。後掲関連『国際人口与発展論壇』によると、1998年年末まで、全国レベルの社会团体は1800あまり、地方レベルのそれは16.56万であり、企業レベルになってない一般の民間会社は恐らく70万あまり登録していたとされている。

また、登録されている民間組織の中には、下記のような二種類のものがあ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る。

1) 「自上而下的民間組織」(上からの非政府組織)

「上」は「政府」、「下」は民間社会・地域社会を示し、政府から生まれた民間的非営利組織のことを言う。この種の組織は、「上」=政府側において行われている改革と関連して、ある程度は政府が行った改革によって生まれた政府機能の社会化の産物=「下」として、その主要な社会的資源である人や財、モノ、情報、管理とそれに関連する組織資源を含んだほとんどの資源は、主に党と政府機関の権力によってコントロールされている独占的領域から提供されている。

2) 「自下而上的民間組織」(下からの非政府組織)

この種の組織は公民が自発的に組織されたものであり、経済活動の活発化や民主化の発展と関係があり、経済活動や社会を発

展させるための活動、さらには政治活動に参加している。それらの中に、自らの成立を保障するために会社や企業を作るという名目で工商部門に登録するタイプ、あるいは自らの組織をある職場の下位単位として民政局に登録するタイプ、という二種のものがある。また、非営利組織として成立したものの、実際は非営利的な活動を行っているものもある。

以上の二種類の組織はいずれも非政府組織が持つべき民間性・非営利性・自治性と志願性という特徴が欠如していると中国国内の関連研究し指摘されている³。

上記の指摘を踏まえ、筆者にとっての課題は、中国のNGO(非政府組織)とNPO(非営利組織)に対する厳密的な定義をづけることは、中国におけるNGO・NPOが存在する合法性や活動の性質につながることで、非常に困難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すくなくとも下記に要因に関わっている。

第一に、前記のような70万もの民間組織を生産されたのは、計画経済の影響がまだ残っている中国では、民衆層はある組織や団体や企業は、国家部門や国営企業でなければ、非政府組織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認識をも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国家政府の『社会团体登記管理条例』の修正版および『民弁非企業単位登記管理暫定条例』の公布もそのような認識を一般化にされた動因である。

第二に、中国の民間組織は国家政府に登録せず、許可を得なければ、その成立はできない現状は、国家政治の絶対権力が揺るげないという国全体の環境に生じたものであるといえる。さらには、民衆層の非政府組織は非合法的、反政府的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誤った認識も、そのような環境によって一般化されている。

第三に、国際社会では、中国は果たして本来意味でのNGO(非政府組織)とNPO(非営利組織)を生まれるような環境を備えているのか、という認識も一般論になっている。

それゆえ、近年中国に現れる民間組織に定義をづけることはある程度の難度がある

が、それと同時に、玉石混交しているにも拘らず、中国の民間組織には社会公益のために、公民権意識の向上を示せるものもあることは事実として否めない。さらには、それらの努力や貢献はすでに国際社会の注目を集めるようになる。

本稿は幾つかの民間組織の成立時期に沿ってそれらのあり方を呈する。それに基づいて中国の国際影響の拡大は「国家」や「経済活動」という側面によるものだけではなく、民間社会に孕んでいる力による側面、即ち、中国民間社会に現れている国際社会との向かいあう動向にも見られることを提示したい。

また、使用用語上の混乱を避けるために、「民間組織」という用語で本稿の一般内容を示すが、固有組織を示す場合はそれらの固有名称でそのまま表記する。

I 中国政法大学公害被害者法律援助センター (1998年発足)

1 発足の背景

本センターの中国語名称は「汚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別称は「環境資源法研究サービスセンター」である。センター主任は中国政法大学の王燦發教授であり、1994年から、『中国環境報』紙上において、「厳弁護士」という筆名で、全国の公害被害者からさまざまな質問に答えていた。1995年に江蘇省邳州市で発生した、400羽ものアヒルと周辺の養殖魚を一週間のうち死滅させた環境汚染の被害者に対する訴訟支援がセンター開設の端緒となる。

この汚染事故による被害者の農民と漁民およそ7～8戸は、地元政府に救済を求め陳情するが効果なく、地元の裁判所は訴えそのものを受理しなかった。王教授はこれらの被害者を無償で支え、3年の困難な訴訟活動の末に40万元の賠償金を勝ち取った。この過程で被害者救済を阻害する深刻な現状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た王教授は、センターの設立を思い立った。

1998年に同大学内で設立の承認を得た後、約1年間の準備期間を経て、1999年11月1日より本格な環境法支援活動を開始し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た。「ホット・ライン」と呼ばれる電話番号を新聞などに公開し、電話で公害被害者に法律援助を提供する。通常、電話相談に応ずるのは環境法を専攻する政法大学の大学院生ボランティアである。電話で問題解決されない場合、被害者は直接センター事務所を訪れて相談することもある。訴訟という手段を選ぶ被害者には、センターに登録された弁護士を紹介し、時にはセンターに所属する教授や弁護士が自ら訴訟代理人となる。

「ホット・ライン」開設以来、2008年4月までに全国各地からの相談電話が10870件あり、そのうちセンターを訪れた者は延べ593人、手紙による回答は400通以上に上る。

本センターは中国政府に規定されている民政局には登録されていない社会団体ではなく、同時に大学では学内予算を受けない環境法研究機関として、自ら集めた資金と汚染被害者に無償で法律支援を提供するボランティアによって成り立つ実質的なNPO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⁴。

センターは環境汚染の被害者に対する法律支援を中心に行うほか、弁護士、裁判官、環境行政職員に対する環境セミナー、環境NGOのためのキャパシティ・ビルディング活動等を展開している。

センター事務所は政法大学の校舎に隣接する古い教職員用宿舎内にある。事務所内は使用されている設備や機械も含め近年のセンターの活躍ぶりとは対照的に地味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

2 国際社会における中国政法大学公害被害者法律援助センター

センターは今や、中国国内のみならず海外からも注目される存在となっている。2001年にはフィード財団が中国で実施している「環境保護奨」の「一等賞」が贈られ、2008年5月には日経アジア賞を受賞し300万円を贈与された。

王主任は2007年10月に発売されたTime誌上にも世界の「環境英雄」としてアルゴア前アメリカ合衆国副大統領などと共に

掲載されている。

本センターに関して、アメリカ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邮报》, News weekly, Chicago Tribune, Eugene Weekly, 日本『朝日新聞』, 『読売新聞』, NHK, フランス『解放報』, カナダテレビ放送, 韓国テレビ放送, オランダテレビ放送等海外のマスメディアも本センターの事業や影響を報道した。

また、ドイツやカナダ, 韓国, アメリカ, オーストラリア, オランダなどの環境機構や大学との間, シンポジウム開催したり, 共同プロジェクトを行ったりしている。

日本では東海大学(2005年)や命館大学(2009年)との交流も行っている。

II 雲南省チベット族地域の民間組織⁵

1 カワクボ文化社の活動(1999年発足)

文化社は雲南西北部に位置している徳欽県に設けている雲南最高峰(標高6470m), チベット族にとっての神山の名を冠した民間組織であり, 1999年に発足したものである。

目的はカワクボ地区のチベット族民間伝統文化を収集整理し, 民間文化活動を組織することで文化の継承を図ること, また自然を畏敬するチベット族の伝統を回復して, 人と自然との調和を維持し, 生態環境の保全を図る, さらにチベット族が居住する地域のあいだの交流ならびに他の民族との交流を促進し, チベット文化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ことなどが掲げられている。

また, 文化社は伝統的な歌や踊りを訪ねて山村を回りそれらを録音してテープを作り, 『雲南徳欽藏族民間音楽』(雲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として出版した, 反響は大きかったが海賊版が出回り, 結局赤字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の困難な局面を国外の自然保護NGOの支援を獲得することで乗り切った。

2003年には世界自然基金WWFと共同して, ワカクボ山周辺で神山に捧げる儀式の調査を行い, 2004年以降はアメリカに拠点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を置く巨大なNGOである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の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 伐採が禁止される区域の実地調査を請け負うことで, 経済の援助を得た。そのほかフランスや香港の環境保護組織などから, 野生動物保護のための基礎調査などのプロジェクトを請け負っている。

2 シャングリラ民間自然保護協会の活動(2002年発足)

協会の設立は2002年であり, シャングリラ県人民政府の環境保護局が主管機関となっている。1997年にカフェを開業したチベット族の札西多吉がカフェの収入による貧困村落への支援活動を起点となる。協会の目的と活動は, 自然保護区の自然保全, 伝統文化の保護, 土地所有者権利の維持という。また, 小学の給食施設に対して資金援助し, 大学生に奨学金を出している。

シャングリラでは, 外部から来た資金はわずかな金額で個人所有の土地を買い集めているという。隣接地の麗江ではすでに地元のナシ族の大半が土地を売ってしまったから, このようなことを押し留めることも, 協会の目的の一つだという。

協会は古城から市街地中心部に出たところにあるチベット・カフェに本部にある。このカフェには海外から訪問したバックパッカーを主な客とする宿泊施設があり, 現地の有識者による活動友人として国外のネットワークエコ・ツーリズムによる支援拠点としての機能を果たしている。

この協会にはアメリカ人のサポーターもいる。チベット・カフェでツアーを募り, チベット族の村にステイし, 参加費から寄付を含ませる。ツアーが泊まる農家には, 協会が支援して給水施設やトイレの整備を行う。

また, オランダの旅行代理店と提携してオランダからツアー客も来る。ツアーの収入で牧畜業を改良させたり, ビニールハウスでの野菜栽培に援助したりしている。

III 「公盟研究院」(2003年発足・2005年改名)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し、法律を武器として公民権を行使しよう
とした上記の法学三博士の試みがついに登
場した⁶。

1 「公盟研究院」登場の背景

「公盟」は法学博士を集めている民間組
織である。

その前身は、2003年3月に起こった「孫
志剛の死」をきっかけに、国務院が1982年
5月12日に公布した『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収
容遣送弁法』を違憲な行政法規として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に告訴を行った
「法学三博士」（2003年時点、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俞江（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院藤彪（法学博士）；北京郵電大学文
法学院許志永（法学博士））である。

孫志剛は湖北省黃岡陶店郷幸福村の出身
の者で、2001年武漢科学技術学院芸術系を
卒業した後深圳や広州で働いた。2003年3
月17日の夜、彼がインターネットカフェに
出かける途中警察に遭った。『居民身分証』
を携帯しなかったため、交番まで連行され
た。三日間の後、3月20日に、孫志剛は心
臓発作で広州市のある收容人員救治站（広
州市に設けた收容された人員のための救急
所）に死亡した。

僅か27歳でかつとても健康的であった
孫志剛の急死に、疑問を持つ彼の家族や友
人たちが、その死因を究明するために一ヶ
月近く各関連部門の間を駆け回った。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南
方都市新聞、広州市に設けている南方新聞
業集団による編集発行）4月26日、『北京
青年報』（北京青年新聞）などの新聞は、孫
志剛の死と彼の家族の、彼の死因を究明す
るための行動が行き詰まる状況について詳
細に報道した。

2003年5月中旬、国家政府は孫志剛の家
族に対して賠償を払ったともに、孫志剛事
件と関わりのあった凶行犯や汚職官員のい
ずれも法律によって制裁した。

しかしそれと同時に、つまるところ孫志
剛は收容送遣制度のスケープゴードである、
收容遣送という時代遅れた制度を改善、あ
るいは廃止しなければ、第二、第三の孫志
剛がまだ現れてくる可能性がある、国家に
よる賠償や犯罪者を裁判にかけることだけ
では、收容送遣制度がもたらした問題を根
元から解決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ことに目覚

2 「公盟研究院」を発足した「法学三博 士」の試み

2003年4月より、上記の三名は、1982
年に公布した『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
弁法』という違憲立法が長期的に維持され
てきた背景および、それを廃止するための
法的方法を試み始めた。5月中、彼らは『立
法法』第90条の「……前規定以外のその他
の国家機関と社会団体、企業や事業組織お
よび公民は、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
条例と単行条例が憲法あるいは法律に衝突
しているならば、（それらに関する）審査の
提案を文書にし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
員会に提出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り、（その提
案を）常務委員会工作機構が研究を行い、
必要なときに、関連の専門的委員会に提出
し審査を受けて意見を求める」⁷という内容
に基づいて、違憲な行政法規や地方法規を
逐一審議して、中国の法制度を統一するこ
とを促すことと目的として、討議を重ねた
上、『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
办法」的建议书』（『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収
容遣送弁法』に関する審査への提案書）を仕
上げた。

提案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
我々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公民として、国務
院が1982年5月12日に公布した、未だに
施行されている『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
送弁法』が、我が国の憲法と関連法律に衝
突していると認識している、ここであえて
全人代常務委員会に『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収
容遣送弁法』を審議に付すことを提案する」
といった内容である⁸。

2003年5月14日、提案がファクスで全
人代常務委員会法制工作委員会に届き、提
案者に署名したのは前記の法学三博士であ
る。

彼らの提案は「合法的に憲法から受けて
いる権利を使用し、個人の利益のためでは
なく、国家法律の尊厳を見守った」のよう
な法学専門家たちの評価と支持を得た上、

『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を修正すべきか、それとも廃止すべきかに関する議論も引き出された。

その結果、2003年8月1日、國務院第381号政令『城市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城市において生活不安定の流浪乞討人員の救助管理方法』）が公布され、この政令が公表するとともに、1982年以来、施行され続けてきた行政法規であった『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を廃止することも表明した⁹。

それ以来、收容送還制度の憲違審査に関する提案を提出した三名が「法学三博士」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¹⁰。

3 「公盟研究院」の発足

2003年10月、法学三博士が張星水弁護士（法学博士）を加えて、政府部門での登録手続きを経て、公共利益を守るための非営利的組織である「陽光憲政」（陽光満ちた憲政を求める）を設けた。

2004年、『憲法』が修正される前、「陽光憲政」は共同で『完全我国憲法人権保護条款的建議』（我が国の憲法人権保護条約を完全するための建議）を仕上げた。これは、中国の『憲法』における人権保護条項を全面的に修正し、保護条項を一つの完全な人権保護体系として形成させるための建議書であり、法学者の意見を求めた上全人代に提出した。

2005年、「陽光憲政」は「公盟」に改名した。公盟は理想主義者の公の同盟である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また、公盟は自らの目標を、法によって国を治める、政治の文明化を推進する、公民権の自由を守る、公民社会の発展する空間を広く開拓することに置い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目標を目指す公盟の主な活動は、下記の通りである。

- ① 典型的な個別事例を通して、法治の進化を推し進めること；
- ② 民衆と関わりの有る関連制度に対する関心を呼びかける；
- ③ 法律による援助が成功を収めた事例をもとに、関連する制度の改革に対

して提案をする；

- ④ 民衆からの投書や陳情について調査研究を行なっている。

例えば、許氏は調査を行う期間中、普通の上訪者を真似て政府関連部門まで出掛け、政府関連部門の守衛に防がれ、ひどく殴られたこともあった。この体験は、のちに、上訪者たちが遭遇した苦境をある程度まで改善するために役に立ったばかりではなく、調査研究に基づいて末端政治体制の改革に関する建議書をも提出した。

また、公盟は積極的に社会問題の解決に参与し、重大事件に関しては理性的・生産的な意見を述べたり、人民代表の選挙に参与したり、制度上の問題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たり、立法機能に公盟の政見を説いて回ったりすることを通じて、非合理的な制度を改革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2007年、公盟の活動はついに、国際社会と向いあって、『公民権利と政治権利における国際公約の許可問題』および《徴収法》草案の制定、戸籍制度の改革、人民代表を説得することを通して立法の手順を推し進めることに重点を置くことになる¹¹。

III 消費者權益を保護するための「王海ホット・ライン」（2006年発足）

1 「王海ホット・ライン」発足の背景

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が公表されたものの、商品の品質が急速に落ちたり、偽造された酒による中毒事件、偽造薬によって命を落とした事件、偽造種子で農民を騙した事件が次々と起こった。「打假英雄」と呼ばれている王海はこのような背景のもとに登場した¹²。

1995年王海はSONY製を標榜したイヤホンを購入、コピー商品だと気付いた。SONY北京駐在事務所においてそのすべてがニセモノであると判明した後、彼は『保護法』第49条の「経営者は詐欺行為を働いた場合、賠償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規定に基づいて、北京東城区工商局を賠償交渉の仲介者として、デパート側にコピー商品を購入した損失についての賠償を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2 (1) 2010
表明、また王海にアメリカの知識産権保護
について、消費者保護委員会の現状につ
いて紹介した。

2006年、王海は「王海熱線消費者權益保
護非営利項目課題組」(消費者權益を保護す
る非営利的なプロジェクト王海ホットライ
ン) という非営利的な組織を設けた。本組
織は、ボランティアをメンバーとして、ホ
ット・ラインを設けて民衆からの摘発を受
け入れ、それを手かかりにして詐欺行為を
調査し、政府部門に報告し、コンサルタン
トとして一般市民や消費者に法律的な援助
を提供し、ニセ商品に関する情報や警報な
どを伝えている。

そ王海氏の「打假」活動は、1995年から
2008年時点で13年間を経た。あらゆる分
野までその影響力が高まった。彼は、自ら
の行動によって法律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
できるよう期待している。彼は、「かつてニ
セモノは小売業や手工業の工場で作られて
いたが、現在では、有名企業でさえも、あ
る海外ブランドでさえも詐欺を行っている。
しかしながら、それらを取り締まるための
制度や立法に関しては、対応できる措置が
未だに取られてない」と主張した。

2008年時点まで、王海はホット・ライ
ンを公のNGOとして建設し、グローバルゼ
ッションの中その活動を国際社会まで広げ
るために、政府に登録を申請し政府の許可
を得るために苦心している。

IV 民間の国際公益組織「壹基金」(2007 年発足)

壹基金は映画スター李連傑氏が2004年
4月に発足した中国国内を拠点にしている
中国の国際公益組織であり、香港やアメリ
カやシンガポールにも事務所を設けている。
今年6月まで、募金額はすでに1.68億元
に達した。李氏は自身にとって映画は副業
にすぎず、「起業者」としてこの壹基金こそ
が彼の起業の起点であり、壹基金をこれま
で例のない「社会企業」として建設しよう
と語る。

昨年、四川省中江县龙台镇龙台中学の施
設が「5.12」大地震で倒れ、その後、修

請求した。しかしながら、デパート側は「コ
ピー商品であることを承知のうえわざわざ
購入した」という理由で賠償を拒否した。
こうした現状の中、王海は『保護法』を武
器とし、コピー商品であることを承知のう
えそれを公然と違法売買を行う販売側と戦
おうと決心した。

1996年末、王海はコピー商品を撲滅する
活動を組織化するために北京で営利会社と
して「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を設
立した。その主な業務は企業や会社からの委
託を受け、あるいは企業や会社に雇われ、
さらには政府部門に協力し、コピー商品の
製造や販売を調査し暴露しつつあてきて
いる。たとえば、温州公安局に協力し、偽
造ファスナーを生産した全国最大の事件を
解決したり、国家煙草専売局に協力し、偽
造ブランドタバコを生産する北京最大の拠
点を取り締まったり、浙江省技術監督局に
協力し、バルブを偽造した全国最大の事件
を解決したり、工商部門に協力し、酒を偽
造する北京最大の拠点を取り締まったりし
た。

大海商務は公益事業にも貢献した。王海
と社員らがボランティアの形で1998年に
違法民間医「Z氏家族」違法行為を調査し
た上、その黒幕を国家衛生部に告発した。
これによって1998年末には、衛生部が全
国各地の無許可游医を取り締まる指令を
発した。統計によると、王海とその部下
がZ氏家族を告発したことによって、患者
側は年間20億元の損失を免れた¹³。

2 王海ホット・ラインの登場

王海は、世界中の偽造品を取り締めるた
めに設立されているアメリカのある法律事
務所と協力し、有名ブランドのトランプや
自転車での中国での販売に当たり、その偽
造品を撲滅するための「打假」業務も担
当した。このため、1998年、アメリカク
リントン前大統領が中国訪問期間中、ア
メリカ駐上海領事館で座談会を開催した
際、王海は8名の中国人招聘者の一人と
なった。

王海に対して、クリントン氏は「名前を
よく知っている」「中国消費者の保護者」と

復したが 1400 名あまりの学生や教職員はトイレ不足の状態にあった。そして、壹基会は資金を出して龙台中学に 280 平方メートルのトイレを建設した。また羌族の伝統刺繍「羌繡」に対する援助を通して羌族の女性に就職に機会を提供すると試みしている。

李連傑氏は被害地に援助に手を伸ばすことは容易ではあるが、なりよりも、壹基会の努力や試みを通して、最終的には中国の NGO のために基本的な基準を制定し、その基準を以って中国の NGO を成熟させることに力になりたいのである。

それゆえ、李連傑氏は毎年国内の NGO の中から優秀な NGO を選出し、壹基会がそれらに 100 万元の奨励金を提供する。それらを看板として中国の NGO を成長させる。そして、企業にも NGO に資金援助をするための基準を与える。この措置の目的は中国の慈善事業を統一するところにある。

また、壹基会は中国赤十字との合作の形で、「中国紅十字会李連傑氏壹基会計画」を設立することで、公の資金募集活動を行える資格を備えている。この方式は、中国の国情によるものであり、壹基会を中国に根づきたければ、合法的な国際公益組織と合作しかない、中国では合法的な国際公益組織といえば「中国紅十字会」しかない。壹基会はその下位組織として自らの資金を運営できると李氏が語る。

清華大学 NGO 研究所の観察者は、壹基会の合法性は李連傑氏の国際的な影響と繋がっている。その影響がなければ、その合法性は問題となる。すなわち、壹基会の合

法性は最終的に中国の慈善組織の自主性に関する法の健全に関わ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も李氏が自らの組織を国家の意思決定と結び付く「中国赤十字会」に付属させた要因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むすび

第一に、中国民間社会における民間組織における組織規模で中国政治の不正を打破するための試み、それによる社会を発展させるための動向は、中国の経済活動の活発化や社会の民主化の進展の産物であるといえよう。それらの動向から、世界経済の行方を左右する大国としての中国の改革の核心はもはや経済ではない、法制問題であるという動向が伺える。

第二に、第一にと関連して、中国の民間組織は政府部門に登録をせざるを得ず、あるいは政府部門に付属せざるを得ない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にも拘らず、また、それぞれの規模や方法においても相違点はあるが、それらの共通点は、中国内部社会のなかで、環境保護意識・公民権益の保護・伝統文化を再評価する動き・慈善事業の拡大などが、国際的な持続可能性を求める動きと共鳴しあい、新たな可能性を開きうるということが出来る、と考える。

¹ 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教授。

² NGOやNPOについての出所は後掲諸関連参考図書に参照して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

³ 『清華発展研究報告 2003 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門』および、『国際人口与発展論壇』による。

⁴ 桜井次郎「中国政法大学公害被害者法律援助センター」『天地人』第4号 2008年No.

4による。

⁵ 上田信「模索する雲南チベット族」2008年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シンポジウム報告による。

⁶ 孫志剛事件や三博士の事例は云翔著「反思收容—从孫志剛事件到收容制度的“变革”」（反省收容—孫志剛事件から收容制度の“变革”まで）『人權』2004年第4期；p 23—30による；『開放中国 改革30年の記憶』

「2003：孫志剛案开启的公民权利道路」

(2003：孫志剛事件から始まった公民権への道) p 267-272; 『日誌中国』第二卷「收容送還办方廃止」p 435-441 によるものである。

⁷ 『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第九十条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⁸ 提案原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发的，至今仍在使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人権』2003年第4期 p 27 による。

⁹ 出所注5同

¹⁰ 高明潔『中国における公民権意識の台頭と社会変革の可能性に関する試み』による。

¹¹ 出所同注5

¹² 王海の事例は『開放中国 改革30年の記憶』に収録されている「1995：“刁民的發端”（1995：ずるく卑劣な者から始まった行い）p 181-190，および『日誌中国』（第三卷）「8月4日 王海打假◎“刁民”王海 叫我社会活动家」（ずるく卑劣な者王海 私を社会活动家と呼んでくれ）p 405-412 等による。

¹³ 「Z氏家族」とは、元々が福建省でネズミを退治する薬を売るために巡回する游医（許可無く巡回する民間医）とその家族のことであった。後に性病を治療できるという名目で全国各地を巡回し、さらには病院や医療機構と協力し、大々的に広告したことで、一夜に

して全国的に有名な「性病治療集団」となった。患者を騙したことによって毎年数千万円を儲けた。出所同注12。

参考文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国法律分類總覽（国家法・行政法卷）』法律出版社 1994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審定『公民的權利与義務』法律出版社 1995年

馬橋憲男『国連とNGO—市民参加の歴史と課題—』有信堂 1999年

遠藤富生編集『国連憲章』小学館 2003年

中国人権研究会主編『人権』2003年全四期『人権』雜誌社発行 2003年

王名主編『清華發展研究報告2003 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門』北京清華大学出版社 2004年

邓国胜「中国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新環境」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办『國際人口与發展論壇』

<http://www.cnhubei.com/200408/ca558619.htm>

藤岡美恵子・越田清和・中野憲志編『国家・社会変革・NGO—政治への視線/NGO運動はどこへ向かうべきか—』新評社 2006年

馬橋憲男，高柳彰夫編『グローバル問題とNGO・市民社会』明石書店 2007年

編集代表 広部和也・杉山高嶺『【解説】条約集』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2008 三省堂 2008年

桜井次郎「中国政法大学公害被害者法律援助センター」中国環境問題研究拠点編『天地人』第4号，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 2008年 No. 4.

經濟觀察報編著『開放中国 1977-2007 改革30年の記憶』中信出版社 2008年4月
新報社編著『日誌中国 1978-2008 回望改革開放30年』（全六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年10月

上田信「模索する雲南チベット族」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国をめぐる開発と和諧社会』報告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主催 2008年12月

高明潔「中国における公民権意識の台頭と社会変革の可能性に関する試み」『紀要』134
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 2009年9月

Yahho 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消費者權益保護法』2007年 <http://china.com.cn>

Yahho 中国「中国政法大学汚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 □Center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Pollution Victims in China」
<http://www.clapv.org>

Yahho 中国「公盟研究院」
<http://search.cn.yahho.com>

Yahho 中国「王海熱線」[http:// www.wanghai.net](http://www.wanghai.net)

Yahho 中国「李連傑壹基金」
<http://www.jetlicn.com>



由“归侨之家”活动看“侨”网络的形成¹

奈仓 京子²

[摘要]

本文以上世纪 40 至 60 年代期间自愿回国的归侨为例，尤其聚焦于“归侨之家”，基于以下问题意识进行讨论。第一，这些自愿回国的归侨回国后已经过了五、六十年，可是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利用“归侨之家”组织举办各种聚会活动呢？第二，这些归侨当年为什么选择回国，现在他们的故乡意识又是怎样的呢？本文不光介绍“归侨之家”内部组织活动的概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归侨联谊会的活动，以及对他们的话语加以分析，探讨归侨身份的自觉及其差异性的再生产，试论跨地域性“侨”网络的面貌。

[关键词] 归侨，“侨”网络，归国华侨联合会（侨联），归侨联谊会，“归侨之家”，节点

序言

1 归侨研究的理论视角

华侨华人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域，至今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相互间存在几个共通观点。第一，将海外华人社会视为中国社会的延长线；第二，以二元论的视角议论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认为他们对故乡中国或侨居国的认同是非此即彼的；第三，本质主义地认为华侨华人保留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Chineseness）。这些前人研究中所指的“中国（人）性”，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宗族纽带、祖先崇拜、华语教育等方面。上述三点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即华侨华人重视血缘与地缘，尽管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可是对大陆籍贯地始终怀着思乡之情³。这种观点还可见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盛行的侨乡研究。

但另一方面，部分海外人类学者的华侨华人研究也为我们展现了新的理论视角，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观点，譬如Suryadinata 1993, Gosling 1983, 王维 2001 等。这些研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值得借鉴：一是，从行为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民族志性的主位性考察；二是，摆脱二元论的视角，留意行为者的多样性、暧昧模糊的状态及动态。从行为者的角度来说，也许我们的研究对象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华侨”、“华人”、“归

侨”、“难侨”等。作为本文考察对象的归侨，是具有复数文化背景的特殊群体⁴。他们虽然血缘上是中国人，但他们在海外出生成长，无疑深受海外文化的熏陶，“再归国”后必然经历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归侨并非一直处于某种特定文化中，因此我认为考察归侨时这两点十分重要。

关于归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 James Chin Kong（钱江）、王苍柏和芹泽知弘有关香港归侨的研究。钱江站在归侨的立场议论归侨的问题，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从东南亚回到香港的归侨为对象，通过分析自愿组织(Voluntary Associations)的原理和成员的情况，在宗族、方言、祖籍地这三方面与传统海外华侨华人社区进行比较，说明了涵化(acculturation)和适应(accommodation)过程中，香港归侨形成了多元的认同。钱江把中国人性的视角相对化，其议论表明香港归侨逐渐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认同富于变化，具有多样性（Chin 2003: 63-82）。

王苍柏的观点接近 James Chin Kong（钱江）。他通过考察巨港（香港）校友会，指出华侨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组织原则在其再移民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王苍柏认为，归侨新的移民模式打破了原本在华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血缘和地缘的联系，他们把共同的侨居地、巨港当作其新的“籍贯”，加上校友关系尤其是年级（班）关系，取代原有的宗

亲血缘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谱系”（王苍柏 1999：55-66，2006）。

芹泽知弘通过访谈香港的归侨（越南归侨和印尼归侨），论述他们的移动与认同形成之间的关系，指出他们的认同属于边界认同。这些在东南亚和中国发生冲突后逃难至香港的“华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对家乡、籍贯等中国系移民的下位族群社会资源，以及对香港社会都感到无所适从。但他们被越南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直接或间接地逐出国门，所以无法使用“越南人”“印尼人”这种“某国人”的说法来表述自己。在香港的特殊环境下，这些拥有相同的移民经历的人聚集起来建立了他们独自的社会关系（芹泽 1998：145-171）。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自发形成的香港印尼归侨同乡会，并非基于中国故乡而是基于侨居印尼时期的地点组织而成（芹泽 2002：183）。芹泽指出，香港的民族分类中“香港人”和“越南难民”被加以明确区分，这种情况下，关注立场模糊的香港中国系移民的人生及其认同的形成非常重要（芹泽 2002：168-189）。

另外，市川哲以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移动的“华人”为考察对象，在跨国社会空间的理论视角下探讨他们连续性的移民经历和“中国”的看法等问题。从他的分析得知，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虽然血缘上是中国人，不过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很淡薄，文化上看到各个地方的习惯混合的状况（市川 2009）。

钱江、王苍柏、芹泽知弘和市川哲的研究再次提醒我们，不能只以“中国（人）性”的程度作标准探讨华侨华人、归侨的认同问题，有时候移民的自我认同具有暧昧模糊的特性，他们的世界可能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应该把移民群体视为动态的集团。

2 华人网络的概念

如上所述，摆脱二元论或民族国家的基调，能更深入自由地议论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归侨文化认同。一些学者对将华人社会定位于中国社会延长线上，仅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华人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提倡使用华人网络作为分析概念。其中，刘宏等学者的观点在考察作为中介组织及中介群体的归侨时

尤为值得参考。

刘宏曾经出版了《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该书中他对把新加坡华人社会视为中国大陆社会的延续的观点提出异议，提倡在各华人居住国的变化脉络下，以华人为主体，客观地进行分析。他还聚焦新加坡华人的商业活动，并在东南亚或东亚等“流动性地理（flexible geographies）”的概念下进行考察贸易城市、港口国家新加坡的意义（刘宏 2003）。这种观点在刘宏主编的《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和廖赤阳、刘宏共同主编的《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两书聚焦以新加坡、香港、厦门为中心的“流动性地理”和网络实体，试图将基于国家和专业领域的华人研究以及从华侨到华人的剧本相对化，把国家和网络视为一对范畴，以地域论和跨国的空间展开为视点提倡华人研究的新范式（刘宏主编 2007，廖赤阳、刘宏主编 2008）。

正如陈天玺在《华人网络——华商网络与意识认同》中指出的那样，网络概念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该词条事实上广为使用，所以没有共通的定义（陈天玺 2001）。但历来使用网络概念形容华人关系时，往往以此为“王牌”一元性地使用。对于这点，《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指出，“修正派在注重网络的机构性和正规性的同时，明显地忽略了华人商业的社会特征及其灵活性”（第 27 页）。他们认为，在华人商界中，华人文化即儒教道德及民间层面的习惯和行为规范为建立信赖关系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市场和法体系两种制约因素之外，华人文化是发展华人商业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他们试图论证的“硬件”制约因素和“软件”制约因素的错综。

对本研究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建构网络时中介组织的作用与功能的相关记述。譬如，第六章陈丽园论文介绍的“侨批公会”，它将分散在各地的侨批局制度化，扮演了为海外开放的中介性角色。第七章游俊豪论文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番禺侨务办公室和归国华侨联合会频繁访问海外华人社团，由此得知除了血缘、地缘等非正式的联络网之外，

政府和半官半民的机构也逐渐对建构地域网络发挥作用。由于归侨既活在原侨居国，又活在中国，具有跨地域的文化纽带，因此刘宏和廖赤阳的分析给我一些切入点及摆脱二元论观点的理论启发。

另外，关于华人网络研究，有郑一省的《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他回顾社会学、人类学界使用的“网络学说”，在闽粤侨乡和新马泰三国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华人经济活动、民间信仰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加以分析，提出了闽粤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这个“多重网络”概念。“多重网络”是“一种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多线、多群体、多层面的复杂网络”，也由侨乡网络和华侨华人网络构成。他从历史关系、经济互动关系、社会文化互动关系、民间层面、政府或政府参与层面等切入探讨华人网络的状况。郑指出，华侨华人社团网络实质上是环绕在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核心的共同意识以及人际连带关系，多重网络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网络。他用“节点”来把分散于各个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这种网络机制的思考途径值得参考。但他以为多重网络是以中华文化为“节点”的网络，在侨居国与侨乡的二元对立中议论，可见存在本质主义的主张（郑一省 2006）。综合上述情况，想再次强调以下两点的重要性：第一，不再仅以“中国（人）性”的程度高低为标准考察归侨，应从行为者的观点出发，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及心理纠葛等。第二，摆脱民族国家框架局限下的社会文化单位的分析视角，以网络为关键概念对归侨认同意识及其网络形成加以分析。

I “归侨之家”的概况

1 归侨

本研究中议论的“归侨”，既指个人也指集团。当地政府虽然在分类上将由于排华或战争等原因不得不回国的华侨华人称为“难侨”，特别是越南归侨还曾被称为“印支难民”、“难民”，而称自愿回国者为“归侨”（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6：213-225、245-249、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6：97-105）。本文中不分“难侨”、“难民”，统一使用“归侨”。Fitzgerald 使用“Domestic Overseas Chinese”一词，翻译成中文，大致

相当于“国内华侨”。该词包括三种含义：一是侨裔，指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海外华侨的抚养家庭和亲戚；二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叫归侨；三是，以学生身份来中国学习的海外华侨的子女（Fitzgerald 1972）。但是某些人是否属于“归侨”，不仅要依据客观的因素来判断，还不能忽视主观的因素，换言之，其本人如何看待自己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文把“以学生身份来中国学习的海外华侨的子女”包括在“归侨”之中，但这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属于不同的两个问题。关于“归侨”的定义，王赓武提出一些看法。他曾撰文提及，“据处理归侨事务的官方机构估计，目前约有归侨一百万人，但他们又承认许多归侨仅仅是表面上可将其看成是以前的华侨，其他许多人干脆放弃归侨身分，当他们完全被同化和在海外已无残存关系时尤其如此。缺乏可靠数字的其他原因中，包括一些官方机构有扩大控制和扩大归侨含义的倾向，而另一些则限制较严”（王赓武他主编 1986：258）。从归侨主位的角度来衡量“归”或“归侨”的含义是本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之一。

我曾经在广东台山海宴华侨农场前后住了一年多（2005年3月份至2006年10月份），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那里的归侨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东南亚各国遭遇排华而不得不回国的，回国后由国家统一安置到农场里生活。我曾考察过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宗教习俗、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并与人类学涵化理论进行对话，议论了归侨选择性地文化适应的情况。华侨农场是一个孤立于当地周围社会的特殊社区，因此归侨接触当地人不多，容易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奈仓 2007、2008a、2008b，奈仓 2008、2009）。

但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期间，还有一些并非毫无选择地被迫回国的归侨，他们与华侨农场的归侨不同。首先，他们当中很多人为了学习或参加革命而回国，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在父母的劝诱下回来的，但回国的目的都相当明确。其次，他们分布零散，不像华侨农场的归侨那样集居一处。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融入居所周围社会，几乎时时刻刻接触本地人。

2007年9月至2009年3月份，我在厦门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得到李明欢教

授鼎力支持，对自愿回国的归侨进行了考察。其间，我参与厦门“归侨之家”的各种活动，与归侨建立起友好的信赖关系，相互长期保持联系、频繁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多次有针对性地采访了一些归侨。该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非常重要的、有益的补充，让我更全面、更深入、更确切地把握归侨群体的现实状态。

2 归国华侨联合会与“归侨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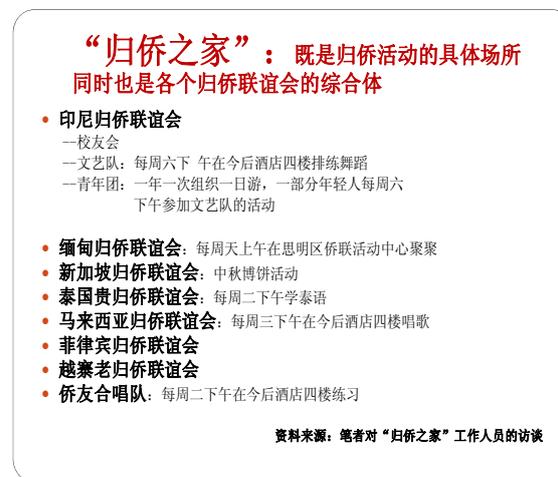
“归侨之家”既是归侨活动的具体场所，同时也是各个归侨联谊会的综合体。“归侨之家”位于厦门今后酒店三、四楼。今后酒店由华侨投资于1990年建成，现属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以下称侨联）管理。其中一、二楼作为客房承包出去，三楼原本是侨联办公室，但由于侨联2005年5月迁往了“团结大厦”，现在已成为“归侨之家”的办公室，四楼是举办归侨活动的场所。现在，侨联每年给各个归侨联谊会分别提供2000元活动经费，此外归侨自己也筹集需要的会费。这样，有了一定的活动费用的归侨便可以利用“归侨之家”举办聚会活动了。归侨联谊会名义上由侨联管辖。根据社团管理法，需要缔结联谊会时首先应到民政厅提交申请。个人申请的手续比较繁杂，所以由侨联代为申请，因此归侨联谊会名义上属于侨联管辖。

厦门“归侨之家”主要由印尼、缅甸、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寨老等联谊会以及侨友合唱队组成。其中印尼归侨联谊会人数最多，内部再细分为几个校友会、文艺队、青年会等组织。印尼归侨联谊会一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聚会，平时按照厦门行政分区划分小组活动。“归侨之家”每个周六上午都举办交谊舞活动，不论原侨居国在哪里，都能参加该活动。现在，每次都有十几个从各国回来的归侨参加活动（请参照图1）。

“归侨之家”与侨联有密切的关系。侨联在日常生活上为侨提供各种服务，是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发挥联系归侨及海外华人作用的半官半民的中间媒介型组织。中国有五个具有“侨”字特色、为“侨”服务的中央一级的侨务组织：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是通过侨务立法、侨务法律监督为侨服务的；全国政协

港澳台侨委员会是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侨服务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是通过制定侨务政策、法规等为侨服务的；中国致公党是通过参政议政为侨服务的；中国侨联则是通过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侨服务的（林晓东 2006：71）。“侨”指的是与海外有关系的中国人，换言之是“侨胞”，因此侨联不光为国内的归侨，还为海外华人服务，甚至可以说为了加强国内与海外华人的密切联系而存在。

图 1：“归侨之家”的构成团体



侨联的历史可追溯到抗日战争，在中国革命的中心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中国侨联的前身（林晓东 2002：55）。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地方成立侨联组织，其中以广东、福建两省较为普遍（卢海云、权好胜主编 2001：257-258）。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原有分散的、地方性的侨联组织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侨务工作的需要，不少归侨强烈要求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归侨团体，以便领导各地的侨联组织。另一面，鉴于著名归国侨领陈家庚在国内外有着极大的影响，为了充分发挥其政治作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毛泽东也考虑由他出面组织一个全国范围的归侨团体。于是，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侨联组织便提到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样1956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形成了全国统一的侨联组织网（卢海云、权好胜主编 2001：260）。

侨联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以下称为侨

办)同属于统战部下的组织,可是两者性质不同。侨办完全属于政府部门,难以直接帮助归侨或向海外华人进行政治宣传,比如“反独促统”。而侨联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但它属于民间组织,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容易出面向海外侨胞进行政治宣传,又能为一般侨胞提供服务。根据陈曲水在全国侨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侨联对于政府各项工作也起了批评和监督的作用,有些是侨务机关所不能代替的;因为侨务机关与侨联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侨务机关是为华侨服务的国家行政机关,而侨联却是侨眷、归侨自己的组织。应该承认:目前有些国家干部,作风不够民主,有的甚至态度很粗暴,引起一些侨眷的思想顾虑,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尤其是有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违法乱纪事件,不敢提出批评和揭发。但是由于侨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与侨联中的成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敢于和侨联谈家常、讲知心话。通过侨联,就使我们改进工作和教育干部,更好地贯彻侨务政策,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印 1956: 52)。

改革开放以后,侨联有四项基本职能:为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履行参政议政、维护侨益、海外联谊和群众工作(林晓东 2006: 71)。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侨联与海外社团的交往也逐渐频繁起来。1984年,由司徒慧敏带队的全国侨联访问团首访美国成功,标志着中国侨务工作的一大突破。此后,各级侨联广泛发动归侨、侨眷,请进来、走出去,采取探亲、访问等方式,开拓海外联谊工作,并积极参与和协办世界性社团活动。为便于工作的开展,中国侨联还于1995年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出国审批权。许多地方侨联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广泛借助社会力量,热情接待前来观光旅游、寻根问祖、探亲访友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利用各种传统文化节日开展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还有在海内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各级侨联还积极探索文化、宣传、联络工作的新途径,创办了一批研究机构、文化实体和宣传刊物。截至1996年,侨联系统的华侨历史学会已达27个,出版的有关华侨历史和现状的著作、资料约达220余部,

计5400余万字(黄小坚 2005: 320-321)。

为了解侨联运作的情况,我以泉州侨联为例,访问了有关工作人员⁵。泉州市侨联是全中国唯一创办侨联直属的华侨历史博物馆(1995年建成)的侨联,其办公室就设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后面。为什么需要创办华侨历史博物馆呢?博物馆许副馆长说,“华侨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光荣历史应该世代相传。可惜一些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已经不太了解这些历史,所以建立侨联直属的博物馆有利于让其历史流芳百世。为了收集资料,我们有时候需要去东南亚。我1995年去了新加坡,2002年12月份去了马来西亚,2003年1月份再去新加坡,2004年去了印尼。去海外的时候,我们总得有点名目才行,所以我们与华人社团联系,请他们发邀请函。到当地收集资料的时候,也请社团的人帮忙。通过跟他们一块儿吃饭,增进友谊”⁶。其实,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建立与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有密切的关系。1981年1月8日,“晋江地区华侨历史学会筹备组”成立,这是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的前身。1983年1月至1985年10月,先后出版了《侨史》、《华侨史》。1987年4月份,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还决定筹建该博物馆(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6: 359)。由此可见,侨联是中国与海外华人社团交往的平台,方便开展海外联谊工作。而且,侨联在海内外积极开展华人历史文化的宣传工作,还创办研究机构、文化实体和出版宣传刊物等。

原泉州侨联副主席郭先生及福建省侨联宣传部许小姐为我介绍了侨联如何帮助“侨”(归侨、海外华人等与中国有血缘的人群)的具体事例⁷。郭先生将侨联工作划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56年至1966年,该时期回国的归侨人数最多,该时期侨联发挥的作用最大。其首要任务是帮助归侨度过种种难关,尤其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负责分配从海外寄来的食品。该时期侨联帮助归侨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上,例如替归侨缝制衣服和代写书信等。第二时期为文革期间,侨联工作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第三时期为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由于为“侨”服务的组织不断增加,侨联的影响力比起第一时期有所下降,但由于其政治色彩没有侨办浓厚,

相比之下更容易联络海外华人。譬如，巴拿马华人曾经支持台湾政府，为了使其转而支持大陆，侨联曾到巴拿马宣传“反独促统”思想。

实际上，侨联在联系归侨与海外华人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一个女性前来侨联求助，希望跟去了菲律宾的丈夫见面。解放前她丈夫去了菲律宾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为了见丈夫她首先要去香港，而安排她外出的各种手续就是由侨联来代办的。侨联还曾经帮助过分隔海峡两岸（大陆和台湾）的家庭，请看以下故事：

有一个姓杨的男性，由于家境贫困，留下家里童养媳的“妹妹”和母亲当兵去了台湾。他对“妹妹”感情深厚，很想跟她结婚。可是，大陆和台湾之间政治问题发生后，他根本无法与“妹妹”见面。“妹妹”放弃了等待，跟别的男性结了婚，而他在台湾一直独身生活。后来，住在印尼的姓杨的同乡去台湾跟他见面的时候，告诉他一切情况，他一听“妹妹”结了婚就伤透了心，但同时非常期盼与“妹妹”和母亲重逢。住在印尼的同乡跟侨联联系，请求帮忙。当时前往大陆访亲的人数有限，个人申请也很难获得批准。在侨联的帮助下，1986年他们终于在香港见上了面。

福建省侨联宣传部许小姐也给我讲了一些侨联助“侨”的事例。我跟许小姐见面数天前，有几个归侨到侨联寻求帮助。他们的父亲在国内结了婚后才去菲律宾，在那边也娶了太太。父亲已经在菲律宾去世，坟墓也在菲律宾。最近，他们母亲（去菲律宾前娶的太太）去世了，他们想把父母合葬在一起。不过中菲两个家庭从来没有交往，所以他们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里，于是来找侨联帮忙。侨联与菲律宾晋江同乡会联系，开始收集消息。另外，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归侨去海外访亲需要向公安局提供一些材料，包括与海外亲戚三封以上的书信往来记录、归侨证明书、无犯罪证明等。侨联给归侨说明所需手续的情况，并为归侨出具身份

证明等材料。

侨联还协助海外华人举办“寻根”活动。譬如，新加坡晋江同乡会反映，年轻一代在新加坡出生成长，对大陆没有多少印象。老一代华人希望年轻一代认识自己的故乡，于是请求侨联帮忙，组织“寻根”活动，举办与大陆年轻人的交流会等。

此外，侨联还帮助国内的归侨。譬如每年一次给他们提供免费医疗，举办医疗卫生的知识讲座等。解释《归侨侨眷保护法》，提供房屋产权等法律顾问服务。还给经济困难户封红包，关心其子女的成长，举办归侨联谊活动等。

侨联之所以那么关心归侨，是因为政府认为归侨会给国家带来经济效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大量的外资帮助发展经济，而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缺乏了解，对投资中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这一时期，来自海外华侨以及港澳的投资成为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在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归侨自然成为联络外资的天然渠道（黄静 2005：52）。厦门市侨联当时每年接待150多个社团，各联谊会也参与接待工作。

如上所述，侨联在政府和归侨之间、“侨”（归侨和海外华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也是与海外非正式交流的平台。对国内归侨来说，侨联可谓“娘家”，是随时可以依靠的港湾。“归侨之家”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于改革开放后成立的，其组织活动的后盾就是侨联。这种动向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关注归侨，并支持归侨联谊会的各种活动，希望借此加强中国与海外华人世界之间的纽带联系。作为行为主体的归侨是沟通中国与海外的中介群体，活跃于超越国界的地域社会中，他们具有跨越国界在更广的地域内进行文化、经济活动的的能力。他们的移动与交流互动，促使逐渐形成跨国的“侨”网络⁸。以下，通过参与考察“归侨之家”的活动，探讨“侨”网络的实体。

II “归侨之家”的活动

“归侨之家”既是归侨活动的具体场所，同时也是各个归侨联谊会的综合体。厦门“归侨之家”主要由印尼、缅甸、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寨老等联谊会以及侨友合唱队组成。“归侨之家”每个周六上午都

举办交谊舞活动，不论原侨居国在哪里，都能参加该活动。现在，每次都有十几二十个从各国回来的归侨参加活动，人数最多的是印尼归侨，还有越南归侨、缅甸归侨、马来西亚归侨等。

除了周六活动之外，基本上以各个联谊会为中心展开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最活跃的是印尼归侨联谊会。

1 印尼归侨联谊会的活动与其成员

归侨联谊会中规模最大的是印尼归侨联谊会人数最多，会员为约 4000 人，内部再细分为几个校友会、文艺队、青年会等组织。经费都是自筹的，年会费每人 30 元。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在春节联欢会等时候提供捐款。联谊会的理事会成员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比如现在印尼归侨联谊会的理事长是旅游社的经理（消息来自我对会员的访谈）。平时以秘书长为领导计划展开活动，比如歌唱舞蹈活动，春节联欢会的节目安排、彩排、抽奖，组织旅游，举办中秋博饼，发行内部会讯等。这些工作全都是志愿的，没有报酬。

印尼归侨联谊会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聚会，平时按照厦门行政分区划分小组活动，每年还组织几次旅行（请参照图 2）。分组中属于思明区的印尼归侨相当多，他们每周一次在“思明区侨联中心”聚会，跳交谊舞和唱卡拉 OK 等。思明区分组的中心人物之一是陈阿姨，60 多岁。其实她并非归侨，而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她在归侨子女就读较多的集美上小学和初中，先生（已去世）是印尼归侨，因此她有不少归侨朋友。她很喜欢与归侨交往，人际关系以归侨为主。她曾经当过“侨友合唱队”的理事，不过 2008 年退任了，理由是“现在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想法太多，不好打交道”。由陈阿姨的事例可见，“印尼归侨”并非完全由印尼出生成长的人群组成，随着与印尼归侨交往的时间增加，不但她本人觉得自己是“归侨”之一，其他归侨也把她视为“归侨”，她甚至成为了领导。虽然她是本地人，不过与“本地人”划清界限。象陈阿姨那样，本身不在印尼出生长大，却与印尼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前面提到的雅加达华中校友会、泗水同学会等。参加唱歌跳舞等活动的人不一定是校友，有一些人只是曾经住在同一地

方，甚至附近地域的人也会来参加活动。可见他们的活动带有强烈的地缘性，可是这种地缘性并非基于中国籍贯地，而是基于原侨居地。

图 2：厦门印尼归侨联谊会的构成团体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 印尼归侨联谊会：包括华侨农场，约 4000 人）

——文艺团

——青年团

- 厦门城区的印尼归侨联谊会：

思明区、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

- 校友会：

万隆（1993-），巴中（1993-），泗水（1992-），井里汶汶华（1992-）苏北（1993-），玛中（1992-）雅加达（1993-），巨港（1991-）新中（？-），普华（2006 年一百周年校庆）

资料来源：《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印联会讯》，笔者对印尼联谊会副秘书长的访谈。

印尼归侨联谊会还组成了“文艺队”和“青年团”。“文艺队”在 1996 年组成，队员平常一起排练印尼舞蹈和演奏乐器，每年举办新年联欢会，表演舞蹈。乐器是一个印尼华人赠送给联谊会的，他还出钱让两个年轻文艺队队员到印尼接受一个月的乐器培训。海外印尼华人与归侨交往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他们全年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是元旦时举办的联谊会，大约 1000 人前往参加活动，其中绝大部分是厦门城区的归侨、竹坝华侨农场和天马华侨农场的归侨。此外，还有集美大学的印尼留学生以及印尼华人。思明区、湖里区的侨联干部，统战部干部，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归侨联谊会的会长也会应邀出席活动。联谊会有印尼地方性同学的舞蹈节目、文艺队的舞蹈节目、青年团的舞蹈和印尼乐器演奏、印尼归侨孙子唱印尼语歌、印尼留学生的合唱和舞蹈，最后进行抽奖。为迎接元旦联谊会，青年团两三个月前开始每周六在“归侨之家”排练，老一代善舞的人教年轻人舞蹈，传承着“印尼”味道。

但现任印尼归侨联谊会秘书长黄先生很担心印尼归侨联谊会的将来。与他同一世代的人越来越少，而年轻一代对联谊会没什么感情，各自忙着工作和照顾家庭，围绕自己

的生活圈子来生活。黄先生很担心年轻一代离联谊会愈来愈远，说不定十年后组织印尼联谊会活动不是归侨子女，而是侨属。因此为了世代传承联谊会，联谊会中结成了“青年团”。老一代教年轻一代舞蹈、演奏印尼乐器，每年组织一次1日游，还组织品尝印尼美食的活动等，希望以此促进归侨子女之间的交流。2008年11月9日（周日），青年团去附近的海门岛旅游，参加者23人，包括部分归侨子女的朋友（非归侨）。我也参加这次旅游，认识了青年团队长陈小姐（1970年生，家庭主妇，担任队长5年）。根据对她的访谈，青年团现有成员78人，但其中不少人忙于工作与家庭，不太关心联谊会的活动。陈小姐之所以参加联谊会活动，是因为1989年表姐（姑妈的女儿）和姑妈一起从印尼来厦门的时候，表姐只会印尼语和英语，不会汉语，她和表姐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无法沟通。于是陈小姐参加侨联主办的三个月印尼语学习班。她现在觉得“归侨是个特殊群体，希望世代延续下去”。

我参加印尼联谊会平时的活动时发现有些人用印尼语交谈。一个阿姨跟我说，她回国前不会说印尼语，回国后跟其他人学会了，现在很喜欢用印尼语跟人聊天。正如上面谈及的那样，有些会员本人不是归侨，有些不是某一学校校友，但他们愿意参加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的校友会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他们逐渐萌芽对“印尼”或“某某地方”的感情。有些男性平常穿印尼服饰，也有一些人只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才穿。“文艺队”主办联欢会的时候，印尼归侨还会特意准备了一些印尼菜等。到印尼探亲或去华侨农场游玩的人也带回一些印尼食品和香烟等请大家品尝。总之，无论语言也好，服装也好，食品也好，他们分享着一种独特的“印尼”。

2 会讯、通讯录、博客

印尼归侨联谊会从2004年7月份起出版季刊《印联会讯》，介绍归侨回国后的生活经历，校友会与印尼华人交流活动，新春联谊会以及印尼华裔寻根活动，国内印尼归侨活动等。作者几乎都是厦门印尼归侨联谊会中文笔好的几个会员。报纸放在“归侨之家”，随时可以看看。同时发给每个会员，也寄给云南、广东等外省的印尼归侨联谊会。

缅甸归侨联谊会成立于1993年，是最早成立的归侨联谊会。现在他们每周星期天在思明区侨联活动中心聚会活动，排练舞蹈和闲聊等。全年最大的活动要数4月第二个周日举行的“泼水节”，这已成为缅甸归侨的“象征”。该联谊会除了接待来厦门的缅甸侨外，还组织港澳缅甸侨交流会等活动。他们一年两次发行《鹭岛胞波》，介绍澳门、台湾、纽约、温哥华等地的原缅甸归侨和校友会的活动情况，还简介现在的缅甸国情。内容还包括介绍缅甸探亲，华文教育，联谊会工作，“泼水节”活动等等。听联谊会代表人物之一说，很少将《鹭岛胞波》寄往缅甸等海外国家。2000年的时候，他们在澳门举办了“世界缅甸同侨联谊会”，据说“凡在缅甸出生或居住过的华侨、华人、归侨或其后裔及缅甸社团可成为本会会员或团体会员”（林清风他主编2001：85）。一名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的男性设立了名叫“缅甸同华之家”的博客。

这些活动促进了流散世界各地的华裔缅甸移民的互动和跨国化。但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老龄化比较严重，不像印尼归侨联谊会那样积极地让年轻一代加入活动。联谊会更新通讯录的时候，打电话确认地址，同时提出希望归侨子女加入组织，可是年轻一代不感兴趣，冷漠地挂断电话。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缅甸归侨的网络虽然向外扩大，可是平时活动呈现非实在化倾向。

总的来说，归侨联谊会的活动表明，尽管归侨与海外华人的日常性交流不多，可是归侨联谊会会让分散的归侨聚集起来，并逐渐强化为与海外交流的“节点”力量。因此归侨联谊会不象黄静说的“会刊不仅是信息交流的阵地，会刊的流通还成为建立跨国网络的重要纽带”（黄静2005：56）那样一下子变成跨国网络。然而，它对印尼归侨或缅甸归侨创造独特的“印尼”、“缅甸”起了重要作用，使他们逐渐自觉与周围本地人的差异性并焕发自豪感。这样，在想象中建构“侨”认同意识，强化内部关系，发挥与海外华人社会交流的“节点”功能。至于缅甸归侨，他们重视跨国缅甸侨的联系，而国内归侨联谊会的“节点”功能偏低。

年轻一代在中国出生成长，对父辈的原侨居国没什么印象，因此怎样才能让年轻一代继承联谊会和归侨意识，这是现在最大的

问题。但另一方面，一些事例表明，部分年轻人在参与联谊会活动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比较特殊，建构起作为归侨子女的意识。

III 归侨独特的经历和记忆

自愿回国的归侨回国后已经过了五、六十年，可是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利用“归侨之家”组织举办各种聚会活动呢？他们当年为什么选择回国，现在的故乡意识何在？我不想停留在对“归侨之家”内部组织活动进行概况描述的水平上，希望聚焦参加活动的归侨，通过他们的话语分析探讨归侨身份的自觉及其差异性的再生产等问题。以下重点考察参加“归侨之家”活动的归侨的个人经历和记忆。

我参与观察“归侨之家”的归侨活动，频繁接触、深入交流的大约 20 人，其中 10 人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回国原因及各自感受等。下面我想从行为者的视角出发，通过归侨的话语理解他们怎样发出差异性诉求及寻找心理依靠。

可以认为，归侨的差异性与他们在原侨居国以及回国后的经历及记忆是分不开的。当然每个人的经历、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彼此之间也存在一些共通点：第一，在海外出生，曾经作为外国人生活；第二，懂事后才回国；第三，接受中国政府特殊待遇，回国后一定时期内在补校过着以归侨为主的集体宿舍生活，其间多多少少感到文化冲突等。

1 回国出于“爱国”？

这些自愿回国的归侨当年大部分离开家人单独回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他们一旦回国就很难再返回原侨居国。所以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还选择回国呢？”。不少人回答说，“因为爱国，想对国家做贡献，当时这是最红的思想”。这种模范答案在归侨回忆录和报刊上的归侨故事中相当常见，因此给人感觉好像套话一样。实际上，归侨说的“爱国”话语中隐含着个人历史，他们当年选择回国是有原因的：

首先，这与原侨居国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家庭状况是分不开的。比如，交谈的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他小时候家庭经济比较艰难，无法上学，为了帮补家计从小就要参加劳

动。也有人说父亲再婚后，自己与后妈相处不来，在家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还有人说，当时中国人经常受当地人欺负，被当地人说“滚回你的国家去”等等，甚至有人亲眼目睹自己的朋友被当地人杀死等可怕场面。诸如此类的经历使他们逐渐萌发去别的地方谋求归宿的欲望，心中孕育起从来没有到过也没见过的“祖国”的美好形象。

其次，这与归侨在原侨居国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是分不开的。不少归侨在侨居国接受了祖国是中国的思想教育。我的访谈者中有一个缅甸归侨在缅甸华侨中学读过书，上完初中后才回国。她告诉我，在家里说缅甸语会被长辈严厉批评，奶奶常说“说本地话很容易忘记祖国”等等。她回忆在缅甸上学的情形时说，“在学校里也仿佛生活在中国社会里一样”，“我们已经中了毒才回来的”。另一个从印尼回来的男性在印尼的时候常常看“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女篮五号”（1957年），“刘胡兰的故事”（1950年）等中国电影，这些影片讲述的都是爱国革命故事。从这些话语来说，他们回国前在侨居国华文学校等地方被灌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在其想象中“祖国”是美好的向往之地。

从上述情况来看，他们在原侨居国的生活经历和所受教育，都让他们对祖国产生或强或弱的想象，当这种感情需要变得特别强烈的时候，就达到钟理和的小说《原乡人》的主人公那种境界，也就是“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但是，并非全部归侨都是因为侨居国接受爱国宣传，想象美好的“祖国”才回国的，也有部分已知道现实情况才决定回来的。有一个印尼归侨 20 世纪 30 年代去印尼棉兰，做生意很成功，生活过得很好。他崇拜陈家庚，很想回国。1955 年他一个人回来看情况，知道国内生活环境不太好，但他回国的决心没有改变，只要能为祖国效力，哪怕辛苦也不在意。他太太因为在印尼过得比较富裕，本来不想回国，没办法之下只好在 1957 年带着孩子跟随丈夫一起回国。这个事例表明经济条件好的人不一定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为国家作经济方面的贡献才回国的。如果把这个现象称为“爱国”，那么它不

是一种空洞的口号。

2 故乡意识何在？

那么，他们回到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后，现在怎样看待中国和原侨居国呢？《鹭岛胞波》、《印联会讯》、《福建侨报》还有一些归侨研究论文谈论归侨的故乡意识时，普遍认为中国是他们的“第一故乡”，原侨居国是“第二故乡”。不过，根据我对归侨的访谈以及一些归侨自撰的回忆录，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归侨没有把中国和侨居国断然分开考虑，有些认为原侨居国是“第一故乡”，还有一些归侨对中国感到不满，决定去第三国寻找理想生活的地方。也有一些归侨说对什么地方都无法感到归属感，那种感觉就像无家无根的流民一样。

总的来看，认为中国是“第一故乡”的归侨往往是回国后有机会继续上学，毕业后被安排到有一定名气的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又有和睦家庭的归侨。回国后有了不愉快的经历，对生活感到不满的归侨，则觉得缺乏归宿感。

有一个女性缅甸归侨（1953年生）曾经在缅甸华侨中学读过书，学校有不少通过大使馆进来的中国电影、杂志等，在学校里感到好像处在中国社会似的。她初一的时候由于政治政策的关系转到缅甸政府中学，与班上的缅甸同学关系很好，也会说会写缅甸语。

回国后安置到了江西，在当地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到工厂里工作，那时她觉得地位突然下降了许多。因为她本来想上大学深造。她先生的家乡在厦门，2005年他们把户口迁到厦门。她的祖籍在福建安溪，不过从来没有回去过。她说虽然在江西生活了30年，但“那里没有挂牵的人”，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回江西。她说在江西被人问起故乡在哪里的时候通常回答说“我们没有家，我们是归侨”。她还说，“我们在这里口味不合，不是我们的原味，心里牵挂不了。找不到归宿，找不到点，这里没有思念，我们象在流浪”。“我们没有靠山，只能靠自己，很不容易走出来，很难翻身”。来厦门后被人问家乡在哪里的时候，她回答说“我是安溪人”，不过马上被人说没有安溪口音。她又说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记忆犹深，因此尽管过了好几十年也还是很怀念缅甸。但另一方面，家人已经没人留在缅

甸生活，所以也没有回缅甸的强烈愿望。从她的这些话语，可以感受到她复杂的心情。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哪怕过了十几年也一直感到怀念。有时候看探亲回来的缅甸归侨朋友带回来的缅甸歌曲、跳舞的碟，就想起以前缅甸生活的地方，很想再去看看。缅甸俗话说，“把脐带埋下来的地方就是故乡”。她先生的父母不想回国，父亲已经在缅甸去世了，母亲还在缅甸。其父母觉得把脐带埋在缅甸，加上已习惯了那边的生活，所以故乡就在缅甸。

她今年3月至4月回缅甸住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跟我说“跟现在的中国比较，缅甸远不如中国，心里很难过。希望缅甸早日脱贫”⁹。她被缅甸的堂哥问当时回国得对不对，回答说“当时不知道回国的选择对不对，我们回来后缅甸的政策变了，允许华人做生意，当时很后悔回国。不过看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觉得回国是对的”。堂哥和堂姐也想来中国，但不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也不是因为中国是故乡，而是因为他们想见她母亲。他们小时候在她家附近生活，对她母亲很有感情¹⁰。

另外，有一个印尼归侨（1937年生）说，印尼华人第二代和三代之间也有差别，第二代对中国的感情比第三代强。他是第二代华侨，他母亲是印尼人，他父亲经常跟他讲中国家乡的事，让他对故乡产生了朦胧的感情。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无法继续上学，开始参加劳动，生活很艰苦。1955年，他17岁的时候一个人回国，在补校上学，当时很感谢中国政府。不过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他陷入困境。他回想当时的情况说，“我们爱母亲，可母亲不爱我们，我们能怎么办？”

他曾经在尼龙工厂工作，该厂近2000名职工中归侨只有10个左右。有一天选工会主席，他得票最多。可是被本地人说“归侨怎么能当主席呢？”。他感慨地说，“因为我是归侨，没办法，以前在印尼被人瞧不起，现在在这里也被人瞧不起，到底谁看得起我们？”

现在他在厦门有家庭，儿子已成家，也有了孙子。不过他告诉我“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你知道犹太人吗？我们跟他们一样的。我们永远是外国人，在印尼的时候他们排华，

回祖国后我们是外人”。但是因为印尼是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与同学和亲戚生活的怀念还刻在他的心里面，比长大以后的中国生活印象更深刻。现在他哥哥夫妇住在印尼的父母家，他们只能用印尼语沟通。1991年以来，他前后五次回印尼探亲。

1998年在印尼再次发生排华，不少华人想把孩子送到中国接受教育。他先后当起了8个家庭24个孩子的“监护人”。这不是做生意，完全是志愿服务。厦门市公证处给他出具“公证书”，因为当“监护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不少归侨不愿意担任。每个孩子来到厦门，他都要领他们去相关单位办理一系列手续。平时他还主动和学校保持联系，参加家长会，关照孩子们的生活等¹¹。我问他“您为什么愿意做那么辛苦的事？”，他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同胞，同一祖国的人，应该帮助他们。如果是印尼本地人的孩子，那我不会帮忙的”。1998年动乱的时候，他的朋友目睹朋友被本地人残杀的场景，之后一直睡不着，并发传真给他，请求他安排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并给与照顾。他小时候也亲眼看到朋友被本地人残杀，因此十分理解朋友的心情。所以他答应帮助那个朋友。

据他说，不少印尼华人父母希望孩子毕业后留在中国就业，与中国人结婚。特别是女孩，很多人希望对象也是华人，过了适婚年龄还找不到华人对象的才考虑与印尼本地人结婚。而且，他们觉得跟本地人结婚是丢脸的事情。所以，不少印尼华人父母觉得如果孩子愿意跟中国人结婚，那么贫穷也没关系，乐意在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实际上很多孩子毕业后希望回到父母住的地方¹²。

从上述归侨话语来看，他们是“位于中间的、归属感（所属性）暧昧的、缺乏稳定性的浮草般的‘边缘人（marginal man）’”（坂田：1985:8）。其归属意识处于波动、模棱两可的状态。还有一个印尼归侨祖籍在广东梅州，是“厦门大客家”（客家人组织）的会员，每年几次参加活动。不过他从来没回过梅州，既不知道老家具体在哪里，也不会说客家话。2009年2月14日我跟他一起去客家新春联谊会的时候看到另外几个印尼归侨也来参加。他们之所以喜欢参加客家组织的活动，是因为不少社会地位高的人士也来参加。按照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异

乡人”特有的“客观性”来说，他们“不会事先决定接受什么、理解什么、考虑什么”（齐美尔著、居安译，日文版 1994:288）。就是说，这些印尼归侨处于边缘立场，但这并不一定引起负面作用，有时候还会发挥正面作用。由于是处于边缘的，所以可以获得自由状态，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及生活方式等。

至于归侨回国后如何看待自己与本地人的关系，可由“归侨之家”的“侨友合唱队”活略知一二。合唱队50多名成员中归侨不到10人，其余的都是本地人。队员本来以归侨为主，后来一个本地人不断让自己的朋友加入，现在变成了以本地人为主的合唱队。“归侨之家”的值班员说讨厌合唱队来活动，因为他们乱扔水果皮、花生壳等，与归侨不一样。现在的“青年团”团长是归侨子女，她觉得自己父母那一代“归侨的思想很单纯，说话很直爽。有些本地人很有心计，考虑斗争问题比较多”。还有人说“我们归侨和本地人感情上合不来。归侨才是‘老乡’，经历和习惯都一样。哪怕有什么困难，我也不想请本地人帮忙”。他还强调说“我们由统战部管”。由此可见归侨与本地人之间存在习惯、思想以及政治身份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归侨意识。

这在归侨的婚姻中也有所反映，虽然也有跟非归侨结婚的，但归侨之间结婚比较普遍。不过，夫妻双方虽是归侨，但原侨居国不一定相同。不少人跟我说“对方也是归侨，这是当时谈对象最起码的条件”，“请朋友介绍归侨对象”等。

王苍柏考察香港的归侨团体时提出，“归侨来到中国大陆或香港之后，失去了在侨居地的少数民族身份，不再面对来自主流社会和殖民当局的外部压力。因此，和传统的华侨社团拥有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和宗教等多重功能不同，归侨社团的功能明显地简化了，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功能方面，即为归侨提供一个在新的环境中的有效的社会网络和回旋余地，以此生活上互助，感情上交流”（王苍柏 1999: 65）。从归侨之家的功能来说，确实象王苍柏指出的那样，比传统的华人社团简单化了。可是，从他们在中国的身份和认同意识来说，根据上述的归侨话语，说其“不再面对来自主流社会和殖民当局的外部压力”也不确切。他们还要面对作为少数派的困扰，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这种

感情从他们在原侨居国及回国后在政治波动时代活着的历史出来，他们需要能够依靠的精神寄托。“刚回来时过春节没有可回的家”，因此他们没办法融入到主流社会，具有“边缘人”、“异乡人”特征。这就是他们需要“归侨之家”的重要因素这一。从他们的感情来说，我认为说归侨团体功能“简单化”并不合适。因为“归侨之家”就是他们共享记忆和经历，自觉独特文化，再生产差异性的地方。

从网络的角度来说，中国与原侨居国的个人层面的关系对归侨来说比中国与原侨居国的国家层面的关系更重要。那里生活着自己的亲朋戚友或者自己曾在那里留下令人怀念的记忆，才会让自己对该国或该地发生感情。从这点来说，“侨”网络是由归侨的个人“知识”支撑起来的，这种“知识”是维持“侨”网络的核心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他们的记忆、经历和生活行为等。

那么，归侨如何回国后看待自己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呢？下面还是以“归侨之家”的事例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归侨之家”组成了一支“侨友合唱队”，队员 50 多人中归侨不到 10 人，其余的都是本地人。队员本来以归侨为主，后来一个本地人不断让自己的朋友加入，现在变成了以本地人为主的合唱队。一个归侨一直主持活动，不过今年辞掉了，原因是“本地人思念很多，很难相处”。“归侨之家”的值班员也说讨厌合唱队来活动，说他们乱扔水果皮、花生壳等，与归侨不一样。

现在的“青年团”团长是归侨子女，她觉得自己父母那一代“归侨的思想很单纯，说话很直爽。有些本地人很有心计，考虑斗争问题比较多”。还有人说“我们归侨和本地人感情上合不来。归侨才是‘老乡’，经历和习惯都一样。哪怕有什么困难，我也不想请本地人帮忙”。他还强调说“我们由统战部管”。由此可见归侨与本地人之间存在习惯、思想以及政治身份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归侨意识。

这在归侨的婚姻中也有所反映，虽然也有跟非归侨结婚的，但归侨之间结婚比较普遍。不过，夫妻双方虽是归侨，但原侨居国不一定相同。不少人跟我说“对方也是归侨，这是当时谈对象最起码的条件”，“请朋友介绍归侨对象”等。

那么城市归侨的这种故乡意识和差异

性如何得以保持呢？我认为“归侨之家”就是他们共享记忆和经历，自觉独特文化，再生产差异性的地方。

结语

根据上面的考察，“侨”网络可视为以包含着独特的混淆的“印尼”和“缅甸”等的“归侨之家”为“节点”的跨国界跨地域的网络。可以说“归侨之家”让分散的归侨聚集起来，重温经历、记忆、缅怀之情。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在网络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着自己想念的亲朋戚友，或者自己曾在那里留下过值得怀念的记忆时，自然对该国或该地发生感情。从这点来说，“侨”网络是由归侨的个人“知识”支撑起来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记忆、经历和生活行为等，是维持“侨”网络的核心因素。

建构跨国网络的时候，“节点”的存在极其关键。华侨华人史上曾经有水客、侨批局等连接双方的中介存在，而现在“归侨之家”的上级组织侨联就是充分发挥中介功能的组织。侨联将中国当地人与归侨连接起来，同时在个人层面将归侨与他们在海外的亲朋戚友连接起来，又在国家层面将中国与侨居国连接起来。从这点来看，归侨本身就是具有跨国性的个人和群体，他们具有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潜在性。

“侨”网络是同时由归侨的经历和记忆维持的。独特的经历和记忆让归侨自觉差异性，“归侨之家”则是体现其差异性的渠道与场所，各种归侨联谊会活动发挥着强化这种差异性的功能，并生产了混淆的“印尼”、“缅甸”特点。我不想只用认同意识（identity）一词来说明一切，因为归侨的问题并非单纯的文化上或感情上的问题，还涉及到政治身份的问题，同时也是带有政治性的跨地域流动人口的问题。他们在原侨居国和回国后一直面对文化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差异与摩擦，并进行选择与调整。我想用文化公民权的概念来进一步分析归侨的文化自觉问题。翁爱华（Aihwa Ong）对文化公民权下定义，认为它是“面对各种难以取决的矛盾时产生的文化实践与信念、观念等。同时也是向基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或其所属国的国民及领土等标准形成的均一形态提出异议的行动。文化公民权就是在权力网络与民族国家

和国民社会等相结合的情况下进行的‘主体化 (self-making)’和‘生产化 (being-made)’过程 (Ong 1996: 738)”。归侨以“归侨之家”为平台, 分享独特的经历和记忆, 还与海外华人互动, 促进了跨地域性的“侨”的活动. 这种网络也是归侨获取文化公民权的表现手段之一。

总的来说, 归侨虽然“回到”中国, 不过在心理上不断往复于“祖国”和原侨居国之间, 如果他们亲朋戚友在第三国家的话, 其往复区域会更扩大. 因此,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该不该使用“归侨”这一概念, 对本人来说都是“侨”, 就是与海外有关的个人或群体而已. 本文中我之所以使用“侨”网络这一词, 其缘故也就在这里. 对行为者来说, “海外华人”只是自己的亲朋戚友. 这里我还是想强调这种“侨”网络是基于个人关系建构起来的, 也就是说这种网络只有通过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常态关系才能建构起来. 因此, 如果这种个人层面的常态交往消失的话, “侨”网络也有可能慢慢弱化. 关于这点, 今后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考察。

¹ 本研究得到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共同研究课题资助. 课题名称为, 与“和谐社会”对话: 从文化公民权来看, 华南地区的边缘群体 (项目主持人: 奈仓京子).

² 京都文教大学文化人类学科实习助手、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³ 包括施坚雅 (1981) 的泰国华人社会研究, 傅立德曼 (1985) 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 李亦园 (1970) 关于马来西亚麻坡镇华人经济机构、家庭与宗教生活、华人认同感, 以及它们与地方干部制度的关系的研究等. 华侨华人的文化习惯及认同感等究竟是在中国还是在侨居国, 又或者是在两者之间呢? 这便是这些研究共通的议论中心所在. 而且, 议论时往往以“落叶归根”、“落地生根”或者“中国人性”等概念加以描述 (庄国土编 2003; 曾少聪 2004; 梁英明 2001 等). 日本人类学者三尾裕子也指出, “中国系移民认同研究的议论普遍认为, 无论是持有中国国籍期间, 还是获得当地国家的国籍以后, 又或者是在当今国际化的年代里, 中国系移民始终保持着‘中国人性’. 持本质主义不变论观点是这些议论的共通点”. 同时她主张说, “维持‘中国人性’只是中国系移民的选择之一, 只有清楚这一点, 我们才不至于自动地、本质

主义地将中国系移民描述、定义为‘华侨华人’, 才可能把握中国系移民的社会文化的涵化全貌及其多样性” (三尾 2006: 85-86, 笔者译).

⁴ 我曾考察过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之间由于遭遇排华而回国的归侨被政府安置到华侨农场的归侨 (奈仓 2007、2008a、2008b, 奈仓 2008、2009). 有关华侨农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具有代表性的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李明欢、刘朝晖、孙晟、俞云平在福建松坪华侨农场进行调查研究, 其成果发表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 6 月第 2 期) 上. 该研究应用人类学方法考察归侨的故乡意识、认同感、集体记忆等, 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分析切口. 但还是带有以往的华侨华人研究同样的倾向. 也就是, 以“当地社会”与“归侨社会”的多元视角主要议论了作为周边群体的“归侨”如何单方面地融入作为中心的“当地社会”, 过于简单地使用“归侨群体”把握华侨农场的居民, 无法表现归侨社区内部的复杂情况.

⁵ 省、市、县、区、乡、镇、村、街等行政级别, 以及企业、学校等, 只要有归侨的地方就会有侨联. 以福建省为例, 据《福建侨联三十年》(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编, 1990 年, 44 页), 1989 年省内侨联组织为 363 个, 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厦门归国华侨联合会、泉州归国华侨联合会等.

⁶ 2008 年 5 月 23 日和 6 月 10 日, 经福建华侨大学朱东芹老师介绍, 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一楼办公室进行访谈. 此处谈话内容来自 6 月 10 日的访谈.

⁷ 2008 年 6 月 10 日, 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一楼办公室对郭先生进行访谈, 2008 年 6 月 18 日在福州的省侨联办公室与许小姐交谈.

⁸ 厦门市侨联春节为归侨举办“春节游园活动”.

⁹ 2009 年 5 月 6 日在网上聊天.

¹⁰ 我和那个缅甸归侨阿姨 2008 年 12 月 21 日, 在思明区侨联活动中心第一次认识她, 她在那里上班, 从事打扫卫生, 接待客人等工作. 后来我有时间的时候经常去找她谈话, 访谈她的经历. 我 2009 年 4 月回日本来后上网交流, 问她回缅甸探亲的感受. 2009 年 8 月 14 日我在广东深圳再跟他见面, 继续问她在缅甸时的感受, 近况等. 现在也一直保持联系.

¹¹ 详情请参考 2008 年 10 月 29 日的《厦门晚报》, “第二届厦门市道德模范候选人”.

¹² 2008 年 12 月 13 日去厦门归侨之家参观印尼归侨合唱队活动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他, 后来他

在侨联大厦的办公室跟我谈到他的人生故事，给我看一些生活照片，还给我提供不少有关联谊会的资料。

【参考文献】

中文

1. 陈达（1938）《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
2. 傅利曼[著]，郭振羽、罗伊菲[译]（1985）《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台湾正中书局。
3. 黄静（2005）“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pp.50-59。
4. 黄小坚（2005）《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5. 柯群英（2005）“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pp.55-62。
6. 毛起雄、林晓东（1993）《中国侨务政策概述》中国华侨出版社。
7. 李明欢（2003）“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松坪华侨农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pp.1-3。
8. 李明欢[主编]（2005）《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9. 李亦园（1970）《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湾正中书局。
10. 梁英明（2001）《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昆仑出版社。
11. 廖赤阳、刘宏[主编]（2008）《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东亚口岸城市的华商与亚洲区域网络》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12. 林晓东（2002）“试论侨联人民团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pp.55-62。
13. ……（2004）“侨联人民团体维护侨益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pp.70-78。
14. ……（2006）“浅析《中国侨联章程》的历史沿革”《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pp.59-71。
15. 刘进、钟顺兰、朱爱金（2004）“五邑侨乡国际移民的社会心理分析”《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6 No.2，pp.84-87。
16. 刘宏（2003）《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
17. 刘宏主编（2007）《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华商馆。
18. 刘权（2002）《广东华侨华人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 刘玉遵、成露西、郑德华（1985）“华侨，新宁铁路与台山”《华侨、华人历史论丛》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出版，pp.162-203。
20. 刘朝晖（2003）“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区认同的实证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pp.11-18。
21. 卢海云、权好胜[主编]（2001）《归侨侨眷概述》中国华侨出版社。
22. 奈仓京子（2008）“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与其变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pp.23-33。
23. ……（2009）“跨境的越南归侨”《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pp.75-93。
24. 孙晟（2003）“重建家园：松坪华侨农场印尼归侨群体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pp.19-25。
25. 王苍柏（1999）“香港的归侨团体研究：以巨港（香港）校友会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pp.55-66。
26. ……（2006）《活在别处——香港印尼华人口述史》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7. 王苍柏、黄绍伦（2006）“回家的路：关于全球化时代移民与家园关系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8卷第4期。
28. 王赓武、姚楠[编]（1986）《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9. 俞云平（2003）“一个特殊社区的历史轨迹：松坪华侨农场发展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pp.4-10。

30. 袁丁（2008）“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侨汇流通：抗战中的广东侨汇研究”钱江、纪宗安主编《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第一辑,pp.116-127.
31. 曾少聪（2004）《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2. 郑一省（2006）《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33. 钟理和（1982）“原乡人”《钟理和小说选》广播出版社出版, pp.1-12.
34. 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35. 庄国土等[著]（2003）《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36. 张应龙（2003）“改革开放后台山侨乡经济的变迁”，周大鸣、柯群英主编《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pp.23-34.
37. ……（2003）“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pp.35-43.
- 地方志, 报纸, 内部发行资料**
38. 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编（1990）《福建侨联三十年》内部发行.
39.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1996）《泉州市华侨志》中国社会出版社.
40. 《厦门晚报》（2008年10月29日）
41. 厦门市缅甸归侨联谊会编《鹭岛胞波》（第1期1993年-第34期2008年）.
42.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编《印联会讯》（第1期2004年-第19期2008年）.
43. 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编（1999）《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
44.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编（1986）《侨联三十年》内部发行.
45.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编（1956）《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内部发行.
- 日文**
46. 市川哲（2009）「新たな移民母村の誕生—パプアニューギニア華人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社会空間」『国立民族博物館研究報告』33(4),pp.551-598.
47. 市川信愛（1996）「移民による僑郷・福建の変容—新中国成立以降の華僑教育の視点から」可児弘明編,『僑郷華南—華僑華人研究の現在』行路社,pp.116-138.
48. 王維（2001）『日本華僑における伝統の再編とエスニシティー祭祀と芸能を中心に』風響社.
49. 小熊誠（1996）「フィリピン華僑と故郷福建—宗親会と同郷会を中心として」可児弘明編『僑郷華南—華僑華人研究の現在』行路社, pp.174-188.
50. 小野沢正喜（1988）「トロント市におけるベトナム系コミュニティの二重構造の分析」綾部恒雄編『カナダ民族文化の研究—多文化主義とエスニシティー』刀水書房, pp.297-345.
51. 可児弘明[編]（1996）『僑郷 華南-華僑華人研究の現在』行路社.
52. 川崎有三（1996）『東南アジアの中国人社会』山川出版社.
53. 坂田義教(1985)「マージナルマン」坂田義教編『現代のエスプリ』№211,至文堂,pp.5 - 21.
54. ジンメル,ゲオルク[著]、居安正[訳]（1994）『社会学：社会化の諸形成についての研究（下）』白水社.
55. スキナー、ウィリアム[著]、山本一[訳]（1981）『東南アジアの華僑社会—タイにおける進出・適応の歴史』東洋書店.
56. 芹澤知広（1998）「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香港人」・「香港文化」研究の現在—」青木保他編,『岩波講座文化人類学第13巻 文化という課題』岩波書店, pp.145-171.
57. ……（2002）「『香港人』と『越南難民』のあいだ」吉原和男・鈴木正崇[編]『拡大する中国世界と文化創造—アジア太平洋の底流』弘文堂,pp.169—189.
58. 陳天璽（1999）「華人研究とネットワーク論」飯島渉編,『華僑・華人史研究の現在』汲古書院, pp.281-301.
59. ……(2001)『華人ディアスポラ：華商の

- ネットワーク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明石書店.
60. 中田睦子(1996)「福建省晋江县における施氏の分節形成と地域移動」可児弘明編『僑郷華南—華僑華人研究の現在』行路社,pp.56-76.
61. ……(2001)「僑郷からの眺め—華人ネットワークの行方」田中恭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国際関係—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秩序』東京大学出版社,pp.215-254.
62. 奈倉京子(2007)「過渡的居場所としての『ベトナム帰国華僑』」『華僑華人研究』第4号, pp.17-41.
63. ……(2008a)「インドネシア帰国華僑から『中国系インドネシア系移民』へ」『白山人類学研究』第11号, pp.121-146.
64. ……(2008b)「帰国華僑の社会保障：中国広東省台山華僑農場における人類学的調査を通して」2008年6月『海外社会保障研究』第163号,pp.98-108.
65. 三尾裕子(2006)「中国系移民の僑居化と土着化—ベトナム・ホイアンの事例から—」伊藤亜人先生退職記念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東アジアからの人類学—国家・開発・市民—』風響社,pp.85-102.
66. ユエンフォン・ウーン(Yuan-Fong Woon)、吉原和男[監修],池田年穂[訳](2003)『生寡婦<グラスウィドウ>—広東からカナダへ、家族の絆を求めて』風響社.
- Introductory Review”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Volume2 Identity, Culture & Politics*. Linda Y.C. Lim and L.A. Peter Gosling ed.: Singapore, Maruzen Asia, pp.1-14.
71. Ong, Ahiwa (1996) Cultural Citizenship as Subject-Making: Immigrants Negotiate Raci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Anthropology*, -37(5), pp.737-762.
72. ———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Duke University Press.
73. Suryadinata, Leo (1997)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英文

67. Barth, Fredrik (1969).*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Waveland Press.
68. Chin, James Kong (2003) “Multiple Identities among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Hong Kong” *Chinese Migrants Abroa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p.63-82.
69. Fitzgerald, Stephen (1972)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0. Gosling, Peter L.A (1983) “Changing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An



「省管県」制度の一考察 —浙江省の例を通して—

兪 嶸¹

I はじめに

中国の政府構造は中央、省、市、県、郷鎮の5階層からなっており、1994年の「分税制」より、中央と省レベル政府との間の税収区分は確定されたが、省と省レベル以下の市、県、郷鎮の間には、依然として統一した明確な税収区分がない。「分税制」は中央政府の財政力を強化する意図があるため、制度実施後、財政収入総額に占める中央財政収入の割合は大きく上昇し、それに伴い、地方財政収入の割合は低下した。自らの財政力を保持するため、省レベル以下の政府では、財政収入の減少をその下のレベルの政府から税収を吸い上げる形で補填する傾向が強まった。結果として地方の財政収入は省、市レベルの政府に集中し、末端政府に行くほど、財政状況の悪化が進み、特に県と郷鎮レベルでは状況が深刻である。

県財政の立て直しが急がれるなか、市が県から財政収入を吸い上げることに歯止めをかける方策として、浙江省で行われている「省管県」制度が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省管県」は省が直接県の財政を管轄し、市の県に対する財政管轄権を無くすものである。市と県を財政上同列にする「省管県」方式は県の財政力の補強、財政難問題の解消および財政力格差の是正に有効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

先行研究のなかで県と郷鎮の財政赤字に焦点を当てるものは多数あり、中では、「省管県」を含む県レベル財政の建て直し方式に注目するものもあるが、「省管県」制度の有効性について、数量的に捉えるものは少ない。本論は県レベルの財政力不平等度に注目し、最も早くから「省管県」制度を導入した浙江省と導入していない江蘇省、広東省、福建省、山東省の4省²との比較を行

う。この4省は浙江省と同じ東部地域に位置しており、経済発展レベルも近く、比較対象として適切だと考える。

浙江省における「省管県」制度の有効性を検証するにあたり、まず上記5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の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不平等度を算出し、比較を行う。それから、浙江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の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不平等度を市の間の不平等度(市間不平等度)と市が管轄する県との間の不平等度(市内不平等度)に分解し、それぞれが県間不平等度にどの程度影響しているかを把握する。使用するのは2005年のデータであり、タイル指数を用いて不平等度の分解を行う。

II 「省管県」制度が注目される背景

1 財源の上級政府への集中による県財政の悪化

「分税制」の実施により、財政収入総額に占める中央財政収入は「分税制」前の1993年の22.0%から実施直後の1994年の55.7%に跳ね上がった。その後も一貫して50%前後のレベルを維持している。財源が中央に集中されるにつれ、省レベルでは財政収入の減少を下級政府に転嫁する傾向が現れた。省と省レベル以下の市、県、郷鎮における税収区分は省に委ねられていることは、下級政府への財政減収の転嫁を可能にしている。縦割りである行政構造のなかで、省以下の各級政府においても、上級政府は下級政府に税収の減少を転嫁する傾向があり、結果として、省の財源は省と市に集中し、下級政府であるほど財源が不足し³、県と郷鎮の多くは深刻な財政難に陥った。中国の政府構造では、下級政府の財政権、人事権などは上級政府の影響下に置かれるため、県と郷鎮政府の財政収支は上級政府

の方針によって大きく左右され、それに対し異議を申し立てる機会も少ない。

専項移転支払いはその一例である。分税制実施後、中央から省へと移転支払いが行われると同様に、省レベルにおいても、省と市、市と県の間で移転支払いが行われている。移転支払いのうち、専項移転支払いは用途が指定されているが、省と省以下の政府との間に明確かつ厳格な分配基準が欠如しているため、上級政府は下級政府に専項移転支払いを給付する際に、一定の比率で支払い金を上級政府に保留するケースが多い。これは下級政府になるほど、得られる専項移転支払いの金額が少ないことを意味する。

2 移転支払いによる財政再分配機能の欠如

地方財政は上記の構造上の問題を抱えているだけではなく、省から下級政府に対する移転支払いの算定基準にも問題がある。移転支払いは本来省内各地の財政力格差を是正し、公共サービスの均等化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が、財政難に苦しむ県、郷鎮政府までに十分な移転支払いが行き届いてい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以下より移転支払いの内訳を通してこの問題を検討したい。

図表 1 2004 年度省対下級政府の財政移転支払い

項目	金額(億元)	割合(%)
一般移転支払い	600	27.0%
少数民族地域移転支払い	37	1.7%
農村税・費改革移転支払い	590	26.5%
給与調整移転支払い	918	41.3%
その他	79	3.6%
移転支払い総額	2224	100%

(出所) 李、許 (2006)

(注) その他は、農業特産税の廃止、また農業税税率の引き下げによる税収減少に対する移転支払であり、県と郷鎮財政に対する補助金や奨励金を含む。

図表 1 に省対市・県の移転支払い項目と

それぞれの支払い額の割合を示している。移転支払い 5 項目のうち、最も高い割合 (41.3%) を占めるのは給与調整移転支払いである。そのほとんどは民間企業の給与増に併せた地方公務員給与の引き上げに費やされており、財政力の補強と公共サービスの拡充とはほぼ無関係であると言える。4 級にもわたる地方政府の間に業務の分担が明確ではないため、政府機能の重複が多く、財政支出の効率が低いと指摘できる。

そのほか、高い割合を占めるのは農村税・費改革移転支払いであり、移転支払い総額の 26.5% を占めている。この項目を制定する目的は農村税制の規範化、農民負担の軽減と農村行政機構の簡素化である。農村税費改革移転支払いの一部は農村の初等教育やインフラ整備に使用されており、農村部における財政力の補強と公共サービスの拡充に寄与すると言える。しかしながら、算定基準のうち、農村税費改革前の財政が農村税費に対する依存度 (農業 4 税が財政収入に占める割合)、財政困難度 (人件費と行政業務の遂行に必要な経費が財政収入に占める割合) など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れらの算定基準は旧制度の影響を受けており、また恣意的な部分もあるため、総じて客観的な基準とは言えない。

また、一般財政移転支払いは移転支払い総額の 27% を占めており、下級政府の財政力の補強が目的であり、主に公的サービスの拡充に使用すると決められている。その算定基準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T_{0i} = \delta \times (SE_i - SR_i)$$

T_{0i} は i 市・県に対する一般移転支払い額である。

SE_i は i 市・県の基準財政支出額⁴である。
 SR_i は i 市・県の基準財政収入額⁵である。

δ は移転支払いの係数であり、以下の算定式より算出する。

$$\delta = \frac{PT_r}{(SE_1 - SR_1) + (SE_2 - SR_2) + \dots + (SE_n - SR_n)}$$

うち、分子の PT_r は省が支出可能な移転支払い額である。分母は省内各市・県の基

準財政支出と基準財政収入の差額の合計額である。

以上の算定式では、移転支払い係数の分子は省が支出可能な移転支払い額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は省の財政事情や省の裁量によって支払い額は大きく異なることを意味する。財政力が強く、尚且つ下級政府への移転支払いを増やす意思が強い省は、給付額を多く設定するが、そうでない省は給付額を少なく設定できる。これは客観的な基準に準ずるも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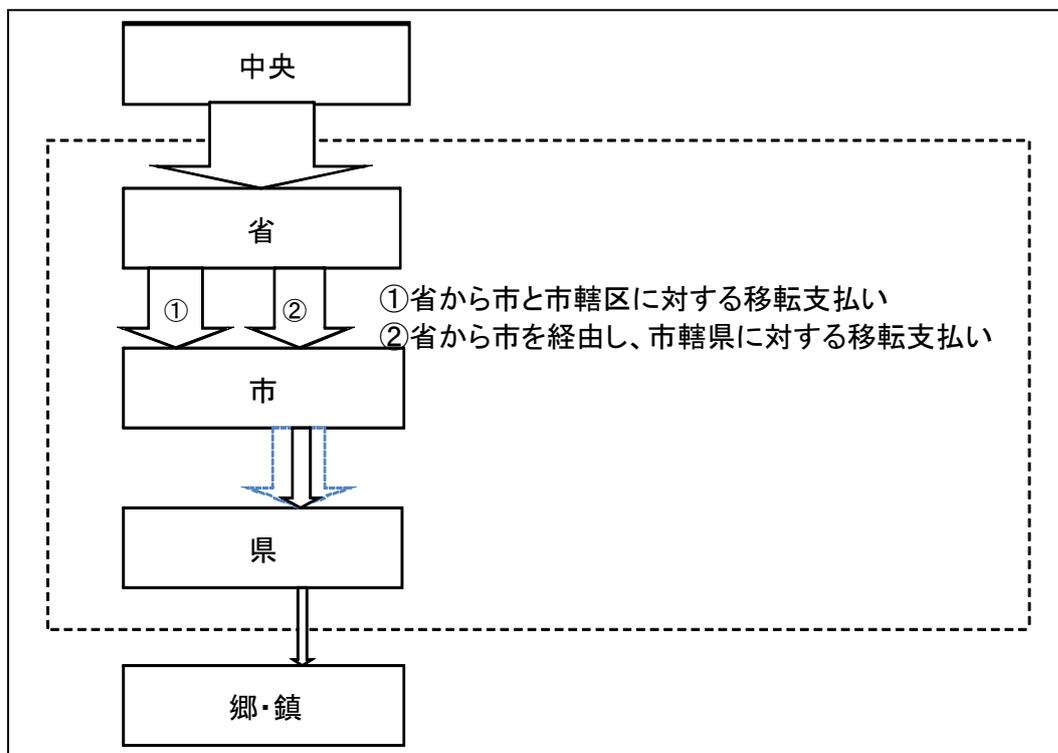
総じて、現在の地方財政構造のなか、県レベル政府は税收の分配において上級政府に有利な分配方式に従わざるを得ない。また、移転支払いにおいても、県レベル政府への財政力補強目的の支払いは不十分である。更に移転支払いを受給する際に、県レベル政府は上級政府の市から一定比率で支払い金の保留を要求されることが多い。結果として全国的に県レベル政府の財政状況の悪化が急速に顕在化した。

図表2に移転支払いの仕組みを示してい

る。一般的に省から下級政府（市、県）への移転支払いは①市と市が管轄する区に対する移転支払いと②市が管轄する県に対する移転支払いから構成される。そのうち、②の部分は実質省から県への移転支払いであるが、行政上県は市に管轄されるため、②の部分は市を経由する形になっている。上述通り移転支払い金の市への保留が発生するため、結局②の部分の一部しか県に行き届かない。

県の財政難問題の打開策が求められるなか、「省管県」制度が注目された。「省管県」は市が県に対する財政管理権を無くすものであり、制度の実施により、②の部分の移転支払いは省から直接県へと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市を経由しないため、市への保留分はなくなり、省からの移転支払いは県へと全額支払われる。これは県の財政力の補強と財政難問題の緩和に有効だとされている。以下より最も早くから「省管県」制度を導入した浙江省の例を通して、当制度の有効性を検証する。

図表2 移転支払いの仕組み



(出所)：筆者作成

III 浙江省の「省管県」制度とその補助策

浙江省は経済発展が速い東部地域に位置しており、2006年現在、人口が全国の3.8%を占める浙江省はGDPと地方財政収入において、それぞれ全国の7.5%と7.1%を占めており、いずれも第4位である。浙江省は11の市と58の県から構成されており、2005年現在の経済発展レベルで選出された全国トップ100県のうち、浙江省の27の県がランクインしており、4分の1強を占めている。県の財政力を保持するため、浙江省は独自に「省管県」制度を進めてきた。

「省管県」は従来からある財政管理方式である。1994年分税制以後、中央と省の間の財政関係が明確にされるにつれ、地方においても各級政府間の財政関係を整理する動きがあった。多くの省では行政体系に沿った「省管市」、「市管県」の政府間財政関係が確立され、「省管県」を存続させたのは浙江省のみである。浙江省はこの財政方式を続けたのは、省と市の間の税収分配が原因で市の財政力が低下した場合、「市管県」なら、市は財政減収分を管轄する県に直接転化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り、県の財政力の悪化に繋がるという懸念があるからだとされている。浙江省の「省管県」は具体的に税収区分、特定補助金支払い、財政資金用途、決算などにおいて、省が市を通り越し直接県を管轄するという形である。

「省管県」は省が直接県に移転支払いを行うため、貧困県の財政難問題を有効に改善できると思われていた。しかしながら、「省管県」は県に対する赤字削減の激励効果が小さく、逆に言えば、省から財政補助金を獲得するため、県は「貧困」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省管県」を進めてきた浙江省では、1994年までに県に対する補助金額は年々増えており、貧困県の財政赤字問題も有効に改善されなかった。

1995年から浙江省は徐々に補助策として、「両保両掛」、「両保両聯」、「億元県奨励金」、「強県拡権」を導入してきた。「両保両掛」は主に財政赤字が特に深刻である

貧困県と低所得県に対するものである。県が中央政府の定める契税⁶と耕地占有税の徴収任務を達成し、更に財政収支の均衡を保つことができれば（両保）、県の財政収入増加率と正比例に、省から県へ給付される財政補助金と奨励金が増える（両掛）とい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おり、財政収入の増加率が高い県ほど、省から得られる財政補助金と奨励金が多いということの意味する。「両保両聯」は県が当年度財政収支の均衡を保ち、更に累積債務を段階的に消化できれば、県の財政収入増による省への財政上納金の増加分の10%を県の技術開発補助金として還元し、さらに4%を奨励金として給付するという仕組みである。以上の二つの補助策は県に財政増収と財政支出節約の激励策として、多くの県で財政状況の好転をもたらした。

一方、「億元県奨励金」とは、財政収入が1億元を超えた県に対し、省が30万元の奨励金を給付し、財政収入がさらに3000万元増えるごとに20万元を給付するという内容である。また、「強県拡権」は、経済活力のある県の権限を拡大し、市と同様のレベルまで引き上げるという内容である。県の権限は上級政府である市に比べて非常に少ないため、経済活力のある県をさらに発展させていくには、市による行政的、財政的束縛を打ち破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た。特に県を管轄する市の財政力が弱い場合、市は自らの財政力補強のため、市と県との間の税収区分を市に有利な形で設定し、或いは市の開発事業のため、県が保有する土地を安価で徴用するなど、県の発展を妨げてしまう可能性がある。これは「強県拡権」が発足した背景である。

「省管県」制度の実施および一連の補助策の導入は、浙江省の県レベル財政力の向上をもたらしたとされている。図表3に浙江省、福建省、広東省、山東省、江蘇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の財政力を示している。図表4から読み取れるように、県レベルの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において、浙江省は2195元であり、他の4省（福建省は928元、広東省は741元、山東省は992元、江蘇省は1566元）を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る。

図表3 東部5省県レベル財政力の比較 (2005年度)

	浙江	福建	広東	山東	江蘇
GDP(億元)	13437.85	6568.93	22366.54	18516.87	18305.66
一人当たりGDP(元)	27435	19129	24327	20023	24489
県の数	58	57	67	91	52
県レベル人口(万人)	3175.81	2435.34	4959.97	6631.39	4873.33
県レベル財政収入総額(億元)	697.02	225.95	367.46	657.91	762.99
県レベル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元)	2195	928	741	992	1566

(出所)：『2005年全国地市县財政統計資料』、『中国区域経済統計年鑑2008』、『浙江統計年鑑2007』より筆者作成。

IV 「省管県」制度の有効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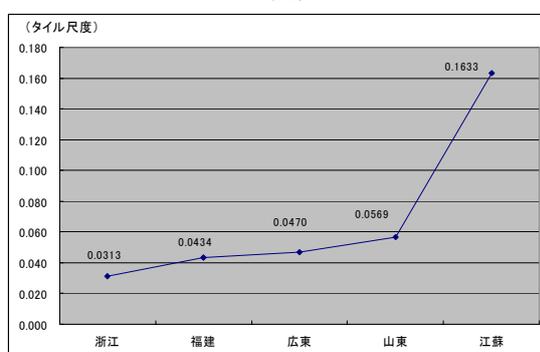
1 東部地域5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財政力不平等度の比較

「省管県」は浙江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の財政力の向上をもたらしただけでなく、省内各県間の財政力格差の是正にも有効だとされている。ここでは2005年のデータを利用し、タイル指数を用いて、東部5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の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の不平等度を算出する。算定式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り、算定結果を図表4に示している。

$$T_T = \sum_{i=1}^n \left[\frac{Y_i}{Y} \log\left(\frac{y_i}{\bar{y}}\right) \right]$$

そのうち、 T_T は浙江省の県間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タイル指数である。 Y_i は*i*県の財政収入総額である。 Y は浙江省の県レベル財政収入総額である。 y_i は*i*県の1人当たり財政収入額である。 \bar{y} は浙江省の県レベル1人当たり財政収入額である。そして*n*は浙江省の県の数である。他の省も同様に算定する。

図表4 東部5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不平等度の比較 (2005年度)



(出所)：『2005年全国地市县財政統計資料』、『中国区域経済統計年鑑』、『浙江統計年鑑』より筆者作成。

(注)：県の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は移転支払いが行われた後のものである。

図表4から浙江省の県レベル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の不平等度は最も低いことが分かる。東部5省のうち、浙江省と江蘇省は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が比較的高いが、江蘇省と比べると、浙江省の県レベルの不平等度は非常に小さい。すなわち、浙江省は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の増加と県レベルの財政収入配分の均等化を両立できたと言える。

2 浙江省における県間財政力不平等度の分解

県レベルの財政収入不平等度(県間不平等度)は、その構成要素である市レベルの財政収入不平等度⁷(市間不平等度)と各市が管轄する県間の財政収入不平

等度（市内不平等度）に分解できる。以下より、タイル指数を用いて浙江省における財政収入の県間不平等度を市間不平等度と市内不平等度に分解し、それぞれの構成要素がどの程度県間不平等度に寄与しているかを検証する。計算式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T_T = T_C + T_{CO}$$

$$T_T = \sum_{i=1}^n \left[\frac{Y_i}{Y} \log\left(\frac{y_i}{\bar{y}}\right) \right]$$

$$T_C = \sum_{K=1}^m \left[\frac{Y_K}{Y} \log\left(\frac{y_K}{\bar{y}}\right) \right]$$

$$T_{CO} = \sum_{K=1}^m \left[\frac{Y_K}{Y} T_K \right]$$

$$T_K = \sum_{i=1}^n \left[\frac{Y_i}{Y_K} \log\left(\frac{y_i}{y_K}\right) \right]$$

T_T は浙江省の県間タイル指数である。 T_C は浙江省の市間タイル指数である。 T_{CO} は各市内の県間タイル指数である。 T_K はK市内の県間タイル指数である。 Y_i はi県の財政収入総額である。 Y_K はK市内各県の財政収入総額である。 Y は浙江省の県レベル財政収入総額である。 y_i はi県の1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である。 y_K はK市内各県の1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である。 \bar{y} は浙江省の県レベル1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である。 m は浙江省の市の数である。 n は浙江省の県の数である。そして n_K はK市内の県の数である。

図表5に浙江省における県間財政力不平等度の分解結果を示している。2005年現在、県間財政収入の不平等度に対し、市内不平等度は市間不平等度より強く影響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った。「省管県」の補助策である「財政収入1億元奨励」と「強県拓権」は一部の経済力の強い県で財政増収効果を発揮したことが一因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図表5 浙江省における県レベルの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タイル指数の分解（2005年）

	総タイル指数	市間不平等度		市内不平等度	
		寄与度 (%)		寄与度 (%)	
浙江	0.0313	0.0119	38.2	0.0193	61.8

（出所）：『2005年全国地市县財政統計資料』、『中国区域経済統計年鑑』、『浙江統計年鑑』より筆者作成。

V むすび

本論は浙江省の例を通して、「省管県」制度の有効性について分析した。「省管県」を実施した浙江省と実施していない東部地域の他の4省と比較すると、2005年現在、浙江省の県レベル一人当たり財政収入の不平等度はもっとも低い。これは「省管県」制度は県レベルの財政力格差の是正に有効であることを意味する。

ただし、財政難に陥っている県に対し、財政増収の激励効果が小さい「省管県」制度だけでは不十分である。浙江省の経験から、「省管県」を取り入れる際に、それと併用して「両保両掛」、「両保両聯」のような補助策の導入は不可欠だと考える。一方、「省管県」は現在財政上県に市レベルの権限を与える方向で進められているが、政府構造が簡素化され、5層からなる中国の政府構造は3層になるという予測があるなか、将来的には行政上においても県が市と同列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は十分ある。いち早く経済活力のある県を市の束縛から解放するため、現段階において、「億元県奨励金」、「強県拓権」のような施策も必要だと思われる。

また、浙江省が現在実行している「省管県」と一連の補助策は県レベルの財政難問題の緩和と財政力格差の是正に有効であるが、①省内各級政府の間における税収区分と事務権限の区分は不明確、②客観的な基準に基づいた省内の移転支払いがなされていないなどの問題を改善できるとは言えない。

総じて言えば、「省管県」とその補助策は短期的に有効であるが、制度化されていないこれらの施策は恣意的な部分がある

と言わざるをえない。財政問題を根本から解決するためには、客観的な基準に基づく移転支払いの実現、財政の制度化が不可欠である。無論、それを支える行政システムの構築、また関連法律の整備も重要である。

-
- ¹ 静岡産業大学情報学部専任講師
- ² 本論で言う「省管県」制度を導入していない省は、2005年までに全省レベルで導入していない省を指す。
- ³ 分税制実施後に起こったこの現象は「中央財政日増しに発展、省級財政ますます安定、市級財政ぐーらぐら、県級財政悲鳴が上がり、郷級財政集団脱走」と揶揄されている。(雑誌「財政」2003年第2期)。
- ⁴ 当市・県の基準人件費支出、基準公用経費支出、基準衛生事業費支出、基準都市維持建設費支出、基準社会保障支出、基準援護・社会救済費支出、基準農業生産支援支出、基準農業総合開発支出を含む。
- ⁵ 当市・県の地方本級財政収入、上級政府からの移転支払いと各種補助金を含む。基準財政収入額の算定は省によって異なっており、大きく4つの算定方法に分けられる。①前年度の決算額で基準財政収入額を決める(北京、安徽などの13省はこの方法を利用)。②税種別で税収入を測定し、その合計で基準財政収入額を決める(吉林、寧夏などの9省はこの方法を利用)。③前記①か②をベースに市・県の財政収入増加率、GDP成長率、財政収入がGDPに占める割合などの要素を取り入れて基準財政収入額を決める(天津、河北、山西、青海などの6省はこの方法を利用)。④前年度の決算収入に税収増加率をかけて基準財政収入額を決める(内モンゴル、福建、チベットの3省はこの方法を利用)。
- ⁶ 「契税」とは不動産を取得する時に支払う契約税であり、課税対象は家屋の販売、贈与、抵当権の設定による所有権の移転である。
- ⁷ 市レベルの財政力不平等度を算定する際に、使用するデータは市が管轄する県の財政収入であり、市が管轄する区の財政収入は含まれない。

参考・引用文献

- 【日本語文献】
- 田中修. 2002. 「中国財政の維持可能性」. 国際通貨研究所「財務省委嘱：東アジア研究会」報告書 2002年2月
- 田中修. 「中国財政の現状と課題」. 日中産学官交流機構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1a.biglobe.ne.jp/jcbag/tanaka_report060117.pdf (2008.10.10)
- 佐藤主光. 2005. 「中国の地方税制：省と省以下級政府の財政関係に着目して」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と国務院発展研究中心との「地方財政(地方交付税)に関する共同研究」最終報告書
- 【中国語文献】
- 財政部予算司編. 2002. 『中国政府間財政関係』. 財政部予算司編
- 李萍 許広才. 2006. 『中国政府間財政関係図解』. 中国財政経済出版社
- 蔡紅英. 2007. 『中国地方政府間財政関係研究』. 中国財政経済出版社
- 『2005年地方財政統計資料』. 財政部国庫司 予算司 編
- 『2005年全国地市県財政統計資料』. 財政部国庫司 予算司 編
- 『中国区域経済統計年鑑』. 2008. 中国統計出版社
- 『浙江統計年鑑』 2007. 中国統計出版



中国からの不法移民 —香港への密航を中心に—

愛 みち子¹

はじめに

中華人民共和国から外に流出する不法移民について、香港への渡航状況と背景を手掛かりに述べるのが、本稿の目的である。

中華人民共和国（以後「中国」または「大陸」）からの不法移民について、断片的な情報に触れることは多い。それらの情報を寄せ集めただけでも、中国からの密出国は絶えず、密入国は世界的規模だと考えられる。全体として把握され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るが、この現象の範囲、規模、不法性のどれも調査には高いハードルとなる。また送り出し地である中国が問題を認識し、研究調査に着手するのが有効であるが、当面実現しそうもない。従って研究のほとんどは中国以外の国に住む、関心を寄せる研究者かジャーナリストによってなされ、状況が説明されているのが現状である。

本稿においては、極めて限定的ではあるが、中国から香港へ向かう不法移民をみていく。香港は1997年に中国に返還され、国家のレベルでは中国の「国内」だけれども、中国大陸部とは異なる返還前の社会制度が保たれており、中でも人の移動が自由である点など、大陸から見れば依然として「海外」に限りなく近い。よって中国から香港への境界を越える夥しい移動があり、さらに増加傾向にある。その中で、例外とは捉えられない密航行動がある。あえて密航するのはなぜか、密航がど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かを見ていきたい。密航する動機やきっかけに注目し、「中国人にとって密航するとはどのようなことか」について理解を深めたい。

注意したいと思うのは、密航行動の不法性や裏社会とのつながりばかりに囚われると、「暗黒社会を覗き見る」ような姿勢になって密航現象を別次元に追いやってしまう。不法の範囲は必ず適法範囲と連続しており、裏社会のありようは表の社会の裏返しになっている。密航当事者を良く見てみると、私たちが考える「密航」の印象とは異なる認識をもっており、密航に踏み切る心理的ハードルは低い。それもまた密航が起り続ける理由であろう。

以下、中国公民が中国から外に移動する際に関わる制度について述べ、香港に行く場合の特殊な状況を説明する。続いて密出境と密入国を請け負う集団や人である「蛇頭」について特徴をまとめる。

I 中国からの出国について

中国公民の移動は極めて制限された状態にあるといえよう。中国公民の出国には、当局の許可を必要とする。公民が中国の外に出ることは、行き先がどこであれ、政府当局が介入するもので、決して個人の裁量だけで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の考え方を制度化したものが以下である。

居住国内的公民经批准出境的，由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附发出境登记卡。

（中華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2章出境 第6条）

ここには公民の出境には「批准」が必要だと明記している。出国のお伺いがパスポートの請求であり、パスポートの発行が許可にあたる。

パスポートが発行されたら、渡航先国の政府が発行する査証(ビザ)が必要である。中国公民の海外渡航には、他の国同様、パスポートとビザを要するわけだが、問題となるのは、それぞれの取得の際の詳細な基準、ルール、必要書類などが明白でないことである。パスポート取得については法律に明記があるものの、実際は住所地、身分、人的コネクションの有無、時期などによって取得状況が異なる。査証は、中国と相手国との2国間の協定によって定まるが、相手国公館に雇われた中国人担当者の裁量に任されることも多いという。このように中国公民が中国を出国する際の手続きを見ていくと、一人の出国に何重ものチェックが働き、自然と出国が制限される構図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対照的な一例を示せば、日本の関連法では国民の出境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定めている。

本邦外の地域に赴く意図をもって出国する日本人(乗員を除く)は、有効な旅券を所持し、その者が出国する出入国港において、法務省令で定める手続により、入国審査官から出国の確認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前項の日本人は、出国の確認を受けなければ出国してはならない。

(出入国および難民認定法 第7章 日本人の出国及び帰国(日本人の出国) 第60条)

ここで日本国民が義務付けられているのは、出国の確認であり、具体的にはパスポートへの押印が必要だと言っているにすぎない。日本人の出境に課せられるのは書類整備である。先の中国公民に対しては、出国そのものを干渉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この干渉の現実は見えにくい。とりわけ中国人の海外旅行増加の報道、例えば「2009年、中国人の日本向け個人旅行が緩和され、中国人にとっては20カ国以上の国に個人で旅行でき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った報道によって、さらに見えなくなる。これでは、あたかも中華人民共和国の人民が随意に海

外に出か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のような印象を与えてしまう。

確かに大陸の中国人の海外旅行の需要は増し、実際の渡航数も増し、渡航を阻んでいた諸条件も少しずつ緩和されている。しかし実際状況では、大陸の中国人が海外へ赴くことは、依然として容易いことではない。「中国人の個人旅行の自由化」と報道される段階にあっても、「自由な旅行」は完全に政府のコントロール下にあって、「これまでよりもやや緩和された」、「少しずつ許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捉えるべきである。

これまで同様、中国人の海外渡航は団体旅行が一般的である。団体旅行にも依然として「逃亡を防ぐ」目的の習慣が健在である。旅行会社に納める「保証金」が代表的なものである。人気のある国へ行くには、日本円で数十万円の「保証金」を支払えることが、旅行参加の条件であるから、その資力がなければ短期の団体海外旅行も参加できない。

このような条件や干渉によって、中国では合法的な渡航が制限されているといえるだろう。海外渡航への需要がすべて満たされることはない。そこで非公式、非合法な方法で中国を出国、外国への入国する方法が取られるのである。つまり非合法的手段への需要は、中国政府が合法的手段の枠や条件を狭めれば狭めるほど高まる。ここでは密航の違法性よりも、合法渡航のしにくさが最も強調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考える所以である。

ところで、中国を世界規模の制度の中に組み込んでいこうという時代にあっても、中国国内でこのような移動制限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は、意外に知られていない。外国人は「自分たちが中国国内でどのように管理されるか」について高い関心を示すけれども、「中国人がどのように管理されているか」への関心は薄いようである。

II 香港への入境について

香港は中国大陸の陸続き、広東省の一部、珠江が東シナ海に流れ込む河口に位置する、約1万平方キロの地域である。1840年の阿

片戦争以後、イギリス統治がなされ、段階的に統治地域を増して、約 100 年間、現在の香港の範囲を保ってきた。

政治的には、イギリスの植民地政府が治め、国際的にもイギリス領と認められてきた。しかしそれに対する中国の姿勢はわかりにくいものであった。中国政府は、表向きは一貫して阿片戦争以後に結ばれた条約は清国政府が強制された「不平等条約である」として、イギリスによる香港の支配は認められないとの態度をとってきた。

その一方で、中国が自ら積極的に香港を回収しようとし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とみられる。例えば「1949年の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国時に、なぜ共産党は清代に外国領となった香港を解放しなかっ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が当然湧くし、続いて「香港をめぐる中英の直接交渉はなぜ 1980 年代まで持たれなかっ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も抱く。もし中国政府が香港を自国領と考えるなら、「なぜ中国から香港への出境は厳しいのか？」という問題もある。香港をめぐる問題の複雑さや微妙さにプラスして、中国政治がとる態度の分かりにくさ、一貫性のなさ、両面性を指摘できる。

他方イギリスは、一貫して国際法上有効な条約に基づいて統治を行ったとしている。これには矛盾がなく、イギリス政府は国際法に忠実であったために、香港を返還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と見られる。全香港の 9 割にあたる新界の租借期限が満了するのを前に、イギリス側から中英交渉を持ち寄った形だからである。

つまり中国もイギリスも、香港は正式に自国領土だとしてきたのである。中国からすれば、建前上香港は国内であるが、実際は外国だった。複雑でわかりにくい位置づけだった。従って中国と香港の間の往来は、国際移動とも国内移動とも違うものであった。

中港間の往来は、第二次大戦以前はかなり自由であったと言われる。戦後になって世界が冷戦構造となったとき、中港境界もその様相を呈した。境界が厳しく管理され、中国から香港への移民は、入境枠制度によ

って定数が許されるのみになる。

中国で改革開放が始まった 1979 年、中国から香港への片道入境許可証である「単程証 (One-way Entry Permit)」が発行され、中港間の正式な合法移民の制度となる。人数は 80 年代は 1 日 75 人、90 年代に 100 人以上となり、95 年以降は 1 日 150 人となっている。

ちなみに、中国から香港へ移動する際に使われる旅行文書は、片道用の「単程証」の他に、往復の許可である「双程証」がある。これは短期の旅行用に発行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単程証よりは簡単に取得できる。これを使って香港に入境し、そのまま滞留している超過滞在者も一般に「不法移民」として扱われる。

中国で発行される正式旅行文書について説明する。単程証と双程証の発給の手順はこのようなものだ。申請者は住所のある地域の小区 (居委会または村委会) に申請する。その後県級市から地級市、というように広域を管轄する上級機関へと移り、最終的に公安局長の許可とサインで発給される。

多くの機関と大勢の担当者の手を経るので時間がかかる。また申請の受理や順番について明確な基準も不明である。ゆえに、申請者にもたらされる結果もばらつきがある。典型的な当事者の声は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陸氏は「妻の申請は 10 年かかってやっと通ったのに、2 人の子供は 2 年で来ることができた」と言い、林氏は「当事者たちにも入境許可の審査基準がわからない」と言う。²

自ら申請した場合は、発行まで通常 2~3 ヶ月かかるという。短縮するためには高額の手数料を支払って政府の旅行社を経由して手続きをするか、伝手を頼って関係部門の役人に個人的に働きかけるという。それらの方法で 1 ヶ月ほど短縮されるという。³ここでは汚職の問題を避け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関係部門の融通で手続き期間が短縮できる状況に、汚職がまかり通る余地がある。

汚職状況については確固たる証拠を提示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複数の経験者からの聞き取りによると、最低一件につき 1000 元程の現金を出入境を管轄する公安局の役人に渡すのが通例であるという。この時あらゆる伝手を駆使してなるべく高い地位にいる人を紹介してもらおうという。そうすることで手続きに要する時間が短縮されるのが常識であり、役人へ賄賂を支払う側もいわば一定の価格を支払って時間短縮というサービスを買う感覚に到っている。汚職が容易には絶えない所以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香港の政策はどうであろうか。香港の移入民政策で、華南における移民行動を大いに促したと思われる制度があった。「タッチベース」政策という、不法移民に対して場合によっては居住権を与える制度である。中国からの不法移民は、香港への海路または山越えを水泳、小型船舶、徒歩などの手段で体力任せにやってきて、香港に密かに入境した。香港側では、これらの不法移民が中国との国境付近の新界地区で発見された場合は、送還の対象とした。しかし中心部までたどり着いた場合は、入境處への出頭や登録など正規の手続きを経て居住権を付与した。この政策を「タッチベース政策 (touch base policy, reach base policy, 抵壘政策)」と呼ぶ。この制度は香港政庁によって正式に政策として採用され、年間数万人の規模になり、1979 年には 11 万人とあまりにも対象者が増えたため、1980 年に廃止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制度がイギリス属領であった香港で、主に大陸の中国人を対象に取られていたため、華南、とりわけ広東省、次いで福建省には、密航してでも香港に入境する堂々たる動機を与え、挑戦する価値のある冒険と映った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大陸を出発するときは違法の移民でも、「タッチベース」に成功すれば、合法移民となれたわけだから。

これらの密入境者は、中国側から泳いで香港沿岸に到達するものが多かった。移民自身が多くは若い男性であった理由にもよ

る。以下は 1980 年に 31 歳の時に香港に密入境した経験者の言葉である。

…「私は泳いで香港に来た。そんなことを目論んだことはなかったが、友人たちが蛇口から香港まで泳いでどんな所か見に行こうと誘ってきた。私は命懸けで泳いだ。5 時間後に香港に着いた時、何も、お金も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その上知人もいなかったが、今から思うと易しいことだった。捕まらずに入境處まで行かれれば、IDカードをくれたのだから。」…⁴

約 5 時間必死に泳いで来ることが可能なのは、確かに頑強な人間だけであろうと察しがつく。その上さすががしい青春談か成功談のような言葉になるのは、香港入境に夢と成功を託す当時の気分が表れているのだと思う。

Siuによれば、合法、非合法を含めた中国から香港への入境者は、1950 年代は約 40 万人、60 年代には約 12 万人、70 年代は約 50 万人、80 年代は約 30 万人、90 年代は約 40 万人であるという。⁵

III 蛇頭について

地続きの中国と香港の間には海路と陸路がある。第二次大戦後は中港間の自由な往来は許されていないのだが、密入境が絶えたことはない。海路でも陸路でも、闇の密入境ビジネスがあり、多額の報酬で請け負っているといわれる。請け負う組織や個人は、一般に「蛇頭」と呼ばれる。これは広東語で密航者を蛇になぞらえ、密入境者を「人蛇」と表現するため、密入境者のガイドという意味である。同様に「小人蛇」は不法児童移民で、「蛇船」は密航船である。「蛇頭」という言葉には非合法の行為が連想され、マフィアと同じ意味だと考え易いが、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い。「蛇頭」の段取りは、中国沿岸からアメリカやヨーロッパまで地球を半周するほどの移動を手配することもあれば、たった 1ヶ所の出入境チェックポイントをごまかして通過する手配まで、規模は

大小ある。小さな手配の場合は、他の職業を持つ人が、手数料目当てにアルバイトをする感覚で、危険を冒して請け負う場合もある。

海路の密入境については以下である。海路が密入境の最も多いルートであるという深センの役人の情報もあり⁶、一般的な密航方法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密入境のルートは、多様化していると見られる。香港がタッチベース政策を採って、中国から体力の限りに密入境を図った男性が多かった 1980 年代以前は、泳いで香港到着するルートが多く、比較的近距离を取ら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しかしタッチベース政策が 1980 年 10 月に終わり、それから返還前後はボートを使っての密航となり、ルートも長距離を取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1978 年の報道レポートによれば、ルートは香港新界の東岸を目指す大鵬湾(Tai pang wan)と、西岸を目指す后海湾(Deep Bay)がある。ジャンクによる密航がそれらのルートの外側を取っていたという⁷。しかし 2001 年の報道によれば、ジャンクによる当時のルートはもはや最も近距离のものとなり、さらに遠く香港から 100km 余り離れた汕尾からボートを走らせるルートまでであるという⁸。

密航ルートの多様化は、移動手段、船舶の多様化と関係があるらしい。最も外側のルートとされる中国広東省汕尾市から香港九龍東岸の西貢へのルートは、直線距離でも 100km 以上あり、やや外海を通ることになり、漁船を用いるという。中国広東省惠州市澳頭から西貢へのルートは、島の多い広東省の沿岸を通ってくるため、大型、中型の高速船を使うという。広東省深セン市の南に突き出た半島の香港側の南澳から西貢へのルートは、内海を通ってくるため、快速艇を用いるという。深セン市から香港の西岸に着く近距离ルートは、皆漁船か内河船であるという⁹。様々な船舶によって様々なルートが開拓されたとみることもできよう。

移民が子供や女性の場合、多くは密航に

は手引きを頼む。蛇頭を頼らずに密入境するのは難しいといわれる¹⁰。密航にかかる費用は数千ドルから数万香港ドルと言われる¹¹。以下は、上記引用部分の男性の妻の経験談である。

…私は今まで 6 回不法に香港入境をした。毎回約 3,000 香港ドル(日本円で 4 万円前後)の費用がかかった。…私は上の 2 人の子供を連れて深・に近い蛇口からスローボートに乗った。たったの 1,000 香港ドルだったが、5 時間もかかった。酷い旅程だった。他の 4 人の女性と一緒に船底の木のふたの下に隠れていたの、息の詰まるところでうさかった。涼しくするため、蛇頭たちは紙のうちわをくれた。海上警察を避けるためにボートは止まっていたから、私はそこら中に吐いた。子供たちは「心配しないでお母さん。もうすぐお父さんのところに行けるから」と言った。別の時は 1 時間で着くスピードボートを何度か利用した。たいてい深夜に出発して、蛇頭はほとんど、ドアツードアのサービスを提供した。時には香港に着いたところにタクシーが待っていた。香港へ行くのを助けてくれる人を探すのは容易なことだ。村の中を聞いて回れば、必ず他の誰かと乗合になるよう準備をしている人が深・にはいる。最大の問題は警察で、制服を見るたびに心臓がドンドン打った。…¹²

陸路の密入境ルートは、鉄道が通っている地点の羅湖口と、車道が通っている皇崗口、道路が通っている文錦渡と沙頭角口であるという。羅湖口は山を登り、網柵を登って越える。皇崗口は車両の中に身を隠して通り抜ける。文錦渡と沙頭角口は山を登って入境するという¹³。

この中で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のは、境界上

の最も東の地区、沙頭角である。中港境界は二重構造になっている。沙頭角地区の実際の境界は沙頭角河と中英街(中国側は深港街に改名)である。その外側にさらに入りが制限される境界がある。香港側は境界から 500m ないし 2km 内側に「禁区界線 (Closed Area Boundary)」が引かれ、約 6000 人の住民と被招待者しか出入りできない。密入境者対策として 1952 年から 1994 年まで夜間外出禁止令がしかれていた¹⁴。中国側には検問所から出入りする沙頭角保税區がある¹⁵。密入境者は中国側から保税區に入り、出入り自由な中英街を横切り、監視の薄い場所を選んで香港側へ進入していく。手引きを頼んだ場合、蛇頭が陸路密入境者を導く時の通路としても知られている¹⁶。

陸路ルートの変化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陸路自体は以前から利用されている。返還後は摘発された数のみを見ると、海路よりも多い¹⁷。陸路も海路同様、移動ツールの多様化が影響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のは、皇崗口の車両を利用した密入境である。中港間の経済的つながりが強まり、特に製造拠点が中国側にシフトするにつれて、境界を行き来する車両数も種類も増えた。人が隠れる場所も増えたと考えられる。

蛇頭の手引きによる密出入国は、中国と香港の間だけでなく、世界中のあらゆる国境で行われ、中国人をチャイナタウンなどの目的地に運んでいると見られる。

2000 年 6 月イギリスで発覚した密入国事件では、密入国団 58 人が中国、ロシア、東欧、中欧を通過して、イギリスに入国し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¹⁸。このルートはすでに「密航のシルクロード」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中国人が目指すのは各地のチャイナタウンであるが、イギリスロンドンのチャイナタウンには、毎月 400~500 人の新たな中国人が到着しているという。手引き料は一人約 250 万円だという。2000 年 10 月に香港の貨物港で発覚した事件では、密航者が隠れていたコンテナはアメリカ西海岸行きであった¹⁹。2003 年 1 月に中国で裁かれた密航事件では、首謀者の被告は 1998

年から 2 年余りの間に、38 回に分け、713 人の中国人を貨物船で海外に密航させ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²⁰。そのうち 138 人がカナダへ、残りが日本に向けた密航であったという。手引き料金は一人約 255 万円だという。

以上のような限られた資料から、蛇頭の特徴についてまとめるならば、以下の 5 点になると思う。

- ① 多様な人々の加担
ごく一般の漁民のような人々が手助けする場合から、マフィアのような非合法組織まで多様である。
- ② 多様なルートをもつ
世界への陸路、海路、空路を駆使する。ただし香港へは海路が多い。
- ③ 密航技術の研究開発がされている
当局の取り締まり方法や技術の進歩に対抗する形で、方法を進化させている。
- ④ 活動が広範囲である
アジア、北アメリカ、欧州での活動が確認されている。
- ⑤ 福建が発祥である
福建出身の中国人のネットワークを利用して、海外に豊かな人脈をもっている。

まとめ

本報告では、中国からの不法移民の背景をみていった。現代中国の移民をめぐる状況をみていくと、そこには中国政府による中国公民の移動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政策があり、大きな行政組織の弊害があり、中国の行政事務の特徴、決められたルールや手順に従って事務が行われるというよりも、組織の力関係や個人的つながりが優先される等、が反映されていた。

不法移民はそれ自体単独に存在するというよりは、このような中国の状況を受けて、必然的に絞られる合法移民の枠ではすくいきれない、潜在的な移民要求を満たすような形で発生することがわかる。また合法移民に関しても、行政事務の複数の局面

において、汚職や個人的裁量が入り込む余地があり、合法的なルートをたどった違法行為であるケースの存在も否定できない。従って、個々の移民に対して「合法であるか不法であるか」という区別や問いが、日本にいて考えるような決定的な黒白の別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と想像できる。このような動機や背景、その上どのような手段であっても移動するという独特の感覚によって移動を行っていく以上、やすやすと国境を越えていくことが想像できる。

さらに、蛇頭という先導とネットワークの存在や、タッチベース政策による移民動機への刺激や、乗り物などの技術の向上や、グローバルイゼーションの進化による情報の得やすさなどは、中国人の「自由な」移動を進めるものである。

本稿では移民の動機についてほとんど触れていないが、軽視するものではない。特に中国から香港へ向かう移民の場合、背景に分離家族がある場合が多い。分離家族とは、中国と香港に分かれて住む家族で、元から境界を越えて結婚し、家族を形成している場合が多い。

さらに、蛇頭との関わりあいにおいて、華南における移民状況や背景、歴史、制度などについて考え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思う。別の機会にぜひ検討したい。

¹ 共立女子大学 非常勤講師。

² 『香港経済日報』、97/8/16

³ 2001年4月、福建省石獅市の住民からの聞き取り調査より。

⁴ SCMP、95/5/28

⁵ Siu, Yat-ming, “New Arrivals: a new problem and an old problem” in Chow and Fan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98*, 201-228

⁶ HKS、97/7/28

⁷ FEER、78/12/29

⁸ 『太陽報』、01/7/24

⁹ 『太陽報』、01/7/24

¹⁰ SCMP、97/7/6

¹¹ 『蘋果日報』、97/7/5

¹² SCMP、95/5/28

¹³ 『太陽報』、01/7/24

¹⁴ SCMP、94/7/8

¹⁵ 沙頭角保税区の潜入レポート、山上太郎(仮名)「沙頭角怪しく賑わう新界のベルリン」、『月刊香港通信』No.50、96/6/1: 20-21

¹⁶ 『蘋果日報』、97/7/5

¹⁷ 『太陽報』、01/7/24

¹⁸ 『読売新聞』など各紙、2000/6/23

¹⁹ 『明報』、2000/10/19

²⁰ 『朝日新聞』、03/1/8

参考資料

<公的文書>

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ウェブページ
(<http://www.gov.cn>)

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ウェブページ
(<http://www.gov.hk>)

日本政府法令データウェブページ
(<http://law.e-gov.go.jp>)

<新聞、雑誌>

日本発行

『朝日新聞』

『読売新聞』

香港発行

FE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KS (Hong Kong Standard)

SCM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香港経済日報』

『明報』

『太陽報』

『蘋果日報』

<書籍>

愛みち子『香港返還と移民問題』(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

森田靖郎『蛇頭と人蛇—中国人密航ビジネスの闇』(東京:集英社、2001年)

Chin, Ko-L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efe, Patrick Radden, *The Snake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Y: Doubleday, 2009)



論文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Utilization in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A Tale of Two Cities

Jia LI¹, Tomohiro AKIYAMA²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urrent water shortage in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by examining the evidence from two cities, i.e., Jinchang (金昌) and Zhangye (张掖), which adopte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ince 1949. The study presents the statistics together with the interview results during a fieldwork conducted in September 2008.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led by a proac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environmentally fragile area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water stress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region.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water utilization, Gansu, China

1. Introduction

Expan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growing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entailed higher consumption of water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depi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utiliz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The national overall statistics often conceal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urrent water shortage by examining the evidences from the following two cities: Jinchang and Zhangye.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result of a 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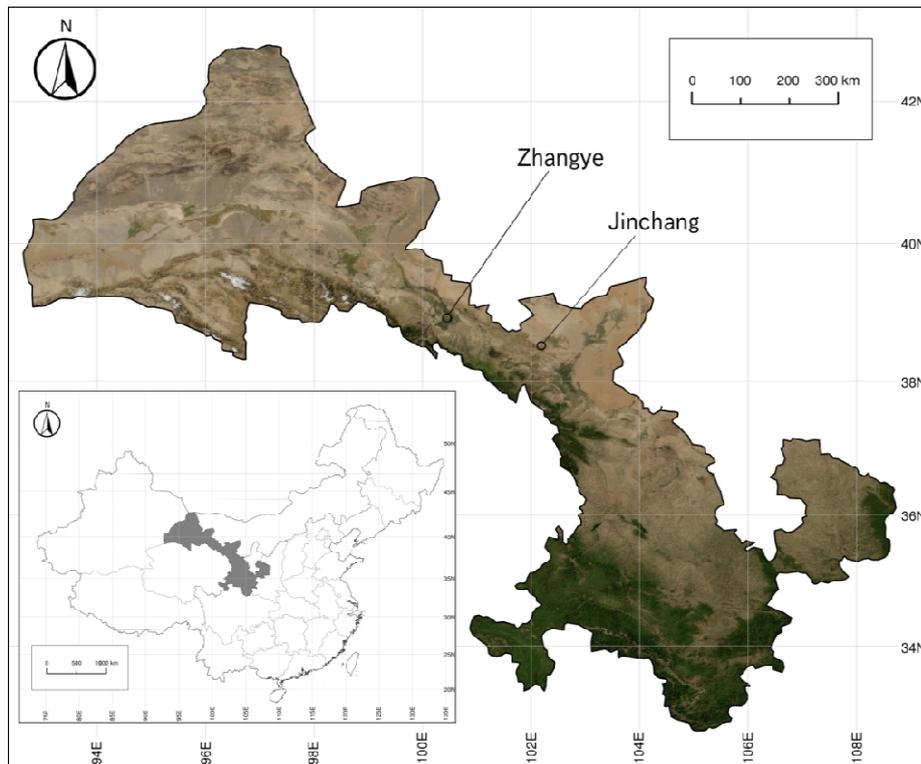
work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in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during September 13-24, 2008. The reasons why we choose these two cities are as follows: first, both the cities seem to be in water shortage. Jinchang was recogn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one of the 108 cities in severe water shortage in 1992. Zhangye was recog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s a pilot city in building water-saving society in 1998. Secondly, both the cities have experienced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terns for the past 50 years. Jinchang is a typical industrial city, whereas, Zhangye relies on agriculture for its economic base. They provide good examples fo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

velopmental strategies and water utilization.

2. Study Area

Both Jinchang and Zhangye are located in the Hexi (河西) Corridor, the Gansu Province of Northwestern China (see Figure 1). As of 2006, the population of Jinchang is 466,000, and the total area covers 9,600 km². The annual range of precipitation is 110-150 mm, and the potential evaporation is around 2,000 mm³. Whereas, in 2006, the population of Zhangye is 1,272,000, and the total area

covers 42,000 km². The annual range of precipitation of Zhangye is 129-500 mm, and the range of potential evaporation is 1,600-2,000 mm.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UNEP (1992, 1997), both the cities belong to semi-arid and/or arid region⁴. The water resources of both cities rely on the melting glaciers and snow of Qilian Mountains. Jinchang belongs to the Shiyanghe (石羊河) River basin, whereas, Zhangye belongs to the Heihe (黑河) River basin⁵.



Source: Blue Marble: Next Generation (NASA's Earth Observatory).

Figure 1 Map of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3. Jinchang and Zhangye: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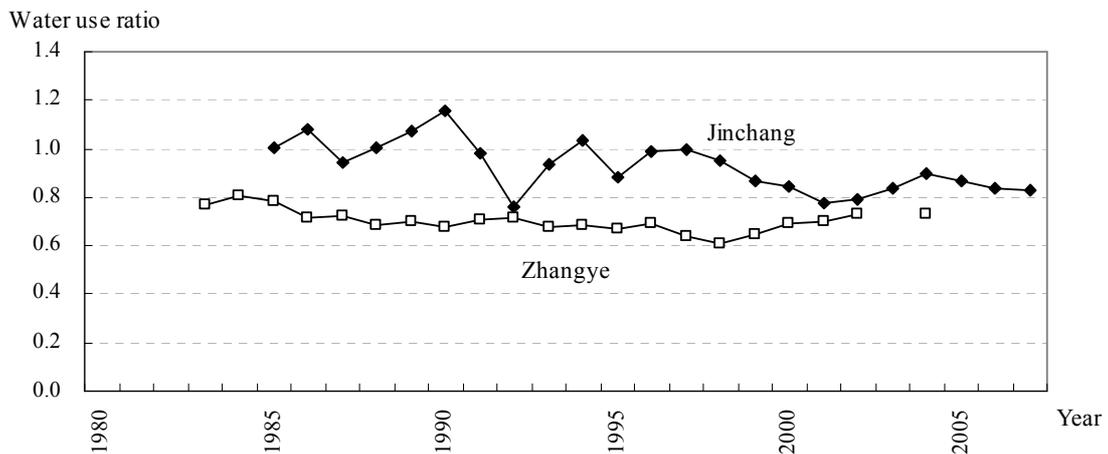
3.1 Jinchang and Zhangye: Water Use Ratio

Water use ratio is an indicator of water stres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 countrie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ased on their water use ratio: 1) low exploitation: <0.20; 2) comfortable range: 0.20-0.59; 3) environmentally overexploited: 0.60-1.00; 4) mining: >1.00⁶. The ratio i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R_{wu} = \frac{Q_C + Q_{ET}}{Q_R + Q_G - Q_I}$$

where Q_C is the volume of consumptive water use for human activities, Q_{ET} is the volume of evapo-transpiration of ecosystem, Q_R is the total volume of surfacewater, Q_G is the total volume of groundwater, Q_I is the volum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urface-water and groundwater.



Notes: 1. Gross water availability of Jinchang is 537.4 million m³. Gross water availability of Zhangye is 2.7 billion m³.

2. The ratio of Zhangye is estimated as: (agricultural water use/79.5%)/gross availability. 79.5% is the agricultural water use to total water use ratio of Gansu, 2004.

Sources: In the case of Jinchang, interview conducted in the Bureau of Water Resources of Jinchang (*Jinchang shuiliju*, 金昌水利局), September 17, 2008. In the case of Zhangye, Chen (2007), *Gansu Yearbook*, 2007: 207,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5.

Figure 2 Jinchang and Zhangye: Changes in Water Use Ratio, 1983-2007

Figure 2 presents the changes in water use ratios for Jinchang and Zhangye. Here, the water use ratio is estimated by the ratio of the amount of total water use to the amount of total water availability. The Chinese statistics define the total water use as the sum of

agricultural water use, industrial water use, domestic water use and ecological water use. In contrast, the total water availability is defined as the total volume of water resources, i.e., the sum of surfacewater and groundwater minus the double-counting portion. Dou-

ble-counting portion occurs due to the movement between the surfacewater and groundwater.

Obviously, both cities have excessively exploited the water resources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s. Since the mid-1980s, the water use ratios of Jinchang and Zhangye had continuously fallen into the environmentally overexploited range. The average value of Jinchang is 0.9, and that of Zhangye is 0.7.

3.2 Jinchang: Evidence from an Industrial City

Jinchang wa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accompanied by the exploitation of nickel mine. It has relied on heavy industry for its economic base. Large population was in-migrate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o construct the city. Consequent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ssociated increase of water utilization have resulted in the water shortage.

Table 1 Tax Payment by JNMC, 1982-1990

	Amount (million yuan)	Percentage in total tax revenue of Jinchang (%)
1982	21.5	70.5
1983	25.0	71.7
1984	40.6	73.3
1985	70.3	73.4
1986	78.6	73.4
1987	92.9	72.2
1988	111.3	69.7
1989	130.0	61.2
1990	160.2	62.6
Average	-	69.8

Source: *The Jinchang Chronicles (Jinchang shizhi)*.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ore deposi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the Yongchang (永昌) County in 1958. The mining of nickel started in 1959. In 1961, the Yongchang Nickel Mine was renamed as the Jinchuan Non-ferrous Metals Corporation (currently, Jinchuan (金川) Group Ltd., hereafter, JNMC). In 1962, the Jinchuan County was established. In 1981, the Jinchang County became a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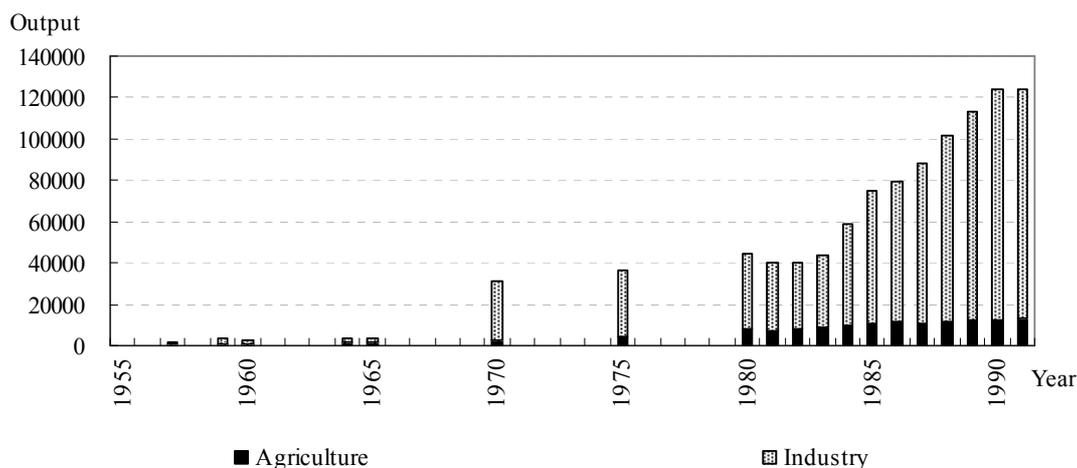
The importance of mining and related metallurgical/chemical industry for Jinchang

is reflected in the expansion of JNMC. Table 1 presents the tax payment by the company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2-1990. On the value base, the tax payment by JNMC had increased monotonically from 21.5 million yuan in 1982 to 160.0 million yuan in 1990. In the meantime, on the percentage base, the tax payment by JNMC had accounted for 69.8 percent of the total tax revenue of Jinchang on average over the period of 1982-1990.

Figure 3 presents the changes in indus-

trial structure of Jinchang during the period 1957-1991. Industrial sector had attained remarkable growth since the late 1950s. Using 1980 constant price, in 1957, the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was 956,000 yuan, less than one tenth of the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Soon after the nickel mining started

in 1959, the industrial output outperformed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related heavy industry was especially remarkable. During the period 1981-1991, the heavy industry had accounted for 95 percent of the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on average.



Source: *The Jinchang Chronicles (Jinchang shizhi)*.

Figure 3 Jinchang: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1957-1991 (Unit: 10,000 yuan, 1980 constant price)

In-migration of Popu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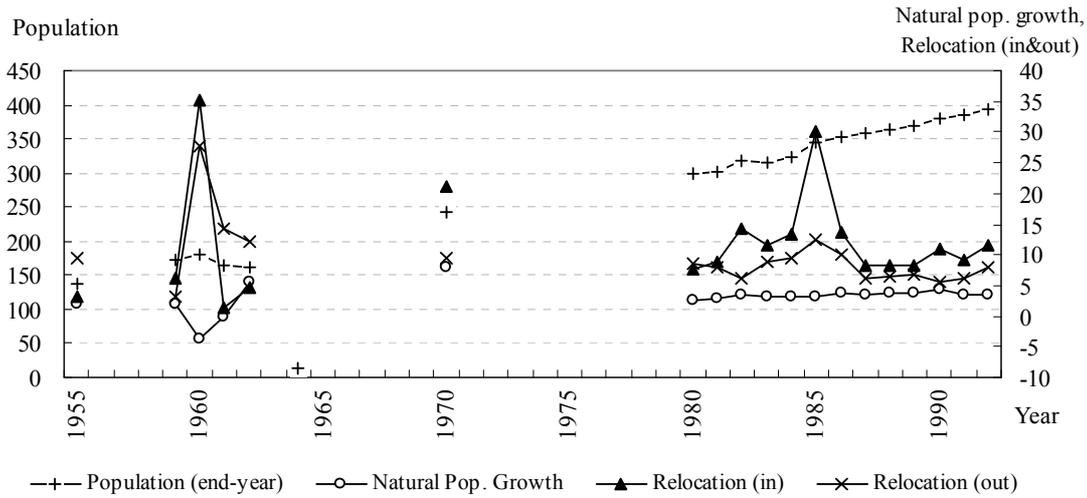
One peculiar featur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n industrial city is the mass 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into Jinchang. Figure 4 depict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the 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in Jinchang since 1955.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Jinchang had increased by three times from 138,500 in 1955 to 392,379 in 1992. In addition, except for the three years of 1960-1962, the number of the in-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had alway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the out-relocation of population⁷. In the years for which the statis-

tics are available,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relocation into Jinchang amounted to 228,389. It accounted for four times of the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city.

The in-migration of popul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First, the population was relocated into Jinchang for the land reclamation. Gansu Bayi Farm (甘肃八一农场) was established in 1958 by 800 veterans from Lanzhou and Xi'a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4th census conducted in 1990, the number of people associated with the Bayi Farm increased to 9,407. Secondly, a

large number of the population had been relocated to Jinchang to work in the mining and related metallurgical/chemical industry. This accounted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opulation relocated to Jinchang. Table 2 presents the list of counties/towns in Jinchang

by their sizes. Among three heavily populated counties/towns of Jinchang, two (Jinchuan district and Hexibao (河西堡)) have expanded due to the in-migration of population.



Source: *The Jinchang Chronicles (Jinchang shizhi)*.

Figure 4 Jinchang: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1955-1992 (Unit: 1,000 persons)

In 1958, a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technicians and managers were relocated from Heilongjiang, Liaoning and Baiyin (白银), Gansu into the Jinchuan mining area. They,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constitute the main part of population of the Jinchuan district, i.e., the urban center of Jinchang. The population of the Jinchuan district was 14,317 by the end of 1961. It increased to 111,417 in 1982. In addi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chang city in 1981, the government permitted the families of mine workers to change their status from a

rural register to urban register (*Hukou*, 户口, *Nongzhuanfei*, 农转非).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led to the increase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of Jinchang. In 1990, at the time of 4th census, the population in the Jinchuan district attained 159,579.

In the meantime, after the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e Hexibao Iron Plant and Yongchang Power Plant were established in 1958, many workers, technicians, manager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gradually relocated into the Hexibao town. In 1964, the population was 10,348 in Hexibao town, while the

number amounted to 36,717 in 1982⁸.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migration of population have sub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water consumption in Jinchang; however, the city was established in a place where water resources could not afford such

extensive scal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a large population. On September 17, 2008, when we conducted a fieldwork in the Xi-axiaogou (下小沟) village⁹ located in Shuangwan town, Jinchuan district, the villagers told us that the water table had dropped from 2-3 m in the early 1970s to current 50-70m.

Table 2 Size of Counties/Towns in Jinchang, 2003

Size (10,000 persons)	No.	Name of counties (towns)
Small cities (5-20)	1	Jinchuan district (金川区)
Large towns (2-5)	2	Chengguan town (城关镇), Hexibao town (河西堡镇)
Small towns (<1)	6	Xinchengzi town (新城子镇), Dongzhai town (东寨镇), Shuiyuan town (水源镇), Zhuwang town (朱王堡镇), Ningyuan town (宁远堡镇), Shuangwan town (双湾镇)

Note: Currently, in China, there are five practical (de facto)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provincial level (省级行政区), prefecture level (地级行政区), county level (县级行政区), township level (乡级行政区), and village level (村级自治组织).

Source: Chen, Zhen and Mao (2006:17).

To ameliorate the water shortage, th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was proposed by the Jinchang government. However, up to now, the project seems to fail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Jinchang. In 1983, two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chang, the city government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about water diversion. In 1984, the project “Yinliuruxi (引疏入西)” was proposed by the 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project aimed to transfer water from Liuhuanggou(硫磺沟)¹⁰ to Xidahe (西大河) river in Jinchang. In 1986, the project was renamed as “Yinliujijin (引疏济金)”, i.e., transferring water from Liuhuanggou to sup-

port Jincha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started in 1995 and completed in 2003. Howev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appears not to have ameliorated the situation in Jinchang. According to the *Gansu Daily*, by July 1, 2008, the two main reservoirs in Jinchang, i.e., Huangcheng (皇城) and Jinchuanxia (金川峡) could meet the water demand of the city only for seven days. On the 3rd of July, the Jinchang government released a water-saving announcement to impose restrictions on both the productive and domestic water uses. In addition, the water supply to both the non-productive and non-domestic uses stopped temporarily during the period July 3rd-25th¹¹.

3.3 Zhangye: Evidence from an a City Relying on Agriculture for its Economic Base

After 1949, Zhangye has been developed as 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of China. Consequently, large-scale land reclamation was conducted and the associated increase of water utilization resulted in the water shortag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eihe River basin and also the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¹².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hangye has a long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at least traced back to Han Dynasty. In 1949, the Zhangye district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Zhangye city (county-level)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the jurisdictional area of Zhangye was re-defined, and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the city was raised to municipal-level¹³.

Table 3 Zhangy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1963	Recognized as one of 15 provincial food crop production base counties (<i>quansheng liangshi shengchan jidi xian</i> , 全省粮食生产基地县)
1971	Recognized as one of 25 national food crop production bases (<i>quanguo shangpinliang jianshe jidi</i> , 全国商品粮建设基地)
1983	Recognized as one of Dingxi-Hexi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counties (cities) (" <i>Hexi-Dingxi</i> " <i>liangxi nongye jianshe xian(shi)</i> , “两西”(定西,河西)农业建设县(市))
1986	Recognized as one of provincial food crop base construction counties (cities) (<i>quansheng shangpinliang jidi jianshe xian(shi)</i> , 甘肃省商品粮基地建设县(市))
1987	Recognized as one of 25 national food crop production bases (<i>quanguo wuda shangpin shucai shengchan jidi</i> , 全国五大商品蔬菜生产基地)
Currently	Recognized as one of national key food crop production bases (<i>quanguo zhongdian shangpin liang shengchan jidi</i> , 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 and one of 5 national vegetable production bases (" <i>xicaidongyun jidi</i> ", 全国“西菜东运”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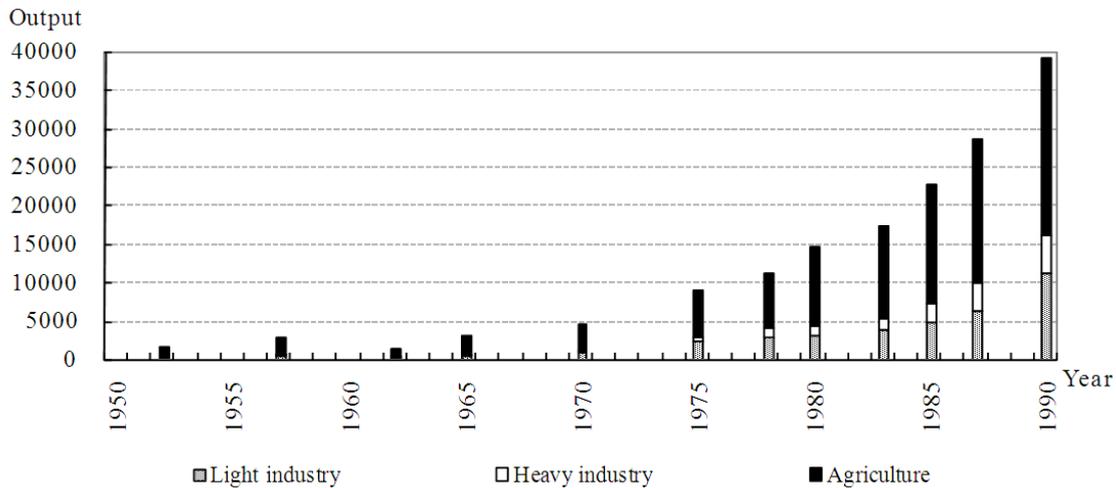
Sources: *The Zhangye Chronicles (Zhangye shizhi)*, official website of Zhangye government (URL: <http://www.zhangye.gov.cn/Index.html> (as of Jan. 12, 2009)).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Zhangye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s Table 3 shows, up to date, Zhangy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either provincial-level or national-leve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for at least 6 times. Currently, Zhangye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national key bases of food crop production, and also one of the five national bases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Figure 5 presents the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Zhangye during the period 1952-1990. It is obvious that Zhangye's economy has been agriculture-based.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specially, light industry among others, has been remarkable since 1950s, the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has continuously outperformed the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Using 1980 constant price, the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in-

creased from 1.7 million yuan in 1952 to 162.9 million yuan in 1990. The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increased from 15.6 million yuan in 1952 to 228.6 million yuan in 1990.

In 1990, the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was two times the gross output of light industry, and 4.5 times the gross output of heavy industry.



Source: *The Zhangye Chronicles (Zhangye shizhi)*.

Figure 5 Zhangye: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1952-1990 (Unit: 10,000 yuan, 1980 constant price)

Land Reclamation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Zhangye as 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large-scale land reclamation had been conducted after 1949. In 1957, the 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conducted an estimation of reclaimable land area along the Hexi Corridor. Zhangye accounted for 39 percent by 169,333 ha¹⁴; however, from 1949 to 2008, the total cultivated area in Zhangye has increased from around 60,000 ha to 260,000 ha¹⁵. This implies that the land reclamation was also conducted in the area unsuitable for the cultivation. Figure 6 shows that the sown area of two primary crops in Zhangye, i.e., wheat and maize, had experienc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and finally stabilized at around

100,000 ha in the 1990s. In the absolute values, the total sown area of wheat and maize had increased from 39,587 ha in 1950 to 104,620 ha in 1997.

The land reclamation in Zhangye has mainly taken the form of farm-building. In 2005, the total land area of state-owned farms was 41,835 ha, of which cultivated land accounted for 4,847 ha. The total cultivated land area of three big farms in Zhangye, i.e., Zhangye Farm (张掖农场), Shandan Farm (山丹农场) and Linze Farm (临泽农场), accounted for 4,640 ha¹⁶. Put roughly, the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form of farm-buildin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types.

1) **Production-Construction**

Corps-led land reclamation.

In Gansu, the land reclamation led by the Production-Construction Corps was conducted during the period 1963-1974. In total, the Corps reclaimed land of 24,767 ha during the period¹⁷. To examine the Zhangye Farm of Ganzhou district as an exampl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55 and taken over by the PL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No. 11 Division No. 4 Regiment in 1965, thereafter, in 1975, it was devolv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renamed from Lanzhou Military Region Production-Construction Corps No. 2 Division No. 2 Regiment to State-owned Zhangye Farm. In 1990,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 Zhangye Farm was 6,800 ha,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amounted to 1,533 ha¹⁸.

2) Local government-led land reclam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led land reclamation started soo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land reform in 1952. Since 1954, various Danwei (working units, 单位) had established farms in Zhangye. Although these farms had undergone several changes including the merger with other farms, take-over and devolvement by the army, in 1990, the number of Danwei farms in Zhangye exceeded 70. The total land area of

Danwei farms amounted to 3,000 ha,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was 1,667 ha¹⁹.

After 1978, the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form of farm-building had stopped;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encouraged the land reclamation by granting economic incentives to farmers. In the Ganzhou district, during the period 1984-1990, 12 million yuan had been invested to reclaim land of 5,000 ha.. The government accounted for about half of the expenditures. Exactly, the fiscal appropriation accounted for 5.9 million, the collective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2.4 million, and the investment by individual farmers accounted for 3.7 million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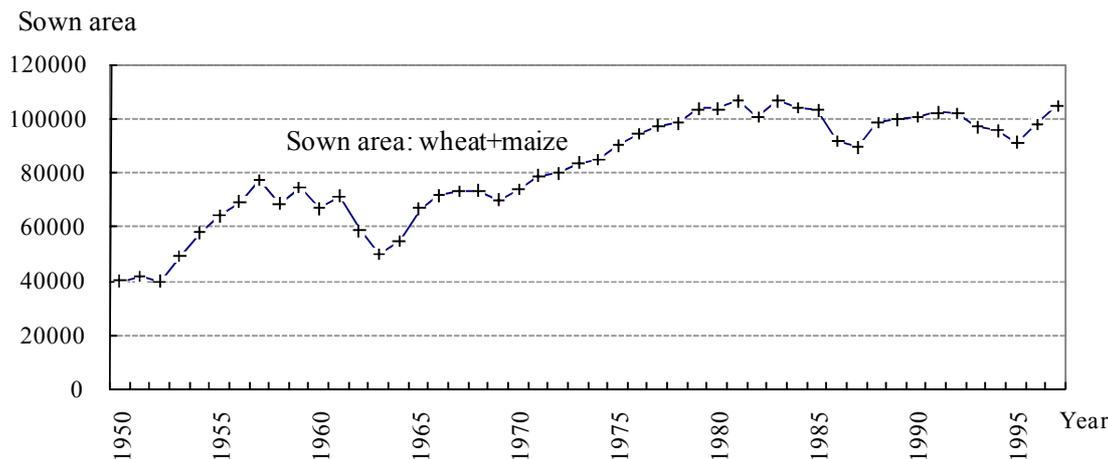
In the Shadow of Heihe River Project

Th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eihe River basin including Zhangye after 1949 entailed the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of water. As a result, the discharge released to the lower reaches decreased. Serious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ccurred in the lower reache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in the lower reaches, Heihe project was initiated in 2000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river water to the lower reaches. Since 2003, Zhangye has been requested to release 950 million m³ per year to the lower reaches by administrative order. In

2002, one of the terminal lakes in the lower reaches (eastern Juyan, 居延) revived; however, due to the release of water to the lower reaches, th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water intake declined. Therefore, Zhangye has become more dependent on the groundwater for

irrigation due to the lesser accessibility to river water. The groundwater level had declined rapidly since the start of the Heihe project. Moreover, the water for irrig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not sufficient.



Source: *The Zhangye Crop Chronicles (Zhangye diqu liangshizhi)*, p.38.

Figure 6 Zhangye: Changes in Sown Land Area, 1950-1997 (Unit: ha)

On September 19, 2008, when the authors conducted fieldwork in the Xiaotun (小屯) village located in Yanuan (鸭暖) town, Linze county, some villagers told us that the water table of wells had dropped sharply due to the excessive well pumping. In Xiaotun, the average depth of wells is 20-30 m, while in the neighboring Pinchuan (平川) town, the depth of wells usually exceeds 100 m. On the same day, the authors conducted fieldwork in the Heihe Farm²¹. The water has not been provided to the farm since 2006. The fruit trees are dying from lack of water.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farm have lost their ways of

living. Young people moved out of the village to get a job as migrant workers, while the old people stay at home hoping for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4. Concluding Remarks

Through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Jinchang and Zhangye after 1949,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urrent water stress in the Gansu Province, North-western China. We found that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ly fragile area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water stress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region. The study provided the evidences from Jinchang and Zhangye which had adopte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ne city is an industrial city which relies on the mining and related heavy industry for its economic base, while the other one relies on the agriculture for its economic base.

First,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benefits has propelled an un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environment. In both the cities, the current water shortage is due to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conducted since 1949. In Jinchang, a development strategy lacking long-term concerns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ustrial city in a place where water resources may not afford such a huge population and extensiv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Zhangye, a development strategy lacking river basin-wide vision led to the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eihe River basin. As a result, the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lower reaches had deteriorated.

Secondly, humanity's suffering is intertwined with nature's suffering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led by a proac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Here, the humanity's suffering is reflected in the relocation of population. The suffering of nature is reflected in the degrad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both cities, we witness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d been relocated to fulfill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government. In Jinchang, a lot of people were relocated into the city to build a brand-new industrial city in the Gobi desert. In Zhangye, when the priority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changed fro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on-conforming places for the new strategy such as the Heihe Farm are abandoned, and the local people's interests were ignor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²².

¹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Niigata Prefecture.

E-mail: lijia@unii.ac.jp

² Department of Urban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E-mail: t_akiyama@env.t.u-tokyo.ac.jp

³ Potential evaporation or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PET) is the amount of evaporation that would occur if a sufficient water source were available.

⁴ Define annual precipitation as P and potential evaporation as PET. Arid region refers to the area wherein $0.05 < P/PET < 0.20$, while semi-arid region the area wherein $0.20 < P/PET < 0.50$. P/PET is called as aridity index.

⁵ *Gansu Yearbook, 2007.*

⁶ Shalizi (2006: 5).

⁷ One year lag of the *3 Years of Natural Disasters* during 1959-1961.

⁸ All data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relocation are from *the Jinchang Chronicles*.

⁹ The village is a well-irrigation district.

¹⁰ Liuhuanggou is the tributary of Datonghe (大通河) river which is located in Menyuan county (门源县) of Haibei (海北州), Qinghai province.

¹¹ *Gansu Daily*, September 2nd, 2008. *Jinchang Government Announcement to Combat Drought and Save Water*. July 3rd, 2008.

URL:<http://gsrb.gansudaily.com.cn/system/2008/09/02/010824971.shtml> (as of Jan. 12, 2009)

URL:<http://www.jcxzxx.com/Article/gongzuodongtai/benshi/200807/887.html> (as of Jan. 12, 2009)

¹² For instance, the two terminal lakes, i.e., western and eastern Juyan lakes dried up in 1961 and 1991 respectively.

¹³ The jurisdictional area of former Zhangye city was renamed as Ganzhou district (甘州区). Since then, Zhangye city includes one city district, 4 counties and one autonomous county.

¹⁴ *The Gansu Chronicles*, Vol. 19:11. The jurisdictional area of Zhangye here includes part of Jiuquan (酒泉) city as well. The original document is called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bout Wasteland in Hexi Region, Gansu Province*”.

¹⁵ Field interview conducted in the Bureau of Water Resources of Zhangye (*Zhangye shuiwujū*, 张掖水务局), September 18th, 2008.

¹⁶ *Zhangye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2005.

¹⁷ In 1963, PL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o. 11 Division was established. However, due to the star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land reclamation led by the PL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o. 11 Division stopped in the late 1966. In 1969, the land reclamation resumed accompani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Lanzhou Military Region Production-Construction Corps. The farms run by the army were devolv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1975. *The Gansu Chronicles*, Vol. 19.

¹⁸ *The Zhangye Chronicles*.

¹⁹ *The Zhangye Chronicles*.

²⁰ *Gansu Yearbook*, 1991.

²¹ The Heihe Farm is located 2.3 km away from Yingluoxia (莺落峡) where there is dam to control the flow of water from the upper reaches. The farm consists of 300 households and 113 ha of cultivated area.

²² The recent development trends of two cities are as follows. In 2008, Jinchang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7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bases. Several projects including Jinchang airport, petroleum city, chemical industrial base are under construction. In 2008, Zhangye government initiated 3 agricultural projects, i.e.: Jinchangye (金张掖) seed maize production base, Western China potato processing and planting base, modern agriculture project (greenhouse vegetables and grapes).

Chinese)

Chen, Jing. Water Use in the Middle Reach of Heihe River Basin. In *Chugoku henkyo chiiki no gojunen* (edited by Nakawo, Hohbaatar and Konagaya). Toho Shoten. Tokyo. 2007. (In Japanese)

Gansu Yearbook (former Gansu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Various years.

Shalizi, Zmarak. Addressing China’s Growing Water Shortages and Associate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WPS3895. 2006.

The Gansu Chronicles, Vol. 19 (Gansu shengzhi). Gansu People Press. Lanzhou: Gansu. 1993.

The Jinchang Chronicles (Jinchang shizhi). China City Press. Beijing. 1995.

The Zhangye Chronicles (Zhangye shizhi). Gansu People Press. Lanzhou: Gansu. 1995.

The Zhangye Crop Chronicles (Zhangye diqu liangshizhi). Gansu People Press. Lanzhou: Gansu. 1999.

UNEP. *World Atlas of Desertification*. Edited by Nicholas Middleton and David Thomas. Hodder Arnold. London. 1992.

UNEP. *World Atlas of Desertification*. Edited by Middleton N., Thomas D.. 2nd edition. Edward Arnold. London. 1997.

Zhangye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2005. Gansu Culture Press. Lanzhou: Gansu. 2007

References

Chen, Huailu, Yanlin Zhen, and Liwei Mao. A Research on Jinchang’s Urban System Structure. In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 20(2): 17-22. 2006. (In



論文

交通变革与近代郑州地域构造的变容

刘 晖¹

I 问题的提出

19世纪末之后,中国的整体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转变,以驿道、运河为中心的运输路线被海运和铁路所取代,交通工具由木船车马转变为轮船火车.尽管郑州地域水运网络已经衰落,并受季节性制约,但水运在传统运输时代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联系外部世界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陇海铁路、平汉铁路²以及津浦铁路通车后,原本就很衰微的中原水路运输遭遇沉重打击,水运沿线市镇亦无法保持原有的繁荣而迅速衰落.而郑州位居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十字交汇点,交通区位优势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潜力,20世纪初叶逐渐成长为一座新兴的铁路枢纽型城市.区域交通格局的变迁,特别是郑州在中原近代交通运输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使得郑州的地域构造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地域构造是人文地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某一地域或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与组合所构成的区域内部的空间结构.在战后的日本学界,地域构造是进行地域经济研究的一个常用概念,逐步形成了地域构造论,相关的研究及研究组织层出不穷.伴随理论与实证分析的进展,地域构造已成为经济的空间体系、地域变动、区域结构功能分析以及城市研究的重要工具.

就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而言,目前关于郑州地域构造分析特别是近代交通与该地域构造变容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学术界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如黄荣清的《北京城市的地

域构造》一文,是中国学界少有的运用地域构造的概念进行城市内部结构功能分析的论文;柴彦威则对城市空间以及中日城市空间结构比较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类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内部的结构功能分析方面,而对城市外部或者地域空间结构的探讨还不足够.分析交通变革与近代郑州区域社会变动的内在关系,在近代中国交通的场域中寻求郑州地域构造研究的新思路,由此来把握近代郑州地域社会变迁的实态,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郑州的地域构造³涉及郑州城市的内部结构、城市的内部与外部关系即城乡关系以及郑州地域的整体空间构造等诸多方面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宏观上探讨区域交通变革给郑州地域的整体空间构造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外在态势,包括地域经济中心的位移、经济空间的变化和市镇分布等方面.

II 郑州地域交通格局的演化

郑州位处中原腹地,传统交通时代主要依靠水运和驿路来实现区域间的人口物资流动,在王朝鼎盛时期曾经位居地域交通的中心地带,是中国南北东西水运和驿路交通网的重要联络地.但伴随着全国整体交通路线的变动,郑州地域交通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历史演变.

1 郑州地域水运由兴盛转而衰落

就水运交通区位而言,郑州所在的汴洛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相接之际,其古代

水系西达长安(今西安),东经开封转至江淮,从先秦、汉魏至唐宋的1400多年间,一直是中国水运交通的总枢纽。隋唐时期,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至江淮地区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黄河与淮河两大流域间的联系,凿通了黄淮间的大运河——通济渠(即汴河,唐名广济渠),沿黄、沿运河的市镇因此得以发展,汴州(开封)因位处黄河与汴河交汇处,有漕运之便,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南北交通的转运中心⁴。通济渠在郑州、开封之间与汴河合流,然后分流入淮,提升了郑州在区域水运中的地位,使得郑州成为水旱转运码头,市面一度繁荣。

唐开元年间曾重开郑州附近的板渚口以通漕运,郑州、洛阳、开封一线黄河的通航能力大为提升。如唐天宝2年,一年运抵西安和关中平原的粮食就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漕运量的最高纪录。宋元丰年间,为减缓汴河淤积,实施引洛入汴工程。在郑州汜水关通黄河,接运河,有效降低了汴河泥沙的含量,河道的改善亦推动了漕运的发展,而郑州恰位于这项工程的中心位置⁵。由唐至宋,郑州数度被置为州府治所,是洛阳和汴梁(开封)两大都市之间的重要联络地,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粮食转运中心,在区域水运交通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宋元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京杭大运河的凿通使得全国交通线路发生了整体位移,南粮北运的主航道不再经过郑州地域,区域水运遂开始萎缩。但在传统交通时代,水路依然是商货流通和人员流动的重要手段。19世纪末前夕,河道网络的变化使得河南省一些依靠水路而繁荣的市镇开始衰落,源自郑州地域的贾鲁河⁶由于淤积而无法通航,区域重要商业市镇——朱仙镇遂变成了一座城市的遗迹⁷。郑州在地域水运交通衰落的大势中勉以为继,交通地位逐渐衰微。

2 郑州地域的驿路交通网络

驿路是中国传统交通体系中的另一重要载体,初成于秦汉,唐宋时期驿运至为繁盛。郑州管城驿在唐宋时期是联结四京,即长安(今西安)——洛(今洛阳)——

汴(今开封)——宋(今商丘)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条横跨豫陕两省的运输干线,是当时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在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交流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近代时期的中国,交通——主要是指陆路交通——首先是作为王朝控制系统而存在的,包括社会控制和疆域控制。自从清康熙实行“裁驿丞、归州县”,官路与地方行政中心更紧密地结合成网络⁸。清代的驿路网络包含两种线路:一是以京师北京为中心至各省省会的驿路,被称为官马大路,简称官路;二是由省会至地方重要都市的驿路,被称为官马支路,简称大路。因清季河南的省府一直是开封,官马大路联结京师,官马支路则由开封向各地辐射,因此开封是河南驿路交通运输的中心。在省府开封联结各府州县的7条主要驿路中,有3条⁹经过郑州,表明郑州在该地域驿路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14年(公元1675年),河南省共有驿站120个,急递铺885所,铺兵3025人,其中州管驿站12处,县管驿站96处,驿丞管腰驿12处。而到了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全省驿站减少为68处¹⁰,这意味着中原地区驿路运输开始趋于衰落,郑州地域概莫能外。

及至清末,以河流和驿路为中心的传统交通体系在郑州地域整体衰落,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凿通使得中国南北交通主航道东移,尽管位处中原、扼交通要冲的郑州地域,在政治讯息南传和经济物资北调中时为经由之地,但毕竟偏离了交通干线,地域交通的地位骤然下降;其二,黄河屡屡泛滥改道,汴河淤塞,导致郑州地域河运不靖,水路交通趋于衰落;其三,自元明清始,中国的整体发展态势是政治中心北移,经济中心南移,这种疏离使得曾经的王朝统治中心地带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蜕变为政治经济的“塌陷地”,导致郑州地域在中国社会发展格局中被边缘化;其四,晚清以降,郑州所在的中原地区战争频发,匪祸横行,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振。此外,运输工具的传统落后、效率低下亦是郑州地域交通格局无从改观的一个重要原因,交通变革迫

在青睐。

3 新式交通工具——铁路的导入

近代商品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运输业，因而扩大流通、开拓市场的前提就是采用先进的运输工具。伴随中国门户的洞开，新的交通工具——铁路于19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从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各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都遵循着一个共同规律：即经历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注重利用科学技术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¹¹。铁路作为近代化与技术革新的成果之一，对整个近代化进程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修筑并在郑州十字交汇，推动了郑州地域交通的兴起，以机械为动力的铁路运输逐渐取代了以风力、畜力等自然力为动力的帆船车马等传统运输，成为地域交通的主要方式。

平汉铁路、陇海铁路的选线设定，主要是基于内陆腹地开发的考虑。两广总督张之洞1889年向清廷启奏《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折》，提出在中国的中部腹地修建铁路干线，视铁路为开通土货、连接四海的利器，既可内开未尽之地宝，又可外收已亏之权利。关于卢汉（平汉）铁路的修建计划，张之洞认为“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缩谷”，筑路“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¹²。陇海铁路始于“汴洛线”，最初是平汉铁路的支线。“河南省因京汉（平汉）铁路干线不经过省城（指开封——作者注），深感不便，于是便有汴洛铁路之设。初意不过东至开封，西至洛阳，为京汉支路耳。乃汴洛成而西有洛潼（指连接洛阳与潼关的铁路——作者注）之计划，东有开徐（指开封、徐州间铁路——作者注）之设施，于是引起陇秦豫海大干线之议”¹³，筹划修筑陇海铁路，以打通西部腹地。

1906年与1909年，平汉铁路和汴洛铁路筑成通车后，郑州即可通过平汉铁路北达北京，转接天津，城北20余公里通黄河水运，向南可抵汉口，连接长江水路；通过陇海铁路向西至观音堂（后至陕州、

潼关、西安等地），向东经徐州北上通济南、青岛，南下达浦口、上海，由徐州继续东行即达海州大埔港出海，由海路南下到上海，北上至青岛，能够与诸多通商口岸直接联系。郑州从交通区位上来说可谓是四通八达，居于中原近代交通运输网的核心位置。

III 新式交通体系下郑州地域构造的变容

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被引入中国之后，由于其强大的运输功能，改变了人员、商货的基本流向，传统的运输渠道由此发生转换，冲击并改变了原有的地域构造。铁路沿线及其辐射区域成为继沿海、沿江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铁路的筑通，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交通布局，郑州处于十字交通的核心位置，从而获取了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地域经济的中心。铁路作为郑州连通外部世界的桥梁，改变了该地域传统、落后的状况，外向型经济得以确立，从而引发区域经济空间的演化。铁路线的铺设亦带来区域市镇的兴衰更替，传统市镇则趋于衰落，铁路沿线一批新兴市镇悄然崛起。

1 地域经济中心的位移

在铁路开通前，郑州只不过是一座乡村气息浓郁的小县城，在工商业和政治上均没有多少价值。然而，铁路的筑成使得郑州可以联络各通商口岸，客货交往旋即频繁起来，其经济地位亦逐渐得以提升。这给原有的黄河、卫河及运河水路交通带来极大冲击，压倒了河南省最大的市场——周家口，一夺省城开封的繁荣势头，独占长江、黄河间中原最大的货物集散市场之重要地位¹⁴。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给封闭、衰落的郑州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和驱动力，工商贸易活动日益繁盛，逐渐发展成为与开封相匹敌的商业都市。

铁路开通后，郑州地域经济的中心逐渐发生了显著位移。未有铁路之前，区域经济的活发地主要限于水运便利之所，黄河、淮河、汉水和卫河水域是区域农作物

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商贸的中心，诞生了周家口、朱仙镇、道口镇、社旗镇等著名的沿河商业市镇。随着铁路的筑通，郑州地域的物资集散态势发生了明显改变。平汉铁路的筑成使得郑州以南的铁路取代了周家口水路运输的大部分，并且影响到河南省西南部的汉水水运，铁路对该区域与汉口间贸易的打击，比周家口更甚。陇海铁路西展之后，显然给区域水路交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西部腹地的物资基本上不再通过黄河水运，而是经由陇海铁路和郑州这个交通枢纽，连通平汉、津浦铁路，与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往来贸易。在铁路的联动作用下，郑州逐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及工业品的转运中心。1920年前后的调查结果显示，“郑州的发展，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即铁路开通以来，河南、陕西、甘肃、山西西南部的物资以此为自然的集散中心地，客商频繁往来，遂形成今日的隆盛局面”¹⁵。郑州市场圈的影响范围因之拓展，从而助长了郑州商业中心地的形成与殷盛。

郑州地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还体现在金融的地域构造方面。在铁路通车之前，郑州银行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除豫泉官钱局郑州分局之外，仅有数家银号和一些带有抵押融资职能的当铺。铁路通车使得郑州成为连通中国西北的门户，商务活动大大增加，刺激了郑州金融业开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大迅速发展，各大银行纷纷在郑设立分支机构。就1930年代中期而言，郑州计有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陕西省银行和大陆银行等12家银行，其中中国农民银行等5家为分行，中央银行等3家为支行，中国农工银行等4家为办事处。而同期省城开封仅有银行7家，除河南农工银行为总行之外，其余均为支行和办事处，洛阳更是只有河南农工银行和中央银行两家银行的办事处。金融机关的多寡及其分设机构的规格水准，既是一个地域市场繁荣度的晴雨表，同时也是该城市在区域中

经济地位的一种表征。

2 地域经济空间的拓展

郑州地域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20世纪之前基本上仍旧保持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商品流通及市场结构简单，交换多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地域经济空间非常小。农作物主要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而是对消费后的剩余进行出售，大都仅流通于农村附近的集镇市场圈，真正通过长途贸易网络流入市场的相当有限。

20世纪初起，平汉、陇海铁路的筑通并交汇于郑州，为郑州地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一改郑州地域传统封闭的面貌，扩大了沿线地区商品输出的范围，也使得郑州的商品贸易范围大为拓展。郑州地域交通运输状况的改观，大大缩短了联络通商口岸的时间，使得原本偏远封闭的乡村市场亦能够通过近代交通方式联结口岸市场乃至国际市场。

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运量大、运价相对低廉、适合批量商品的长途贩运等优点。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贯穿，使得郑州地域的农民可以籍此便利，大量自产地运销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铁路沿线地区的农民，在较高利润的驱动下，逐渐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因地制宜，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¹⁶。区域供需的畅通使得农作物生产已不可能封闭在农家自用的小天地里，商品化生产成为可能，农民生产的目标指向开始由自给自足转化为商品，商品化逐渐成为农作物生产的主流，由此推动了区域经济作物种植的市场化转向。郑州及其周边地域农作物种植专区亦逐渐形成，如豫东陇海铁路沿线花生种植区、平汉铁路南线许昌一带烟草种植区、豫西豫北棉花种植区等等。

铁路的筑通提升了沿线地区商贸与人员活动的频度，拓宽了流通的渠道，调剂供需平衡，从而实现了区域内外生产、消费和信息的有效沟通。就区域棉花产销而言，1936年河南棉产总量为130余万担，其中农家自身消耗30余万担，其余100余万担则流向市场。除本省纱厂消耗省内

皮棉 25 万担之外，输出境外者常达 80 万担左右¹⁷，多利用铁路经郑州转运至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终端消费市场或者国际市场。郑州作为陇海、平汉铁路的节点，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县城一跃成为 1920 年代中国最大的原棉转运市场之一。除河南本省来棉外，还有陕西、山西两省的来棉，每年达数十万至百万担，地域商业空间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铁路通车之后，郑州近代意义上的机器工业开始从无到有、逐步得以发展。最早建立的是一批铁路附属工厂，如郑州机器厂、机务修理厂、电务修理厂、材料厂等，为铁路提供配套服务，同时兼营地方业务。这些交通伴生型工业的发轫，体现出明显的铁路特色。基于交通区位和铁路沿线产棉区的考虑，上海企业家穆藕初选择在郑州设立豫丰纱厂，建成于 1920 年，是当时河南省规模最大的棉纺织企业。纱厂拥有纱锭 50000 枚，每年消费皮棉达 10 万担¹⁸，其原棉的运入和产品的销主要依托铁路。

近代运输业使得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相对缩短，往来时间大为减少，运输费用下降，加速了人口、商品、生产和市场的集中，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建立和扩大¹⁹。通过铁路交通网络，郑州不仅密切了与北方口岸城市的联系，而且与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交易频繁，加速了区域经济的向外化发展，从而拓展了地域经济的空间。

3 铁路沿线市镇勃兴

从交通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一条交通线所经之地，往往给沿线的重要站点带来巨大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使之成为人口物流集聚地，继而为此处的居民提供从事商贸、手工业等非农业的条件，从而最终形成市镇²⁰。

在 19 世纪末季之前，郑州地域的市镇基本上是沿着水运网络或临近行政中心，一般规模较小，呈点状无序分布。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生产地和销售地的相对位置随之发生变化，靠近交通线地区的交易成本无疑相对较低，于是铁路沿线人员及商贸活动开始集聚，

一批市镇悄然兴起。就华北市镇发展的态势而言，“如果说，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是江南市镇勃兴的黄金时代；那么，华北平原的市镇勃兴，则大致是发生在 19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近半个世纪里”²¹。而且城市行政等级或供给职能不再是决定华北城市兴衰的唯一因素。在腹地市场中的位置，与通商口岸的交通方便与否，成为决定城市在近代区域系统中地位的重要因素²²。这一阶段郑州地域市镇的勃发，其中固然存在方方面面的原因，但区域铁路交通体系的初步构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平汉铁路、陇海铁路的贯通使得区域发展重心发生转移，原本分散的地域结构由于铁路交通网络的形成而呈现集聚的态势。在平汉、陇海铁路所构成的“十字”交通线上，几乎汇聚了河南省全部的重要城市，铁路沿线涌现大量中小市镇，集中分布在两大铁路干线上，漯河、周口和焦作成为新出现的、连接北京和武汉以及上海（1927 年后）的市场中心中最繁荣的市镇，而像这样的城市当时有一打之多²³。据 1935 年的统计，在河南省市镇密集度最高的 20 个县中间，90% 位于黄河南岸一侧的平汉铁路沿线、开封道地区以及黄河北岸一侧的河北道地区。就交通条件而言，位于铁路（包括平汉、陇海和道清铁路）沿线者达 12 个县之多，位于河道沿线者 5 个县²⁴，由此可见区域市镇的空间布局与交通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洛阳、安阳、新乡、许昌、漯河、确山等铁路沿线城市迅速成长，同郑州、开封一起构建成中原地区的城市体系。

随着郑州地域铁路沿线市镇的兴起，人口也在向这些新兴市镇缓慢、稳步地迁移。从整体上来看，河南人口在近代以来是沿着两个方向持续迁移的：一是向着水源比较丰富的河流两侧集中，二是向着铁路或公路沿线地带集中，沿交通线区域的人口一般较为稠密²⁵。与平汉铁路沿线城市迅速崛起相比，被称为“八省通衢，势若两京”的河南省城开封却相对衰落了。自 20 世纪初至 1930 年代中期，开封的城市人口缓慢增长²⁶，经济发展亦非常迟缓。就

发展速度和城市经济运行态势而言，显然与相邻的新兴交通功能型城市郑州不可同日而语²⁷。致使开封相对衰落的因素固然很多，如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战乱纷扰等等，但以铁路为主的近代交通网络取代传统的水陆交通网络，使得开封失去了往日的中心地位，被新的交通格局挤于一隅，这显然是致使其衰落的主要原因²⁸。交通枢纽地位的旁落，开封以西和以东两个铁路交汇点——郑州、徐州的崛起，给这座行政中心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洛阳、开封的水路运输已极其萎靡，但因其同时为铁路交通联络地，水路与铁路的沟通强化了其在转运中的地位，两地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除此之外，开封因位处区域的政治中心地，而在此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保持着相对于郑州的优势地位。

IV 结 语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郑州地域交通格局经历了从自然力导向的传统河运、驿路到机械动力主导的近代铁路的演变，从而为区域社会变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力量。铁路的修筑从根本上改变了郑州地域的腹地交通，它不仅仅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而且摆脱了地理条件的制约。20世纪初华北区域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超过了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铁路交通网络的初步形成，对于加速华北地区的发展以及区域结构的改变，无疑起到强劲的推动作用。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铁路沿线和通商口岸附近地区，铁路打通了以往因交通不便而处于封闭状态地区，使其与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²⁹，它突破了郑州地域发展的时空限制，其地域构造遂发生深刻变化。

铁路将郑州地域的穷乡僻壤与省内外诸多城市中心直接联系起来，为区域经济资源的配置注入了新的要素。铁路为其经过的地区提供了新市场，改变了原有的商品流通路线，有助于提升经济作物种植的区域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促动地域

经济布局的改观。铁路缩短了郑州与贸易港口或通商大都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有助于推动郑州地域商业空间的拓展，使得商品向更广阔的地域渗透，地域经济的空间容纳力随之增强。以铁路为代表的近代交通促进了郑州地域经济中心职能的强化，郑州由此快速崛起，并且铁路交通对于郑州城市的影响力延续至今，仍然是该地域发展的强劲动力。

附记：本文系2008年度爱知大学青年研究助成“铁路と郑州都市化の進展”的研究成果及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交通体系与华北区域社会变动研究”（课题编号：08JJD840191）的中期成果之一。

¹ 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² 陇海铁路又称陇秦豫海铁路,是西起中国甘肃省兰州市、东至江苏省连云港的一条东西交通干线,途经陇(甘肃)、秦(陕西)、豫(河南)、海(江苏海州),全线长1750千米。陇海铁路并非是一次成路,而是分段建设而成。最初是在汴洛铁路(开封至洛阳,1908年底建成通车)的基础上向东西方向延展,直至1952年才最终完工。平汉铁路为联结北京和汉口的一条南北交通干线,1906年建成通车,全线总长1214千米。该线初称卢汉铁路,继称京汉铁路,后称平汉铁路。为统一起见,本文除在引文中沿用原有称谓外,余则概称平汉铁路。铁路(railway)是以机车牵引列车在两条平行的铁轨上运行、从而实现人或者货物空间位移的一种陆上交通方式,铁路的应用标志着近代交通运输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陇海、平汉铁路在郑州交汇,由此带动了这座城市的快速成长。

³ 郑州既是一座城市,同时又是一个区域。那么在论及郑州的地域构造时,则要考虑郑州城市的地域构造和郑州区域的地域构造两个层面。郑州城市的地域构造是指构成城市的各种元素,如人、建筑物、街道等的空间位置、分布密度和分布形态。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功能分区,受城市的地理环境制约,因交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亦受城市历史的影响,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结果;郑州区域的地域构造是指该区域的各构成要素的空间结构状况,如市镇的分布、人口的聚散及流动、交通状况、核心——外围结构、区域经济的布局等等。本文中的郑州地域并非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一个因铁路而兴、影响区域经济变动的泛郑州的概念,近乎郑州经济圈的意涵。

⁴ 林富瑞、陈代光:《河南人口地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178页。汴河源出郑州附近荥阳大周山,东流经开封、商丘、徐州合泗水入淮。隋炀帝开通济渠,引黄河入汴,从而沟通黄河、淮河及长江。五代和北宋时期开凿了源自郑州的金水河、蔡河,在开封与汴河相汇,从而形成了汴河水系及开封这个水运中心,也使得郑州依托水运与外界的联系有所增加。

⁵ 侯全亮:《郑州至开封古代水运兴衰之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⁶ 贾鲁河的说法有三:一是系元代贾鲁奉元顺帝之令所开之黄河,大约自河南仪封、睢县、考城、商丘、虞城、夏邑,山东曹县、单县而至江苏徐州,与今天的贾鲁河并非是一回事;二是今贾鲁河,本名孙家渡河,为明代刘大夏所开。1448年黄河决于荥泽孙家渡口,漫流祥符、尉氏、扶沟、通许、洧川、临颖、郾城、商水、太康、项城诸县,至寿州入淮。刘大夏于1494年修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70余里,导水南行,经中牟、朱仙镇下至项城,南倾入颍,以杀黄河之势,并资通运,作为黄河故道,航运价值不大;三是本文所言造就朱仙镇崛起的贾鲁河,源自郑州属地荥阳东南诸山,上源有索、金、须、郑诸水合流于郑州附近,东流经中牟县北,由东南流经开封朱仙镇,折南经尉氏、扶沟,至周家口合汝、颍二水为沙河,下达淮河。孙家渡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泥沙易使河道淤塞;而贾鲁河以索、金、须、郑诸山源为水源,则河道稳定,航运畅通。至明末时期,贾鲁河取代汴河而成为该区域包括郑州联系外部世界的通道,沿河的朱仙镇藉此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区域重要的水陆转运中心。到了清朝后期,因黄河泛滥,贾鲁河淤积,朱仙镇丧失交通区位而趋于衰落。参见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年第12期。

⁷ [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页;《河南公路交通古今》,郭颖生编:《中州今古》,中州今古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⁸ 刘海岩:《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年)》,〔日〕渡边惇:《20世纪前半华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研究报告),驹泽大学文学部2002年版,第155页。

⁹ 西线:自开封府西行,经中牟县圃田驿、郑州管城驿、荥阳县索亭驿、汜水县驿、巩县洛口驿、偃师县首阳驿、洛阳县周南驿、新安县函关驿、澠池县义昌驿、蠡城驿、陕州硤石驿、甘棠驿、灵宝县桃林驿、阌乡县鼎湖驿至关东店出境(接陕西省华阴县),全长450公里,为东西横贯河南省的一大干路;北线:自郑州管城驿北行,经荥泽县广武驿过黄河,至获嘉县亢村驿,再经新乡县新中驿、汲县卫源驿、淇县淇门驿、汤阴县宜沟驿、安阳县邺城驿至丰乐镇出境(接河北磁县),全程210公里;西北线:自郑州

所属荥泽县广武驿经武陟县驿、河内县覃怀驿至泽州府（山西晋城），全程 115 公里，是晋豫交通要道。参见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公路交通志》（第 38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21 页。

¹⁰ 杨克坚主编：《河南公路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9 页。

¹¹ 李文耀：《铁路与中国城市的发展》，《人民铁道报》2001 年 4 月 28 日。

¹²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 1 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69 页。

¹³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中华印刷局 1920 年版，第 97 页。

¹⁴ [日]横滨正金银行：《河南省郑州事情》，调查报告第 12 号，横滨正金银行 1920 年版，第 1-2 页。

¹⁵ [日]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河南省郑州事情》，青島守備軍民政部鐵道部 1922 年版，第 7 页。

¹⁶ 沈松桥：《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 年版，第 341 页。

¹⁷ 全国棉业统制委员会河南省棉产改进所：《河南棉业》，河南省棉产改进所 1936 年版，第 26 页。

¹⁸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2 页。

¹⁹ 靳润成：《中国城市化之路》，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 页。

²⁰ 谷中原：《交通社会学》，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9 页。

²¹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8 页。

²² 刘海岩：《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 年）》，[日]渡边惇：《20 世纪前半华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研究报告书），驹泽大学文学部 2002 年版，第 159 页。

²³ 朱毅等编：《河南县情》，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67 页；[美]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 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5 页。

²⁴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3 页。

²⁵ 林富瑞、陈代光：《河南人口地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7 页。

²⁶ 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3-217 页。在汴洛铁路通车的次年（1910 年），开封的城市人口为 159,729 人，1925 年则上升为 226,758 人，15 年间增长 42%，人口呈不平衡增长，自然增长率多为负数，人口的增加属于移民、经商、公职派驻等社会增长。此后，开封城市人口整体缓慢增长。1926 年 229,483 人，1927 年 230,623 人，1930 年为 236,547 人，1931 年上升为 251,629 人，1934 年为 287,808 人，而 1935 年突降为 203,341 人，1936 年复增至 307,071 人，10 年间人口大约增长 34.7%。

²⁷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郑州在铁路通车后得以凭借交通区位优势而迅速发展，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论是城市空间范围、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总量的绝对值，开封均高于郑州。直至建国以后，郑州的各项指标才逐渐超越开封。郑州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速度和态势层面，是相对于自身及周边地区而言的；开封的衰落亦表现在发展速度和经济运行态势方面，与自身及郑州相比较而言，是一种相对的衰落。

²⁸ 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7 页。

²⁹ 刘海岩：《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 年）》，[日]渡边惇：《20 世纪前半华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研究报告书），驹泽大学文学部 2002 年版，第 160-161 页。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程序化”“执政” ——简析中国三十年来执政哲学的程序理性转向，兼谈作为社会行为 (制度) 正当性依据的科学的意象的变迁

涂 明君¹

摘要

1977年开始的从革命思维向执政哲学的转向，以形象模糊的科学为社会行为(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以对科学作常识化、实用化解读的程序理性为执政哲学基础。随着科学意象的变迁，语义含混的程序理性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发展阶段：1977-1979年自觉苏醒后自发地反对“两个凡是”程式化束缚、1979-1989年自在地“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性探索前进并初步去意识形态地提出初级阶段论、1990年-2002年自为地市场体制改革形成经济理性的初级阶段纲领并诱致性变迁到制度理性的政治民主程序化、2002年开始自反地多元化解读程序性发展道路中的科学与人文并试图以科学性兼容超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从第一到第三个阶段末所形成的程序化理念尚为伸张程序价值论，就因最后一个阶段科学化泛化的泛化而表现出某种复古性地倒退：虽然新程序主义试图以程序与契约相互论证来协调程序与道德，但深植于传统思维模式中的道统意识形态基本占据上风并将科学上升为某种道德意识形态抑制程序理性；同时，道统本身却又存在道德真空的巨大困境，道德理想的混乱和虚妄，给了集中的政治权力将程序拉回到工具性僵化程式以机会。如何融贯中西地处理程序(化)与道德和权力的关系，是程序化建设的关键，也是中国模式之探讨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 执政哲学；程序理性；渐进改革；科学；正当性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中国更被指为党国体制。1978年底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后，跳出革命思维的执政党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思考和争论的重大问题。其中思想界(新)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保守(权威)主义之间的争论规模和影响最大。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虽然以批判的姿态有效地、有价值地制衡和鞭策着新权威主义，但相对疏末于主流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者萧功秦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中国的大转型”描绘出了一幅政治社会学图景，^[1]虽然尝试着作出思

想文化史解释，但其中国化哲学自我意识相对薄弱，缺乏系统的哲学基础作支撑。其他如经济学类邹东涛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²、林岗《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实质、意义和前景》，^[2]政治学类乔舒亚·雷默(J.C. Ramo)“北京共识”和其他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3]丹尼·罗德里克(D.Rodrick)“诊断法”和胡鞍钢学习、竞争和创新模式^[4]，萨米尔·阿明(S.Amin)“走向欧亚的重建”和大卫·施韦卡特(D. Schweickart)“后继体系理论”，政治理论类俞可平“中国模式”^[5]和郑必坚“中国崛起”，都存在与萧说类似的缺憾。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转向，

以意象模糊、并不清晰的科学为社会行为(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以语义含混、并不成熟的程序理性为制定政策的哲学基础。随着科学意象的变迁,对科学常识化(借用金观涛、刘青峰语)、实用化(借用李泽厚语)解读的程序理性相应地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自发地反程式、自在地试错性阶段化、自为地纲领性程序化和自反地科学性自组织。即,1977-1979年自觉苏醒后自发地反对“两个凡是”程式化束缚、1979-1989年自在地“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性探索前进并初步去意识形态化地提出初级阶段论、1990年-2002年自为地市场体制改革形成经济理性的初级阶段纲领并诱致性变迁到制度理性的政治民主程序化、2002年开始自反地多元化解读程序性发展道路中的科学与人文并试图以科学性兼容超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四阶段论属于以偏概全的理念型提炼,每个阶段均包含其他阶段的部分内容。而且,越是靠近今天的历史,越是被活着的人的主观性所遮蔽;事实上,程序理性在中国还远未成型和健全,自为地程序化和自反地科学化只是一种倾向,其发展存在若干变数,³有待进一步观察,故而只能做简单分析和初步前瞻。本文的重点是相对明确呈现出来的前两个半阶段,但对程序理性在道统意识形态复古大潮中的未来发展表达一定程度的担忧。

I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自发地突破封闭程式

“文化大革命”有其部分合理性,因为它希望以大革命和大民主的方式打倒高度集权模式所带来的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程式化固然不错,但连着一块把程序理性也彻底抛弃,最后的结局自然是脱序失范,导致革命自身也成为革命对象,辉煌自焚。“粉碎”“四人帮”,以革命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了,但革命却还远未结束,其灵魂仍在:与传统“气论”和烈士精神有着紧密联系的非理性激进革命理念依然深藏于时

人意识深处;较激进革命更为宽泛的革命理论体现着价值理性⁴和道德理性,确有纠工具理性之偏的人文理想价值;革命话语作为传统资源,既可以为(新)左派也可以为改革新政提供可以利用的正当性依据。由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成为1977年前后华国锋、邓小平等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过渡性口号。⁵

1 用科学“革命”挑战“两个凡是”

表面看来,吴江1977年7月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6],将革命的外延从单纯的上层建筑扩大到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有泛革命化之嫌;但它实际上消解了激进革命观中的阶级斗争和批判运动内涵,在保留创新性发展的同时放弃了革命的暴力破坏性,为革命话语开辟了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无产阶级对革命所拥有的专属权——科学技术革命,知识分子当然也有资格参加;生产力革命,也并不绝对排斥非无产阶级。或许吴江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革命仍然在继续,但它前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却开始被质疑。阶级分析,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精华,它受到怀疑,这当然是关系到执政正当性的一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

按照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需要进步的阶级来领导;而无产阶级具有最纯粹的无产阶级道德,如一穷二白最渴望革命、大公无私最能够革命等等,其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决定了他们是最先进的阶级,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性和正当性——此所谓“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⁶而无产阶级领袖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无疑是道德品质优秀中最优秀者、高尚中最高尚者。虽然林彪事件已经使少部分人懵懂地觉得领袖原来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道德圣人”,从而觉得这套道德政治逻辑有些问题,但它的确还是被广泛接受的执政哲学。⁷毛虽然去世了,但在广大群众中依然享有崇

高威望。所以一方面要加紧把新的领导人树立为具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的英明领袖——“衔命者，君之尊也”，⁸另一方面还要借重毛的影响和既有政治体制资源以收拾乱局、稳定人心、巩固政权、重建德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政治哲学的外在表现，就是“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这里，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变成了类似于古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如何维护和遵循，则还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官僚体制。文革之初，旧的国家机器的确被摧毁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加集权、更加一体化、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体制。^{[7]P230}“两个凡是”利用并维护着既有的官僚主义体制资源，通过对已故领袖的盲从迷信，压制个人自主性，延续文革的种种行为——哪怕它是非理性的。社会仍然是一块高度同质化和板块化的砖墙，它钳制理性与个人活力，缺乏弹性程序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政治机制。吴江探讨“继续革命”的问题，质疑了执政主体的界定和执政目的的范围，从而间接质疑了这套执政体制的正当性，挑战了“两个凡是”的形式主义程式化倾向，被胡耀邦称作“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或被传为‘第一声号角’）”实至名归。

接下来，邓小平在1977年4月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后，更直截了当地用了科学的名义：“‘两个凡是’不科学”。他还在7月复出后多次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8]PP2.4} 聂荣臻、陈云和叶剑英也公开表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提升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通过扩展生产力和工人阶级的外延暂时重新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会议在强调科学创造性的同时，指出科学要实事求是。把科学的内容包含到生产力之中、把科学的

本性定义为实事求是、把科学看作“正确”的化身，都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抓科学工作？其最原始动机已不可考。可以观察到的是科学作为理性的象征成为反对非理性既有政策（及其哲学）的重要武器；而且，在邓和胡耀邦的主导下，科学日益高调地成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行动（制度）性的正当性根据。

2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科学真理”的正当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用作论据的实践，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就只有发现新元素证明元素周期表和发现海王星证明太阳系学说两个科学史方面的例子。该文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文章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的，是主要用“真理”而非“实践”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个论证过程虽然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也没有完全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没有完全封锁“理性建构主义”的道路；该文对科学史还有误引。但这些都无伤大雅，甚至多年来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逻辑悖论和史料错误。

大讨论的主要成果，是“实践”在意识形态哲学上取得了最后裁决者的地位。对立统一且更强调矛盾冲突的《矛盾论》没有被抛弃，但注重经验的《实践论》却无疑成为了意识形态舞台上新的主角。真理需要检验，实践需要探索。探索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显得比较杂乱、没有头绪，但实事求是的探索，最终是要探索出“是”，探索出事物的规律，探索出方法的程序。重提《实践论》，突破了形式主义程式对实践性探索的封闭，开辟了程序性探索的路径。

大讨论的另一个效应是将科学真理与马列主义真理并列，将科学实践论证科学真理与社会实践论证马列主义并列；将科学实践看作是正确的实践，将科学活动所反映的意

识形态看作是正确意识形态从而将其接纳为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不仅为科学哲学影响政治哲学开启了大门，而且把科学放到了一个同马克思主义同等正确的地位上，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一效应一直影响着中国三十年来的（政治）思想演变历程。当然，此时的科学刚刚重获新生，人们只是在下意识里认定其正确，而并没有仔细省查它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冲突，更谈不上冲击和颠覆，只能说科学主义初露端倪。

这种对待科学的不明朗态度，既可能产生西方式的道德与理性两分，也可能产生把科学技术作为最高价值的科学主义，还可能产生把科学看作服从于某种道德幻想的纯粹的工具。不管向哪个方向演变，科学的意象都会与程序理性的内涵发生密切的互动。

3 三中全会标志着程序理性的苏醒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在此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真理标准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并且批评了前一时期一元化领导方式。这一次高层会议，的确让与会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关键之处尚由政治局常委会左右）尽可能地民主讨论，^[9]这些高职位党员的个人权力真正体现了出来。1979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将民主的理念重新播撒到全国，民主程序获得生长空间。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10]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被放弃。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定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左倾错误理论”，“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11]在这一理论雪崩式瓦解的几年时间里，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被取消，人民政府的组织机制得以恢复。

斗争和运动等话语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的历史舞台，实践、科学和民主等成为社会行动（制度）的正当性依据。科学和民主从封闭的程式中走了出来，现代程序诉求也就必然会跟着出现。⁹但冰封日久，科学和民主都需要一个生发和成熟的过程，程序理性也需要一个萌芽和成长的过程。这个重新萌芽的过程，首先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朴素的程序理性去逐渐消解意识形态的禁锢，从而为程序理性自身赢得成长空间的。

II 从自在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策略到试错性摸索前进的“初级阶段论”

“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改革者的专利，在1969年7月北京大学宣传队（主要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向北京市革委会汇报、并由后者向中央送上、最后由毛批示“照发”全国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中，就有“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表述。^[12]意思是知错就改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修正错误把坏事扭转过来变成好事。应该承认其中蕴含了试错和稳妥的理念，但在文革时期显然不是主流，而且还必须服从于毛泽东思想，最终目的是懂得如何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而非去自主地探索真理。

1 “摸着石头过河”：陈云的“稳妥”，还是邓小平的“摸索前进”？

在改革派内部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非邓小平，而是陈云。1950年4月陈云在政务院政务会议发言和1951年7月指出“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13]^{P152}针对激进主义情绪下“毛毛草草”的冒进做法，陈云强调稳妥。1961年3月陈云对“摸论”作出实践论解释：“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推广必

须是成熟的东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人是需要经验教训的，老头子头发变白，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14]1960年代初所谓的经验教训，显指大跃进之后的大面积饥荒造成饿死人乃至人食人的人间惨剧。陈用经验主义的渐进程序理性批评浪漫主义的革命乌托邦，代表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被剑桥史书认为的“渐进主义”^{[15]PP52-83}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16] P378}的基本哲学立场。但事实上，程序理性至多只能理解为一种在强势革命激情中的潜在对立面，虽偶有觉醒迹象，但在1978年以前从未形成气候，^[17]这顶多是黑夜里的一次短暂梦醒，之后还是沉睡。

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实际影响的“摸论”，是陈云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发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8]P279}。邓在闭幕会上肯定了陈的报告：“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由此，“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改革方法论的指导性原则。

事实上，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解，陈云与邓小平并不完全一致。本文认为，陈云的“摸论”不能完全代表执政哲学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当然注重经验教训，但他在“实事求是”之前还加上“解放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谋略，也有思想文化内涵，可以说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更加全面。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的改革，还要把科学的开放创造性拿来当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老老实实地埋头于经验。虽然陈云在1984年6月又提“摸论”，但人们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提出的并非毫无道理。“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

索前进。”^{[19]p174}在人们对描绘新社会蓝图充满激情、在对作为新事物的改革满怀期待与宽容、在缺少内省的自由主义如地火般大面积熊熊燃烧的情况下，当时许多人对执政哲学的理解，显然更接受邓小平1985年的那个胡适式的、更进步的、更有激进色彩的表述“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20]p113}，而不是陈云偏保守的思想。

或许还有其他反对声音，陈云在1988年5月为自己做了辩护：“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¹⁰。”^[21]“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当然没有错，但以“多谋善断”（叶永烈语）著称的陈，如果过分强调小步慢走，那就与小步快走的实践不符，与科学技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的主流意识形态闹别扭，被公众误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异而不真诚地拥护“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指导原则，只是在坚持经验主义渐进原则的同时，还增添了追求进步的内涵，并且在意识形态中或多或少多地保留着革命和自由的激情。这就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

2 程序性渐进思想与改革的制度层面

如何在实效主义的猫论下解决上述冲突？邓小平把程序性渐进方法不仅作为一个原则，还极力倡导要将渐进策略贯彻到制度改革中去。成中英曾经指出过方法有四个辩证互动的层次：本体、原则、制度到运作。^{[22]p17}邓小平一开始提出制度问题时就谈到了程序性和变革的辩证关系：“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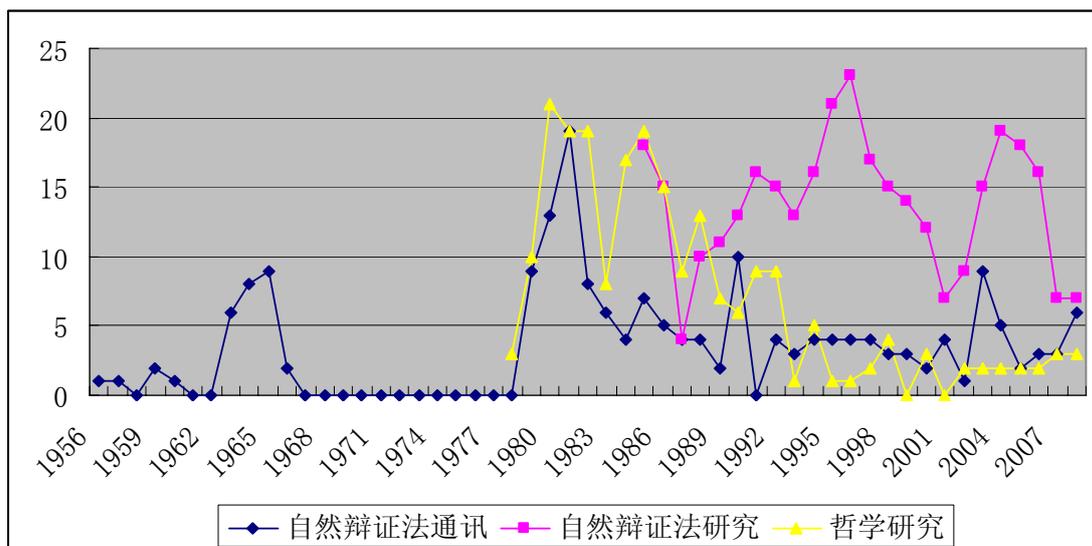


图1 科学哲学类核心期刊中“控制论”全文检索年篇数¹¹

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

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并不是否定计划和循序渐进的程序理性。之所以强调计划性和步骤性的制度建设，是要为“坚决彻底的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使改革成果建立在一点一滴的程序性积累当中，从而使改革发展更加稳妥、更加牢靠。所以，邓小平在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革命观进行批评但保留革命话语的前提下，试图用程序渐进的方法去改革制度：“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方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3]p333、336}

这样，程序性渐进的思想，就不仅仅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而且要规范为制度；这里的制度，也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关乎民主等政治问题：“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24]p196}、“（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25]p177}事实上，现代制度区别于传统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用弹性的程序取代僵化的程式，制度中的程序与普通的程序在程序理性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不

同。^[26]既然以程序渐进的思想指导制度改革，程序精神及必然会渗透到（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当中。

3 试错性“控制论”对渐进主义的“科学”支持

程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程序的基本精神，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总结一步经验。”^{[27]p1016}即反对冒进和大跃进，坚持按秩序一步一步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做，不指望把所有的事情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做完；走完一步，下几步看清楚，计划明确了，再迈出下一步；迈（探索）的过程中感觉到与预期有偏差，就收回来重新规划。如此，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达到过河目的。这种国人乐于接受的常识理性（金观涛、刘青峰语），科学哲学称之为启发式探索、试错性搜索或渐进性调试等等。这是复杂性自组织命题，在当时叫做系统科学（哲学）。通过对“控制论”和“系统论”在科学哲学的两本核心期刊上进行全文检索（图1），基本可以证明当时兴起了“系统热”；引领系统论兴起的，是控制论。控制论的精髓，就是负反馈自动调节，是试错性调试。

控制论是中国第一批自然辩证法研究者的主要课题之一。1955 到 1956 年，龚育之确定其汉译名称并翻译维纳《控制论》。紧接着钱学森回国，其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工程控制论》被译成中文。到 1966 年的十年时间内，业界举行了数次研讨会并将国外控制论哲学论文摘编结集。因为在《工程控制论》的指导下中国研制出了火箭、导弹，发射了卫星，所以毛不仅在生前 7 次接见钱，并且仔细研究过控制论哲学问题并将其批注以《内部参考》的形式供高级干部学习。虽然说毛对某些控制论哲学观点持批评态度，但客观上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普及了控制论。¹²“文革”之后的邓所理解的科学，主要就包括控制论。

1978 年 4 月，《哲学研究》发文《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介绍了 1977 年 12 月到 1978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的主要内容，谈到“关于控制论”的新课题，这是“文革”后重要哲学期刊上第一次重现“控制论”。^[28]而在规划会议和文章发表期间的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经提到了“控制论”：“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29]p94}这个讲话邓小平没有亲自写初稿，但他审阅后修订、认可、确定并郑重宣读。讲话对控制论和科学技术的定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这样一个实效的目的，这是对科学的一种简单的、工具理性式的理解，是目的理性中工具理性的主要方面。科学哲学界的想法当然要比这个表述复杂得多，如《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还谈到了用之于管理、人工智能思维模拟等，但首先还是要强调运用系统工程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邓小平的讲话和自然辩证法的规划，宣告控制论复活。1979 年魏宏森撰写、钱学森审阅的《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成为新出

版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的其中一章，为控制论的新一轮复兴热潮奠定了基础。从图 1 来看，这股热潮的高峰在 1980 年到 1982 年，余波绵延至 1990 年前后。¹³控制论在 1980 年代初的热潮很快就因为钱提出（大）系统科学观而扩展为更加广泛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再加之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更多接近之处，“老三论”的热潮使得“系统”、“整体”成为普及度更高的词汇。但这与“控制”和“调节”并不矛盾——因为系统所涉及的更多只是观念层面，一谈到具体的实践，就要谈到机制和方法；而在科学成为正当性依据的时候，一谈到方法，自然就会以科学方法为正当乃至正确；借着自动化和钱学森的光环，控制论无疑代表着最新、最先进的科学方法。一般系统论和系统哲学的兴起，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延续了控制论研究的热潮。

这股热潮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仅仅局限于讲话所圈定的“生产”领域，1980 年 3 月金峰、樊雷¹⁴等《控制论与制度改革》，标题已表明是冲着为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而来。该文首先明确制度不仅要有阶级性，还要有科学性；制度结构的科学性，就要看它有意识的自动调节能力；这种制度能力的获得，还需要在科学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不断地探索实践；探索的目的，就是要基于控制论的试错性动态反馈调节机制建立调节制度的制度，也就是否定革命委员会集鉴别、调节、执行为一身的机制，成立三个互不干扰的独立机构，实现“目标-鉴别-调节-执行-目标-.....”的，有科学、民主和法制作保障的良性循环。^{[30]pp5-11}这样，科学已经摆脱了阶级立场和阶级道德之类的束缚，明确成为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但如果把这里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的二分看成科学理性与终极价值的二分，那就有拿西方现代化经验来硬套中国的实践之嫌，易形成误读。

4 理性与信仰二分，有苗头但相当微弱

《控制论与制度改革》实质上回避了对阶级性的探讨，从而也就回避了科学与阶级论背后的道德意识和权力意志的可能冲突。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下，科学与阶级被不加辨析地“统一”在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如该文为了论证制度调节何以具有科学性，最终还要到马恩全集第32卷第542页去找依据。^[31]1983年出版的《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也存在类似现象：“如果从主客体之间反馈耦合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提出的认识模式，可以发现，‘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循环正好相当于控制论的负反馈调节原理。”^{[32]p179}把黑箱控制论的试探性搜索与毛的实践论的完全等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完全等同。科学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但不能据此认为科学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已经成为道德和信仰的基础，不能说就是科学主义——因为最终的裁决还取决于权力，权力如果裁决说某某理论或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那它就不仅不正当，甚至本身是科学的东西也不科学了。如果一定要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贴上科学主义标签的话，那也应该看到此时的科学并没有完全明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并不是最终的正当性依据。

二十多年后刘青峰为再版《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作序，拒绝给新启蒙运动戴上“科学主义”的帽子。她坚持那是一个以认知为终极价值，并希望把认知指向科学自身实现超越后，人获得理性和尊严从而真正成为人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还没有被专业取代，呼唤着大无畏怀疑的科学精神的时代。^{[33]再版序言}的确，“借助于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一些方法，从宏观上认识科学史”，从而使“人类不仅应该用科学光芒照亮自己，还应用它来照亮社会，照亮科学本身，照亮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及那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科学和文化背景之间内在的联系”的宣言，^{[33]导言}更接近现代性、科学理性和程序理性中具有根本性的自反精神。刘大椿1985年出版《科学活动论》，^[34]顶住科学及真理具有绝

对性倾向的科学知识体系说，力图客观地说明科学只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一，无疑在支持和深化实践论内涵的同时对物质一元论和预设真理论形成了冲击。

本文认为，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刘青峰强调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非科学主义而是科学精神，作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哲学领军人物之一的刘大椿也同样强调不能把科学当作绝对的排他性价值，这不仅仅是对当年科学哲学主导“文化热”的一种解释或辩护，也不仅仅是为了指出科学（理性）本身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当时的科学理性具有独立的终极价值地位，尤其是独立于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终极价值地位，这是科学能够质疑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但最重要的是，1980年代的科学理性虽然接近于古希腊的认知意志从而成为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但它并不像1990年代那样完全排斥其他的道德追求——比如革命道德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初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并非权宜之计的套话，邓小平的这个表述也的确表达并鼓舞着中国人对革命理想的美好愿望；在毛泽东思想未被1990年代的“躲避崇高”和“告别革命”解体之前，作为伦理价值的革命依然具有与科学同等的地位，只是革命已经由1977年前的激情暴力转义为了类似于萨义德（E.Said）所说的“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而且还不与科学相冲突。

科学与革命，在意象均很模糊的情形下，就这样彼此独立却又相互促进地共同推动了1980年代的思想和社会发展。今天的学人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话，往往容易产生迷惑：科学主义往往会产生程式化的种种僵化形式，乃至极权主义的冷酷强制，但为什么19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热，却带着一种狂飙突进的激进色彩，甚至显得朝气蓬勃、气象万千呢？答曰：这是因为，虽然不少学者至今仍然把1980年代看作科学主义，¹⁵但即或承认1980年代是中国第二次科学主义兴起的原因，也要认识到1980年代

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并不具有绝对神圣的排他地位，其内在的开拓创新精神与另一种终极价值——革命精神，在当时是相得益彰的。虽然可以拿德国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来参照性考察1980年代的中国，但狂飙突进运动领袖赫尔德（J.G.V. Herder）的“天才不须规律”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却绝对不能说是领导性思想，人们在科学的名义下积极地探索自然科学规律、社会科学规律。与学术思想界相互动，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肯定、吸收和宣传着这一精神，即实事求是地探索的精神、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在执政党和学界尚处于新的蜜月期的时候，这几个精神的可能冲突被暂时忽略了，它们显得十分地和谐统一，甚至可以说，1980年代的中国臆想出了一种新的伦理追求——科学革命精神。这种科学革命精神，既无暴力革命之反程序的暴戾气息，也少科学主义的程式强制；既类似于西方的理性与信仰二分，但更模糊地蕴含着道德一统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政府、执政党和普通百姓的制度设计、执政行为和日常行为。

5 “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是类似于控制论的“干中学”

以科学地实践为基本精神，以试错性探索为基本方针，1987年10月，执政党在十三大上第一次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可以从马列经典著作中找到一些依据，所以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十二大和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已经简单提及。胡耀邦在1986年10月筹备会议上提出要把十三大报告写成一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思想理论界的成果，站得更高地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找到正当性根据，但又不至于陷入到1977年前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中。其基本目的就是“以后再也不要吵着急忙搞共产主义了”（郑必坚语）。1987年3月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

坚持上述思路并明确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说明“在新的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理论探索的必要性。”^{[35]pp301-317}显然，初级阶段论和“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策略的哲学基础一样，就是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的调节控制论。而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对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个逐步积累渐进过程的定性，^[36]则是这一程序理性的自然展开。

为什么要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赵紫阳在大会报告中说是要为方针、路线和政策明确“根本依据”，并且指出了六条方针和基本路线。方针和路线背后的方法论是什么？邓小平对十三大的定性说得很白很透：第一，“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6]p259}就是要为“摸着石头过河”提供正当性依据，肯定十年来以渐进主义的方式改正激进革命理论的做法，肯定从反省“左”的教训中找到的试错性调节方法。第二，要求和相信新班子把改革政策“连续贯彻下去”，其实质是坚持试探性摸索前进的哲学，坚持已经初步觉醒的程序理性。

“干中学”也曾经是文革中出现过的一个词汇，最有名的表述是号召年轻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37]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用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语境下，就多了一种探索的科学精神——因为“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干中学”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经表达出了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普遍心理趋势，但实质上以科学革命道德为正当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依然是思维的主导。当其时，西蒙（H.A.Simon，一译司马贺）不仅已经多次造访中国并大范围讲学，而且已经在数年前就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同行们合作，多次进行结合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和“例中学”（Learning from examples）的“示例学习”（Learning from examples and by doing）研究。^{[38]pp42-49, 167-169}

西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只是一个开始，¹⁶以初级阶段论的第一次阐述为标志，倒可以对执政哲学做一个阶段性小结：拨乱

反正之后，经过数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执政党已经去意识形态化地彻底放弃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企图，形成了含有科学精神的社会渐进发展哲学。这套发展哲学实用主义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的需求为目的，常识理性地以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为手段，程序倾向地以规范性的法律制度为保障，具有一定的程序理性。但由于实践年数尚短，渐进改革中具体的程序化办法积累得还很不够，程序理性还极不成熟；再加之对目的-手段之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很容易导致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但无论如何，以科学实践为正当性依据，已经迈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的第一步，略显粗糙的试错性探索前进的执政哲学开始萌芽。

简单反思一下这株嫩芽，当然有一些疑问：1) 这套哲学从根本讲，不就是辩证法已经讲得很清楚的质变量变规律吗？扯上控制论，是不是科学主义作祟？毛泽东用实践论谈得很清楚的问题，还有必要用常识理性、程序理性来解释吗？2) “摸着石头过河”就一定合理吗？“跑着过河”、“跳着过河”为什么就不行？

历史无法假设。空泛地讨论激进与渐进，也的确分不清孰优孰劣，甚至搞不清什么是渐进，什么是激进。大跃进和大民主的实践，把飞跃（跃进）和质变划等号，实际上是把结果与过程相混同。而理性地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质变的结果是可以通过飞跃和渐进两种方式（过程）实现的。飞跃和渐进的区别，不在速度的快慢而在中间过渡状态是否稳定。^{[39]pp129-157} 早点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善的愿望；踏着彩虹桥过河，也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理想。这些愿望和理想，就是中国所希望达成的善和美的质变。这些愿望和过程没有实现的原因，要么是忽视或轻视了过程，要么是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总而言之是理想主义在中国的现实中碰了壁。浪漫主义如果缺乏经验主义的支撑的话，其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激进不是字意上的速度问题，而是说明旧的理论体系对过程的研究及其哲学思考相对阙如，而控制论正好可以弥补这一薄弱环节。陈云要求慢，邓小平要求胆子大一点，这些都不是根本分歧，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步子要稳”更重要——都强调过渡的过程要稳定，强调扎扎实实地落实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虽然说（结构和过程）的稳定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明晰无歧义的概念，但渐进的精髓，也正在这个“稳定”，在于对目的和过程都没有确切的信息可以分析把握的时候，通过试探性地摸索调节自身，以保全自身为发展的基本前提，一步一步地、有程序地稳步前进，而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慢。¹⁷虽然 19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颇有些狂飙突进的味道，但执政党却一直重视“稳”。如果认定了程序性发展的正当性，那么就会很自然地反对任何激进主义，而不管你是激进革命，还是激进自由主义。

中国有着浓重的程式化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程式理性，但由于受制于权力和道德而并不独立。在摸索“初级阶段论”的头七、八年实践中，凭借控制论带来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常识理性得以苏醒。虽然“四个坚持”使得这种理性没有完全获得独立地位，但它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在科学理性独立于宗教理性的启示下，毕竟与程式理性有所不同了。这种新的常识理性，就是蕴含试错探索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程序理性之萌芽。

III 从市场体制改革到经济理性地纲领化和自为地程序化

改革中的中国这艘巨轮，在 1970 年代末调整航向后，虽然不乏精神污染、人道异化和自由主义等争执，但矛盾没有扩大，十几年的航程基本上可以用有声有色来形容。

1 从“动乱”的“六四”到“告别革命(意识形态)”的南巡讲话

1989年受“国内国际气候影响”发生的“动乱”被镇压，新启蒙旗手被舵手撵下船去，自由主义一时间噤若寒蝉，执政者完成了对激进右翼的歼灭。但激进左翼要把航向拉回到改革前的言行，却也只是昙花一现地喧嚣了一两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把这一只激进力量也弹压了下去。“六四”的结果之一，居然是两个激进在意识形态上被明确抛弃，并最终在稳定的基础上确立了秩序的正当性价值，¹⁸把稳定的秩序和政策的连续性当作了社会行动（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这是与执政党思维接近的新权威主义转型为新保守主义的重要哲学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认为苏东剧变是一个失败并且以之反衬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性和正确性的重要论据。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苏东剧变其实有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若以自由和民主为高于暂时混乱的价值，那么苏东剧变就不仅不是一个悲剧反而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通过大乱形成了新的民主政府，毛晚年未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达成的夙愿，在苏东不是获得成功了吗？苏东政治体制巨变如何评价暂且搁置，但巨变的确按照激进的方式达成了巨变者的愿望，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就不应否定革命思维下的激进主义从而简单化地认为渐进优于激进。这既不是以理服人，也不符合历史给人类的教益，不是真正的辩证法。激进与渐进，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适应性地权变。比如分析苏东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原因，公认的看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步伐不是太激进，而是太保守：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总处于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状态，经济萎靡不振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执政党受到攻击被迫下台时，民众居然相当沉默和无动于衷，就因为执政党已经丧失了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邓小平显然也赞同这一看法中的合理因素：“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苏联解体一个月后，

他就开始南巡并发表讲话，全面阐述其关于改革和发展的执政理念。

1992年春的讲话有三个要点：1)继续“大胆地试”，也就是坚持1978年以来解放思想下的试错调节方针：“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而且还可以“慢关”，“可以留一点尾巴”。熟悉中国政治话语方式的人，不难理解其中对“错误”的容忍程度是何其高矣。大胆当然代表了激进，但在邓这里它与控制论的试错性前进并不矛盾：“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是这种高速度的循序渐进。

2)高速、大胆和激进，不能和“左”划等号。因为“左”在中国除了有冒进的内涵，还是一项大帽子——它“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但“‘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为了防止改革开放这个好东西被搞掉，中国“主要是要防止‘左’。”^{[40]pp370-375}这一席话基本上给“左”判了死刑，并已经隐晦地把道德从正当性依据中清除了出去，这可以说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左”的革命色彩，显然指的是那些自诩为革命的道德和理想，也就是李泽厚批评的那种泛道德主义——与邓小平几乎同时，李泽厚在大洋彼岸的丹佛发表了“告别革命”的宣言。^{[41]pp148-162}联想到王蒙经常称赞1990年开始走红的王朔的“躲避崇高”，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颇能说明那几代人对所谓革命道德的态度。去意识形态之后的道德真空，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程序理性的特点非常重要。

3)不争论，也就是不争论姓社和姓资、计划和市场，这是执政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表达去意识形态化的理念，影响深远。向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存在悖论，向左的道德意识形态随着理想的幻灭而幻灭。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不争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又蕴含着乐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最简单、最质朴的生活哲学。“少谈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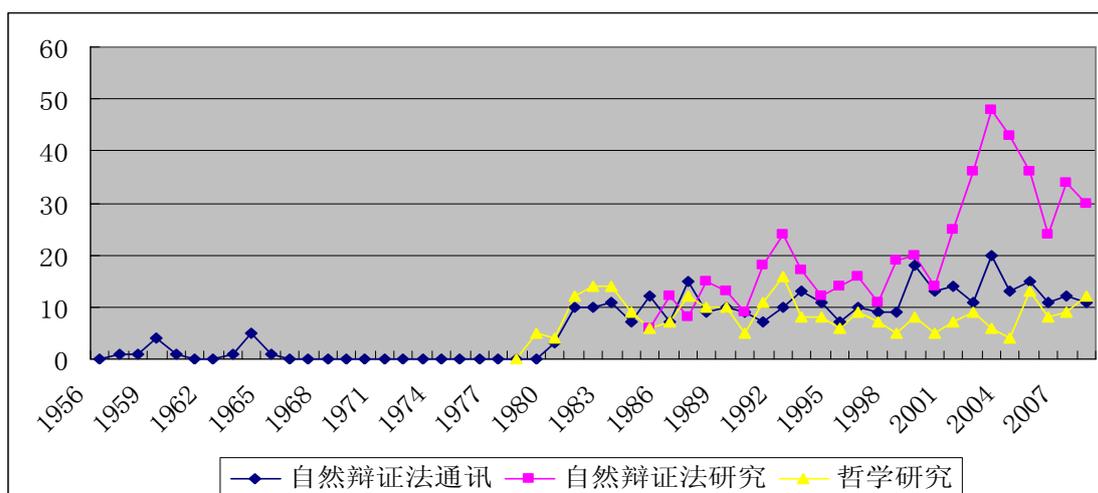


图2 科学哲学类核心期刊中“波普”全文检索年篇数

多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不要相信什么预设的真理，而要多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通过摸索消除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从而一步一步地前进。邓小平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写文章系统论述这些问题，但学者们却发现这种行为背后确有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就是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批判的波普尔的“渐进社会工程”，即进行局部的、不断尝试和不断改错修正的社会改革。

2 渐进主义吃饭哲学对休克疗法自由主义的经济胜利

改革的目标就是创建合理的制度和程序：“即使它们做错了，损失也不会很大，而且要再调整也不难。相反，整体性的改革看来目标宏伟，坚定不移，实际上却常常导致粗陋，混乱和倒退。”^[42]显然，渐进社会工程的哲学基础，就是波普尔本人以猜想与反驳不断证伪的科学演进模式表述的基本哲学观点：批判理性主义，它也是一种程序理性。

同“控制论”一样，波普尔及批判理性主义早在195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也同在1980年代初期形成热潮。^{[43]p388}不同的是其魅力更为持久，并且基本上没有陡升陡降大的断裂性起伏。理性的探究和融入是一个要更花费时间的锤炼过程，何况这还

是一种批判理性。从图2的数据，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显示的折线图来看，它在1992年左右和2002年前后又先后掀起两次高潮。2002年的高潮除了与中国模式的探讨有关，再就是纪念波普尔诞辰100周年。而1992年前后的这次高潮，则明显与“休克疗法”有关。

如果坚持彻底的批判理性主义，那么开放社会的敌人就不只是倾向暴力的极权主义，而是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存在悖论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其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俄罗斯在1991年到1992年全面铺开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该疗法在1980年代中期治理玻利维亚经济危机中发挥了神奇功效，但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却水土不服。同时，东欧国家的类似“革命”也宣告失败。虽然从逻辑上讲，“休克疗法”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这种方法的彻底错误——1996年还有人撰文暗示1992年底的失败是暂时的，“休克疗法”为东欧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44]pp37-41}但本文认为这毕竟更接近于一种“历史在较近的短时间内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书生气。从俄罗斯一直到2000年还深陷经济泥潭，其后虽靠着石油出口有所好转，但在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油价大跌后又陷入困境来看，“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的中长期发展也无益。

“休克疗法”在1992年底基本告败，俄罗

斯在 1994 年 2 月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叶利钦 1996 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都更加坚定了国家对渐进改革执政哲学的信心，并于 1997 年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45]报告通过总结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通过重复邓 1987 年“在干中学”的那一席话，否定了左派在会前提交的“万言书”，肯定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中国模式及其背后的方法论。如果说，1987 年只是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样的状况，1997 年则还指出要在这些细分的 8 个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按照一些纲领性的规定逐步实现 8 个较为明确的细分目标。这就不仅把目的，也把过程进行了初步区分，并且规定了在这些过程中进行的摸索要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即纲领。所谓纲领，就是原则性的方法，方略性的程序。这样，程序理性不仅表现为渐进性和试错性，还要求这种试探性搜索从杂乱无章的状况上升到有一定的秩序性，予以纲领化。纲领化是为了避免无目的地“盲人骑瞎马”，避免无序地“夜半临深池”，拒绝无原则地“脚踩西瓜皮”而使摸索更有效率（工具合理性）和效果（选择合理性），使行为合韦伯和哈贝马斯（J.Habermas，一译哈伯马斯）所说的目的理性，^[46]合施路赫特所说的科学-技术理性。^[4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之所以具有这种程序理性，与 1990 年代复杂的科学主义有着深刻的思想联系。

3 “躲避崇高”的无信仰科学主义与以科学本身为信仰的科学主义

1990 年代的科学主义，不同于目的理性与价值关怀的二分，它具有两种类型：一是以科学本身为信仰的科学主义，一是摒弃任何信仰——包括科学的科学主义。两种类型的科学主义，都不相信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

由于受霍克海默（M.Horkheimer）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忽视目的理性中的选择合理性而仅注意到了其中的效率合理性，并以西方工具理性的扩张来比附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批评这种偏重经济的改革导致道德和人文沦丧。这有一定道理，但在精妙处显出了纰漏。西方即使在工具理性最嚣张的时候，也还是有某种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性的。韦伯现代性不仅指出了目的理性的扩张，更根本的是通过目的理性的界定使“终极关怀与理性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理性独立于信仰，这样即使信仰破灭也不会干扰理性，“理性也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48]p7}前已述，1977-1989 年的中国，科学虽然已经成为正当性依据，1987 年甚至还出版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总体而言科学理性与共产主义（道德）是含含糊糊地捆绑在一起的，有二分的苗头但并未明确二分；有去意识形态的倾向但尚未摆脱完全道德意识形态。

1989 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三个“有利于”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而且还是一切工作是否正当的标准。三个有利于中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最后一项生活水平虽然涉及到人，不能说没有人性关怀，但的确相当模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下难免只有“物质”不见“文化”，这是许多人把邓小平理论定性为实用主义的主要原因。科学虽然依旧是正当性依据，但 1980 年代的科学精神却在 1990 年代经济理性的强势冲击下开始变异。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生产力，落实到生产效率，这就容易导致经济学帝国主义下的科技工具论。像泰罗虽然有分享公正的人文精神但程序化的科学管理却成为“血汗工厂”的效率工具一样，^[49]知识分子虽然在争论人文精神，但在漠视终极关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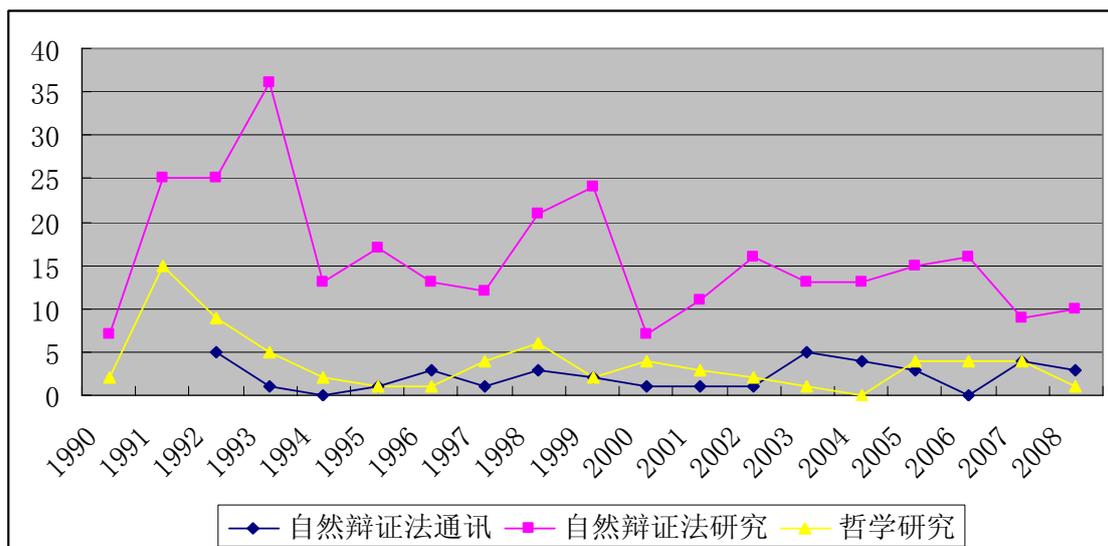


图3 科学哲学类核心期刊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文检索年篇数

实用主义下的科学技术却成为提升效率的第一生产力，确切地讲这不是工具理性而的的确确就是科学主义，是取消一切信仰的科学主义。

邓小平 1975 年复出时提“科学技术是直接生产力”受到批判；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终于确立了科学的“正当性”地位并靠着科学打破意识形态的缺口，打开封闭的国门对外开放。^{[50]pp388-405} 1988 年 9 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 年南方讲话再次提到这一论断，只是更加强化了把科学当作天然正确的、当作社会行动天然的正当性依据的常识理性、实用理性，而并没有跳出把科学技术当作工具的思路，所以称其为工具理性也有一定道理。但西方即使在工具理性泛滥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个与理性无涉的上帝的存在，有一个与理性互相独立的终极关怀存在。在邓小平的解释里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社会上以躲避崇高为荣，2001 年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反证出整个 1990 年代道德高地基本失守。

在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早期论述（1992 年前后的高潮期，见图 3）也还很少涉及这方面内容。这些文

章大多关注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是什么，创造何种机制以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高科技与经济的互动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51]pp57-62} 而没有像世纪之交那样多元，既有从社会变革的实践回应现代科技革命的宏观角度、^{[52]pp64-97} 也有不少文章从批评科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命题。

知识分子并不都是甘于沉沦的，1990 年代中期，如果说还有科学主义的话，那么无信仰的科学主义与以科学为道德和信仰最终正当性根据的科学主义是并存的。邓小平南方讲话所云“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53]p382}，大致可以列入后一种科学主义。而且，后者所说的科学还不是预设绝对真理的科学，而是承认科学规律为相对真理的科学，即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渐进社会工程的纲领化，程序理性的初步成长，就发生在批判理性主义的背景下，这也是波普尔在中国持续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很难说是波普尔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选择了波普尔，最好把两者理解为一种思想的互动。

比如，顾准 1970 年代中期写作的《科学与民主》，曾经发表在 1980 年代中期的《读

书》杂志上，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顾准坚持的彻底经验主义，本来是 1980 年代的话题，但 1990 年代中期才有顾准的再发现并兴起“顾准热”，的确大有意味。《顾准文集》不仅表达了科学比民主之类的终极目的更为基本的思想，而且敢于站在经验主义的和多元主义的立场上质疑乃至批评教条化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至善”这种终极目的。^{[54]pp346、374-375} 对错暂且不论，这至少表明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已经将科学超越于某种制度和道德意识形态，而把科学本身当作了唯一的终极价值。

当然，和刘青峰、刘大椿一样，顾准不仅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论证方法、批判对象上完全一致，也还把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贯彻到底，贯彻到科学自身，并不认为科学绝对正确无误，^{[55]pp374-375} 更无畏地体现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只有融入了这种科学精神之后，才具有了理性和系统的哲学基础，才有可能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针上升到程序理性的哲学高度，而不仅仅是与“休克疗法”做一个简单的效果比较。一拖十年，原拟紧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终于在 1999 年得以面世。这意味着，对波普尔证伪主义和渐进社会工程的借鉴性接受已经不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开放到了包括执政党的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理想主义所构建的“文化大革命”道德乌托邦直到这一刻才彻底坍塌。由此不难看出 20 世纪末中国的科学哲学和执政哲学基本完成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程序理性转向的结论。换言之，以科学为正当性依据，已经初露出了以程序理性为合理性标准的端倪。但此时，科学的意象依然是模糊的，程序理性的意蕴是相当含糊的，有可能被滥用或误用。

4 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化兴起和程序理性的实用化自为

从西方现代性的演变来看，科学主义的程序理性一旦确立，就会倾向于操作主义地由自在走向自为，走向形式主义的程式强制。^[56]这也是韦伯合理化理论最主要的命题——“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57]或曰“理性化过程在政治及其他人类组织中的表现”的“官僚化”^[58]的具体展开。表面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诱发文化层面的经济理性推动制度层面的程序理性的政治民主进程，与之类似。比如，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的同时，十五大报告还宣示了一个重要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句话首先出现于 1996 年《“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发展目标纲要》；1997 年重现；199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封不动地照抄。^{[59]p342} 法学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目的是以制度建设推进生产力发展，保障和固化改革成果。^{[60]p397} 市场经济催生经济理性，而人和组织的经济理性觉醒后必然会要求其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这就是契约和法律的诉求。用“依法治国”将具有准程序理性的“初级阶段论”予以纲领化、¹⁹制度化的历史，大致体现了这一逻辑。

但把历史的视野稍微放大一下，就会发现对上述逻辑也不能僵化地片面理解。且不论 1950 年代就开始的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道路探索，单说 1980 年代，程序化制度改革在思想理论、经济和政治三个领域，虽然不那么广泛和扎眼，却已经在实实在在地互动进行了。^[61]上文谈到的控制论与制度的关系，就是一个证明。图 4 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年著作（含文章）数，也颇能反映“权利结构的理性化与文化的理性化”^[62]（科学哲学渐渐从中心到边缘，但科学意象通过经济学和法学帝国主义依然体现在文化中）的互动。而“初级阶段论”提出后 1988 年的小高潮和随后的低谷，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后著作数马上跃升超过 1988 年的水平，并在其后一直持续走高，极其生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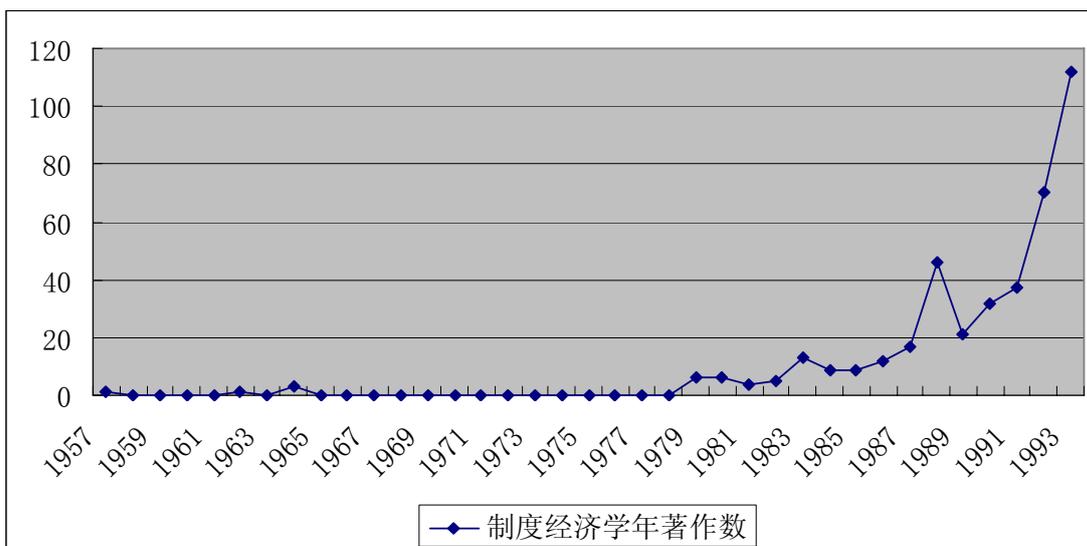


图4 人文社科学献中“制度经济学”全文检索年著作数²⁰ (1957-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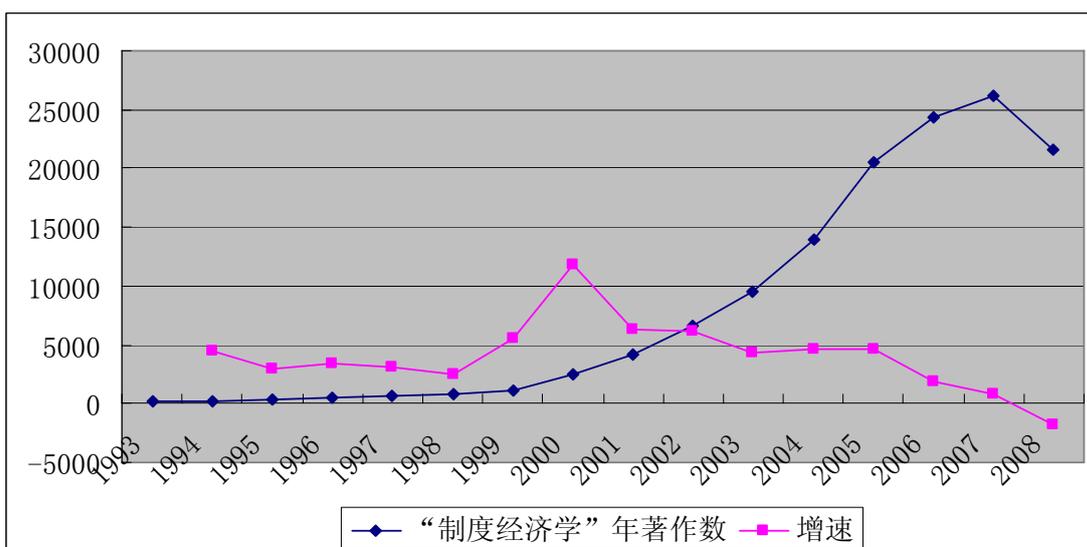


图5 人文社科学献中“制度经济学”全文检索年著作数 (1993-2008年)²¹

反映了政治气候和政治权力的变换对关于制度的学术研究的影响。

学术界的这股热潮，反过来也反映了民众乃至执政者的关注热点。制度者，以程序理性为根基也；而辅以经济，虽不能绝对化地做物质化、庸俗化理解，却也表明了实用主义的过分猖獗和道德理想的过分阙如。2002年，被外界称为技术官僚的当政者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宣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

程序化。”^[64]西方社会用至少40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程序化科学管理的科层官僚制度，^[65]这么快就被中国接受了吗？这里的制度和程序，如果仅仅是基于对科学的常识性理解而做出的实用主义解读，那就必然与西方原汁原味的科学管理和程序化管理存在差异。

科学管理之所以能被德鲁克(P.F.Drucker, 一译杜拉克)誉为能与马克思主义比肩的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两大思潮之一、并被贯彻到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管理

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程序性这些深植于西方文化中的哲学思想。

^[66]这些都不是具有自身独特文化传统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可以拿过来就用的。对于系统、科学和程序，中国人自有自己的传统资源和现代理解方式，它们未必都与西方的程序化管理精神相同。程序化地“依法治国”，一个“治”字表露出“三个代表”的先进性政治精英对权力理解的底色，相对于西方个人主义要求通过程序达成契约，这里的程序更多地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权力用来治理国家的工具，更偏重于实质理性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程序本身的民主价值，程序正义中的程序民主，在依然以实质性内容为正当性判据的中国，除了以季卫东为代表的部分（新）程序主义知识分子以外，还处于普遍受忽视的状态。

只是被贯注了科学性而缺乏民主性，这样的程序理性当然是很不完整的；而被贯注的科学性是一种杂糅了去意识形态无信仰和以意向模糊的科学本身为信仰的含混的科学主义之后，这样的程序理性就更加显出了不完成的弊端。这种程序化的自为，较之西方操作主义下的程序强制，具有了更复杂、更含混的反道德、反理想色彩。缺乏伦理价值的程序化，或许能兴盛于一时，但必然是不得人心的，也就必然不可能长久。不过，中国的程序化进程既然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启动，程序理性既然已经进入到自为的阶段，它就会作为一种强劲的实力不可遏止地发展下去。从西方的教训来看，工具理性的盛行一度导致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程序以秩序的名义压制个人的自由，束缚人的自由发展，甚至使人异化。中国的程序化发展，能够成功地规避这些现代性困境吗？执政者又是采取何种方法进行规避的呢？这种规避的方法有效吗，它带来了哪些积极或者消极的效应？这些效应对程序理性乃至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IV 程序化行为在科学发展观下的多元化解读与程序理性的复杂性前景

1990年代，在民众对各种意识形态强制感到厌烦的时候，“去政治化”（借用汪晖语）“不争论”顺乎民意。但21世纪初以来，社会出现了道德真空并导致民怨声起，被指责为技术官僚或者没有理想和理论的实用主义，这是任何执政党都不能漠然置之的。如果说还要坚持“不争论”和“韬光养晦”的小平遗训的话，那也至少要表明自己的主张和哲学。以上就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以意象模糊的科学为信仰，已经被证明是靠不住的；科学发展观，带来了哪些新东西能够让人觉得可靠可信，从而纠科学主义之偏，将程序理性和中国社会引领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去呢？目前看来，局面相当混乱，前景还相当的不明朗，甚至有复古为道统一体化结构的可能。以下试述之。

1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以科学为正当性依据

科学发展，从字面上讲，是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从内容上讲，发展、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兼顾等，^[67]也是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早就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其中统筹兼顾甚至还是1957年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有的提法。^[68]批评者说它了无新意，党内理论家辩护说是一脉相承。这样说来，科学发展观本身倒是的确体现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持续性发展的反激进精神。新意当然不限于此，尤其关键的是加上了一个“观”字，那就要强调其理论基础、哲学属性了。因为这里的观，不仅仅定位于普通人的普通的观念，它明确宣称自己是具有相当程度普遍性的自然观、历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系统的哲学观。

“第一要义”的发展，本质上是有质量、有内容地行动和前进。所以在本文看来，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搜索前进、到反一蹴而就激进观

的“初级阶段论”、到初级阶段的行动纲领、到民主政治的程序化展开这样一个程序理性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寻找最终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确立执政哲学基础。而在发展之前冠以“科学”二字，则表明这个最终依据，就是 1977 年以来就已经成为正当性依据的科学。只是以前尚处于隐而不宣的状态，这一次明确予以正名，使得科学能够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并列，并且还有可能以最新的、与时俱进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义对上述理论有所超越，不能说没有勇气和意义。2009 年 5 月，“六四”二十年之后的又一个春夏之交，执政党郑重其事而又大张旗鼓地推出《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在论证第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时，邓小平 1992 年所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被再次引以为论据。^{[69]p3}

但作为合理性标准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科学哲学界内部也争论不休并且迄今尚无确切答案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对此并未作正面回答，这也就为容易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人们对科学和程序的解读提供了多元化可能空间。冷溶和李君如等一直认为，科技革命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文认为，科技革命的基本工具和基础平台，就是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程序所形成的巨复杂的程序化网络体系。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化，信息化的根本是程序化。知识管理无论翻出多少花样，最根本的精神还是秉承与泰罗科学管理的程序理性。比如，2008 年开始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分析认为是原有信用体系的崩溃，本文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制度落后于技术，尤其是没有以权变的程序化因应日益程序化的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变异影响。这提示我们要对程序化作出紧跟时代的思考，做出新的解读，尤其是思考如何

使人为地程序化能够更好地为人的生活方式提供新的选择。如同科学一样，程序化也是一柄双刃剑，程序理性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这是新世纪的中国科学哲学和执政哲学都还没有研究透彻但的确紧迫的新课题。

在科学重新开始成为正当性依据不久的 1980 年代中期，刘大椿在《科学活动论》中论述过科学的两面性，当时应者寥寥。1990 年代，随着《中国 21 世纪议程》以可持续发展复兴自然哲学并发展出一门蔚为壮观的生态哲学，人们对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也回到恩格斯对自然的胜利和自然教训我们的思路，并在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的讨论中使认识在保留分歧的状况下渐趋客观和多元。但科技双刃剑如何运作，科技在何种情况下有益，何种情形下有害，却没有得到细致深入的研究。

由于传统程式观的束缚，更重要的是受科学主义导致的极权主义强制之苦的记忆还十分清晰，国人的程序理性来自对科学的常识化、实用化解读，这就难免存在中国特色的偏见：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大多没有认识到程序具有适应性权变的弹性，而把它与僵化的程式混同，把程序看作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随着“摸着石头过河”到程序化执政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经济上的成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程序的合理性，并首先认识到科学性的程序行为能够带来效率。程序化的公正和公开价值，近年来也渐渐为部分人所接受。总体上看，对于科学哲学和执政哲学来说，对程序化价值的全面认识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渐进过程，且尚未完成。

2 程序化的科学与民主内涵及其“中国特色”的多元解读

2002 年执政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民主政治时，同时还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必须靠机制中的程序来落实，这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程序

理性的科学与民主内涵，认识到了程序化的科学与民主价值。2004年执政党专门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在重提“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重提“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新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70]。涂明君一度乐观地按照《程序化的哲学阐释》的逻辑，把这个新论断想当然地归结到了程序化执政的落脚点；并且根据江西铜业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党建工作、湖南省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案例，得出政府过程理论和程序主义已经与中国程序化建设相结合，^[71]用机制创新来解决“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72]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形势下“改革攻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73]系统完成体制建设和制度改革。倘若果真如此，那程序理性就基本健全、执政哲学就基本成熟了。

可是，稍微放眼扫描一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就会发现与现代程序有太多的抵牾。局部的程序化实践是有的，但总体而言却未必尽然；从有科学性和民主性推出具有程序理性也是基本无误的，但如果这个前提出了问题呢？换言之，如果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是含糊的或者有歧义的，那么这个程序理性还可能是清晰和确切的吗？逻辑上讲不大可能。实际的问题是，这里（执政哲学）理解的科学，未必是科学哲学理解的科学；执政哲学理解的民主，未必是政治哲学理解的民主；而且，无论中外，科学和民主是现代和近代以来相互有着内在关联的两大精神，科学哲学颇关注民主问题，政法哲学也对科学不无见解，它们之间也不无分歧。

制度经济学研究延续着2002年的热潮，2006年开始放缓增速，2007年进一步减缓，2008年则出现负增长。其中可能有2008年数据不全的原因，但2006年以来热度渐减却的确是一个趋势。其中可能有任何学术热点研究本身不可能永远不退热的原因，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以人为本”成为正当

之后兴起对“制度拜物教”的批判更相关联。总体而言，政法学界中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关注并肯定程序的正面价值，但新程序主义的声音有多高，法学界批评程序主义的声音就有多高，而批评者却很少意识到批评对象所说的程序并不是自己定义的那个程序。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受到类似的意识形态影响。比如，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法学帝国主义的批判，近年来势头渐猛。其中表现尤为突出者，是利用现代互联网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强大力量重新崛起的新左派，它们融合了西方20世纪后期极为强势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确很有学术功力，不像老左派对渐进改革和程序发展的批评那样空洞乏力，而是的确切中了要害。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科学意象和程序理性的多元化解读。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兴起，就是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观。霍克海默正是从对制度钳制人的角度展开了对工具理性的猛烈批判的；马尔库塞（H.Marcuse）则直接把技术对人的异化描述为单向度的人。福柯（M.Foucault）以知识考古批判规训的理性，德里达（J.Derrida）则完全地“去逻格斯中心主义”彻底地反理性。《程序化的哲学阐释》描述了西方程序理性在科学主义下经由操作主义-行为科学-管理学-政治学实现对社会程式化强制的路径，从而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合理性。但该文认为德里达等固然切中肯綮，但自身却并没有完全摆脱知识和理性的境域，甚至还要利用科学和程序的方法来进行论证，说到底还是没有跳出从康德（I.Kant）《纯粹理性批判》意识到的理性的局限到布里奇曼（P.W.Bridgman，一译布雷治曼、布里齐曼等）《事物即方法》（The Way Things Are）所说的“咬尾之猫”的思维闭环。^[74]

就像康德和布里奇曼不曾动摇对理性和科学的信仰一样，《程序化的哲学阐释》受哈贝马斯的启发——虽然批判目的理性导致的

制度化扭曲了交往沟通,但最后还是“重振理性雄风”以程序性的互动协商改善生活方式,结合复杂性研究和知识管理研究成果,提出对程序化可以有一种在容纳对程式化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超越程式化的协同互动的解读。但这个协同超越的新程序化动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该文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图景,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原则,并表达了应该自觉其局限地肯定程序、理性、科学和知识的正面价值的立场。^[75]刘大椿 1987-1995 年间提出《互补方法论》,指出程式化的努力和以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为代表的反规则的“怎么都行”应互补地运用;^[76]2008 年进一步提出正统(标准)科学论与另类(后现代)科学论的多元化共存。^[77]这一扩展科学论的尝试当然会影响到对科学意象和科学总画卷的描述,但具体会产生何种影响?落埃未定;这种科学意象的变迁又会对执政哲学产生何种影响?前景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科学与人文、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将会得到越来越多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以科学为正当性依据的中国,更是如此。

和科学一样,民主也是 1977 年来制度的正当性依据,甚至历史更为悠久,超过八十年。^[78]虽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只是对广大人民而言的一种要付出痛苦代价的、有条件的制度,^[79]它依赖于一定的程序并且这种程序还有可能被独裁者所利用;民主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但如果把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那就会受到批判——不能草率地把这种批判扣上“左派”的帽子,因为就连波普尔也早就论证过“民主悖论”;再加上民主前面还可以加上一些定语,诸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之类,这就使得民主的正当性大打折扣,远没有科学那样理直气壮。

正当性强度接近科学的,是人民民主;在科学发展观下,人民民主的后设层面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合理性标准——以人为本。就其目的而言,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没

有什么不同,但科学发展观之所以这么讲,是想体现出自己是有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是有文化和哲学底蕴的。执政党在异化人性的物欲追求和效率理性受到广泛批评的时候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就是表明了一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这也就要求社会从金钱拜物教的单纯物欲中解放出来,要重建公平的道德观和回归人之为人的人文精神。而人要想有尊严的存在,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权力诉求,这也就是民主。所以,以人为本的提出把民主问题分解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权利权力和人文精神。有意思的是,在谈到民主和人文的时候,不仅顾准,几乎所有的中国学者总是把它与科学相关联,要么对立化,要么统一化,总之是又回到了科学的问题上来。这或许也是执政党用“科学发展”来概括其执政理念的一个原因吧。

3 科学的人文精神能作为新时代的新道德吗?

19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最为激烈的思想交锋,除了激进与保守,就是“人文精神”,但在 1993-1995 年间“未能深入”。90 年代后期,与上述两大交锋均有纠葛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大型论争,再次触及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公共性与公共关怀。^[80]1999 年,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在批判反科学和非理性人本主义之片面性的基础上,论证了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的人文意义和科学的文化价值,提出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自由的人文精神。^[81]在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提出这一观点,既为科学正名,也以科学精神填补了道德真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2000 年,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系统讨论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82]要解决的就是科技革命导致人的交往实践复杂化,进而导致道德问题复杂化之后如何建构以及建构什么样的新的道德规范的问题。对于世纪之交开始网络化和全球化的

世界和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其实，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的时候就指出，1990 年代初必须注重效率，但到世纪末的时候就一定要突出解决公平问题。^[83]这让人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深谋远虑乃至和远见卓识。当然，邓预见的只是关于效率理性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必须解决公平的伦理问题，这只是刘大椿所关注的科技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科技革命带来的新道德问题，显然比这要繁杂得多。所以，2001 年 1 月，在“依法治国”形成共识、制度经济学迅速升温的时节，江泽民提出同时还要“以德治国”，^{[84]p200}虽然暂时在党内外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许多干部搞不清到底是法大还是德大，但在执政哲学上却是抓住了时代脉动的主旋律。在目的理性发展到过分实用主义的制度理性的阶段，在经济理性下的效率诉求达到高峰导致缺信无德的时候，不提道德建设显然极其不利于社会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没有道德正当性的政权历来得不到百姓的支持，西方如此，中国尤甚。但中国又没有西方那种理性和道德二分的传统，这样把法治和德治互相独立地分列，显然也不符合中国人对政权和道德的习惯性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充分清晰地阐释，在观念上的冲突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会造成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的剧烈冲突。

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与社会制度合一的”“一体化结构”^{[87]p20}，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后设层面的科学标准的合理性，把经济和法制的科学性和伦理道德的科学性统一起来。2001 年底，吴国盛发表《科学与人文》，在廓清两者的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主张弘扬独立、怀疑、批判、无畏、献身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并且指出这些科学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精神，是人文精神。^[85]显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吴和孟建伟一样，都把二分的科学理性和科学道德统一为一种科学精神，从科学哲学的细致研究中为执政党建立科学道德

观及这种道德下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哲学基础。2006 年，胡锦涛提出作为科学发展观中核心价值观的八荣八耻，第三条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86]

虽然胡锦涛并没有明确说这里的科学是科学精神，但它明确地把科学作为道德价值追求，不仅为科学发展观画出了点睛之笔，使科学从科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工具手段性解读明确提升为一种价值和精神，而且还为程序化的科学行动提供了一种道义正当性论证，这对于执政哲学来说完全足够了；更何况，它还完全契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当然，“八荣八耻”的潜在问题是价值太多，八个核心，的确与社会思潮多元性相当合拍。但科学只能保证它与“八荣”中的人民和诚实是大体和谐的，万一当科学与“八荣”中的辛勤、团结和艰苦之类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科学决策就影响到组织团结、要破坏“和为贵”的理念的时候，又叫人何去何从呢？程序理性与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其他价值呢？最后也只能由权力裁决了。

4 程序理性在道德和权力统治下的不乐观前景

以人为本带来的权力问题，主要是人民权利与执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呢？科学发展观除了树立科学的伦理价值，还有一个基本内涵是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换言之，科学既是伦理道德，也是工具方法。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科学发展观除了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其他地方用到“科学方法”一词时，均为泛称，含义相当宽泛和模糊。唯一的例外，就是胡锦涛在科学院谈到复杂的关系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解决。^[88]系统科学在 1980 年代是在中国大热的显学，当下则被称为复杂性研究，其研究兴趣也从当年控制论的自动调节转变成对外的自适应和对内的自组织机制。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政治转型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系统的自组织。^[89]这一说法

比较贴切。如果把以人为本的民主理解为“还权于民”的话，那就要给百姓以自主的治理权力，相信他们能够通过程序性协商自组织地管理自己。这样，虽然自组织也会带来组织权力的问题，但程序具有优先于权力的地位。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就试图完成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的转变，体现自组织的哲学，把“依法治国”理解为“以法治国”，让自发的、自组织的程序去治理国家。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不断壮大程序理性的自组织能力，丰富和完善“自下而上”的程序机制，应该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这种理想化的方式，在中国实际运行的难度很大，作为一种执政哲学，双向自组织的程序理性能否被广泛接受，或至少起到纠偏减弊的作用，前景相当不乐观。

执政党在当下的现实选择，还是坚持“依法治国”的思路，把以人为本理解为单向地、“自上而下”地精英执政为人民。让“先进的”精英服务于一般的民众，首先要破除心理上的优等生情结，这并非没有可能，但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要诉诸于道德，要让政治精英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的意愿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历史证明这样要求是必要的，但极不充分。第二是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成长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具有与政治精英同等地位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精英，只有这样一支能够与政治精英相均衡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公共的权力不受权力的侵害，用程序化来分解或制衡权力。这在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但看看国学、阴谋学和帝王学等势利文化、权谋文化在当下中国的盛行，就能感受到权力及其谋略对当下中国的控制有多么深厚。道德意识的模糊和混乱，给集中化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口实和机会，程序理性存在回归到僵化的官僚主义程式的极大可能性；政治权力太过强大，导致经济基础被政治上层建筑统治过深，导致权力经济压制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生长，使本文对程序化的科学管理、对程序协商分权的前景也不得不充满疑虑，如果乐观也是谨

慎的。

比如，或许是有感于以科学为道德的单薄无力，或许真正地想把宪法和法律程序真正地作为一个独立于实质理性的价值，2007年12月，胡锦涛提出了“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但现实却表明这种一锅粥似的混乱表述，只会带来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上更大的混乱。最近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逯军事件”。据报道，2009年6月，他对记者说了一句颇能反映时代特征的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相继予以批判；最高人民法院召集11位“知名法学家”论证“三个至上”“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结合、社会主义法律与中国共产党政策相融合的当代法政治学、法社会学形态”。主流媒体的批判旗帜鲜明，它们直接代表了当政者的态度。但以“三个至上”的统一来平息民情和舆情，在政治运作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逻辑上和现实生活中却是荒谬的——许多干部私下坦承：逯军说的是实话。“三个至上”的最终结果，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个“至上”成为压倒一切的，唯一的“至上”，不可能统一。本文认为，“党的事业至上”这种存在多元标准的实质理性，如果不做严格的界定就只会被“党的”各级权力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有利于自身的多种解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最终的结果，肯定也不是什么“党的事业至上”，而是“权力”至上；“逯军现象”，表达了当下中国的思维混乱导致了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乱相。

尽管问题不少，但中国式的程序化改革毕竟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并业已迈进科学和民主的殿堂。虽然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与西方存在或小或大的差异，但正如《制度经济学》所言：“一个社会究竟赋予其制度什么样的内容只能由该社会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决定，它只能通过渐进的、演化性的试错过程来发现。中国以及亚洲的

其他国家现已置身于这样一种过程之中。”^[92]中国的程序理性，在常识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和直接作用下，已经由一开始懵懵懂懂的试错性渐进探索，发展到中间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制度和规范化的程序理性；由于1990年代的去意识形态化的程序理性有导致道德失范之虞，21世纪的程序理性又试图把道德请回来。

把道德重新请回来，那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道德和程序理性各自独立地二分，二是道德重新成为主导一切的正当性基础。为了保证程序的独立地位并接受中国社会需要道德理想的传统和现实，新程序主义旗手季卫东提出了程序与契约的循环论证说，即“契约的非契约论基础是程序，程序的非程序性基础是契约”^[93]，试图通过把道德理解为一种心理契约以与程序相对立地统一。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治国，就是建立在这一程序理性的哲学基础上的。但且不论它在西方是否能够成为现实，考虑到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基础的不同，就会对其中国前景产生更多的疑虑，以科学的名义复古到道德意识形态统治的第二种方向，目前看来似乎更占上风。

但上文已经反复论证，道统思维最终导致的是道德真空或道德虚化、道德泛化、道德模糊化。道德理想的混乱和虚妄，给了集中的政治权力将程序拉回到工具性僵化程式以机会。僵化的权力机制必然催生腐败这颗毒瘤，毒瘤越涨越大又使国人呼唤重建道德。这样，中国就会陷入权力与道德的恶性循环之中。如何破解呢？程序理性当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困难和阻力相当巨大。如何克服？需要相当雄伟的理论魄力和相当高超的实践技巧，殊为不易。如何融贯中西地处理与道德和权力的关系，是中国未来程序化建设的关键，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人类文明发展有可能做出贡献的地方，这也才是“中国模式”所应探讨的核心问题。处理得好，或许就是一种新的智慧、新的现代化模式、新

的更“科学”和更人性的程序理性。

¹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博士后、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生

² 邹东涛同萧功秦类似，很早就关注中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道路”并进行理论总结，如1999年的《文化冲突、文化整合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6期）等。最近的系统思考见之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2006年前后在洛杉矶“旅美中国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第11届年会”、“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博鳌论坛”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政府转轨国际论坛”等会议上的讲演）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路线图与大智慧》（《江西社会科学》，2008.10）等。

³ 这里的变数，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甚至本文的发表和传播范围的大小都可能对程序理性在中国的未来进程产生或有或无、或零或大的影响。

⁴ 价值理性是韦伯在定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时的发明。他在构造出 *wertrational* 这个词汇的同时，也指出价值理性始终是非理性的。施路赫特用形而上-伦理理性表达类似含义。

⁵ 事实上，冲决一切网罗的革命精神在中国永远都不会只是一个过渡。作为弥补和制衡程序理性局限性的一个对立面，革命激情永远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随着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顾准、陈敏之、王元化语）的交相起伏而此起彼伏罢了，不能绝对地说孰有益孰无益、孰正当孰不正当。

⁶ 《管子·形势篇》。

⁷ 应该指出的是，不惟1970年代，中国数千年来来的政治哲学其实都是这种道德统治论，很少例外时期。

⁸ 《管子·形势篇》。

⁹ 现代程序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后者经过奥卡姆剃刀等掀起的唯名论革命之后，自然法则一分为二为实验科学中的科学规律和现代法律中的自然权利，（M.A.Gillepie, *The Theological of Modernity, Critical Review, Vol.13, No.1-2*）下一步才有了科学程序与政法程序的分野。涂明君在《程序化的哲学阐释》中把它们归结统一为程序理性。

¹⁰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把最后一句话“这话没有错”表述为“我没有放弃”。

¹¹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下

同。

- ¹² 事实上, 钱学森本人虽不是最高层领导, 但是中共九大、十大主席团成员, 十大中央候补委员, 第四届人大主席团成员, 是仅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级干部。钱的这个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
- ¹³ 图 1 表明, 控制论研究大致上有三个高峰期, 1964-1965 年, 1981-1982 年, 2003-2004 年。第三个高峰期显然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关, 但具体读文章就会发现很多是回顾性的。
- ¹⁴ 金观涛和刘青峰阅读本文初稿后以电子邮件回答了作者的猜测, 指出金峰确为金观涛和刘青峰, 樊雷为樊洪业和雷祯孝。
- ¹⁵ 如作者根据本文初稿在 2009 年 4 月“首届全国中青年科学技术哲学论坛”(江苏·南京) 作报告时, 肖显静和吴国盛曾就此与笔者商榷。尊重这些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同时, 笔者依然坚持自己正文中的观点, 并且感谢这些质疑促使本人修改稿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 ¹⁶ 随着 1990 年代后经济学、管理学热潮的兴起, 西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决策过程及其机制的管理行为研究——有限理性下的满意决策理论, 在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激起了长期而巨大的回响, 对中国的管理实务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 西蒙的影响其实还不仅于此, 他所提出的程序理性 (procedural rationality), 有着西蒙本人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重要性, 值得深入研究。详见涂明君:《程序化的哲学阐释》。
- ¹⁷ 查阅《辞源》和《汉语大词典》, 就会发现缓慢至多只是“渐”的引申义, 逐渐发展、次序进行、从头开始才是“渐”的本意。
- ¹⁸ 事实上, 1980 年代初作为思想意识形态主导的“五讲四美”中, 就包括“讲秩序”。但 1980 年代对秩序的理解, 显然还很表浅, 甚至仅仅停留在“排队论”的层面。当然, 不能说今天中国人的秩序意识一定比 1980 年代强——就拿简单的排队来说也远远不如近邻日本的自觉化程度高, 但对秩序的理解的确丰富了许多。
- ¹⁹ 在英语中, 纲领化 (programming) 和程序化 (proceduralization) 是一个近义词。programming 既可以翻译为纲领化, 也可以翻译为程式化或者程序化。
- ²⁰ 资料来源: 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检索范围为“学术总库”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下同。
- ²¹ 检索时间为 2009 年 8 月 31 日, 2008 年数据

或恐不全。

参考文献:

- [1]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 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 [2] 林岗:《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 实质、意义和前景》,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1).
- [3] (美) 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 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4] 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5] [89] 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 超越“华盛顿共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6] 吴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载《理论动态》, 1977 年 7 月第一期 (创刊号).
- [7] 张志明:《走出迷谷: 1967-1979 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
- [8] 戴煌:《胡耀邦与 55 万“右派”的改正》,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秘》,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1998.
- [9] 于光远:《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1978 年 12 月 22 日.
- [1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 年 6 月 27 日.
- [12]《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 1970 年 3 月 15 日. 中发 (1970) 17 号. 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数据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6.
- [13]《陈云文选》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4] [21]《陈云年谱》下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15] (美) R·麦克法夸尔、(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 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6] (美) R·麦克法夸尔、(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 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7]涂明君：《革命中国兴起过程中的程式化与反程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第五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2009。
- [18]《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9] [20] [24] [25] [36] [40] [53] [8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美）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23] [2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 [56] [75]涂明君：《程序化的哲学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
- [27]《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28]李惠国：《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上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哲学研究》，1978年4月。
- [30] [31]金峰、樊雷：《控制论与制度改革》，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3期。
- [32] [39]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33]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34] [76]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35]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 [36]《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
- [37]《人民日报》编辑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7日社论。
- [38]朱新明、李亦菲：《架设人与计算机的桥梁：西蒙的认知与管理心理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41]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42]（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43] [50]刘大椿：《科学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4]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前苏总国家转轨进程再评述》，载《东方》，1996年(1)。
- [45]《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 [46] [5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47] [58]（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8]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2008，未刊行。
- [49]涂明君、艾志强、刘柏志：《科学管理公正观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启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4)。
- [51]吴向红、刘大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研究状况综述》，载《教学与研究》，1992(2)。
- [52]刘大椿：《从中心到边缘：科学、哲学、人文之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54] [55]《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59] [60]刘海年、李林：《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61] [71]涂明君、李佩琼：《改革开放30年的程序化建设历程》，载《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8(6)。
- [62]（德）普塞：《哈柏玛斯》，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9。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 [6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 [64] [6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 [65]涂明君、岳玲、戚璇：《科学管理源流考》，载《科学管理研究》，2008(2)。
- [66]涂明君、戚璇、岳玲：《科学管理的管理哲学思想》，载《科学管理研究》，2009(2)。
- [67] [86] [88]《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 [68]《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 [69]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
- [70]《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4-09-27。
- [72]《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
- [7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74] Bridgman, P.W. *The Way Things A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77] 刘大椿：《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关于当代科学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8]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为人民民主奋斗八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79] 闫健：《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0]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81] 孟建伟：《论科学的人文价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1999。

[82] 刘大椿：《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4]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5]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87]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90] 新华网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孙承斌、李薇薇）：《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光明日报》，2007-12-26；中央电视台，12月25日《新闻联播》等。

[91] 《郑州经适房土地建别墅 记者采访被质问替谁说话》，<http://www.cnr.cn/>。

[92]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3]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43(1), 2006年1月。

[94] (美)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译自英文1978年版。

[95]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当代藏汉的佛教交流：色达的民族志对话

李晋¹

I 导论

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在市场改革后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复兴，这一复兴遍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等各个领域。1995年，欧大年（Overmyer）等学者在《亚洲研究》杂志上梳理了当时出版的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其内容分为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大众宗教这五个类别，尽管这期集刊并不包括基督教和少数民族宗教在内²，不过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季刊》专号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方面的阙如得到了很好的弥补³。

这两期集刊基本可以反映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宗教研究的主流动向。尽管在很多场合下，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宗教”时，它首先是在指从传统中延续下来的汉人社会的民间信仰或大众宗教（这一点在人类学中尤为明显）⁴，但是从这两期集刊所涉及的主题来看，这一概念已经扩展到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制度性宗教在内的中国范围内的所有宗教。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宗教在这一研究视域下是缺席的，这或许是由于在更大的中国研究的范围内，少数民族研究本身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⁵。

本文即试图通过关注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来弥补这一不足。我们知道与其它少数民族宗教相比，藏传佛教的地位更加特殊，比如在为《中国季刊》专号撰写的导论中，欧大年就曾明确指出他之所以没有在集刊中

收录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论文，乃是出于对西藏与中国之特殊关系的考虑（Overmyer, 2003: 315）；而在国际学术界中，藏学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并置地位更是在学科区隔上影响了中国研究者对藏传佛教的关注。正是这样，尽管在2003年的专号和其它作品中，已经有学者指出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特别是中国城市间的迅速传播是目前宗教研究中的一个亟需注意的新现象（Birnbbaum, 2003; Kapstein, 2004）⁶，但是直到今天，不管是在中国研究还是藏学研究的领域内这一问题均未得到充分的讨论⁷。

本文即试图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透视这一宗教领域的新趋势。市场改革后，基于宗教政策的放宽和剩余经济的释放，藏区的寺庙同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⁸，它们在90年代初开始向汉地扩展其势力，这一东进运动以四川境内的康巴藏区为中心，后者不但在历史上就是汉藏互动的主要通道，而且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里的寺庙一直以所谓的“无宗派运动（Rimed movement）”的主张为传统⁹——这使得它们更容易接受汉族的信徒。此外，与西藏本土相比，国家对康巴藏区的管制远不如想象中的严格¹⁰，政策的宽松为寺院和僧侣的传法活动提供了可运作的空间。上述因素叠加起来，最终导致康巴藏区成为了这一藏传佛教东进运动的主要承载者。

据笔者所知，在这一过程中最早接触汉族信徒，并且最有计划地发展与汉地之间的联系寺庙，是坐落于青海、四川交界处的

五明佛学院。这座佛学院在创立之初不过是色达县境内的一座不足百人的讲经场，但是在随后的 20 年里，它却迅速成长为全藏区宁玛派的中心¹¹。它的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果仅比较市场改革后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座能与其相提并论。而且五明佛学院远离拉萨、西宁、兰州这样的大城市，它所在的色达县在过去一直是游牧区，现在也依然位列甘孜藏区最贫困的县份。正是这样，这一在宗教地理上的从边缘向中心的迅速蜕变，便成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本文的写作即围绕色达的地方史展开。我将证明在佛学院崛起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对汉地资源的吸纳；如果不是从 90 年代起就积极迎合汉族信徒的需要，佛学院很可能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不过在笔者进行研究之前，这里已经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诸多西方媒体的报道¹²；美国学者大卫·杰马诺还专门以佛学院为研究对象写就了一篇精彩的论文（Germano, 1998）。但是，当笔者把自己的研究与其进行比较时，我惊奇地发现在对同一个田野点进行考察时，我和杰马诺竟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正是这种对比构成了本文的核心议题：通过五明佛学院所反映出的藏传佛教东进运动及其造成的汉藏结盟，我将把焦点导向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藏传佛教”这一话题。在我看来，色达的案例足以给我们以启示，为我们打破“西藏问题”的迷思，融合中国研究与藏学研究的既有论题提供新的启示。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杰马诺的研究及其背后的学术谱系。

II 杰马诺笔下的佛学院：藏学研究的谱系

随着传统藏学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现代转向，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成为了藏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一现实的政治关系甚至成为了决定后者话语脉络的母体语境。1951 年 5 月，当时的拉萨地方政府与社会主义中国之间达成协议，达赖方面承认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中央政府则承诺在过渡期间不会在西藏境内发动任

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 1955 年，随着毛泽东做出建设“社会主义高潮”的指示后¹³，四川政府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合作化改造，这一举措很快导致了康巴藏区的叛乱，并最终引发达赖喇嘛在 1959 年的出走，此后，中国开始在西藏全境落实其社会主义政策¹⁴。

与中国内地的其它宗教一样，藏传佛教在随后的 20 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不但其境内的寺庙组织和僧团群体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少佛教传承也就此散落中断。反观达赖喇嘛方面。从 1959 年起，每年都有大批僧侣追随他的足迹流亡到了印度，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僧团领袖和佛教师，流亡政府也因此能够在海外重建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寺庙，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西藏以外的藏传佛教的新社区。

正是这一对比强化了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主流印象——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西藏在很多时候是以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他者形象出现的——它不但充满了无以伦比的宗教灵性和密传氛围，而且被视为冒险家的乐园和遥远的香格里拉¹⁵。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西方在看待“西藏”这一地理概念时一直存在着两个定型化的误区：一是认为 1951 年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纯粹的宗教王国；二是相信这个宗教王国已经在中国的统治下毁于一旦，今天的西藏是政治性的，其境内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压制与反抗（Adams, 1996）。正是这样，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会采用一种将“中国”与“西藏”对立起来的二分逻辑，并由此展开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这一点最为明显的体现在对流亡藏人的关注之中。

这些流亡藏人基本是在 1959 年后才从西藏迁往印度的，因此从很多方面上讲，他们都是事实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对立者。而且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方的研究者一直未被允许进入西藏进行调查¹⁶，他们只能通过流亡藏区的片断化的观察来透视西藏本土的各个领域，因而也就很自然地陷入了

上面所提及的二分逻辑¹⁷。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把如今散落在印度、东南亚及欧美各地的藏族聚落及其信徒视为藏传佛教的挣扎与抵抗（或者是一种重生）；并在宗教地理上用达兰萨拉取代了拉萨的象征地位，如果要概括的话，流亡的政治学与乡愁，或许是这类研究的最好注脚。

这一对流亡藏区的过分关注削弱了西藏本土的声音，它产生了一个很吊诡的影响，似乎“真正的西藏”在西藏之外。但是自 80 年代后半期起，随着在拉萨爆发的几次颇具影响力的抗议事件，以及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开启的接触和对话，西藏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真切存在，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在此时被允许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这就使新的研究开始采用一种更为关注西藏内部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市场改革的转向后，西藏社会确实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复兴，不但传统的宗教实践像 1959 年之前那样重新回到了藏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僧团和寺院的蓬勃发展。因此当如何穿透流亡藏人与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对立并从两者的幕布下发现西藏自己的声音成为 90 年代以降学者们最为关切的话题时，这一倾向很好地体现在了对藏传佛教复兴的研究之中。

杰马诺的研究可以说是这一新出现的范式转换的典型例证：他将佛学院的崛起视为藏传佛教复兴运动在地方社会的具体表征，并且相信这一地方史的事件可以用来透视西藏自身在市场改革后所发出的声音。杰马诺认为，法王和他的佛学院塑造出一种牢固的西藏认同：这里不但吸引了来自全藏区的不同派别的僧侣，实现了藏传佛教内部的无宗派式的大同；而且通过以宁玛派为主的教义宣说和仪式技术，法王重新确立起那些在文革中业已失散了的藏传佛教传承谱系，他还通过一系列布道和朝圣活动发现并联结起一些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湮灭的修行场所和宗教遗迹，这就使藏传佛教体系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得到了双重的修复。如果我们将整个西藏视为一个宗教或地理概念上的躯体

（body）——套用杰马诺的术语——佛学院所做出的努力即在于使市场改革后的藏区社会“重新拾得（在社会主义破坏中）被肢解了的躯体（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body）”，藏传佛教的复苏就这样经由佛学院的运作在碎片化中得到重建，而与此同时，杰马诺也通过这一具体的微观研究实现了对西藏主体性的发现。

此类关注藏传佛教复兴的作品实际上是西藏研究与中国研究所关心的不同主题彼此融合后的结果，具体来说，是“中国—西藏”这组对立与“国家—社会”这组对立相互交叉后的结果。我们知道在 90 年代，中国研究内部掀起了一场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那时的很多研究都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因此当藏学研究者的目光投向市场改革后的西藏社会和藏传佛教的复兴这一话题时，他们很自然地从中国研究领域借鉴并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家权力的收缩和社会资源的释放促成了藏传佛教在市场改革后的复苏。但是，与其它宗教相比，杰马诺等西方学者在解释藏传佛教的复兴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悖论：他们在讨论复兴的原因和机制时，往往将这场复兴作为整个中国之宗教复兴的一部分来理解，但是在讨论其意义和效果时，却又视其为西藏之离心倾向的一种证明——因为藏传佛教的复兴是在国家权力收缩后才发生的，而且僧侣阶层普遍被认为是西藏独立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¹⁸。这一看似矛盾的解释模式实际上根植于上面提到的两组对立，在融合中国研究与西藏研究各自的话语范式时，“中国—西藏”之对立与“国家—社会”之对立被简单地重合起来，在这种重合下，“中国”被完全地等同于“国家”，与“西藏”所象征的“社会”对立，这种“化约—对立”逻辑正是杰马诺式的研究的不足所在。

这一化约对立逻辑很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具体经验的判断，这在色达的案例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根据笔者的调查，佛学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汉地资源的吸纳，但是尽管杰马诺自己也提到了汉族人的在场（Germano, 1998: 118），他却并没有

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从而使汉族(中国)与藏传佛教复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无意间被遮蔽了。杰马诺仅仅将五明佛学院向汉地的拓展视为布道者的恩惠与施与,这在西方藏学研究中是很常见的观点¹⁹,它能够突出西藏的主体地位。但是佛学院的历史表明,是法王一方主动运用策略发展同汉地的联系,而且随着汉族资源与藏传佛教的结合在康巴地区变得日益普遍,佛学院开始面临着来自其它寺庙的竞争和挑战,这一宗教市场的形成使得布道者与信徒之间充满了复杂的权力互动,没有哪一方能够在这种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笔者并不打算在本文中涵盖所有的讨论,我只是希望把视线牢牢限定在同杰马诺的直接对话,因为这将有助于突出一种关于藏区宗教复兴的新的理解。我想强调的是在市场改革之后,改革释放出的空间和资源促成了一种新的汉藏结盟的形成,这一结盟不仅在经验层面具有意义,它同样可以为我们融合中国研究与西藏研究的既有范式提供新的视角。过去的学者在合并“中国—西藏”与“国家—社会”这两组对立时,存在着一种将“中国”化约为“国家”,并藉此与“西藏(或社会)”对立的弱点²⁰,但是市场改革使中国和西藏均发生了分化,即便藏传佛教仍然处于国家的对立面,他们同样可以积极发展与中国自由资源之间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获得对抗国家的资本。因此,佛学院的存在构成了双重的隐喻:一方面,它的确如杰马诺所言,证明了西藏自身在市场改革后所萌发出的主体性;但是在另一方面,它所实现的汉藏结盟也构成了对杰马诺论点的挑战,即藏区的僧侣阶层虽然仍然对抗着国家,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却使他们在另一个角度上愈发卷入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III 佛学院历史的两种文本

四川省色达县位于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由于地处偏远,这里在1950年代之前长期保持着部落自治状态(SPXZ,第41卷;SDXZ,1997:38;XKTJ,1939)。在传统的藏区部落社会,部落由血缘地缘原则共同

组成,每个部落都有其对应的寺庙。部落头人与寺庙精英之间互为支持,构成了地方的上层精英。如果审视周边藏区的宗教地理,我们会发现这一地区游离于几个主要的藏传佛教中心:甘肃的拉卜楞寺、青海的塔尔寺、以及川藏交界处的德格和白玉县。根据当地的档案记载,色达境内的寺庙大多属于附近各县之主要寺庙的属寺,可谓藏区佛教地理之边缘。这种地理的边缘性也有助于今天的僧侣规避官方的干预。

与中国内地和藏区其它地方类似,色达县自西康解放起经历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²¹,传统的部落制度和寺院统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解体,这段历史在杰马诺的作品中是缺席的,不过在过去的一篇论文中,我曾对此有过大致的介绍(李晋,2006)。在国家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官方曾经积极吸收包括宗教与部落首领在内的地方精英,但是随着过渡政策在1955年底被建设社会主义高潮运动所取代,配合着整个康巴藏区的叛乱风潮,原有的色达头人和寺庙组织在1956-1959年间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叛乱。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地方精英在这场叛乱中的策略是成功的,他们调动起了色达境内的相当比例的人力和资源²²,但是当国家政权决心通过暴力来维护其成果时,地方的抵抗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上,在评估市场改革后的西藏之主体性时,杰马诺等西方学者很可能过高地估计了改革所释放出的藏地资源,尽管缺乏足够的调查或数据,但是从直观上讲,叛乱及其失败的结果表明仅凭色达本地的资源是很难和国家抗衡的,或许也正是如此,佛学院在创立之初就尽可能地扩大其布道范围,并以此来吸纳色达以外的资源。

实际上,类似的作法在色达县所处的康巴藏区早已有之。在社会主义中国到来之前,为了对抗以拉萨为中心的格鲁派势力的不断集权,康巴藏区在过去二百年间一直存在着“无宗派运动”(Ris med)的传统(Samuel,1993:256-263)。这里的僧侣不像西藏那样强调严格的僧院体系,也时常淡化教派间的界限,这种松散的组织方式显然有利于布道

的扩大，它是地方社会针对周边权力中心的一种应对措施，只是在过去这项措施指向拉萨政府，而在今天则针对中国的国家权力本身。在杰马诺的研究中，他发现法王也在积极推广这种无宗派运动的理念。佛学院并不要求前来求法的信徒必须正式加入学院，只要能够遵守戒律、精进闻修，他们可以自由地往来或离开，因为法王相信目前整个藏区最为急迫的任务是恢复在文革中被毁坏的寺院教育和修行技术，而这需要超越宗派的通盘合作。在90年代初时，佛学院里的僧侣几乎囊括了藏区的所有教派²³，杰玛诺相信这种去宗派化是西藏主体性形成的标志之一，而本文的对话就将从这里展开。

本文所涉及的材料取自于笔者在2004年和2005年的调查。需要指出的是，杰玛诺的田野是在90年代初完成的，虽然那时佛学院已经在积极发展同汉地的联系，但是这一趋势远没有今天这样明显，因此汉藏关系的确立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想通过不同时期的调查所得来突出自己与杰玛诺之间在理念上的差异。我们在文章中都用到了佛学院出版的印刷品，他所收集到的藏语材料有些是我在调查中同样遇到的，目前已经有了汉语的翻译版本，但是对于那些他没有提及的汉语印刷的素材，我不清楚它们是否存在着对应的藏语版本²⁴。杰玛诺的文章涉及诸多话题，我将在本文中选取几个最为关键的节点展开对话，这些节点基本可以概括其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核心主题。

1 无宗派运动与列饶朗巴

藏传佛教非常强调上师(guru)的地位，因此比起汉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佛教传承体系在藏传佛教系统中要占据更为根本的位置²⁵。尽管欧阳端(Raoul Birnbaum)认为目前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所导致的汉地佛教导师的匮乏造成的(2003: 445)，但是实际上藏传佛教的传承系统同样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在复兴藏传佛教的过程中，法王非常强调重建被

中断了的传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也经由这种重建来获得自身的宗教资本与合法性。他有时将自己的前世描绘为藏区历史上各主要教派的教主或高僧，有时又通过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来获得自身之布道原则的合法性。在佛教轮回时间的包裹下，各种神秘的预言、神话或是高僧传记与现实世界之间发生象征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所有现实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在宗教文本中找到它所成立的依据和理由；另一方面，佛学院又能够通过对其文本的巧妙诠释而将某种修辞变为真正的现实²⁶。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法王的传承谱系中会存在着如此多的教派间的杂合，因为它被理解成前世存在的关于无宗派运动的预言。杰玛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他仅仅提到了法王与格萨尔王之间的联系(1998: 58-60)。法王宣称自己在文革中经常依靠观想格萨尔王来获得后者的庇护，并以此来规避干部的迫害，他还声称自己传授的金刚歌是在梦中与格萨尔王见面时得到授记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格萨尔王是藏族的传奇英雄，作为神话符号的格萨尔王象征着整个西藏的民族认同和对共同体的想象，它可以是藏族民族主义的原初表征(protonationalism)²⁷——因此是超越宗派的——而杰玛诺也确实是在这一向度上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的。此外，杰玛诺还提到法王的另一个前世是列饶朗巴(Lerab Lingpa)，并指出这位19世纪的色达伏藏师曾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导师²⁸，这样，我们看到在杰玛诺叙述的背后，他所塑造出的是一种作为坚强实体的西藏认同(自然是与中国对立的)，以及一种将本土西藏抬高至与流亡藏人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隐晦叙事。

杰玛诺的意旨最为明确地体现在以下这段概括中(1998: 60)：

类似这样(即格萨尔王)的观想——通常与前世记忆相联结，与西藏过去的文化英雄相遭遇，揭示了潜在的(宗教)教义、艺术品和歌曲，并且往往紧密地与西藏境内的圣地和历史相联系——在使法王被尊为伟

大的灵性导师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法王的名声牢牢地根植于现今依然活跃的藏族传统之母体，而这些观想也成为了他很多行动的基础所在。

但是，佛学院的汉语材料表明法王实际上拥有更为复杂的传承网络²⁹，其间涵盖了更多的教派，虽然笔者并不能对所有的线索逐一加以梳理，但是这些材料表明，杰玛诺所强调的列饶朗巴的线索是正确的，因为他被认为是法王最直接的前世。不过，汉语材料体现出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强调在列饶朗巴与汉族信徒之间存在着联系。这样的联系被杰玛诺所忽视——虽然他也对佛学院里的汉族信徒施加过笔墨，但是杰玛诺并没有意识到佛学院的成功是由汉族影响的，也从未试图在两者之间发现真正机制性的联系。从理念上讲，如果佛学院意在通过无宗派运动实现与国家的对抗，那么这一结盟完全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突破藏区的边界而将汉传佛教纳入在内，而在现实过程中，中国社会在市场改革后释放出的空间和资源恰恰提供了这一条件。

以下是汉语版本的法王传记中的列饶朗巴密传，作为法王的前世，他的传记预示了法王在今天的动向，我们可以在引文的最后段落看到列饶朗巴（法王）与汉族信徒的关系：

本来，大师（指列饶朗巴）长达三百六十页的密传中有数多精彩的情节，但在此只撷取几则片断，也许会令您一饱眼福：

一次，大师在青海省境内开取伏藏时，当地的护法神、土地神有些不高兴，降大冰雹，制造违缘，伏藏大师非但未受半点损害，而且为了制裁他们，除了开掘自己所应取的伏藏品外，将土地神所拥有的财产全部没收无余。最后，那些设障的护法神、土地神追悔莫及，无地自容，在大师面前拱手作揖，连连忏悔。

当年，第九次边地魔军蜂拥而至，进入西藏，准备摧毁佛法。军兵无法抵挡来势凶猛的魔军，藏地的高僧们迫切地祈请伏藏大师降伏魔众……大师将附有魔军首领的魂

石拴住，插入金刚槌，顿时那块魂石鲜血横流。当时，魔军已包围布达拉宫，正进入大昭寺的时候，主帅忽然七窍流血，载倒在地，西藏顺利度过了这一场劫难。

又一次，在色达时，净现中出现了一千多位空行母，以优美的金刚舞供养大师，最后依次融入，只剩下十六位。她们有的是康巴装束，有的是安多打扮，还有汉族的服饰。其中两位汉族空行母对大师宣说了未来藏传佛法兴衰的十六种预言。（FWJMPCZ, 2001: 8-10）

这段密传的开始部分仍然隐含着对无宗派运动的暗示。土地神等地方神灵的阻挠象征着佛教内部的派系壁垒，列饶朗巴将其财产没收这一情节，体现出佛学院所希望实现的对其它资源的吸收与整合。根据杰玛诺的研究，五明佛学院的崛起和法王的一些主张在现实中招致了藏区其它宗教势力的敌视与反对³⁰，而且随着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拓展，汉传佛教界很可能做出自我保护式的反应³¹。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土地神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加明显，而且该段落确定无疑地展示出法王较之这些阻碍者的非凡能力。

杰玛诺的论点在接下来的段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通过佛法与魔军的较量，西藏与中国的对立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列饶朗巴是色达本地人，但是在19世纪末时，他被邀请到拉萨出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老师，从他的生平（1856-1926）判断，这里所说的魔军很可能是指清末赵尔丰的部队，后者在1910年从汉地进军攻占了拉萨³²。文中提到的两个地点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表达。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的中心，魔军对它们的包围象征着西藏所面临的危机。联想到1959年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的逃亡，以及80年代末发生在拉萨的政治游行几乎都是围绕大昭寺展开争夺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官方确实派兵占领过大昭寺（Schwartz, 1994），因此这段密传是通过唤起藏民们尚且鲜活的集体记忆来激活文本潜在的神圣性，并暗示当藏传佛教在今世再次被魔军（社会主义中国）压境时³³，在政治

中心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几近陷落时，法王会像列饶朗巴那样承担起拯救宗教的重任。

尽管直到这里该密传都很好地契合了杰玛诺的观察，但是在最后一段，它却显示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列饶朗巴的空行母的装束体现出法王信徒的地理分布范围，身着“康巴装束”、“安多打扮”和“汉族服饰”的空行母分别指代康巴、安多藏区和汉地的信徒³⁴，密传在结尾处强调是两位汉族空行母为列饶朗巴宣说了藏传佛教的兴衰预言。这样的表述传递着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即当列饶朗巴转世成法王时，藏传佛教的覆灭和复兴是由汉族人促成的。如果说促成覆灭的那个“汉族”显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话³⁵，那么它意味着在某个时段，法王将依靠另一批汉族信徒的供养而带领藏传佛教走向复兴。

2 汉人喇嘛与伏藏

杰玛诺没有按照密传的启示来理解汉族人的作用。他主要从藏区内部来寻找无宗派运动的线索，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局限。1986年的法会上，法王说自己感到五台山的文殊菩萨亲自来迎请他，因此从今日起，佛学院要与汉地结缘。他在1987年率队从甘孜出发，一路东行至成都，在朝觐完观音菩萨的道场峨嵋山后，他前往北京拜访了班禅喇嘛，并最终在五台山举行了盛大的传法活动，由此开始，佛学院在汉地声名鹊起。

杰玛诺在文章中分析了这次传法活动。他认为在五台山这样一个曾经在帝国时期融合了汉藏佛教的圣地进行布道和宣传，能够“创造出一种基于共同基础的宗教前景，即汉藏佛教界可以在一个共享的现实和象征空间里对官方意识形态做出抵抗……”（1998：86）。但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是转而强调这次布道是西藏在中国冲击下所做出的主动回应。杰玛诺相信，传法活动可以打破外界所认为的西藏在中国的压力下无所作为的刻板印象；而且由于佛学院一方是文化的输出方，因此这次布道活动同样可以颠覆中国官方将西藏定义为“野

蛮”的话语建构。不过在这样的理解下，我们看到汉族信徒的声音和意义被有意无意地从历史的场景下抹去了，而在杰玛诺结束调查后的十五年里，佛学院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另外一种可能。

从五台山返回后，佛学院开始致力于藏文经典的翻译工作。这时的五明已经招入并培养出几位懂汉语的堪布，他们都是法王的得意弟子，在日后吸收汉地资源的过程中这些人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90年代初，佛学院开办了汉语授课，这使得来到色达的汉族信徒明显增多了，佛学院为此特别修建了一座“汉僧显密经堂”，这也是藏地历史上第一座专供汉人使用的经堂。但是实际上，当时在佛学院的汉僧不过几十名，据说是法王力排众议后，才最终修建了这座可容纳几百人的经堂（NMDHH，1998：38）。

法王是在尽力实现列饶朗巴的预言。实际上，在藏传佛教系统中，预言原本就不是对未来的单纯预测，它同时也是“真实(words of truth)”本身，因为佛教徒们相信那些大成就者可以凭借内在的力量将这些事件变为现实（Thondup，1986：68）。在解释法王的无宗派运动时，杰玛诺特别强调宁玛派的“伏藏（Ter）”技术，因为这是法王实现所有预言的手段和依据，也是贯穿佛学院崛起过程的核心线索。在西藏历史上，当莲花生大师将佛教从印度带到西藏后，于吐蕃王朝末期发生了毁灭性的朗达玛灭佛运动，藏传佛教随着吐蕃王朝的覆灭陷入了黑暗时代（九世纪中期到十世纪末期），而在随后长达四个世纪的复兴过程中，不同派系之间展开了对正统性的争夺。那时，宁玛派赖以斗争的武器便是伏藏技术。他们宣称莲花生大师早已预见到了后来的劫难，因此预先在西藏的地表里埋藏了很多重要的经书、法器，以待浩劫结束后供后人开掘以恢复佛教。这些宝藏就是伏藏，而那些能开启伏藏的高僧被称作“伏藏师（Terton）”³⁶。列饶朗巴在历史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伏藏师，作为他的转世，法王在复兴宗教的过程中自然会借助于这项技术。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就连杰玛诺自

己也是围绕伏藏来编织作品的。因为佛学院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法王不断开启伏藏的过程，而且这项技术能够很好地勾联起杰玛诺所要表达的主题。从空间上讲，当法王从色达周边或是其它地点挖取伏藏时，伴随着他的行动和仪式以及随后引发的朝圣活动，西藏的佛教遗迹得到了重新的串联；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已经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湮没了，这种挖掘既是现实意义上的再次发现，也有助于促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另外从时间上讲，鉴于不少传承脉络已经毁于一旦，因此想要重建藏传佛教的制度性与合法性，就需要一种足以跨越时空的手段。伏藏技术刚好符合了这一要求，社会主义时期的真空不但被看似合理地跨越过去，而且反而颇为吊诡地成为了今日复兴的依据和证明。据此，伏藏技术可以说是重构西藏宗教躯体和凸显西藏主体性的最好线索。

而在作品中，杰玛诺确实围绕伏藏技术书写着色达的历史，他描绘了很多伏藏的开启过程，不过杰玛诺并没有注意到，佛学院最重要的一座伏藏是为汉族信徒准备的。在1994年，法王在青海开启了一座名为“金刚萨埵仪轨”的伏藏，他随后强调这座伏藏对汉族为主的众生大有裨益（FWJMPCZ, 2001: 210）³⁷：

在大圆满《应成续》中，普贤如来悬记：末法时代是金刚萨埵佛尊普渡众生的时代。1994年上师在青海取出的金刚萨埵伏藏仪轨，在最后一行小字中，莲师清楚地注明：此仪轨与汉地众生有特殊因缘，将利益以汉地为主的广大众生。”（JGSDXFRYBZYGGJ, 1999）

正是金刚萨埵仪轨的传播彻底确立了佛学院在汉地的地位，到90年代末时，色达已经培养出很多信徒，仅仅居住在这里的就有近千名汉僧³⁸。此时，法王再次授意现在是“金刚萨埵身像”的救世时期³⁹，他呼吁打造一尊由水晶制造的等身高的金刚萨埵佛像，并修建一座佛殿与之匹配，他指出所有的修建费用应该由汉族承担，因为这样才能报答金刚萨埵对汉地的眷顾。

1997年底，在汉族信徒的捐赠下，金刚萨埵殿落成开光。法王又提出在每年的四月初八举办金刚萨埵法会，这项费用同样由汉人来承担。目前，佛学院每年有四次大型法会，分别是持明法会、金刚萨埵法会、地藏王菩萨心经法会和极乐法会，虽然从名义上讲只有金刚萨埵法会是指明由汉人负责的，但是实际上这些法会都能从汉地获得大量的布施。据佛学院的喇嘛介绍，地藏王菩萨心经法会在汉地很受欢迎，因为汉族信徒们相信地藏王菩萨是主管钱财的⁴⁰；至于极乐法会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主题，这是汉传净土宗的主要法旨，而且法王宣称自己在1989年得到了大昭寺觉沃佛的授记，所有与他结缘的人皆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他们还出版了不少旨在论证净土宗与密宗渊源密切的文章，由此可见，佛学院确实有意识地展开对汉地资源的系统性吸收。

3 汉藏结盟与国家

虽然无法掌握足够的统计，但是佛学院无疑从汉地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比如在1999年的地藏王菩萨心经法会之前，法王号召汉族信徒为一位懂汉语的堪布放生积德，从当时的统计表格看，有记载的24个市共涉及放生款4,230余万⁴¹，足见这一宗教经济背后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在笔者调查的2004年的金刚萨埵法会上，每个参与诵经的藏族喇嘛可以在法会结束后得到100元的布施，以当时估计的4,000名喇嘛计算，仅这一项就需要40万元。

这样的态势引起了官方的担忧。2001年4月18日，国家正式成立了工作组，要求佛学院的僧侣总数不得超过1400名⁴²，所有户籍在色达县以外的僧侣都必须离开这里⁴³。他们希望通过拆除房屋来迫使外地的僧侣返回原籍。不过当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报道此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执行最严厉的就是对汉族信徒的清理——官方的解释是这些人中间混杂着法轮功的信徒。但是，此时的国家权力已经不能完全实现对佛学院的压制，他们在过去曾经依靠垄断和切

断寺院的经济来源实现过这种控制，不过当汉地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孙立平，1992）为佛学院提供了足够的财政支持时，彻底的压制已经不再成为可能。在 90 年代末期，佛学院已经拥有了数倍于色达县城的规模，无论是在交通、人口、商业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里已经成长为色达境内的另一个中心。

更重要的是，不少汉族信徒根本不愿意离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坚持留在了学院，还有些人虽然被迫离开了，但是在风波过后很快返回了色达。笔者无法在这篇论文里详细分析汉族信徒的信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既不声援西藏的独立事业，也不想真的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他们对佛学院的支持是宗教性的，几乎不带有任何的政治诉求。但是在国家的打压下，这些信徒还是会主动寻求各种途径来维系自己与佛学院之间的联系。只要有可能，他们还是会千里迢迢地赶赴这里，或是通过汇款捐赠与布施；他们会通过互联网传递佛学院的最新资讯；这也为境外媒体的声援提供了线索。在这些人看来，法王和他的佛学院是整个宗教世界的中心，而他们的生活意义也正在于此，他们希望法王能带给自己救赎与解脱，不过这种诉求并不像千年主义运动那样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

因此，佛学院的汉藏合作不是为了创造出与国家对抗的结构性领域，而是使社会成员免受国家的干扰，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个体的信仰自由。这种抵抗当然是政治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将两者的遭遇定义为一种“结盟”。这一结盟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扩展至整个康巴地区，很多寺庙都在积极发展着与汉地的联系，虽然佛学院仍然是这一藏传佛教东进运动的领导者，不过在 2003 年法王圆寂后，它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了其它寺庙的挑战。我很赞成杰玛诺的看法，佛学院是在采用一种与拉萨不同的模式对抗着国家（1998：220）。在拉萨，宗教与政治总是紧密地裹织在一起，各种宗教实践也往往用来表达对政治独立的诉求（Schwartz，

1994）。不过对于佛学院和其它一些康巴寺庙来说，宗教的繁荣始终是首要的，它们会很自然地通过吸收汉地资源来实现与国家的对抗。

因此，杰玛诺没有意识到汉族信徒的作用和意义，他提到了他们，却抹掉了他们的声音。如果说佛学院和其它寺庙的实践可以视为一种模式的话，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于：当西藏无力依靠自身的资源与国家对抗时，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选择了西方；康巴藏区却利用改革后的机遇成功实现了向东方的结盟（汉地在康巴的东边）。这种选择固然与这里的传统有关——康巴地区在历史上从来不缺乏与汉地的交流——不过在市场改革后的今天，它也体现出更为深刻的意涵。色达的经验见证了一种汉藏融合的形成，这一融合以宗教市场为媒介，而过去一直被视作西藏民族主义最前沿的僧侣阶层，即便依然对抗着国家，却也越来越被整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IV 尾声

随着法王的圆寂，很多原本在佛学院修行的汉族信徒转投到了其它的寺庙。2004 年笔者调查时，这里只剩下百余名汉族僧侣，国家的管制也没有过去那样严了，现在的规模似乎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佛学院在山顶处修建了一座坛城，23 间佛堂内供奉着藏区历史上八大教派的创始人及护法，此外还有一间汉传佛堂，他们选取了弥勒佛、玄奘法师和济公和尚来作为汉传佛教的代表。济公和尚是狂放不羁的癫僧，喇嘛们认为他有密教徒的气质⁴⁴，这或许是在强调藏汉佛教之间本已共有的大乘渊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很符合汉人喇嘛的身份，他们是从东部到西部来的求法者，考虑到不断发生的教派竞争，这一形象同时也是暗示只有在藏地才拥有最为正统的佛教。至于弥勒佛，它是汉地很受欢迎的佛教形象之一，同时也是佛教里的未来佛，这种组合是在预示着藏汉结盟必然会使佛法在人间得到繁荣。

目前，政府派驻的工作组在佛学院里修建了长期办公用的楼房，它象征着现代国家权力的监控。不远处的山顶上则是佛学院的旅馆，那里专供前来朝圣的汉人们居住。佛学院里的其它建筑都是藏式风格的木屋，这样在水平与垂直这两个向度上，两栋现代水泥建筑占据了空间里最重要的位置——旅馆在佛学院的最高处，办公室则位于学院的中央，这种空间布局象征着国家与宗教之间的角力和平衡。

上世纪 50 年代，在发动叛乱前，色达的地方精英曾经为未来县委的房建面积与当时的汉族官员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对于世代游牧的藏民来说，他们曾经认为这些现代水泥建筑象征着汉人势力的扎根(李晋, 2006)。在今天的佛学院里，两栋水泥房子同样影射着汉人，只是这一次后者被分为了两派：“办公室”象征着自 1952 年后延续下来的国家权力的监控；“旅馆”则指涉那些在市场改革后才释放出来的汉地的资源。至此，我们看到列饶朗巴的预言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藏传佛教因汉人的到来而衰败，却又因另一批汉人走向复兴。

¹ 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学研究科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² 需要指出的是，回族和伊斯兰教例外，当时的执笔人为杜磊 (Dru C. Gladney)。

³ 这期专号中收入了赵文词 (Richard Madsen) 和裴士丹 (Daniel H. Bays) 有关中国天主教和新教的讨论。

⁴ 如果可以的话，这一类别同样应该包括儒教。因为儒家正统理念已经通过官方运作深入到民间信仰与大众宗教之中。比如，韦伯选择儒教和道教来代表“中国的宗教”就可以视为对这一点的有力确证。

⁵ 实际上，对目前存在的“忽略少数民族”这一弱点的反思已经在中国研究的内部悄然展开。历史学领域可以参见罗有枝 (Evelyn Rawski) 的综述, Rawski, 1996; 另外可参见 Crossley, Siu and Sutton, 2006; 人类学领域则以郝瑞 (Stevan Harrell) 组织的书系为代表，参见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书系。

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传佛教与中国内地之间

在过去缺乏宗教上的联系，也不意味着汉族佛教徒中从来没有人信仰藏传佛教。实际上，在 20 世纪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着频繁的互动，参见张健飞、杨念群，2002; Welch, 1968

⁷ 笔者强调藏传佛教复兴是中国宗教复兴的一部分，并不是想卷入西藏问题的争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西藏确实与中国的其它地区一样经历了从社会主义政策到经济改革的转变，这种相似性使得关于藏传佛教复兴的研究完全有理由成为更广阔的中国宗教复兴研究的一部分，并利用其特殊性为这一领域提供补充和借鉴。

⁸ 关于市场改革后的藏区宗教复兴的研究，参见 Goldstein and Kapstein, 1998

⁹ 参见 Samuel, 1993: 256-63

¹⁰ 就我自己在调查和旅行中的感受上看，康巴藏区无疑是最近二十年来藏传佛教最为活跃的地区，这里有规模庞大的寺庙和定期举行的法会或仪式，以及在这些事象背后蕴藏的巨大的宗教资源。喇嘛或觉姆在这里的县城随处可见，此外还有很多前来朝圣的藏民或汉族信徒，这和西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 Matthew T. Kapstein 的判断，目前在中国总共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僧职人员约 12 万人，其中有近 10 万人隶属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寺庙。对于康巴藏区宗教繁荣的现状和原因，参见 Kapstein, 2004

¹¹ 宁玛派 (Nyingma Sect) 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支派，其它的教派还包括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格鲁派，关于各教派的简要介绍，参见刘立千，2002。简要地讲，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的旧派，公元 8 世纪，莲花生大师

(Padmasambhava) 将佛教从印度带到西藏，后来由于吐蕃王朝末期的朗达玛灭佛，藏传佛教在公元 8-10 世纪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而在 11 世纪佛教复兴后，新的经典被引入到西藏，那些恪守早先经典和仪轨的佛教徒就成为了旧派，随即有了“宁玛巴”的说法，“宁玛”在藏语中即为“古”、“旧”的含义。

¹² 西方媒体的报道参见 Faison, 1999; Liu and Mahakian, 2001; VOA, 2004; Tibet Press Watch, 2004; 日本媒体的报道参见 週刊文春, 2005。

¹³ 关于这一运动的背景、政策及过程，参见 Walker, 1966

¹⁴ 关于 1959 年之前的历史，参见 Goldstein, 1991、2007; Tsering Shakyas, 2000

¹⁵ 关于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可以参见彼得·比夏普 (Peter Bishop) 和唐纳德·洛佩斯 (Donald Lopez) 的作品。前者梳理了自英属印度时期到 1949 年之间的有关西藏的诸多文学作品，

并由此揭示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形象，参见 Bishop, 1989；后者则围绕若干重要概念和主题展开论述，指出西方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误解。参见 Lopez, 1998

¹⁶ 1984年，西藏正式对外国人开放，而第一位被允许进入西藏的西方学者是梅尔因·戈尔斯坦 (Melvyn Goldstein)，他访问西藏的时间是1985年。

¹⁷ 例如，Furer-Haimendorf, 1989；Powers, ; Avedon, 1986

¹⁸ 参见 Schwartz, 1994

¹⁹ 类似的观点常见于历史研究。在论辩帝国时期的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时，西方学者认为拉萨方面并没有将藏传佛教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视为自身臣属于中国的证明，相反，他们强调自己与中国之间是一种佛教施受者的关系，他们接受中国方面的供养，并回馈宗教的祈福，这样的观点抬高了西藏的地位并为西藏的独立提供论辩。参见 Goldstein, 1989: 44

²⁰ 实际上，“西藏—国家”与“西藏—中国”这两组对立在西方学者的讨论中经常存在着张力。比如在研究拉萨游行时，史华慈指出藏族的抗争最初是指向国家的政治反抗，后来才慢慢演变成针对汉族的族群反抗，参见 Schwartz, 1994: 218-221；在将政治反抗与族群冲突进行转化时，西方学者最常引用的事例是中国官方推行的移民政策。

²¹ 尽管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县这一级别，但是实际上色达非常偏僻，以牧区为主，其县城的规模在今天也仅相当于中国内地的镇的水平，因此在1955年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色达所实施的政策基本是与内地农村相类似的。

²² 参加叛乱的35个部落占到部落总数的73%；12座寺庙占到寺庙总数的50%；尽管官方宣布参加三次叛乱的总人数占到色达人口的20.5%，但是通过比较叛乱前后的人口统计可知参加叛乱的实际人数要接近45%；此外作为计算牧区财产的主要指标，通过比较牲畜存栏数可知叛乱者“胁迫上山”的牲畜数量占总牲畜的59.1%。参见 SDXZ, 1997: 10、189、357-358；SDXRKTJB, 1990

²³ 其中，宁玛派占据僧侣总人数的65%，噶举派20%，萨迦派10%，格鲁派5%，另有少量苯教和绝囊派的僧侣，参见 Germao, 1998: 65

²⁴ 佛学院从90年代初开始发行自己的汉语印刷物，其内容包括佛教经典、教材、法王教言、信徒访谈录等诸多方面，并开办藏传佛教的汉语授课。因此其内部出版物很多都是双语印刷

的。

²⁵ 汉传佛教讲究皈依三宝，即皈依“佛、法、僧”，但是藏传佛教是皈依四宝，还有“皈依上师”。

²⁶ 这里所说的“宗教文本”包括很多形式，它甚至可以不是真实的文本而是一些象征性的叙述载体，这在理解接下来的伏藏技术时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 José Cabezón and Roger Jackson, 1996

²⁷ 参见 Dreyfus, 1994: 210-212；关于格萨尔王与藏族民族主义之间的其它讨论，参见 Schwartz, 1994: 227-29

²⁸ 按照前段给出的理络，这也是法王在1990年前往印度访问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行动依据。反之，他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也成为了他作为列绕朗巴转世的确证。佛学院出版的印刷品里谈到了这次会面，参见 FWJMPCZ, 2001: 128-217；杰玛诺的介绍和分析，参见 Germano, 1998: 87-88

²⁹ 佛学院出版的法王传记里有如下记载：“法界金刚大师的伏藏品中授记……法王曾是印度阿罗汉萨革拉（《花鬘论》的作者），藏地阿闍黎鄂金第二佛莲师座下的持明者降魔金刚；文殊菩萨的化身萨迦法王萨迦班智达根嘎嘉村；格鲁派教主宗喀巴大师二大弟子之一的克主杰；木纳地方的根索秋扎（《入行大疏论》的作者）……又据伏藏大师离垢觉性金刚的伏藏品记载：尊者昔日是帕思巴法王、明朗教主、道孚大智者拉龙华多、列绕朗巴等，列绕朗巴再过五世成为时轮金刚军队的主帅，统领五万眷属降临人间消灭外道，凡与之结缘者均可往生香巴拉刹土。”参见 FWJMPCZ, 2001: 2。

³⁰ 这样的敌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王在宗教建设上的一些主张比如肃清戒律、重整寺院传统，触动了其他宗教精英和俗家修行者的利益；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的争夺。在笔者调查的过程中，汉族信徒转投其他上师或寺庙始终是五明佛学院最焦虑的事情，这在2002年法王圆寂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³¹ 佛学院里的一位堪布对汉传佛教对密教的诽谤撰文进行回击。

³² 参见 Goldstein, 1991: 50-51

³³ 根据史华慈的报告，拉萨的反抗者也将社会主义国家比作魔军 (Demonic force)，参见 Schwartz, 1994: 229

³⁴ 杰玛诺提到由于方言的缘故，佛学院里很少有来自卫藏的僧侣。这或许是密传没有提到卫藏的原因。参见 Germano, 1998:

³⁵ 有很多证据表明，当1952年官方的工作组

到达色达时，色达的地方精英不过是把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新的“汉人政权”。而这种意识在今天也依然存在。参见SDXZ, 1997: 47、514

³⁶ 伏藏技术是近些年来藏学研究的热点。可参见Thondup, 1986; Gyatso, 1986、1996; Hanna, 1994

³⁷ 笔者调查的过程中也听到了另一种说法，有喇嘛认为金刚萨埵主管忏悔，而汉地罪孽深重、最需忏悔，这才是法王的用意所在。

³⁸ 参见Faison, 1999; Eckholm, 2001

³⁹ 藏传佛教中有“意语身”的说法，指佛陀通过意、语、身这三种形式，为世间众生降福。

⁴⁰ 梁永佳在云南喜洲的调查中发现，民间经常讲“地藏王”误写作“记账王”，这应该能够证明其间蕴含着某种与钱财或救赎财有关的概念。参见梁永佳, 2005: 96

⁴¹ 收集于 2005 年 8 月 9 日

⁴² 这一数字由一个名为“国际西藏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的组织透露。参见Eckholm, 2001。日本媒体给出的数字则是 3000 人，参见週刊文春, 2005

⁴³ 工作组援引的对地域范围的限定早在 1955 年就开始实行。1955 年 8 月 31 日，中国佛教协会规定所有寺庙都只能接受那些来自其所在省份的僧侣，只有当个人所在的省份没有可供皈依的场所时，佛教徒才被允许到异地出家。这是一种加强官方控制的有效手段。参见 Welch, 1972: 120-121 页

⁴⁴ 譬如，佛学院的资料中经常拿济公与瑜伽士作比，参见NMDHH, 1998: 249。

参考文献

地方文献:

FWJMPCZ, 2001: 《法王晋美彭措传》，色达佛学院。

JGSDXFRYBZYGGJ, 1999: 《金刚萨埵修法如意宝珠仪轨讲记》，色达佛学院。

NMDHH, 1998: 《宁玛的红辉——今日喇荣山中的一块密乘净土》，色达佛学院。

SDXZ, 1997: 《色达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SDXRKTJB, 1990: 《色达县人口统计表》，色达县第四次人口普查。

中文文献:

李晋, 2006: 《色达的汉人喇嘛》，载郑也夫、沈原、潘绥铭主编: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

学硕士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第 172—228 页。

梁永佳, 2005: 《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立千, 2002: 《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民族出版社。

张健飞、杨念群, 2003: 《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文文献:

週刊文春, 2005: 知られざるチベットの巨大寺院, 週刊文春, 2005 年 6 月 9 日

英文文献:

Adams. Vincanne. 1996. “Karaoke as Modern Lhasa, Tibet: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ultural Politic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1, No. 4, Resisting Identities, pp. 510-546

Avedon, John F. 1986.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Birnbaum, Raoul. 2003. ‘Buddhist China at the Century’s Turn’, in *China Quarterly*, 174: pp. 428-450

Bishop. Peter. 1989.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a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ossley, Siu and Sutton. 2006.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reyfus, George. 1994. ‘Proto-nationalism in Tibet’, in Per Kvaerne, Ed., *Tibetan Studies*, I : 205-18. 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Eckholm, Erik. 2001. “Monitors Say China Pushes Tibet Monks from Study Site”, in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01

Faison, Seth. 1999. “A ‘Living Buddha’ Plants an Academy”, in *New York Times*, July 28, 1999;

- and in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31, 1999
- Furer-Haimendorf. Christoph von. 1989. *The Renaissance of Tibetan civilizatio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mano, David. 1998. '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Body of Tibet: Contemporary Tibetan Visionary Move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elvyn Goldstein and Matthew Kapstei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 53-9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stein. Melvyn. C. 1991.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stein and Kapstein. 1998.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yatso, Janet. 1986. 'Signs, Memory and History: A Tantric Buddhist Theory of Scriptural Transmission.'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9(2): 35-73
1996. 'Drawn from the Tibetan Treasury: The gTer Ma Literature', in José Cabezón and Roger Jackson. 1996. *Tibetan Literature*, 147-69. Ithacha, N.Y.: Snow Lion
- Hanna, Span. 1994. 'Vast as the Sky: The Terma Tradition in Modern Tibet.' In Geoffrey Samuel, ed., *Tantra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Tibet, 1-13*.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
- José Cabezón and Roger Jackson. 1996. *Tibetan Literature*, Ithacha, N.Y.: Snow Lion
- Kapstein. Matthew. 2004. "A Thorn in the Dragon's Side", in Morris Rossabi. 2004. *Governing China's Multi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iu, Melinda and Mahakian, Rusty. 2001. "Trouble in Shangri-La: A Religious Crackdown Targets Tibetans in Remote Sichuan", in Newsweek, September 17, 2001 Issue
- Lopez. Donald S. 1998.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vermyer, Daniel. 2003.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in *China Quarterly*, 174: pp. 307-316
- Rawski, Evelyn S. 1996.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4, pp. 839-50
- Samuel, Geoffrey. 1993. *Civilized Shamans: 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Schwartz. Ronald D. 1994. *Circle of Protest: Political Ritual in the Tibetan Upris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hondup, Tulku Rinpoche. 1986. *Hidden Teachings of Tibet: An Explanation of the Terma Tradition of the Nyingma School of Buddhism*. Ed., Harold Talbott.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 Tibet Press Watch, 2004. "Khenpo Jigme Phuntsok, Charismatic Tibetan Buddhist Leader: 1933-2004", in Tibet Press Watch, a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Volume XII, Issue 1, January/February, 2004
- Tsering Shakya. 2000.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enguin
- VOA, 2004. "Highly Respected Tibetan Buddhist Teacher Dies in Chengdu", Voice of America, January 7, 2004
- Walker. Kenneth R. 1966. "Collectivisation in Retrospect: The 'Socialist High Tide' of Autumn 1955-Spring 1956", in *China Quarterly*, No. 26. pp. 1-43
- Welch, Holmes. 1968.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Buddhist und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